Lingnan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Theses & Dissertations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1-1-2012

自我保護與 "另類" 實踐："雙向運動" 視野下的中國鄉村建設

Jiaen PAN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cs_etd

Part of the [Critical and Cultural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潘家恩 (2012)。自我保護與 "另類" 實踐："雙向運動" 視野下的中國鄉村建設 (博士論文，香港嶺南大學)。
檢自 http://dx.doi.org/10.14793/cs_etd.17

This Thesis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Studies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Theses & Dissertation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Terms of Use

The copyright of this thesis is owned by its author. Any reproduction, adaptation, distribution or dissemination of this thesis without express authorization is strictly prohib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自我保護與“另類”實踐：“雙向運動”視野下的中國鄉村建設

潘家恩

哲學博士

嶺南大學

二零一二年

自我保護與“另類”實踐：“雙向運動”視野下的中國鄉村建設

潘家恩

此論文為文化研究哲學博士學位課程之部分要求

嶺南大學

二零一二年

論文撮要

自我保護與“另類”實踐：“雙向運動”視野下的中國鄉村建設

潘家恩

哲學博士

本論文希望把中國鄉村建設運動放置在更為複雜與動態的脈絡下，嘗試以一種有別于“成王敗寇”邏輯的敘述與視野，通過參與者獨特的視角，結合起微觀與宏觀層面，將具體實踐扣聯（articulate）到近代中國轉型的“百年激進”、“百年鄉村破壞”、“百年鄉建”這一主線中。以理解鄉村建設的生命力、深層意義與內在困境，並在此基礎上對已有各種“類型化”評價認識、“刻板化”參照座標及背後的“意義系統”進行梳理與反思。

為更好實現以上目的，筆者借助卡爾·波蘭尼“雙向運動”視野，但努力避免因生搬硬套而“削足適履”式的尋找或對應本土及“三農”領域的“雙向運動”，而是更多借鑒其“視野”上的啟示。希望通過該“視野”的幫助，讓筆者可以更好的探討那些被遮蔽與忽略的面向，進而解決困擾筆者的理論思考與現實實踐問題。同時，本論文結合了歷史與當代鄉村建設的各組案例，實踐所蘊含的複雜性與豐富性也希望可以推進筆者對“雙向運動”發生及運作機制所展開的討論。

正如標題所示，本論文希望從“自我保護”和“另類實踐”結合起來的角度重新理解鄉村建設的定位與特點及其與“主流”社會的複雜關係及互動。它們既是鄉村建設的主要意義，同時也決定其將一直面對著各種困境與矛盾張力。

本論文借鑒文化研究的思想資源及其對脈絡與扣聯的強調，希望以此打破“研究者-行動者”、“理論-實踐”的習慣性分割。同時希望能跳出一般分析所隱含“樂觀-悲觀”、“積極-消極”的二元框架，也挑戰將鄉村建設納入“效果論”、“好人好事說”和“效果論”這三種常見的類型化處理。故本文儘量避免事實羅列、簡單代言與一般辯護，而是呼應以個人參與鄉村建設的生命史，反觀其中的興奮、困惑、不甘、無奈等複雜情感與認識，除此帶出對所存在社會基礎與宏觀環境的討論外，希望再次說明鄉村建設的動力與張力。

聲 明

本人謹此聲明，本論文為原創性之研究成果，所有已發表或未發表著作之引用，均已適當註明出處。

(潘家恩)

日期

畢業論文核准頁

自我保護與“另類”實踐：“雙向運動”視野下的中國鄉村建設

潘家恩

哲學博士課程

論文審查委員會：

_____ (主席)

梁旭明博士

_____ (校外考試委員)

古學斌博士

_____ (校內考試委員)

許寶強博士

_____ (校內考試委員)

陳順馨博士

導師：

許寶強博士

副導師：

劉健芝博士

代教務會核准：

施雅德教授
高級學位課程委員會主席

日期

目 录

导 论	1
一、 缘起与问题	1
二、 核心概念	7
三、 理论视野与方法	16
四、 章节结构	26
第一章 文献回顾：研究批评、传媒论述与影响	30
一、 研究与评论	32
二、 历史乡村建设批评	42
三、 当代传媒论述：以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为例	53
四、 影响与效果	61
第二章 “现代梦”的别样回声：乡村建设的脉络、资源与矛盾	64
一、“百年激进”与“三农问题”：乡村建设的基本脉络	65
二、 动力与张力：乡村建设的不同资源	78
三、“另类”的难处与现实：乡村建设的多重矛盾	83
四、 小结	91
第三章 “作新民”的乡土遭遇：以乡村建设中的平民教育为例	93
一、“双向运动”视野下的平民教育	93
二、“新民”作为语境	95
三、平民教育的多重面向	100
四、“遭遇”后的创新	106
五、 小结	114
第四章 生态与生计：以乡村建设中的生态技术为例	116
一、 生态与生计	117
二、“正向运动”的限定与影响	119

三、 技术作为空间·····	126
四、 小结·····	136
 第五章 经济与文化：以乡村建设中的农民合作与城乡互动为例·····	138
一、 经济与文化的“另类”视野·····	138
二、 经济文化一体化：农民组织案例分析·····	142
三、 “乌托邦信条”的虚幻与挑战：城乡互动案例分析·····	152
四、 小结·····	163
 结 论 ·····	164
一、 “双向运动”与“双向运动”视野·····	166
二、 “双向运动”视野下的中国乡村建设·····	169
三、 不足与讨论·····	175
 后 记 辩护与理解·····	180
 参考文献 ·····	186

世界各地的人都渐渐发现文化研究是一种不同的做研究和做知性政治工作的方式，因为它既认真看待文化和流行文化，但也用更复杂的方式思考，明白到事情的复杂性，不会说一个很简单故事。人们渐渐理解简单的故事不再能让我们找出正在令世界改变的力量。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2010：9）¹

新问题开创了新的追问角度，并延扩和转变了历史的轮廓。在早先的理论框架中是处在研究边缘的材料拥有新的意义，并推动我们寻找新的回应材料。

（杜赞奇 a，2003：15）

导 论

一、缘起与问题

自2000年起，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走进了乡村建设并持续至今。还记得那是一个深夜，因为学生社团的工作而不得不到半夜才蹑手蹑脚的回到宿舍，为不影响室友们的休息，在微弱的手电光下打开一本友人自费印刷的《告语人民》²。正是那本书震动了当时的我——既因那段一直存在但却被我们有意无意掩埋的历史，也为晏阳初所取得的成绩与光环。更重要的是：晏阳初的人生经历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同样都是从志愿者开始，都是尝试建立一个社会团体以汇聚力量，都认为必须回到民间。但其所主张的“向平民学习”又不是简单浪漫的抬高或一厢情愿，而是基于自我反思与重思我们与他们、理论和实践等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现其中的困境及深层原因，并终其一生保持着不变的热情、行动力与平和心态。

晏阳初还说过人的热情是可以感召的，那一晚的阅读恰如其分的感召了我，将年轻学生自以为在开创历史的小小“自负”续入那场虽然充满差异、虽不像后来叙述中再现之“辉煌”，但却充分体现着知识分子理性自觉的“另类（alternative）”实践中。它让夹杂着盲目自信与彷徨矛盾的我，不再患得患失，

1 即美国文化研究学者 Grossberg, Lawrence，大陆翻译为劳伦斯·格罗斯伯格，香港有时翻译为高士柏，为前后文统一，此处及下文都取大陆通用译法。

2 该书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与晏阳初访谈后，于1945年以英文出版的访谈录，后以《告语人民》为名翻译为中文并作为附录收录于《晏阳初全集》。2003年，该书与晏阳初各时期代表性作品一起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书名即为《告语人民》（宋恩荣编）。

不再奢望于想象中完满的社会改变，而是从自己的反思和改变中去积聚与发现那些零散微弱但却不可轻视的建设力量。

随后就有了我这些年来分别在大学支农社团、河北定县翟城村、北京郊区所参与的乡村建设实践。实践中许许多多的故事与案例、经验与反思、兴奋与失落将在后面各章中陆续讨论。此处先交待一下为何会有这项研究，为何我要主动去书写这样一段似乎因包含叙述者在内而不够“客观中立”的经历。

2007年5月，我们被迫离开工作并生活了三年十个月的河北定州翟城村和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³。笔者在乡建学院中负责的是培训工作，虽然随后做过一些努力，还是发现短期内无法直接的继续原有培训。同时这么多年来，我也慢慢厌倦了部分 NGO 某种程度上的自说自话与“鹦鹉学舌”般的运作逻辑，花哨的包装与众声喧哗下的滔滔不绝，仍然掩盖不了语言的贫乏与思想的困境，钝于反思、轻视学习，最后只能异化为圈内的玩笑——“大白纸+记号笔+NGO 话语”，似乎每过一段时间都可以在不同的会上碰见同样的朋友，听着同样的话，玩着同样的游戏，学着同样的项目申报技巧……。

所以，笔者就提前开始了自己心中已有的计划——回到“象牙塔”，以继续自己的不甘与对另一种状态的尝试：在行动上求同存异，而在思想上求异存同。

于是，我来到了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不会粤语、没有文科基础和“当逃兵”的内心不安，让我在痛苦煎熬中过了前半年，但它也坚定了我的决心：如何珍惜这样难得的时间与空间，通过认真系统的学习和反思，总结多年来乡建同仁们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同时为一线的同仁提供一些新的视野与交流材料。

工作的第一步，无疑是对原先被自己忽视的学院知识加以认真对待，在此过程中发现：与“三农问题”等现实问题高度相关的乡村建设实践，各种相关研究及资料也不少，但很多研究停留在“改良主义、民粹派、西化派/本土派、危机一反应”等类似的表述和归纳（本论文第一章文献回顾将详细讨论），并多以效果为中心，在“成败⁴”与“肯定/否定”程度上争执不下。

3 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于2003年7月1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原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中国社会服务及发展研究中心（香港）、国际行动援助中国办公室、翟城村村民委员会、晏阳初农村教育发展中心、中国村社促进会现代化建设专业委员会在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联合发起成立，学院属于社会力量办学的公益事业，遵循非盈利原则，实行“劳动者免费就学”。秉承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前辈的平民教育理想与乡村建设精神，通过研究实践国内外及历史上各种乡村建设思想，培养乡村建设综合人才，推广乡村建设和农村综合发展实践经验。因“不可抗力”，学院于2007年5月15日中止，转移至北京等地继续开展乡村建设。

4 例如，梁漱溟参与的河南村治学院、陶行知发起的晓庄师范、温铁军为院长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都

而在处理乡村建设与现代化的关系上，基本有着两种看似对立的类型：“走向（现代化）⁵”与“拒绝（现代化）”。两种都将乡村建设与现代化简单的分割开，而忽略两者之间复杂⁶的互动关系。这既容易将乡建等同于“传统”，将这种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以针对现代化的“另类”反应定型化和简单化，也易将“现代化”简单等同于外来的“西化”——这既为评价者和行动者可能出现的“浪漫化⁷”与“简单化”提供了条件，它还让乡村建设所提出的关键命题轻易逃脱：比如，立足乡土中国这一基本条件，如何保持对各种形式以城市化与非农化为特点之走向的警醒与批判？面对强大外部主流⁸所产生的定型化效果，我们对于知识分子角色和现代知识是否可能有新的想象与实践？……。

类似割裂还使历史与当代这两场乡村建设的内在深层呼应只流于表面和形式，八十多年前的历史实践对当下同名运动的启示似乎只剩下具体经验的技术性总结。讲述者和后继者在对历史先行者的精神和道德进行适度“景仰”后，就快速回到现代社会的处事逻辑，迫不及待而又轻易地进行着分类打分与成败论定。

但实际上，无论历史还是当代的乡村建设实践，从来都直接面对着以都市化、工业化、非（去）农化为表现形式的现代化洪流。其对即将被摧毁抛弃的“农业文明/乡土社会/小农经济⁹”的“另类”实践及随后所陷入的困境，其对另外一个世界的想象和遭遇，以及在主流社会中所引发的反应、叙述与互动，本身就构成了我们反思有着几千年农业文明的传统农民大国在现代化转型中各种困境的绝好症候（symptoms）。

然而，如此以知识为战场的实践，绝不仅只需处理知识脉络本身的问题，更需要面对社会运动与学院长期的相互隔膜及由此将实践与理论相互对立所导

曾经被“非正常手段”关闭，存在时间均不超过4年，晏阳初的定县实验则因日本侵华而中断，这些都被一些叙述作为他们各自“失败”的有力论据。

5 如有研究认为：“乡村建设企图使中国农村汇入现代文明洪流，是努力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次可贵尝试”（何建华、于建嵘，2005），该观点转引自中央教育研究所宋恩荣研究员。

6 本论文将不断提及“复杂性”，因为根据劳伦斯·格罗斯伯格（2011：352）所述：“当然文化研究关注的整个焦点，在最后，不是关于任何一件事情，而是关于复杂性”。

7 这些都将在后文有具体的讨论与展开，此不详述。

8 本论文不同部分使用较多的“主流”，在此需要特别说明：笔者所认为的“主流”是指在不同的脉络下相对占据主导性位置的力量（政治、经济、资源分配等）或论述的相对性指称，其中主导性不一定等同于数量上的多寡。如中国农民的人数众多，但其经常属于被主导的处境。在此意义上，与“主流”相对应的概念在不同脉络下略有不同，既可能是“边缘”，也可能是本论文中有特定含义的“另类”（详细讨论见本论文的结论部分），具体为何，需回到具体脉络中详细分析。

9 根据温铁军（2009:23）的分析：“实际正是中国这种‘小农村社制’的经济条件，通过把外部性问题转变为家庭或社区内部的非交易关系，才得以长期维持传统农业”。

致的反智趋向。我们当然需要对知识和知识分子角色进行反省，因为面对当下社会，知识分子无论是选择“躲进小楼成一统”的规避与清高，还是怀着对理想社会自恋式乡愁和乌托邦志向，都不足以真正有效的应对问题。但所需要的反省也不应是“回到一种知识分子原罪式的自我鞭挞中，或重新陷入到一种知行对立的悖论当中，更不是要即刻做出‘行动，还是思考’的抉择——这正是现代性话语内在建构出来的困境。而应该对整个我们所拥有的思想传统和思想资源的一种反省和再度整合。”（戴锦华、斯人，2006：157）

带着这样的问题与视角，我以“实践-研究者”的新视角重新翻开了自认为熟悉的乡村建设历史与现实。

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调查，上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全国从事乡村建设工作的团体和机构有 600 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实（试）验区有 1000 多处¹⁰（郑大华，2000：456）。面对中国各方面普遍危机的时候，既有传统儒家士绅，也有受“西学”影响的洋博士，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创历史般地集体离开书斋、大学讲坛和舒适的大都市，自发形成一场初具规模的乡村建设运动，并认为这样做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¹¹”（艾恺，1996：201）。

根据梁漱溟撰写多年并深以为重的《乡村建设理论》之分析，乡村建设既产生于“各种救亡图存而要求社会积极建设思潮”之中，也因为当乡村破坏成为主要趋势而激起“救济乡村”和“乡村自救”的不同努力，更源自当千年社会秩序崩溃，但新秩序尚未确立下，某种寻找第三种力量重建社会构造的努力¹²。然而，无论是让今天的我们听起来略显悲壮的“乡村自救”，还是让行动者似乎拥有道德光环的“救济乡村”，在梁漱溟对乡村建设的缘起分析中虽有各自的位置，但却不可割裂开后单独通过其中的一部分去把握和理解乡村建设（第二章和结论将详细讨论）。而不管是“被救”还是“自救”，都可能因为“救”的紧急性与临时性而取消我们对乡村建设展开时中国社会整体性问题与影响的把

10 以平教会为例，1926 年到定县的工作人员是 66 人，1928 年是 82 人，1929 年 204 人，1932 年 224 人，1935 年达到 500 人；而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仅自己研究部和训练部培养的学生，留在实验区工作的就有近千人之多（郑大华，2000：538-539）。同样根据该作者判断（2000：461-462）：“乡村建设团体既包括各教育和学术团体、大中专院校、民众教育馆，也包括国民党中央部门、地方政府。前者是乡村建设运动的发动者，目的主要是为了复兴农村经济，实现‘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后者只是乡村建设运动被动的参与者，从事乡村建设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国民党统治，维护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

11 梁漱溟本人则认为（2005:161）：“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体中国社会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

12 详见梁漱溟（2005）及论文第二章。

握，因此容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般的将乡村议题从整个中国议题与历史脉络中抽离出来，却放过更为核心的问题与更有意义的思考。

数十年后，当中国再次展开举世瞩目的“激进”改革并因“中国崛起”而重新成为世界焦点，虽然与第一波乡村建设时期岌岌可危的没落帝国形象完全相反，第二波乡村建设却在新时期再次出发，在“解构现代化”中尝试以“另类”实践去回答“我们到底要什么”¹³，继续回应着与当年相关的议题：如现代社会对农村的影响、城乡关系、知识分子与民众、农村改革（教育/医疗等）基本方向等，并在新时代中增加了生态可持续这样的内容与角度。

当代这场民间自发的乡村建设不希望让农村成为拉动内需名义下城市资本的避难所，也不愿让农村成为有闲阶级与城市中产社群遥远的美丽乡愁或现代危机下的某种修饰，它们更不希望以此附庸出现代社会所常见而必要的道德姿态。

面对这样一段复活着的历史，当下的我们该用一种什么样的角度看待 80 多年前即开始的忧虑与思考？在时间和空间上有了一定的抽离并暂且放下政治正确¹⁴这一限制后，我们可以有着什么样的新解读？

为何这些实践会不约而同、充满张力而又彼此呼应着相似的批判和思考？为何乡村建设会成为不同背景学科与出发点下“另类”知识分子的某种殊途同归？面对如此多的困难与曲折，为何乡村建设仍具有着不竭动力与坚韧的生命力¹⁵？作为一个实践者，具体到自己及同仁们的工作，虽然深刻体认到大家的努力与付出，但为何在现实层面，所追求的目标和实际出现的结果却永远存在着较大的偏差？与此同时，无论历史和当代的乡建实践者都难逃如此被表述和归纳的困境：在成败论英雄式的主流逻辑影响下，以“好人好事”为特征的个人化和例外化处理方式，通过将“另类”定位于主流叙述所允许存在的特定位置，进而把行动者通过“另类”实践所推动的复杂思考与挑战性创新简单化和类型化而无害化（文后各章将进行详细讨论）。

13 参见温铁军同名的两本书：《解构现代化》（2004b，广东人民出版社）和《我们到底要什么？》（2004c，华夏出版社），其中温铁军通过以中国国情与“三农”问题为事实基础，反思质疑了建基于“五百年殖民历史”的现代化论述之普适性。

14 如主流政治影响下乡村建设的类型化特定评价，详见第一章的文献回顾部分。

15 根据温铁军在推动当代乡村建设逾十年的总结：“大家不必高官博带，也不必登高一呼，每个人都似乎在浅吟低唱，声音却震动大地。我们没有媒体，但却有大量媒体报道，我们没有权力，但却有无数成千上万的人自觉自愿地参加。我们甚至不提供什么指导思想，什么纲领，理论体系，我们甚至反对对自己搞一套体系，因为那样成本太高，我们穷到了没有任何能力支付组织成员的劳动工资，但它却坚持了十几年（梁鸿，2011：83）。 ”

基于以上困惑和问题，我尝试通过自己的研究，重新思考并挖掘乡村建设的资源、意义、困难与更大空间，探讨“另类”实践在现实中的各种限制因素、条件和可能形态。进而理解：面对中国这样的农民大国¹⁶和因现代化转型所产生的巨大现实压力、成本转嫁与国情¹⁷等限制，发生于本土和乡土¹⁸脉络下的乡村建设，如何在卡尔·波兰尼所称“双向运动”视野下，以“自我保护”和“另类实践”为特征与定位，进而在实践与理论层面上充满张力的复杂展开。

正是以上研究动力与问题意识，让我选择以理解乡建和重思乡建为本论文的目标，它不是一般意义的乡建叙述或整体性呈现，而是通过重思与发展新视野以建立一种不一样的分析框架，以此尝试对抗一般关于乡村建设的主流叙述，进而帮助我们更准确的理解与定位乡建。

也正是这个基本目标，决定本论文所选择的具体脉络、分析单位与分析方法——以已有乡建主流论述与认识为对象，结合各种实践案例进行脉络化分析。在具体分析中，非采取一般的描述性叙述，而是对话性讨论；非以“三农”为直接研究对象，而是以乡建运动的行为、遭遇的困境及所面对各种“偏见”与定型化认识为对象。

也即，本研究不是以叙述为目标，而是希望可以超越主流论述中以各种“好人好事”和“效果论”为特征的取消问题式简化解读与处理方式（详见第一章讨论），将乡村建设、中国问题及“另类”道路探索结合起来，只有做到跳出狭义乡建看乡建¹⁹，才能更为准确的对乡建进行理解。因此，本研究所涉及的跨度和范围相对较广，各部分中较多使用的注释可以理解为对各种相关背景与复杂脉络的简单交代或说明，以为全文的对话和讨论提供铺垫。

16 从农产品商品化率、各种农业资源匹配情况看，中国都不应是一般意义上的农业大国，但却可以说是农民大国，无论就人口数量还社会形态来说。但此非“大国崛起”意义上的自我标榜，而是对基本国情与限制的提醒与自觉。

17 需要指出的是，要对各种常见习惯性表述保持特别的警惕与反思，此处及下文中的各种“国情”表述需挑战“民族-国家”的一般性框架，也需要挑战其背后隐含的“自上而下”及以“国家/权力”为依据的发言位置。但与国内常见表述统一，暂使用这一表述，但笔者认为本论文中的这一概念都应还包括乡情、村情，也即各种层次的现实限制。

18 本土和乡土高度相关但略有区别，前者强调相对于“全球/国家”的“在地/区域”，后者更强调相对于现代社会及主流逻辑的乡土社会与乡土文化。

19 类似自觉一直存在于梁漱溟的认识中，1930 在其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所拟定的设立旨趣与办法概要中即指（1930：224）：“想要农业发达，不是农业片面的事；在其社会的方方面面（政治经济教育）都有密切关系，而实为整个乡村的事。如此方方面面都顾到的促兴农业，换句话说，那便是‘乡村建设’了”；再如，梁先生 1940 年在“答乡村建设批判”明确指出（2005：594）：“我们的工作纵然在教育，其意义却非止于一种什么教育运动；我们的工作纵然在经济，其意义却非止于一种什么经济运动；我们纵然埋首乡村，却非不问政治；我们纵然身在内地，而眼光正无妨在国际问题民族解放。”

二、 核心概念

关于乡村建设的文献与研究叙述将在论文第一章中详细展开。这里只是简单指出：一方面，现有研究多局限于单一学科框架，并未能将历史与当代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并很大程度上受到成王败寇的胜利者史学观之限制。另一方面，部分研究以浪漫化的道德（英雄）主义为视角，并以模型化和理想化后的乡村建设实践与论述为讨论对象，因而对实践本身的复杂性及其与社会及外部环境的充分互动感知不足，不自觉中简化了乡建实践者的反思与主张，并因此而阻碍对乡村建设实践进行更加准确和深入的把握。

同时作为乡村建设的研究者与实践者，温铁军的观点与一般学者不同。从“三农”问题开始，无论是“百年工业化”，还是近期所讨论的“百年激进”，他始终强调多维度的立体分析框架与整体性宏观视野，挑战常见的“左-右”二分逻辑，不断提醒我们需要回到具体的历史脉络与国情限制下，并坚持以“三农”作为基本的立场与出发点。

因为是经济学家，有人也指出其分析中存在经济决定论的不足，但温铁军在乡村建设实践中其实十分重视各种非经济因素——文化、社会、生态等角度。笔者认为，尽管他的分析已包含文化的因素，并让文化在“手段-目的”的二元对立中得到统一²⁰，也跳出一般意义上对文化的狭义理解，使之拓展到生活方式、多元文化等十分丰富的内涵上，但文化在温铁军的视野中与经济、社会、生态等其他因素似乎仍然是分割的。作为其所推动的当代乡村建设实践团队成员，笔者尝试运用文化研究学术训练，从新的角度进行拓展与补充。以下先介绍本论文即将涉及三个核心概念：

1、双向运动

在近年来引起中国大陆学界关注的《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波兰尼提出了“双向运动（Double Movement）”的概念。通过对百年历史的宏观分析，他认为：以激进与乌托邦为特点但表现各异的“正向运动”狂飙突进，但其相应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反向运动”也同样宽广的存在着。它可能包括着“人的反抗——劳工运动；自然的反抗——农业人口的土地保护运动和现代的‘绿色运动’；金钱的‘反抗’——商业钱的周期波动与中央银行制度

20 如在其推动的农村合作组织文化建设实践，其中的文化既是手段也是目的。

的建立”（许宝强，2001: 69）。

如此相对的“双向运动”不仅限于在经济意义上让市场和经济“脱嵌-嵌回”于社会，同样有助于我们对全面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背景下对乡村处境的全新理解。波兰尼就在书中以长十九世纪的欧洲史为例，认为正是保护主义的“反向运动”实际上“成功地使欧洲乡村稳定下来，也成功的削弱了那个时代的灾祸朝城市蔓延”（2007: 158）。

“正向运动”之所以有效和强大，因为其背后是日益演化为一种信仰、无限的行动主义、世俗宗教、社会计划、社会组织原则的经济自由主义信条（波兰尼，2007: 116-127）。

借助这样的视野，近代中国同样存在着以“百年激进”为特点的“正向运动”力量及想象——作为数代主流知识分子追求与梦想的现代化大计，及在这一想象下产生的对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知识生产、评价体系在内的各种影响、认同、依赖与迷信。无论是先后以日本、苏联、欧美为师的时代潮流，还是“超英赶美”、“大国崛起”的新时代变奏，皆一以贯之的以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以工业化、都市化、法制化、理性化等为基本特征，将现代和传统分割并对立起来，尝试让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卫生等方面实现全方位转型。

具体到“三农”领域，则表现为：脱离基本国情和生态环境等脉络限制，无视各种形式反抗的既有存在，坚信大规模、快速、自上而下以工业化²¹和城市化内容的现代化改造将不产生过度成本，城乡及不同阶层的人们可以相对均衡的获取收益并均摊成本。在这种乌托邦式的信念影响下，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乡村“三要素（土地、资金、劳动力）”大规模流出；相应推出农业产业化²²则加剧农业资源的快速资本化；意识形态上的非农化价值取向则促使乡土社会基础与价值体系的根本颠覆——以西方社会的个体理性替代东亚小农经济的村社理性，进而造成最大弱势群体的农民与最无言的生态环境承担这种巨大转变的实际代价，并通过各种意识形态与意义生产上的“自然化”与“合理化”操作

21 需要指出的是，正如帕沙·查特吉在《二十一世纪农业文化》一文中所指（2007: 199）：“早期工业化的技术状况形成了对于工业劳动力的大力需求，而这些状况已经一去不返了。今天资本主义的发展较几十年前具有更多资本密集型和技术依赖性的特征。大量农民不可能被吸收进新的资本主义增长部门”。

22 “激进”的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所产生的不良后果（如“增产不增收”等）近年来日益显现，其中一个极端但却显示着某种逻辑必然的案例是2011年4月16日山东济南市唐王镇39岁菜农韩进因“8分钱一斤卷心菜”而自杀事件，详见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04/23/5931309_0.shtml。

进行遮蔽。

然而，对于以原住民性质的农业人口占大多数、并以农业文明为主要载体的乡土中国来说，这种“去脉络化”（脱离基本国情与来自生态、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限制）的激进“正向运动”——既产生出“三农”危机这样的后果及极端表现形式，也遭遇来自“三农”各种直接及衍生形式的“自我保护”。

在波兰尼（2007：121-132）的理论中：就像被拉开的橡皮筋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反向运动”广泛和全面，发生在无数毫无联系的问题上，在直接受影响的利益之间也找不出任何明显联系，因为其对应的是“根本性社会利益”，其绝大部分都具有务实性和实用主义特征，行动所针对事项的多样性更让人炫目。同时波兰尼提醒我们：讨论“反向运动”不仅要从经济和利益的角度，还应包括自由和尊严等角度，因为我们不应“将所描述的保护运动归因于阶级利益，而是归因于被市场所威胁的社会实质”（2007：138）；由于“依仗直接受到市场有害行动影响群体各种各样的支持；它运用保护性立法、限制性的社团和其他干涉手段作为自己的运作手段”（2007：114）；“挑战是针对社会整体的，应战才是来自团体、部门和阶级的。”（2007：130）

但我们不应“浪漫化”地看待这种“反向运动”，也不可顾名思义将“自我保护”理解为完全积极意义上的“还原论”——就像橡皮筋崩断，其同样可能产生更大的破坏或危险的政治经济停滞（布洛克，2007：16、19）。

中国“三农”领域的“反向运动”，本身的保护性和反应性决定其与其它“反向运动”一样，没有清晰的类型与固定表现形式，也无终极目标与计划，同时可被不同力量所影响。既可能产生积极效果，也可能通过将本土或乡土本质化与浪漫化而导致真正的保守与盲目排外。

根据波兰尼分析的重点，不是“反向运动”本身将取得胜利，而是“正向运动”建基其上的乌托邦假设本身的虚拟性。中国“三农”领域的“反向运动”之所以存在着各种可能性²³，恰恰因其对应“正向运动”所建基其上之假设的“虚拟性”——如以“消灭农民”、“三农一农化”、“城乡脱钩”为特征主流意识形态（详见第五章案例讨论）。故重点不是悲观或乐观的预言式期待，而是通过类

23 正如前面所提，“反向运动”有着多种形式与表现，“农民维权”这样直接的反抗相对容易理解，“三农问题”本身也可以从“反向运动”角度进行理解，因为其针对和尝试改变的是“正向运动”及其想象与信条，通过“三农问题”让原来“自圆其说”的整套说法出现裂隙，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本论文意义上的“反向运动”。

似的“双向运动”视野以避免我们讨论的简单化，并以此为“另类”实践空间的反思与打开提供启发。

各种层次上的“双向运动”非在不同时空中平行发生，而是在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进行着包括制度设计、经济利益、文化意义生产²⁴等方面进行着角逐、拉扯与互动，因此乡村建设不简单对应于“反向运动”或“正向运动”，而是两者互动后产生并同时兼顾“双向运动”部分特点的“另类”运动。所以，我们需要拒绝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与基于道德立场上简单化的价值判断，首先是以“双向运动”为视野，让乡村建设摆脱“效果论”与“好人好事”这两种常见的分析路径（详见第一章文献回顾）。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通过本论文的研究与写作，笔者认为“双向运动”与“双向运动”视野需进行一定区别。正是波兰尼的理论告诉我们，“双向运动”的不同力量一直相伴存在，但我们却经常只具“单向运动”的视野，它既可能是由“正向运动”所主导，也可能在特定时空与脉络下较多体现“反向运动”的影响，两者都非波兰尼理论中应有的完整视野。

正如标题所示，本文更多讨论和使用的将是后者——即“双向运动”视野。除因其可更好帮助接近研究目标与问题，打开原来被遮蔽的面向与空间外，笔者还隐约感觉到，当我们直接以“双向运动”为框架进行一般意义的现实指认、预言或命名²⁵时，既可能掉入“盲目乐观²⁶”的陷阱中，还可能失去对其视野意义上更具启示性的把握。

24 详见第一章的理论讨论及随后各章的案例分析。

25 中国本土研究可参见：王绍光，2008，《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作者认为：在1990年代短暂经历了“市场社会”的梦魇之后，中国已出现了蓬勃的反向运动，并在催生一个“社会市场”。

26 参见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结合当前全球劳工运动已有研究，而在《从波兰尼到盲目乐观：全球劳工研究中的虚假乐观主义》（《开放时代》，2011/10）中的批评。笔者认同在实践和现实层面对“盲目乐观”和“虚假乐观主义”进行批评有其必要，它实际也体现在笔者对当前中国主流社会运动及主流NGO的批评，详细讨论参见随后各章的具体案例。但笔者认为这些问题不是波兰尼理论本身所必然引起，而是我们仅在实体意义上理解和判断“双向运动”所致，“双向运动”不仅是抽象意义上的力量描述与趋势判断，更是一种动态和整体性的视野。如果在视野意义上，所谓“盲目乐观”和“虚假乐观主义”，恰是某种受“反向运动”力量主导之“单向运动”视野的静态观点与结果。此外，该文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其实都对波兰尼理论中已隐含的“文化”因素引起足够多的重视和讨论，这些都是本论文尝试努力的方向。另外，Michael Burawoy 所做的一个推测（2011:96）意味深长：第三波市场化浪潮的危机，会通过一系列由于非自然灾害而产生的环境危机——气候变化、海啸、地震、石油泄漏、核事件、有毒废料排放——而得到发展。笔者将在第二章中使用“整体性危机”这个概念，并在第4、5章中进行详细讨论。

2、激进/脉络

正是在“双向运动”的视野下，“激进”和“脉络”成为两个重要的概念与关键点，“脉络”则包括“去脉络化”和“（再）脉络化”这两个延伸概念。在本论文的讨论中，笔者认为：作为以农业及原住民为主要文明类型与人口构成的超大型大陆国家，百年中国在“遭遇”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并进而引发的本土“正向运动”是以“激进”为特征。这种“激进”的具体表现与实现手段为“去脉络化”——脱离适当的时间、空间与社会关系。对应的挑战和处理则为“（再）脉络化”，随后各章将进行具体使用和分析。

关于知识界和思想界对“激进”的讨论及其如何构成乡村建设实践的基本脉络，将在第二章中具体展开。此处简单交代为何不采用主流对“激进”的一般定义，笔者认为：除暴风骤雨式的革命与政治变革外，中国本土脉络下的“激进”还应包括不顾乡土社会、小农经济与生态国情等脉络限制，大规模而又快速的推动以“工业化、都市化、理性化”等为特征的现代化转型，除政治面向外，文化与经济也应是讨论“激进”时不可忽视的面向。

面对资本主义 500 年殖民史所建立的世界体系与现代逻辑，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在近代历史上饱受欺凌的国家，以富国强兵为特征的梦想、想象、目标与整体性的社会焦虑，因一定意义上的正义性而成功的回避了批判性的审视与分析，但由此所引发的“激进”与“去脉络”从来都是挥之不去的真正问题。所谓暴力革命，仅为形式多样、或隐或现诸多“激进”中的一种。如果具体到以“三农”为立场，“激进”则不仅涉及五四新文化运动、共产革命、文化大革命、新自由主义等左右翼思潮，它也指忽视各种现实条件与弱势群体利益而强势推动的全面都市化、嫁接于乡土社会但高成本的现代治理、为“三农”危机的转嫁而合理化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甚至是带点浪漫的非政府组织的扶贫与环保主张。

由此所引出百年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态等方面的“激进”脉络，将在第一章中详细展开。此处仅以几个代表性年份或事件做一简单勾勒：

自鸦片战争以来，历经太平天国、甲午海战、戊戌变法、庚子事变等系列挫败，“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层面在内的全方位转型及古老历史在新世纪的骤然断裂”（许纪霖、陈达凯，1995：2-3），因此激发起对数千年农业文明存在形态（包括与乡土社会相适应的文化特征、心理意识等）的拒绝与猛烈批判，

进而引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农立国-以工立国”大论战，外加各种现代思潮对“三农”议题叙述与处理范式上的影响，以致除经济基础的激进化而在广大农村地区产生革命土壤外，乡村社会中的文化价值取向与评价标准也逐步开始激进化。按照梁漱溟的说法，即“自毁”配合着“他毁”，让近代中国历史成为一部名符其实的“乡村破坏史”（详见本论文第一、二章）。

1950-1970年代，通过土地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而获取全国政权的共产党，虽然主观上清醒认识到中国独特国情与小农村社经济这一基本现实，但迫于外部国际形势与客观环境的变化²⁷，为应对当时另一同样重要但却在不同层次上的脉络——“二战”以来席卷全球的现代民族国家独立浪潮，进而获取真正意义上的民族独立以雪洗百年耻辱，则必须通过提前²⁸完成工业化以为现代经济与现代国防提供前提性的物质基础，因此而对广大农村的经济基础与治理结构采取影响至今的“激进化”改造。对于这段特殊历史，笔者认为一方面既不应认同主流叙述中相互对立的简单化认识或以置身当代的今人角度去评判，而需放回当年特殊的国际国内脉络下进行理解；另一方面，更需清醒看到，不管原因为何，该时期对“三农”所进行的“激进”改造，其负面影响持续至今。

1980年代至今，虽然政治意义上的“激进”思潮与实践似乎对“三农”松绑，但经济上的“激进”改革却让“三农”在“市场化、全球化、非农化”的时代强音中默默承受着各种危机转嫁的代价，并最终世纪末的“三农”危机而集中爆发²⁹。与此同时，“后冷战³⁰”时期消费主义与城市中心导向的新意识形态还对经由长期工农革命传统所形成的民众文化进行着根本清算，社会主义时期关于“集体、社区、劳动模范”的强调则悄然让位于“个人、私领域、道德模范”。更多变化则可从80年代以来农民形象的变迁及近年文学评论界关于“底层文学”的讨论中略见一斑。虽然这种文化与意识形态上的“激进化”因间接而显隐蔽，但其同样产生着深远影响。

27 关于建国后农业政策变化及朝鲜战争对其影响的分析，参阅温铁军（2009）：《“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8 实际上已经是滞后了，因为百年中国在此前的晚清和民国就已经进行了两波未成功的工业化，详见：温铁军，《百年中国 一波四折》，《读书》，2001，第3期。

29 “三农问题”最初由温铁军于1996年提出。2000年初，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写信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三个方面也可以概括为“三农危机”的基本表现。2001年“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正式成为大陆理论界和官方决策层引用的术语。

30 戴锦华认为（2012：125）：“冷战年代的一个最大的创造是冷战思维。这种两大阵营共享的冷战逻辑在今天仍然是冷战年代遗留给我们的最沉重的债务，依然是统御着我们思路的一个基本方式。而‘后冷战’时代到来之后，在世界范围之内存在一种想象力枯竭的状态”。

3、乡村建设

据梁漱溟所指：“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個中国社会之建设，实乃吾民族社会重建一新组织构造之运动”（2005: 161-162）。同时他认为：“自毁”和“他毁”之后的中国需要更根本和整体的思路，需要建设“新社会、新生活、新礼俗、新组织”，但核心要义却应是一种更能同时适应（当时的）时代与乡土社会的生活方式与秩序，这种整体性方案与努力即是乡村建设。它的形式与载体可能多样——在梁漱溟的邹平试验区，其可能是村学、乡学；在晏阳初的定县试验区，其可能是“表证农家”、“导生制”；而在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试验中，其可能是“小先生制”、“工学团”。

如此整体性建设为何选择乡村为主要切入点？根据梁漱溟的分析：“中国这样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并以村社聚居为主要生活形态的国家，仿佛是集家而成乡，集乡而成国。……多数人既都在乡村，所以你要启发他自动的力量，启发主体力量，只有从乡村下功夫”（2005: 313）；并且“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法制、礼俗、工商业等莫不如是”（2005: 149、150）。

正是这样的多重考虑，让我们对乡村建设的内涵有着更为丰富的理解，也因此梁漱溟才说：“故我们的运动，不称农民运动，而称乡村运动；不称乡村教育，而称乡村建设。……农民要随着乡村建设而抬头，乡村要随着农民抬头而建设，两面辗转循环，向前推进”（2005: 409-410）。

这种自历史乡建就开始具备的宏观整体性视野，鼓励我们突破单一的实践形式，将其与前述的“双向运动”视野及以“激进”为特征的基本脉络相结合。如果能够因此而跳出狭义乡建看乡建，把前后呼应的实践与理论反思有机联系起来，我们将发现：中国乡村建设始终回应着不同形式的“三农”问题，其是原住民农业人口大国的“三农”因“激进”现代化追求而被迫承接“负外部性³¹”及传统社会结构与文化价值崩溃的双重影响下，知识分子与农民结合起来，尝试在外部环境资源约束下，寻找非主流现代化、非资本主义、非“西方发展模式”的努力，以及因此而与各种困难和限制互动的过程。

实际上，在资本主义及各种“激进”论述内部，“三农”问题始终无法得到

31 详细讨论参见：温铁军，2011，《中国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的负外部性及化解机制研究》
http://news.sh-etc.net/article/zjzp/201112/1171939_1.html，2012年6月5日查阅。

很好的安置³²与内在处理，恩格斯（1971:299）也直接认为：“我们的小农，正如任何过时的生产方式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各种其它论述也基本将“农民”排斥于历史动力之外³³。而在殖民血腥历史还未得到彻底“漂白”的西方中心话语内部，相对共识性的处理则为其派定某种边缘化位置，通过类似于“落后/牺牲品³⁴”这样的模糊化指称与“他者”身份，以对真正的问题完成某种转移与置换。

但为确保农业这一人类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生存条件³⁵，离不开资本主义与工业文明逻辑内两个历史实践才得以“自圆其说”：一方面通过外部殖民与不合理的世界经济体系以转移生产压力、成本及过剩人口——“以空间换取时间”；另一方面寄希望于化学农业、石油农业与生物农业所带来的新增长——“以时间换取空间”。然而，这些却在当下十分现实的遭遇到“有限地球时代”由能源/环境/生态/金融/人类安全等危机共同构成的整体性危机（详见第二章相关分析）之刚性限制。

因此，乡村建设的主要努力也即希望改出资本主义体系与“激进”现代化发展路径及其所产生的路径依赖，进而缓解其对“农民权益、农村治理、农业可持续（‘三农问题’）³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虽然，乡村建设总体上强调建设性的态度与“改良”的方式，但实际却一直对高成本及转嫁代价的“激进”发展模式、现代知识与意义生产、“后冷战”下“二元对立”与“去脉络”的简单化思维进行着根本的质疑与反抗，其努力尝试在现代社会整体性危机不断加剧的压力下，探索并实现来自“三农”的自我保护与“另类”实践。

32 如莫里斯·迈斯纳（2005:27）所述：“对于马克思来说，现实史的舞台是城市，而城市的主要角色是城市的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现代史这一概念中，农村和它的居民充其量只扮演一个微不足道的角色，而且可能还是反面角色”。作者（2005:39）还引述列宁的观点：“城市比乡村占优势（无论在经济、政治、精神以及其他一切方面）是有了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一切国家的共同的必然的现象，只有感伤的浪漫主义者才会为这种现象悲痛”。

33 即使在毕生献身乡村的晏阳初先生那里，也充满不无贬义的“愚、穷、弱、私”式归纳（随着实践的深入及来自乡土的改造，该看法得到很大调整，详见第三章）。而对于当下中国语境，农民要么成为革命的动员对象，要么只是革命成功后的“被牺牲者/被欺骗者”……总之，他们一直都是被命名或指认的“被动”对象。更重要的是，由于长期文化影响，类似的刻板化定型偏见已逐步内化为被叙述者的某种自我认同。

34 如莫里斯·迈斯纳（2005:27）所述：“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中，虽然作为剥削的主要受害者，农民在很大程度上却仍只是推翻剥削过程的被动的牺牲品”。

35 正如 E.F. 舒马赫（1985: 73）所指：“农业的基本‘原则’是同生命，也就是同活的物质打交道。但工业的理想是取消活的物质，甚至包括取消人的因素，而把生产交给机器。……毫无疑问农业和工业的基本‘原则’远不是相容的，而是对立的。……没有工业人类生活能够继续，而没有农业人类生活就不能继续”。

36 详细讨论参见第二章中“百年乡村破坏”与“三农问题”的相关部分。

如此乡村建设，自然非仅“城乡脱钩”³⁷意义上的建设乡村，那其是否更应是某种“反向运动”或“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呢？

笔者认为乡村建设虽然具有“社会保护”诸多特征并深受影响，但却不等同于“反向运动”本身。其同时还携带着“正向运动”的资源烙印及“反向运动”所欠缺的清晰目标。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乡村建设更接近于一种特殊的“正向运动”，其特殊之处在于不同于激进“正向运动”对农民和乡土脉络的忽视，而是坚持适当规模、强调对“在地”³⁸脉络的动态配合并与实践主体进行良性互动，因此是一种带有“自我保护”意味的“正向运动”。“农民化/化农民”、“体制化/化体制”、“商业化/化商业”在百年乡村建设实践中从来都辩证的存在着，因为“三农”脉络本来就非固定不变，是“正向运动”与“反向运动”长期互动的结果。乡村建设作为由知识分子发起并推动的一项带有明显反思与行动自觉的“另类”计划，虽然其独特的目标受到乡土社会与“反向运动”的改造，但却与一般“反向运动”的自发性、反应性及实用性存在着根本不同。

乡村建设虽然不简单直接的完整回应底层与“三农”的利益诉求，但其却同样具备“社会自我保护”功能。一方面，其尝试在实践中自觉体现着“反向运动”的资源与视角；另一方面，通过教育、组织等途径尝试增强底层的主体性，以提高其对精英民主、中产阶级等力量的谈判与制衡力量，促进其它层面上的“反向运动”更为积极有效的发生着。

然而，与所出发并携带着部分资源的“正向运动”一样，乡村建设自身也无法摆脱因“去脉络”而背离“三农”脉络的危险，特别当国家战略、发展主义、市民社会等外来思潮与强势话语内化于实践者并发挥着评价坐标的影响时。此时“三农”的各种消极不配合既是一种新的“自我保护”，更是让乡村建设实践者进一步自我反省并重新脉络化“三农”的新契机。

因此，乡村建设同时对应并受制于“反向运动”与“正向运动”，而不是单向的某种工具性存在。以“双向运动”为视野，既可看出其中的互动关系，拒绝常见的简单化认识，又可帮助我们理解乡村建设的真正困难与深层矛盾，并在此基础上不断进行自我反省和再出发。

37 乡村建设内外都有一种认识，认为乡村建设是“乡村的建设”，极端的逻辑是“城乡脱钩”后才有利于乡村的建设，详见第五章讨论。

38 但这种“在地”与“全球”存在着辩证关系，如戴锦华（2012a：133）所指：“任何在地行动都必须以全球视野为前提，而全球视野是在地行动的更大空间与动力”。

三、 理论视野与方法

1、文化研究传统与资源

本论文不同于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研究，笔者希望可以借助文化研究跨学科的视角³⁹及对实践的高度敏感性。一方面，笔者不同程度上认识到当前中国某种意义上“文化研究无农民⁴⁰”的现状；另一方面，“二战”以来所诞生的文化研究一直有着关注并介入实践的传统，且不说数位文化研究学科开创者们都有着参与英国成人教育教学实践并以此为理论创新基础的经历⁴¹，在 E. P. 汤普森看似专门讨论英国工人阶级的经典著作中，也处理着诸多可与今日中国“农民工”议题相互呼应的工人阶级“前史”——英国的农民问题。同时，工、农问题不可简单分开，因历史与基本脉络的不同，“工人”对于英国的重要性无疑与“农民”对于中国重要性相当。

在当代美国文化研究学者劳伦斯·格罗斯伯格（2000：67-68）看来：“文化研究拒绝把自身建构为可以自由穿行于历史和政治语境的一种完成并唯一的理论主张，其更应解读为在变化着的历史工程与思想资源中不断重建自身的努力”。另外，文化研究拒绝“以学院或狭隘认识论的术语来说明自身的理论精确性，文化研究中的理论是根据它与自身在当代世界的特定实践、结构和斗争的关系以及促进和介入的情况来衡量的，而文化研究的动力则在于——它期望从自身的历史环境中建构种种直接或想象的可能性”。

在近年的一次访谈中，劳伦斯·格罗斯伯格（2010：3）还认为：“文化研究实际上包含三件事。第一是他所描述的一种知识分子政治，即认清社会关系的

39 如戴锦华（2009：151）所指：“文化研究从来不是文学的外延，也不是历史的外延，它是一个社会和思想工作，一个去参与、借助变革社会的和有效的思想生产的一个领域”；刘康（2008：37）则指出：“现实感和问题意识是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在研究方法上，文化研究主张跨学科或学科交叉、历史化、语境化方法，文化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对包括经济、政治、哲学、历史在内的各种领域的整体社会关系的把握”。

40 相对于中国如此庞大、复杂而严峻的“三农”问题与国情现实来说，当前华语世界文化研究与批评多以城市为主要对象与场域，与“三农”相关研究也多局限于对与农民相关文学作品的文本研究，而较少有更广视角与系统的研究。如王晓明（2012：207）所指：“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基本上还是盯着‘都市’，以至于文化研究几乎可以等同于都市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界对今日乡村现实的隔膜，由此造成的种种幻觉，都显得非常触目”。因此，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于2008年主持编写的《乡土中国与文化研究》（薛毅，上海书店出版社）是个重要的开拓与自觉。笔者认为，我们不仅要文化研究的领域扩展覆盖至农民与乡村（准确说应该是广义的“三农”，如果能用文化研究的批判性视角研究农业，应该可以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更重要的由此还可拓宽“都市批判”的单一角度。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仅需要“乡村/农民的文化研究”，更需要具备“乡村/农民/城乡”视野的文化研究。

41 关于文化研究开创者们参与英国工人教育的经历可参考：张亮，2008，江苏人民出版社，《阶级、文化与民族传统》。笔者此处则希望指出当我们讨论文化研究源起时必须“脉络化”，而根据戴锦华所指（2009：143），文化研究的日常生活，在威廉姆斯和汤姆森那是有明确的界定，那是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而且它有明确的本土性和区域性。

复杂性和矛盾，把关于形势（conjuncture）的故事说好，以求开启诸如转化、挣扎、改变等政治可能性，并保持乐观的态度。文化研究的第二个承担是关于脉络，而研究脉络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展一套适合该脉络的文化研究”，第三才是关于文化。他同时指出（2010：8）：亚洲文化“不应盲目学习西方文化研究，而应是汲取经验并且书写这些知性、理论性、实证和脉络化实证，把它们融入周遭，并创造出一套亚洲自己的文化研究，即从自己的脉络说话，也向自己的脉络说话”。

正是受到这些不仅打通学科界限⁴²并开创性的融合起理论与实践的启示，笔者尝试借助文化研究的独特视野与其对社会现实的穿透力批判，“脉络化”本土与实践性议题，回归文化研究中高度联结实践的优秀传统⁴³，从实践中发展新视野，同时运用新的书写方法⁴⁴，以打开更多新的行动空间⁴⁵及对“另类（alternatives）”⁴⁶之多样理解。

2、波兰尼和 E.P.汤普森的启示

本论文的写作很大程度上受到卡尔·波兰尼和 E. P. 汤普森的启示，两位重要学者的观点与立场、分析和写作方法上的影响将在各章中陆续呈现。

全文基本框架借用自波兰尼关于“双向运动”的判断与视野，具体分析请见前文“核心概念”中的相关部分及随后各章所进行的分别论证，此处不加重复。需要说明的是，波兰尼的宏观分析对本文有着很大的启发——其不局限于一般历史描述的“百年和平”分析单位，直接鼓励着笔者对“百年激进”、“百年乡村破坏”、“百年乡建”这组宏观分析单位的尝试性使用。

如果说卡尔·波兰尼给予的借鉴主要为宏观方面，E. P. 汤普森的著作则在微

42 如戴锦华（2009：127）所指：“文化研究不是任何一个传统学科的延伸，不是任何一个既定学科的延伸。相反，它似乎要超越这些学科，异化这些学科和改造这些学科，而它自身是一个拒绝成为学科”。

43 如陈光兴（2009：110）所指：“文化研究的基本精神正在于介入社会的论辩，而非倒退到象牙塔中”。戴锦华（2012b：168）也指出：“文化研究出生伊始，便携带太多、过于沉重的现实‘夹杂物’，而且始终是自觉地对直接、具体的现实情境的正面回应与介入尝试”。

44 如陈光兴（2009：113）所指：“文化研究不同于传统社会科学，它没有固定的书写格式，它的创造性与书写形式不可切割。透过与运动的接合，文化研究不只联系到具体的社会脉动，也传承了在地的文化论述史”。

45 笔者也希望具体呼应王晓明（2000：23）所认为的：“今天文化研究的最大意义，并不只在于揭破虚幻、粗劣和溃烂的事物，而更在于发现活生生的、创造性的文化因素”。

46 戴锦华在不同研究中都指出文化研究与“另类（alternative）”的内在联系，如其认为（2012a：123）：“文化研究既是一种新的知识生产路径，也是一种为了今天的世界寻找一种 alternative 的努力；同时她还通过文化研究的历史指出（2012b：170），文化研究作为重要的另类政治实践场域，既包括对欧美左翼历史伤痛与现实焦虑的直接回应，也是对两大阵营的、双重暴力体制的抵抗与别样出路的探寻”。

观分析与材料处理让笔者受益良多。作为毕生尝试打通理论与实践、学院与社会运动的著名历史学家，其不仅是文化研究学科范式与思想资源的开创者之一，更是英国著名的“独立马克思主义者”⁴⁷、国际反核运动领导人。正如张亮（2008: 52）所指：“汤普森不是为了历史而历史，而是为了社会主义的现实与未来而研究历史，其根本意图是从过去煽起可以照亮未来的火星”。

影响深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写作，既成书于全球马克思主义日益成为教条与政治工具并脱离英国本土现实的年代，也面对着 50-60 年代全球左翼思想和实践普遍陷入低潮的时代氛围。作者希望重新运用马克思思想重新解读工业革命时期英国下层人民的经历，而不是“只有成功者才被记住了！走不通的路，迷失的事业，还有那些失败了的人则统统都被忘记。”（汤普森，2001: 5）

张亮研究认为（2008: 48），汤普森自觉区别于主流论述中“不把工人阶级看作是在变化的社会经济关系中有利益有觉悟的主体，而是看作一种被决定的惰性实体或整形医生的手术台上可以被随意塑造的病人，即‘一个东西’”。也即汤普森的原话（2001: 11-13）：“（一般研究中）我们的考虑多从统治者的角度，这里需要把各种平民从后世的不屑一顾中解救出来。因为是他们生活在那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而不是我们”。

但这种“解救”不是一种简单的“道德站队”，更不是某种对大多数的迷信与执着，而是对平民和文化的重新思考⁴⁸。它拒绝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精英主义的理解角度——认为文化不是人的实践活动，而是实践活动的结果，即以“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来理解（张亮，2008: 99），由之相应有如下常见推论：平民无文化，故必须或可以从外部灌输文化。但汤普森认为这样的认识往往自觉不自觉的落入“见物不见人”的陷阱，将工人只看成作为移民或数据意义上的劳动力。

要让在“胜利者”叙述历史的层层掩埋下重新发掘真正属于“平民”的日常生活⁴⁹与文化无疑是十分困难的。汤普森通过十分努力收集的各种应用文体：辩词/判决书/报纸/档案/信件/民谣——正是这些主流史实以外的各种边角料，

47 1956 年，由于不满苏联对匈牙利问题的处理，他和其他一些历史学家如罗德尼·希尔顿、克里斯托弗·希尔等共同退出共产党。

48 详细可参见：汤普森著，沈汉、王加丰译，《共有的习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

49 正如蔡翔（2012: 203）所指：“我们只有进入日常生活的领域，才会真正觉察到所谓现代性和本土性的冲突和妥协，以及那种独一无二的实践经验”。

拼图般的将我们的视线拉回到无数小人物们的日常生活、苦恼、英雄事迹和理想追求中。

但这与当下“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新叙述时尚下，自觉不自觉将日常生活通过“家常化”而迅速“琐屑化/个性化”以根本上取消问题有着本质不同。因为作者强调“小叙述”从来不应抽空割裂于“大历史”，不能仅从表面进行简单的价值判断，相反更应将之放回所处的社会文化整体脉络中。

当我们在汤普森著作的字里行间中看到如下立场与坚定态度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约克郡或兰开郡织工）社区真是‘落后的’——他们以同样的执着墨守着当地的方言和习俗，没有一点医学知识，而且迷信。但是，我们越仔细观察他们的生活方式，就越会显出关于经济进步和落后的简单理论站不住脚。……每个织布地区都有自己的织工诗人、生物学家、数学家、音乐家、地理学家和植物学家”（2001：331）。该段话很容易会被解读为作者如常见左派们对“大多数”进行着一厢情愿的浪漫化，但汤普森随即点出：“许多当时的著作家都在叹息英国旧习俗的消失。但是，仅仅从田园诗般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变化却是可笑的。这些习俗并不都是无害或富有奇趣的”（2001：480）。他还在另一部著作中提醒道：“不要去为这种前圈地时期的习惯意识而感伤，它自己是狭隘、残忍和迷信的带菌者”（汤普森，2002：170）。

在作者的潜台词中，污名化与美化倾向同样都是陷阱和“去脉络化”的体现，这种出于某种情感上的需要而进行的简化成为不了我们对现实失望的解药，反可能消解十分难得的深入分析空间与必要。因此，我们需要更进一步进入历史，看到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复杂影响因素及张力。

针对有人攻击其著作过于强调经验研究而显得无理论，汤普森虽未作正面回答，但实际上已把答案写在他著作对历史脉络分析与其开创性方法的字里行间了，即如她夫人的评价：“他宁可让理论从历史和文学著作本身脱颖而出”（汤普森，2002，代序：2-4）。

也如张亮所指：“他更加重视对具体问题的解决……始终拒绝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对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系统进行体系化的阐发，而是始终任其自在的存在于自己具体的历史叙事之中”（2008：36）。因为，“他担心体系化的理论表述会使这一具有明确的历史限定性的学说非历史化，从而成为一种制约人们进行新的思考与研究的教条”（2008：38）。

3、论文书写特点

正是受到以上思想资源的启发，作为乡村建设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论文所尝试的“另类书写”除进行知识生产与意义流通上的努力与反思外，也希望为仍在进行中的乡村建设实践建立一个新的理解框架，以有利于现实行动的进一步展开。

因此，本论文尝试在“百年乡建”的意义上联结历史与当代不同时空下的乡村建设实践，而不是一般意义上同名运动的古今对比，更希望能突显其内在的深层关联与呼应。既强化历史实践的当代意义，也使讨论更加复杂与脉络化，以此帮助我们更好的把握乡村建设的实质。历史实践因多数人物与事件已可盖棺论定，且无需考虑过多的现实政治干扰；当代实践则可以引入实践者和书写者独特的感知、观察与自我反思，并更贴近当代读者及继续推动实践的需要。

虽然本论文涉及素材同时包含历史与当代，但因为主要目标是通过对抗主流论述以解决实践者在当代和现实中所面对的理解偏差，同时本文的主要案例多来自当代实践，故本论文的落脚点与重点是当代乡村建设，同时辅以历史部分为参照与引申。自然，这种写法在叙述与材料运用等方面都大大增加了难度，非笔者有限的学识和能力之所逮，幸好其只是未来漫长征程的一个起点，同时也希望此抛砖引玉能引起更多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参与。因此，全文写作存在着以下特点：

（1）、实践者与写作者合一

各章节将结合实践中的实际案例与自我反思，改变常见的“对象化/客体化”书写方式，同时避免“好人好事”式的事实罗列与成果展示。正如第一章也将谈到，此说绝非否定“好人/好事”的存在，相反百年乡村建设历史充满着无数可歌可泣的事件与人物。之所以保持有意识的自我克制，是为对其背后“个人/个别/例外”假设的反思与警惕——正是它们遮蔽并模糊了乡村建设更为深刻的价值与意义，简化了乡村建设与现代社会的内在冲突，并进而消解了乡村建设所提出的质疑与挑战。

同时，只有不断自觉的放弃并质疑“道德高度”的存在，才能让实践者更为客观清醒的理解自身局限及所遭遇的真正困境，并在此基础上开拓出未来的新空间。

(2)、宏观与微观结合

除上述强调将主观与客观相互印证，本论文的另一特点是尝试结合宏观分析与微观案例。仿效波兰尼的先例，尝试将乡村建设实践中具体而又颇具代表性的微观经验放置于“百年中国”历史脉络与“双向运动”广阔视野下，将实践者在认知层面上的困惑与具体案例中的矛盾冲突同样作为理解这一“另类”实践的有效切入点。

将一些看似分割的问题联系起来，跳出传统意义上以乡村建设代表人物、派别团体和发生时间为标准的简单类比与分类，让不同阶段及表现形式的实践在本论文核心概念与问题中互动起来。同时，因不是历史学论文，也非以研究某派乡村建设人物为目标，故本论文不把焦点放于考证史实与篇幅分配上的均衡，各材料选择和运用服从全文的目标与分析脉络，以希望从实践出发并能回归实践。全文也不希望有过强的理论预设，而是借助一定的理论工具与视野，学习 E. P. 汤普森“让理论从材料中脱颖而出”的路径，以尽量避免让充满生命力与复杂张力的鲜活素材去削足适履。

4、关于方法

基于上述目标与特点，本论文根据文化研究学者对方法论中“计划 Project、脉络 context、扣联 articulation)”的强调，在研究采用扣联起实践者行动经验与理论反思并带有行动倾向与内涵的研究原则，在具体分析中主要采取案例分析与文本分析作为研究方法。其中历史实践部分以文本分析为主，当代实践以笔者参与及观察的各组案例与自我反思为主，两部分都带入实践者的独特视角。

关于文献回顾与文本分析的方法较为常见和基本，本论文包括导论在内前三章中将主要使用，随后各章案例中也将根据需要而采用，此处不详细说明。下面仅简单交代其中文本选择的特殊考虑：为直接呈现实践本身的生命力与丰富性，笔者在材料选择中尽可能的使用一手资料⁵⁰：历史部分则尝试直接引用前辈实践者们在不同处境与脉络下的原文，以实践者的特有视角和敏感去感知作

50 如应星（2001：339）所引述 Lichterman 和 Polletta 的发现：“通过参与观察方法来收集材料、通过建构故事来运用材料，这对于研究关系极为复杂且处于不断变动的社会运动或集体行动是非常适宜的”。笔者基本认同，但认为更重要的是处理这些材料时需把握其中的复杂张力，而不可简单化或类型化的处理。

为同行者与先行者的兴奋、苦恼与意犹未尽；当代部分则使用了来自实践者和农民的可公开信件、培训反馈与评估、实践者（工作人员、实习生、志愿者）工作总结与反思、内部讲课稿（课件）、会议记录⁵¹、内部讨论记录、实践者博客、内部教材与出版物、媒体报道与批评等⁵²。这种材料使用偏好与处理方式，一方面受 E. P. 汤普森对史料选择和理解的启发，另一方面既然本研究强调脉络化，在材料上也希望尽可能不脱离具体脉络与情境。作为当代乡村建设实践长期的组织者，同时对研究的独特兴趣与资料敏感让我在愈十年的实践工作中十分注重原始素材的收集与积累⁵³，它让我无需依赖访谈即可获取大量信息，并产生对访谈进行后文“关于田野”中的相关反思。

关于扣联起实践者行动经验与理论反思并带有行动倾向与内涵的研究原则，现有社会科学已经发展出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这一成型的方法，并在近年来得到国内外研究者和实践者较多的应用。该方法基于对传统实证主义方法论反思的基础上，强调行动者视角并对传统社会科学中行动与研究关系进行了新的理解与实践。对于该方法，赖秀芬、郭淑珍（1996：239-240、248）综合各相关研究者成果指出，其一般具有以下四个特征：（1）、研究者与参与者的合作；（2）、实际问题的解决办法；（3）、改变实际状况；（4）、发展理论。作为一循环过程，行动研究的特殊作用是“共同参与、产生改变、缩短理论与实务间的差距”、“打破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权力的不同”。而最重要的意义是改善其他研究在知识建构过程中研究发现与实务脱节之弊病。

潘淑满（2003：217）也归纳多名研究者观点后认为：行动研究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研究方式，强调“从实践工作者的需求与立场出发，对实践工作者所处的工作情境与内涵进行反省与批判，并结合研究的过程与步骤，找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案或行动策略”。而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行动研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研究者就是实践工作者，研究动机是出于自己在实践工作过程中所遭遇到的问题与困难。作为协作者和组织者的‘我们’在和行动研究对象‘他们’的互

51 因笔者作为当事人之一，同时会议记录与内部讨论记录的特点决定在使用时很难分清具体人员，除特别人员单独注明外，一般以集体和团队的观点处理，特此说明。

52 一些可能引起当事人不同意见的内部材料发表前已征得本人同意，并确保不会对其造成不利影响，否则匿名处理。其它部分之所以努力保持实名，则是书写者认为有必要尊重历史与实践者们的付出。另外，针对有些作者主动署名的内部材料，相较于一般访谈，主体性更强，观点立场也更为清晰，它正是强调脉络化的本文所需要的。

53 当代乡村建设实践保持有很好的学习交流与资料积累传统，本文所用许多素材来源于无数人的点滴积累，在此一并感谢无法一一致谢的记录者与书写者。

动过程中，两者绝非孤立与单向，而是互相影响和启发”。

夏晓鹃（2002：39）结合其在台湾美浓的田野与实践认为“研究即实践⁵⁴”，但提出一种不同于一般行动研究的“实践式研究”（praxis-oriented research）。因为她认为：“行动研究的‘行动’并不必然涉及个人及社会改造，同时行动研究原本强调‘社会改变’与‘民主参与’，后来竟被研究工业管理者挪用为‘有效’进行管理的工具。并且由于‘行动’概念容易因强调‘参与’而模糊了社会变革的面向”，故作者改采“实践”一词，以强调研究和从根本改造社会的辩证关系。夏晓鹃（2002：40）同时认为：“实践式研究不仅是让被研究者参与研究之中，更重要的是研究必须能指向物质世界，分析出社会的根本矛盾，并指出变革的可能”。她还进一步指出（2002：219）：“实践取向研究中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并非‘资料收集者’与‘资料被收集者’。对研究者而言，研究即是时时自我反思的历程。在这一基础上，实践式研究者批判主流社会价值将各种现状‘自然化’而漠视政治经济结构挤压，或以‘个人化’为个人是否足够努力的结构⁵⁵”，但实践式研究仍必须避免将民众现状浪漫化。

笔者认为，无论“行动研究”还是“实践式研究”，其重要意义都是挑战实证主义影响下传统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定型化”与“对象化”。而“行动”和“实践”如果不能动态的“脉络化”并真正实现宏观分析与微观案例的结合，或让具体方法割裂于所支撑的方法论与批判脉络，实际都可能出现上述批评中的各种问题。

关于“行动-研究”、“实践-理论”的关系，文化研究学科也一直进行着重思与不同的实践。许宝强在文化研究的视野下对以上讨论相关问题进行如下理解与展开：首先，他（2009：21）指出文化研究所理解的“理论/研究”与“行动/实践”并非分割对立，而是一种辩证统一的互动关系，“‘行动/实践’往往需要‘理论/研究’作为中介，而‘理论/研究’也得借助各种‘行动/实践’去完成。进一步说，针对特定社会脉络中具体问题的各种行动，本身也应该内含着‘理论/研究’工作，而能够有效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研究’工作，其实也是一种‘行动/实践’，因此无需先验的在强调‘行动/实践’还是‘理论/

54 许多学者都有相近的认识与分析，如夏林清（1996：100）转引 Lather 对研究方法的讨论：其认为“实践是指理论与实做之间，来回修正两者的辩证张力。也可以说，一位研究者的研究行动就是他的实践，因为在他的研究行动中可以看到他对特定现象的了解分析（理论）与探究（研究策略的实施）”。

55 因为夏晓鹃（2002：221）认为：“实践式研究在本质上必须是挑战个人主义的。因为它所面对的是社会的结构性矛盾，是必须透过集体力量才能撼动的现实”。

研究中’二选一”。

其次，许宝强（2007：前言 4-5）认为：“文化研究特别强调历史具体脉络和差异中的整体这两个重要面向”。在具体分析上，他引述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对文化研究三个关键概念（计划 Project、脉络 context、扣联 articulation）的讨论（2009:12）：“Grossberg 认为具体而在地计划（contextualised project）才是文化研究的对象，如果没有具体而在地的问题要解决，又或缺乏可达致愿景的研究或理论工作，则很难发展出有意义的文化研究计划。对于脉络⁵⁶来说，其尽管包含各种体制和物质条件，但却并非只是客观存在的背景或自在之物，而是与行动主体和语言罗网紧密联系在一起、流动的动态过程。‘真实’的脉络除了为各种权力所结构外，还同时由我们的分析所建构，因此可以并且正不断在各种文化政治力量的互动争执中被改造。最后一个关键词“扣联”则是理解和改造脉络，以达致计划目标的文化研究方法，它就是把无必然关系的元素拉在一起，从没有关系或被扣联于既有关系中的元素或社会力量中，重新建立新的关系”。

这种文化研究视野，对行动和研究的重思同时体现在方法论与具体方法上，将为本论文各章的写作与分析所采用，全文将采用“实践-研究者”这一独特敏感与视角。而实际上，作为知识分子所推动并带有试验性质的乡村建设运动，类似努力在历史与当代实践中其实较为常见并已为推动者所自觉⁵⁷。

5、关于田野

本章开篇即以说明，笔者从 2000 年开始以大学支农社团负责人的身份参与还处于萌芽期的当代乡村建设实践。2003 年 7 月至 2007 年 5 月，作为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办公室副主任与培训部负责人则完整的参与学院发展全过程。随后因在香港读书和承担《乡村建设史述要》的资料收集与编撰，而作为执行董事

56 这种脉络也可理解为语境，而如刘康转述（2008：38）Lawrence Grossberg 的分析，认为文化研究“是对研究对象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语境的关系作全面研究”。许宝强则认为（2007：前言 5）：“脉络”是动态和经常变动的，而文化研究正是要理解各种“脉络”是“如何被制造和再制造，并尝试让人们能够更有效的改变他们身处的‘脉络’以寻求更美好的生活”。

57 无论历史上的晏阳初和梁漱溟，还是笔者所参与的当代乡村建设团队，都十分强调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晏阳初则直接认为那正是乡村建设成功的基本条件，其主张（1989：305）：“我们的研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乃是为事而研究。又可分做三点说：一是为问题而研究，二是为实施而研究，三是为训练而研究”。乡村建设的类似研究不只出于研究者个人或团体的需要，还需考虑被研究者的需要。这体现为：一方面与他们共同计划共同行动，另一方面研究者在此过程中不断进行总结、反思与调整，并及时将结果反馈给“共同的行动”，以实现行动者与行动对象之间的互相影响。具体可参考晏阳初晚年的总结：《乡村改造运动十大信条》（1988）。

与法人代表，间断性的参与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及小毛驴市民农园⁵⁸部分工作。因为材料的熟悉与掌握程度，本论文讨论的当代案例主要来自笔者主要参与的这两个平台和团体——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2003-2007）与小毛驴市民农园（2008-至今），同时对其他乡建团体也尽可能多的有所涉及。

笔者不愿在实证主义逻辑下进行“客观中立”⁵⁹是否可能的类似探讨⁶⁰，仅希望对“主客体二分”的“对象化”书写保持一定的反思与批判，进而指出：不管技巧如何高超、话题如何开放、气氛如何轻松，访谈行为本身已经是夹带着访谈者所主导的言说脉络——虽然多以“他们自己说的”为名，受访者尽可能被鼓励通过追忆等途径“还原”当时脉络，但因为时空上的抽离（有意无意的忽视其他影响因素）、安全与开放式处理（有条件根据“事后”自己的愿望进行某些修正），实际已经不可能让访谈者与读者完整的把握当时的准确脉络了。

我也不想因为拿起笔记本和录音笔，而让“研究者-被研究者”权力关系进一步定型、研究和行动再度分割、观察与倾听仅成为某种获取更多信息的技巧、客观和独立则被抽离为某种不言自明的“包装”与不无虚伪的“证据”。在这样的成规惯例下，受访内容本身的多义空间与复杂张力往往被不无遗憾的裁剪为一个主流逻辑允许并希望存在的言说“证据”。

因为工作关系，在接待过无数媒体、研究者和“乡建游客”之后，这种感觉尤感强烈。无论新闻报道、学术论文、感想文字无疑都已经是现代叙述结构与既定读者接受习惯双重限定下的产物，转述者的每一句话看似都是原文，但却往往产生着不一样的效果（详见本论文第一章关于媒体呈现与叙述的讨论）。

不过多采用访谈这样的方法，还为避免一种“我知道了/你不都说了吗”式的自信与简单化。相比之下，我更愿意在热火朝天或筋疲力尽的劳动中、在面红耳赤的讨论会上、在集体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搜集多样化的信息，因为只有将这些语言和片段放回产生它们的具体环境中，才可能更好把握那些让大家兴奋、

58 2007年5月，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转型为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并以项目的形式发起小毛驴市民农园，详细情况可参见国仁中心网站：www.green-coop.org。以乡建学院原工作人员为核心的小毛驴工作团队培养招募了数十名长期实习生，并形成包括20-30名工作人员在内的团队，承担了主要而大量的一线工作。

59 夏晓鹃（2002：38）指出：“许多倾向于参与式研究的学者基于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一致认为价值中立是个幌子，最起码‘社会事实（social facts）’不同于‘自然事实（natural facts）’。不采取行动本身即是一种行动。因此参与者的价值、信念与感情对于理解社会是绝对必要的。个人的介入不必然会干扰研究品质，甚至，相反地它有助于提升研究品质”。

60 此处指不想掉入刻意追求“客观/中立”的实证主义陷阱，虽然我在材料来源上努力保持对一手材料与材料本身多元化尽可能的自觉，但在具体选择与取舍上自然摆脱不了书写者的主观烙印。

激情、迷惘、挫败、悲壮、不甘的复杂成因，它远不可能如事后回忆中的轻描淡写与条理清晰。

虽然如此，“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无论与那些案例所涉及的实践者在现实中是如何的熟识与相知，毕竟我不是他/她，我们的交集也必然有限。在这里，笔者不想隐蔽起自己作为研究者与书写者的存在，不想化身为“她/他们”，而是同时带出自己的生命故事与困惑苦恼以进行呼应与补充⁶¹。

此外，因我们是以团队为实践的基本单位，很多案例、反思和总结都是在集体讨论与碰撞中产生的，一些田野调查也是以团队形式展开，故许多时候分不清彼此，特此说明。

四、 章节结构

正如论文标题所示，笔者希望借助“双向运动”视野重新思考中国乡村建设实践的意义、定位、困境及可能出路，而不是实体性的以乡村建设为例去套用所谓的“双向运动”。标题的另外两个关键词——“自我保护”与“另类实践”既是乡村建设在“双向运动”视野下彼此互动和互相影响的两个面向，同时也是其动力与深层矛盾的主要来源。以下简述各章基本内容与彼此联系：

第一章 文献回顾：研究批评、传媒论述与影响

第一、二章将从宏观角度完成乡村建设实践的内外知识脉络梳理。本章则主要讨论主流评价与论述如何处理并影响着乡村建设，它将通过“学术研究、大众媒体、社会运动”等方面与乡村建设展开互动，并对乡村建设的参照坐标、评价标准及实践空间产生着影响，同时参与着乡村建设实践者的自我认同和主体构建。由此将可见，作为“另类”实践的乡村建设一直受到主流的很大影响，不仅空间有限，因受到“双向运动”的互动与限定，实际也不可能真正纯粹或独立。其困难与意义同时基于这种复杂性，随后各章节将以不同角度进一步展开。

61 夏晓鹃（2002：19）指出：“传统经验主义假设认知者和被认知的对象是存在于无关联的两个世界里，研究者的经验可以完全超然于研究本身。社会学的养成训练，使我们内化了男性的思考逻辑，不敢面对自己的经验，而将研究对象视为与自身生命无关的物体”。故其在自己的研究中进行了书写上的创新（同上：24），即在每章的始页，放上研究过程中自己与研究对象间类同的生命经验与反省体认，以尽力不客观化（因而特权化）自己的立场。笔者深受启发，不仅在本论文的各章正文与注释中放入自己的生命故事与反思，同时还在各章前摘录部分历史及当代实践者的语言片段，希望“再脉络化”的同时，能帮助读者进行多角度的展开追问。

作为文献回顾和第一章，笔者尝试对一般论文的文献处理做法进行挑战，它不应只是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罗列、评述及与自己研究之异同，其还应可直接帮助读者对所展开具体脉络进行更好的理解。故该文献回顾除一般的研究评述外，还拓宽至历史乡村建设批评、当代乡村建设传媒论述及由此所造成的影响与效果。既希望读者可全面了解乡村建设常见的论述方式与评价坐标，更希望为笔者随后各章尝试与之对话的“另类”论述之展开做出铺垫。

第二章 “现代梦”的别样回声——乡村建设的脉络、资源与矛盾

本章将以包括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生态在内的立体角度，利用各种已有研究与文献，在宏观层面上带出“百年激进”、“百年乡村破坏”与“百年乡建”这三个论文所要面对的基本脉络。

该部分将以反思现代化对中国农村的影响及其所产生的反应为叙述主线，提出乡村建设作为现代化的内在产物与“三农问题”之对应物的基本假设，以此反思“乡村建设-现代化”这一常见框架的各种不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乡村建设实践背后的三类思想资源：现代化、“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本土和传统思想资源。正是在这些不同角度的体现着“双向运动”，彼此又充满张力的资源影响下，乡村建设实践、乡土社会的“自我保护运动”和“激进”现代化之间存在着多重冲突与复杂互动。这些矛盾混杂交错、相互影响，同时构成乡村建设复杂的脉络、资源与限定。其中的多重复杂性，将在第三、四、五章中结合四组微观案例进行相应的讨论与展开。

第三章 “作新民”的乡土遭遇——以乡村建设中的平民教育⁶²为例

在后面三章，笔者尝试在前文的宏观分析基础上，以实践者的独特视角，借助“双向运动”视野对历史与当代乡村建设中的不同实践案例进行逐一讨论。

依照“跳出平民教育看平民教育”这一基本思路，本章结合历史文献与实践者的案例与反思，希望论证“双向运动”视野下的如下假设：平民教育实践者出发于以“启蒙-作新民”为目标的“正向运动”，但其在实践中不期然的“遭遇”了来自乡土各种形式与表现的“自我保护”，由于充分的互动，平民教育并

⁶² 专指乡村建设实践中的“平民教育”，以与其它目标及脉络下的“平民教育”作出区别，具体区别第三章将有所讨论。

没有简化或定型为“双向运动”的任何一方，而是不断融合并理解来自“反向运动”的资源与立场，并在实践中不断反思调整“正向运动”的目标和局限。进而探索一种以“平民”为立场和角度、以乡村建设为脉络与目标、不同于对立双方的一种“另类”实践。

如此“脉络化”的讨论有助于理解：为何历史和当代的平民教育实践者无论学科、经历、出发点、时代存在差异，只要他们真正扎根乡土，都会受到很大的改造与冲击，最后都可汇聚成为与主流现代化道路有着根本分野的乡村建设。

通过该案例的分析还帮助我们理解“双向运动”视野下的辩证与互动，及其对“脉络化”的强调。

第四章 生态与生计——以乡村建设中的生态技术为例

本章将通过生态建筑、生态厕所、生态农业等具体案例，同样采取宏观微观相结合的方法，进一步探讨“双向运动”不同力量间的互动关系、运作机制与其整体视野下乡村建设的“另类”形态。因此，本章虽然谈的是技术，但非就事论事的停留于技术层面，而是通过脉络化回体现着生态、文化与经济的广义社会，进而讨论其中的生态与生计面向，以及其如何同时面对着“双向运动”的影响与限定而展开创新性⁶³实践。

呼应着第三章关于平民教育实践的分析，本章希望通过另一组案例分析指出：“正向运动”对“另类”实践的影响绝不仅限于出发时所携带的想象与愿景层面，而是一种动态并广泛的过程性存在，自然不会一次性的完成改造。也因此，无论是作为自我保护的“反向运动”，还是“另类实践”的乡村建设都不可能拥有独立纯粹的封闭空间。

第五章 经济与文化——以乡村建设中的农民合作与城乡互动为例

作为上一章所提议题的深化，本章将从对经济与文化的不同理解出发，结合乡村建设实践中的农民合作和城乡互动具体案例，以经济和文化相结合的视角，讨论“正向运动”的虚幻性是如何通过特殊的文化与经济操作而获得认同

⁶³ 至于为何需要创新也非一般性的问题，因为正如温铁军（2009:39）所指：“当前农业与农村经济之外已经树立起来一个产业门类齐全、专业分工社会化的庞大的城市工业。在这种外部的宏观环境变化的约束下，即使小农经济的农业也不可能再完全退回到传统社会，而只能进行一定的组织与制度创新”。

并产生影响。

通过两组案例的结合，笔者一方面指出：支撑“正向运动”的乌托邦信条实际上充满虚幻，并一直面对着来自实践的不同挑战——无论是“三农一农化”、“城乡脱钩”，还是“消灭农民”、“技术中立”、“经济脱嵌于社会”。这些说法虽都看似“自圆其说”，但如果真正回到民众、生活与实践的脉络中，将遭到同样有力的挑战。另一方面，正是通过经济与文化的进一步结合与运作，各种虚幻的乌托邦信条才可能“自圆其说”。结合起来的经济与文化，其实在“正向运动”、“自我保护运动”及“另类”实践中都一直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与影响。所以，只有在“双向运动”的整体性视野下，结合起经济与文化才有助于各相关议题的深入思考，并让实践者理解各种困境的深层次原因，也只有通过对文化和经济的重思与介入，才可能更好的推动“另类”实践。

结论与后记

尝试再次总结全论文的目标、主张、意义与特点，进一步讨论“双向运动”与“双向运动”视野的区别及本文在何种层次上的借用，同时通过“脉络与意义”、“自我保护与另类实践”、“张力与困境”三个方面对“双向运动”视野下的中国乡村建设进行总结，并以“不足与讨论”提出笔者对本论文不足的自觉与反思。

后记部分结合个人经历对“辩护”与“理解”进行简要的区别和讨论，并强调其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同情的理解”，同时还以个人视角对本论文的写作动力与书写特点进行再次说明。

在富丽堂皇的摩天大楼里做出的决策决定着农田的命运和乡下人的未来。城里的道德观念成了全国的标准。现代化的宣传工具从城里向所有山里、水边的小镇放送节目。……大城市的影响到处都是，想在大城市以外建设社区的人必须学会辨认落在他家门前的城市的阴影。

(J. 斯特拉塞, 1983: 287)

乡村建设这个看起来很大的话题其实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上厕所是，扔垃圾是，吃饭是，劳动也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话题从我们的生活中抽离出来，我想我们谈起来会很无力。

(黄国良, 2008: 5)⁶⁴

第一章 文献回顾：研究批评、传媒论述与影响

正如导论所述，作为“另类”实践的乡村建设一直受到主流的很大影响，其中包括主流的评价与论述，而分析论述层面的影响，同样可以借助“双向运动”的视野。

一方面，各种“正向运动”力量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到对“另类”实践的再生产过程中，借助“中立、客观”的名义对其进行着各种命名、分类、标签、打分、包装、吸纳，在这个过程中自觉不自觉的将乡村建设拉回“正向运动”的主流逻辑与参照坐标下，在论述上压缩“另类”实践的可能空间，进而生产着自己所需要的“意义”。这既是乡村建设所需面对的重要挑战，更是其在具体实践中不自觉的接受派定位置、非意愿的复制主流逻辑的可能原因之一。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本章分析，还是第三、四、五章结合具体案例的讨论及结论部分的总结回顾，其中的“意义”主要是以文化研究对“意义系统”(system of signification)的相关讨论为角度，详细可参考斯图尔特·霍尔等学者的分析⁶⁵。霍尔(2005: 3、9)具体指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凭带给它

64 黄国良(老六)为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生产部负责人，该引言出自其：《不像报告的报告——健康农业志愿者实习生总结》，《足迹》(内部刊物)，2008，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生态农业工作室编。

65 在对索尼随身听所做的一项“做文化研究(Doing Cultural Studies)”的研究中，保罗·杜盖伊和斯图尔特·霍尔(2003: 13)归纳了“文化”周而复始的两个主题：文化是“完全的生活方式”及文化是“意

们的解释框架给各种人、物及事以意义”，但它产生于何处？意义产生于几个不同的时刻，并通过几个不同的过程或实践（即作者所归纳的“文化循环⁶⁶”）被传播，其“持续不断的在我们所参与的每一次个人及社会的相互作用中生产出来，并得以交流”。意义还通过各种不同的传媒生产出来，尤其在当代，通过复杂的技术和现代大众传媒等全球通讯手段生产出来⁶⁷，这使得意义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规模和速度在不同文化之间循环起来。但“意义并非直接和透明的，它是随语境、用法和历史境遇的变化而变化，它也常常被抵制，有时候被激烈地争夺”⁶⁸。顺便说明，在本论文各章中笔者所使用“偏见”与“定（型）见”等描述，它们也非价值判断上的一般用法，更多则是从上述“意义系统”角度上对相关处理所可能隐含问题的指认。

另一方面，广泛存在的“反向运动”因常常不能自己发声而需要寻找相应的“代理”，这同样构成了反抗者自身的呈现⁶⁹与叙述的内在需求——当下社会同样需要能一定程度上被理解与定义为批判性的“反抗/反应”空间，其相反或相成的回应或配合着主流论述——然而这种“反向运动”式呈现却深受“正向运动”影响，往往导致相关论述简单化与类型化。

本章希望和下一章配合起来，完成乡村建设实践的内外知识脉络梳理。本章侧重于从外部呈现与评价的角度，讨论主流社会（学界、媒体、社会运动）如何与乡村建设进行互动，“正向运动”如何对乡村建设及实践者的参照坐标、自我认同、评价标准及实践空间发生影响，也即“主流”如何面对并处理“另类”的存在与挑战。第二章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整体展开乡村建设所内在复杂脉络的分析。

义的产生和传播”。而在斯图尔特·霍尔主编的《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2005：2-3），霍尔指出：“文化首先涉及一个社会或集团的成员间的意义生产和交换，即‘意义的给予和获得’。文化既涉及概念和观念，也涉及感情、归属感和情绪。文化意义不只‘在头脑中’，它们还组织和规范社会实践，影响我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真实的、实际的后果”。

66 详细分析参见保罗·杜盖伊、斯图尔特·霍尔等，2003年，《做文化研究——索尼随身听的故事》，霍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其中作者结合索尼随身听为案例归纳了文化循环的五方面与因素，即“生产、消费、流通、表征、规管”。

67 斯图尔特·霍尔（2005：6）指出：“意义与其说是被简单‘发现’的，还不如说是被生产（建构）出来的”。

68 霍尔（2005：24）进一步指出：“如果意义在本质上不是某个固定在那里事物的结果，而是我们社会的、文化的和语言的惯例的结果，那么意义就永远不能最终固定下来。也不存在绝对的或最终的固定意义，因为社会的和语言的惯例随时变化。……意义并不内在于事物中。它是被构造的，被产生的。它是指意实践，即一种产生意义、使事物具有意义的实践的产物”。

69 根据罗钢和刘象愚（2000：21）结合文化研究历史与理论的分析：“从文化和权力关系角度看，呈现行为本身就是文化内部权力关系的一种体现，那些不能呈现自身和他人的人处于无权的地位，只能听凭他人来呈现自己”。

之所以把有关“呈现”的内容放在前面，既是文献回顾的惯例，也同时希望为随后各章的论述展开做出铺垫——让我们先了解乡村建设常见的论述方式与评价坐标，而本论文采用“双向运动”视野下的叙述与处理，正是与之展开对话。同时，如此做法更是挑战一般论文对已有文献的常见定位与处理。笔者认为，文献回顾不仅让读者看到前人的相关研究与自己研究的异同及突破，还应该让我们增加对论文所展开的具体脉络有更好的理解。作为一直存在较大争议的现实实践，乡村建设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与传媒呈现，既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脉络，也是其特征的组成部分。故本章除进行一般的研究回顾外，还用较大篇幅、通过一手材料进行某种罗列，希望让我们更好的接近乡建所置身的脉络，感受这些文献对乡村建设实践不同层次的影响，希望有助读者理解本论文在论点、论证与写法上的特殊安排。

一、研究与评论

笔者认为，“正向运动”的力量与想象一直对乡村建设的评价与研究产生着较大的影响，下文的分析和讨论将从这个角度进行理解并展开。

如有学者对当代二十年来乡村建设相关研究归纳认为，各种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1、“大肯定，小否定”；2、“大否定，小肯定”；3、“成败不定”（何建华、于建嵘，2005）。这种评价角度有一定代表性，某种意义上可视为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或“各打五十大板”的逻辑演绎，因此遮蔽了许多可以深入挖掘与讨论的空间。

刘重来（2007：63-64）根据时间顺序，认为对历史乡村建设的评价有三个时期，分别为民国期间（即与乡村建设兴起到衰落的同一时期）、建国后到“文革”结束前后、改革开放之后，作者及其引用的研究者都特别指出，不少研究对第二个阶段的评价明显不客观⁷⁰。在这个纵向框架下，虽然各研究者的评价高低与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几乎较少有人质疑这种依时间顺序所做出阶段化分类本身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这种顺时序描述做法虽然尝试让论述置于历史时段，

70 刘重来（2007：63-64）转引鲁振祥 1987 年的研究：认为这个时期对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完全否定，批判得一无是处。不仅把“乡建派归入地主买办阶级营垒，认为梁漱溟在山东搞乡村建设，是配合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进攻，是挽救地主阶级垂死的命运；晏阳初是买办学者，打着平民教育的幌子惑世欺民，定县实验对农民有百害而无一利。总之，是一棍子打死”；此外，薛伟强（2006：124）也在《晏阳初研究八十年》中认为：建国之初，晏阳初受到了严厉的政治批判，被称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其理论被认为“是一种为虎作伥的法西斯教育理论”。

但却过于简单与静态，并缺乏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干扰以外更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之整体把握，还缺乏横向比较及对不同评价之间内在呼应的深入挖掘。当然，也有乡村建设研究尝试进行各种不同的横向比较，但一般研究多以“西化派/本土派”、“科学派/传统派”进行类型区分（郑大华，2000），虽然研究者也努力呈现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全貌”，但这种做法仍然容易产生简单化的效果：一方面将复杂多样的乡村建设实践简化聚焦于晏阳初和梁漱溟这两位核心领导人，并认为是他们个人的文化思想与教育背景起主导作用⁷¹，这既把实践内部的复杂张力及个人以外更大的时代脉络简化了，并以“个人/派别”的差异消解彼此间更深层次的有机联系与内在呼应⁷²。另一方面这种关于“个别/个性”的讨论仍是在“正向运动”所主导的现代社会坐标内，它阻挡了我们对乡村建设意义与启示的深入挖掘⁷³，下文将结合材料详细论证。

以上对已有乡村建设研究综述的综述，笔者的归纳虽不尽严谨，但仍希望先给读者一个印象式呈现。下面讨论几类具体的乡村建设研究，同样不可能完整准确的分类，不同类型存在着诸多交叉，把它们“简单化”与“类型化”自然不是笔者的真正目的，重点是希望借此提取归纳几个常见的角度，以方便我们讨论常见“单向运动”视野在呈现和叙述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也帮助笔者明确本论文随后各章讨论在叙述范式上需要挑战与对话的对象。

1、效果论

从成效切入的评价与研究将在下节“历史乡村建设批评”中通过详细的史料进行讨论，此处不举案例，仅简要概括其基本特征与问题所在。笔者认为存在两种类型的“效果论”，第一种比较常见，即以成败论英雄——当我们关心一种思潮、理论和实践时，往往迫不及待以其“结果”为逆推的导向与参照，计划的“成败”因而直接影响着分析者的态度与重点⁷⁴。但这种只关注成效的逆推

71 比如郑大华（2000：472）认为：“定县模式和邹平模式确实存在着种种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源自于双方主要领导人不同的文化思想背景，平教会领导人由于受现代文化尤其是西方文化的影响更深一些，定县模式也就显得更现代或开放一些，山东邹平的乡建由于主要领导人受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思想的影响更深一些，邹平模式也就显得更传统或保守一些”。

72 比如晏阳初、梁漱溟和陶行知的教育背景存在很大的差异，但其对知识分子、现代教育、现代知识本身的思考、批判与随之的遭遇与困境，都有着深层次的呼应，详细讨论见第三章。

73 如梁鸿（2011：63）指出：“那一代人的努力，那无数经验和由此而形成的知识、制度还被搁置在历史深处，无法启用”。

74 当得知成败的结果后，我们多把注意力集中在论证其成功或失败的原因，这种做法有很大的“去脉络”危险，至少易简化任何实践都具有的复杂脉络与丰富可能性。

经常放过了“成败”由谁在界定、是在什么样的脉络与条件⁷⁵下界定等问题。而其背后“成王败寇”的强者逻辑，则基本取消了对成败标准本身的质疑与讨论。如果我们能对这种“效果论”进行反思，被称为“失败⁷⁶”或“不成功”的乡村建设，将拥有比现状丰富很多的实践与思想资源。

另一种类型的“效果论”比较间接——虽不直接以结果倒推成败，但仍然简单化的将“主观-客观”和“目的-效果”对立二分，实际以“主观/目的”为陪衬再次突出“客观/效果”的权威与不可置疑，进而回归主流论述。比如马勇（1999：148）在《梁漱溟传》中先反驳“大多数乡村建设工作者并不是新中国建立后一些教科书所评判的那样，说他们主观上是为了配合国民党政权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进攻，是挽救地主阶级的垂死命运”，再指出“他们是完全出于一种善良的愿望，企图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两条道路之外，寻找出一条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这虽不是彻底改变中国农村贫穷落后面貌的根本举措，但毕竟是有益无害的工作”（1999：148-150）。刘重来（2007：61）在综述不同评价时也总结出类似共同点：一方面，许多研究者对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动机给予肯定；另一方面，这些研究者对乡村建设运动的方式及能否达到预期目的均表示怀疑。

除影响着历史乡建的叙述与评价，“效果论”也直接作用于当代乡建实践。比如无论是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2003-2007）还是小毛驴市民农园（2008-至今），包括笔者在内的实践者一直面对不同参访者类似问题：你们为什么这样做？你们为什么能“活”？你们凭什么“活”下去？你们还能“活”多久？你们能改变中国的大环境吗？虽然前几个问题看似质疑的是乡建之目的与存在理由，但同样隐含着“效果论”的基本逻辑和假设，它还症候性的表现出当代脉络下人们对“另类”实践的一般心理⁷⁷。

75 如温铁军（温铁军等，2003：36）认为历史上的乡村建设“我们不能说它失败了，因为它的条件变化了。”

76 如郑大华（2000：480）所指：“乡村建设运动的这种改良性质，导致了乡村建设运动的彻底失败”。

77 其实提问者心中自有答案，只是需要通过如此的反问，来验证自己的判断，然后获得某种“就是嘛！我猜的对，不过如此！……”式的心安与满足。

2、“好人好事”⁷⁸说

这种类型的评价与研究较为常见，此处仅概括其特征与笔者的反思，具体论据简要涉及，详细内容请读者自行参照相关文本，如《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吴相湘，2001），《中国人能做到——民国实业家卢作孚》（清秋子，2010）等。此类叙述常将乡村建设丰富实践中的“（好）人”和“（好）事”抽离开原有脉络，进行以“个人/个别”为单位的道德处理，因此较多使用以传记为主的史料，部分作品使用较多文学修辞，或通过将乡建人物“传奇化”⁷⁹以尝试获得更多读者的共鸣。类似做法对公众认识乡建（人物/事迹）有一定程度和阶段上的效果⁸⁰，所述“好人好事”无论在历史和当代也都的确存在，因为乡村建设实践总体上所处的边缘位置，在主流论述包围中对另类实践进行某种“存在式证明”⁸¹也的确必要。

但我们可以发现，“好人好事”的类型叙述同样存在于观点、目的和立场各异甚至对立的评价中。如根据《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分析，虽然该书结论认为乡村建设归于失败，但作者仍然强调“成百上千的知识分子其中还有不少人是取得过硕士、博士的归国留学生，或是大学校长、教授和著名专家学者，抛弃了他们在城市的优厚工作和生活条件，来到各方面都比较艰苦的农村”（郑大华，2000：538-539）。可见，如果不能结合于整体脉络并认识到乡村建设实践与实践者本身的复杂性与内在张力，表面上针锋相对的“好人好事”说与“效果论”都将只是“自说自话”，并不构成真正的相互挑战。这既不利于对乡建内在复杂性进行更为必要的把握，同时这种主流逻辑内部允许存在或预留的“好人好事”空间还可能再次巩固我们对“好/不好”评价标准的刻板认识，进而弱化乡建理论和实践通过复杂性所带出的批判力。

78 需说明的是，此处没有“好人一定会做出好事”的意指或推论。而是根据此部分的分析，脉络中“好人”与“好事”为并列关系，分别指“类型化”评价下的个人与事件。当然，其中包括笔者对所谓“好”这一标准与“意义”的质疑与反思，而本论文对“好人好事说”的拒绝与挑战还包括通过各种案例尝试指出：即使是“好人”与“好心”，面对各种现实限制与复杂脉络，也未必能达成“好事”的目标与效果。这也是笔者在导论所提出——为何乡村建设在现实中困难重重并与预期目标相去甚远？

79 除有与一般传记体相近特点外，下文第三部分将分析当代乡村建设被传媒“传奇化”的开局，则可作为对照。

80 例如，正如导论开头所述，正是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但超越于）“好人好事”论述的《告语人民》，作为启蒙读物让笔者开始了至今逾十年的乡村建设实践。

81 此外，两个彼此呼应的例子可作为“另类”实践在主流中证明自身存在是十分困难而又充满悖论的存在：在《蒙面骑士》（戴锦华、刘健芝，2006）这部讨论墨西哥恰帕斯州萨帕塔原住民运动的书中，原住民反抗者们必须蒙上面具，这个世界才可能“看见”他们。而在当代乡村建设运动支农大学生们那里，胳膊上带着红领巾，既为了在城乡拥挤人流中便于辨认，更是让这个世界有可能“看见”类似努力与行动的存在。

故不是“好人好事”的论述不对或不必要，而是不应满足于此。

3、问题说

近年来，有人类学者为乡村建设理论实践的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此处暂归纳为“问题说”，因较少研究直接就其乡村建设批评进行具体回应，此处略为详述。

赵旭东在一篇题为《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围绕“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反思》的文章中尖锐指出：晏阳初“认为所有农民都患上了他凭借理性所诊断出来的‘愚、穷、弱、私’四大疾病，因此需要发动整个社会的力量对此加以诊治。这种思考乡村和描写乡村的模式影响着中国近代以来民众看待乡村社会的眼光，可以说这是一种医生的眼光，是一种容不下一点病菌和疾患的眼光”（2008：112）；这种诊断一方面是“把农民想当然⁸²，由此来彰显他的道德和良心，另外一方面他心安理得⁸³地接受美国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去实现他的拯救农民的心愿”（2008：113）；在作者看来，“迎合那个时代民族改造浪潮的并且遵循晏阳初模式的知识分子们真切地希望，通过人种的改造来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农村人口占据绝大多数的国家的诸多问题。而对于人的改造，最为文明也最行之有效的途径莫过于教育”（2008：112）。

其实这些批评只是引言，重点是作者认为“这种运动显然把中国乡村界定为一种‘有问题的乡村’，此种观念突出地体现在乡村建设派的思想 and 实践中”（2008：111）。它也将从知识论层面导致“不论是早期的乡村建设运动，还是之后的新生活运动，甚至最近的新乡村建设，都无法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自身的问题”（2008：113）。

相对而言，作者更鼓励另一种描述者：“他们不是担当着社会医生的角色而

82 意味深长和充满悖论的是，该说法并非简单的“想当然”或“凭借理性”，其恰恰用最社会学的方式，重要依据之一正是被视为中国社会学里程碑之一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李景汉，2005，上海人民出版社）。

83 作者在随后则自言两难困境：“从学术伦理而言，我们只有不去干涉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不把研究对象看成是不正常的或者是患有疾病的，才有可能得到我们认为客观的观察和描述。从社会道德而言，我们不可能不对和我们一样有着思维与情感的对象产生同情与帮助之心”（2008：115）；“对于那些认为乡村全部是问题的、带有某种政治倾向和企图心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我们又无法与之保持认同。那么作为一位以冷静的客观描述为己任的人类学家或者社会学家，在面对受到伤害的农民或者受到污染的乡村时，该如何做出自己的反应呢？干涉还是不干涉，这是摆在中国乡村研究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难以解决的学术伦理问题”（2008：117）。对于第一种“两难”，笔者认为既不应把这两个层面简单分开，也不可把“研究者-被研究者”分割开，这同样也是作者所批判“对象化”的另一种表现，同时还需要在“后实证主义”思潮启示下追问“何为客观？”。对于第二种“两难”，难道仅是学术伦理问题，难道不同时也是经济、文化、意识形态、主流政治等系列问题吗？本论文第四、五章将有相关讨论。

是担当着旁观者的角色，他们有耐心等待事情一件一件地慢慢发生，像是一位纪录片的摄影师，‘客观’的描述便是目的；即便他们所描述的对象真的出现了什么问题，也由于这类‘摄影师’坚守客观描记的学术原则，而不会动了感情去干预描记对象的行为与思想”（2008：114）。

作者进一步认为：“尽管许多学者批评中国传统文人说的多而做的少，但也许正是这种‘清议’的传统，让我们的社会不仅保留了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生活方式，同时又能够创造出来令人羡慕的维系这种生活的高雅文化。能够这样想，能够这样做，也许才算真正回到了中国问题的根本上去”（2008：115）。而对于当前研究者和实践者所面对的乡村危机，作者也提出不同的观点：“目前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许多人开始担忧起乡村消失的问题。看到越来越多的乡村青壮年进入城市，老人和小孩留守在贫困的乡村里，他们就开始想象未来乡村的消失。对于乡村这些人带着预先的偏见，以为乡村正在变得失序，未来乡村可能会面临崩溃。他们忽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乡村作为一种文化与社会形态的自身转化能力”（2008：115）。

赵旭东对晏阳初广为人引用的“愚、穷、弱、私”观点进行新角度的批判，笔者基本认同并在第三章中详细展开。作者提出类似于“乡村有问题，但不是乡村本身的问题”⁸⁴，拒绝让乡村成为被动与待拯救的客体，都是对主流研究与评价十分重要的突破，同样也是本论文各章尝试论证的重点。

但此处需要提出的是，正如作者在文中批评一些作家让农民和他们的生活“刻板化”⁸⁵，笔者认为其对晏阳初与乡村建设实践的“问题说”同样存在刻板化与对象化的问题，而对“乡村自身转化能力”的坚持也仅为“单向运动”静态视野，而非“双向运动”辩证视野。

首先，和前文各讨论一致，历史相关批评应该放回具体的历史情境下，需要避免“去脉络”的简单处理，比如关于晏阳初把农民“病人化”和“他者化”的论述，我们不应满足于一般的指认，而需回到其作为当时知识分子在特殊时

84 如作者（2009：53）指出：“乡村之所以成为问题，也许根本不是乡村自身的问题，而是一个东方文明在面对西方的现代性所体现出来问题的一种折射。”然而，作者随后所说：“显然，这些并非专业的也不以理解和宽容为怀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者，他们并没有将自己的事业扩展到更大范围的‘文明的碰撞’上，而是目光向下只看到了‘乡村问题’！”，则十分遗憾的以“专业、理解、宽容”这些饱含感情色彩因此也值得追问的价值判断为指认，而轻易放过更值得讨论与深挖的脉络与背景。

85 赵旭东（2008：113）曾指出：“这类作家们必须要标新立异地把自己所看到的和发现的问题书写出来，使这些问题成为公共问题。而这样做的结果很可能以偏概全。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农民以及他们的生活在这些作家的书写中常常成为一种可被界定的因而是被刻板化的对象”。

代背景与充满张力脉络下的某种共同行为特征上进行理解⁸⁶。如此看来，晏阳初与鲁迅等人一样有着某种内在的“双重性”——既批评也自我批评，既“对象化”也对自己身份与认同中的“知识分子/现代教育/都市人”保持着同样深刻的反思并在实践中进行调整⁸⁷。正是通过这样的“矛盾”，才可让我们更准确把握他们的行为动力、意义与局限⁸⁸。

其次，作者十分敏感地认识到乡村建设某种程度上是以现代化为参照⁸⁹，对于笔者来说，其正是受到强大激进“正向运动”力量之影响，但同样重要的是，其在乡土“遭遇”中发生着不同程度的转化，在“反向运动”影响下不断进行着自我批判与自我质疑。在本论文第三章中，笔者将结合历史与当代实例详尽论证。通过这些实例，将发现作者的批判一定程度上缺乏动态与变化视角。

再次，这种静态和“去脉络”的倾向不仅存在于作者对乡村建设的批评中，同样存在于其对乡土社会的理解里，虽然作者努力尝试为之“正名”。的确乡土社会有着与现代社会不一样的逻辑，但如果将其理解为一种“本质化”的存在并认为其可自动自发的完成转化，而将乡土割裂于外在脉络，忽视外部环境变化对其所造成的重要影响（如“三农”问题的产生，详见第二章）及自身所发生的动态变化，则仍是一种“单向运动”视野，虽与作者所批判的“正向运动”相反，但同样忽视“双向运动”间从来就存在的复杂互动关系。

4、其他处理

梁培宽（2001：183）认为，早年的批判者和近年的传记作者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他的父亲（梁漱溟），原因是没把“特”字即“个性”讲出来，没有深入的讨论乡村建设与其他社会运动的不同之处。笔者认为，除了没讲出来外，已有各种叙述因为不同程度与偏向的“类型化”与“简单化”而不可能讲出来。

86 详见本论文第二章《“现代梦”的别样回声——乡村建设的脉络、资源与矛盾》中关于乡建充满矛盾与张力的思想资源分析。

87 晏阳初对农民的批评同时也包含着自我反思：“我们有两个发现是真正的革命。其一是学会了评价农民。多少个世纪以来，我国的农民从未受过教育，这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我们发现农民所缺少的不是头脑，而是机会。于是我们发现了所谓‘苦力’的巨大力量。另外一个发现同样令人吃惊，那就是认识到我们自己——知识分子的无知，并且受到了我们自己农民的教育。……这个运动的目的无非是改革知识分子自我陶醉、自高自大的心理状态及知识分子的无知”（1965：401-402）。

88 今天，我们似乎很习惯于说“局限”，与其是通过严肃的分析而承认任何事物都逃脱不了的辩证法，不如说更多是为了突出或强调那些“超脱局限”而存在的至今事物的某种“合理性”。故当谈局限时，需要放回其所在的具体时代与脉络中，需要警惕以今天我们的眼光、脉络与后见之明而轻易打发。

89 如作者在随后另一篇题为《从“问题中国”到“理解中国”——作为西方他者的中国乡村研究及其创造性转化》的文章中指出（2009：53）：“1930年代在中国展开的以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的思维模式，以现代城市的眼光去向下看传统的乡村，并在乡村与城市的连线上寻找农村问题的解决路径。”

比较起来，芝加哥大学艾恺教授的研究《最后的儒家》则有一定突破。无论是作者将梁漱溟与毛泽东这两位表面看来对立多于统一的“理论-实践者”进行全新角度的比较，还是对梁漱溟主流研究关于其“浪漫主义”、“保守主义”标签的批驳，作者都尝试让我们对梁漱溟的认识回到他所生活的时代，进而理解他的兴奋、动力、困恼与忧虑，也即该书副标题概括的“中国现代化的两难”。

首先，艾恺（1996：202）指出：“梁漱溟和中国及世界各地那些排外的保守主义者们不同。‘实事求是’是他用的最多的格言。梁漱溟对其乡村的及文化的复兴所作的最根本的辩护既不是民族的统一和团结，也不是浪漫主义，而是‘客观事实’，并且最重要的是对于经济上的客观事实的考虑”。之所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浪漫主义”，因为“当时有人主张将中国建成一种道家式的农业乌托邦，以求避免西方工业化带来的罪恶。但梁漱溟则怀疑在现代世界中建立一个农业国的可实践性⁹⁰”（艾恺，1996：142），除这种对现代化以来世界局势难得的清醒与独特认识⁹¹外，其所坚持的“乡村本位”、“反（一般意义）工业化”之所以不应归为“浪漫化”，因其更多是从特殊国情与所造成的“成本/代价”出发⁹²（艾恺，1996：160）。

其次，艾恺认为梁漱溟同时拒绝着“全盘西化论”、“保守主义/国粹派”和“中西融合论”这三种当时有着较大影响的思潮。前者我们相对容易理解，至于拒绝“保守主义/国粹派”，则因为梁漱溟也看到传统文化存在问题，特别自宋以来就成为呆板僵化的教条与“陈旧的古董”（艾恺，1996：8）。虽然梁漱溟主张调和，但同样拒绝所谓中西“融合论”，因其认为这种说法的背后是实用主

90 除此外，艾恺还认为其还取决于梁推动乡建的独特目标：“梁漱溟对于自然丝毫没有那种近乎泛神论的敬意，也没有作为西方平均地权论特征的那种审美的田园之乐。……他认为乡村建设的目标是要实现都市和乡村的相互转化，而不是远古时代那种道家式的乌托邦”（艾恺，1996：203）；而梁漱溟本人，则毫不掩饰的直言：“不是我们选择最理想道走，而是其余这一方那一方都横栏竖截堵塞不通（2005：515）”。

91 虽然他的分析很模糊，但联系着其后数十年出现的“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则初步体现梁漱溟作为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独特敏感。

92 当代乡村建设与历史实践遥想呼应，温铁军（2004：206）认为：历史乡村建设的宏观前提是“‘一战’以后中国不能参与世界势力范围的重新瓜分，内部矛盾开始激化”。而为什么工业化会带来乡村建设？他则指出因为“工业化需要加速内向型积累，而中国人走不出去，没有那个‘坚船利炮’，没有那个铁爪子，不能伸手掠夺。拿不到别人的东西，只能拿自己的”；“‘一战’以后，中国还以为可以在巴黎和会上获得应有的尊重和‘战后利益’，但残酷的现实封住了这条路。即，不能参与世界势力范围的重新瓜分，内部矛盾开始激化，中国没‘戏’，西方列强已经关门了，才是乡村建设开始产生的宏观前提之一”（温铁军，2005b）。

义和工具主义，故他希望摒弃这类“轻率”⁹³的解决办法。

再次，艾恺认为虽然梁漱溟论证中国不能套进常规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但“梁漱溟并没有像人们希望的那样在共产党的努力和乡村建设之间划出一条革命或改良的界限⁹⁴。他认为乡村建设‘毕竟是一种革命；从旧秩序——君主专制政治，个人本位的经济，根本改造成一全新秩序——民主政治，社会本位的经济，不说他是革命是什么？’”（艾恺，1996：224）。在艾恺的分析与比较中，“结果，正是共产党人实现了梁漱溟的最终目标。……毛泽东复兴的风格和手段与梁漱溟的幻想有着某些相似性：强调乡村小工业和地方的自力更生”（1996：279）。这种分析在艾恺1980年代见到晚年梁漱溟后得到某种验证，艾恺认为“梁漱溟本人也强烈感到他的乡村建设的计划和目标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实施了”（1996：351）。通过全书的分析比较，艾恺认为“与许多西化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及国民党或共产党人比起来，梁漱溟与毛泽东两人的接近程度都更大。一个是中国儒家的圣人，一个是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这也许要比他们之间的对立重要得多”（1996：293）。

《最后的儒家》以上几方面的研究对笔者有两点启示。第一，它启示我们摆脱前述几种“类型化”评价，通过思考梁漱溟理论实践本身的复杂性及其与同时代其他思想主张间的内在联系，进而讨论其与“中国现代化两难”的呼应关系。更重要的是，作者虽也谈到梁漱溟的家庭与性格，但却有意识的拒绝常见的个人化与一般性归纳。

正是通过这种“脉络化”处理，艾恺让我们看到梁漱溟理论实践中的内在矛盾与张力——“在政治上的模棱两可：它既不是革命的也不是保守的，也的确不是自由主义的，而是一种‘革命的保守主义’。……他幻想着一种民族化运动以反对国家化。他认为，政府天生就是乡村建设的妨碍。同时他也认识到乡村建设只有含混地和政府联合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武装的政治运动并把权力抓在手里”（艾恺，1996：280）；“虽然乡村建设的目的是建设一个避免都市政治经济控制的社会，但梁漱溟仍然要到都市的银行去寻求资本。而且，就连实验计划本身在山东的贯彻也不是依靠农民的无私，而恰恰是他们的自私”（艾恺，

93 艾恺提到：“针对有人将中国历史的大部分称为‘半资本主义’或‘半封建’，梁漱溟会大笑的认为大概遇到中国事加一‘半’字都颇适当。梁恰恰认为，这些显然不适当的努力反而证明了他的观点。中国社会中的种种这类的‘谜’正因为它一直在努力实现它的潜能，然而它却缺乏完成这一任务所必备的物质条件”（1996：187-188）。

94 艾恺还认为：“梁漱溟的这条路与共产同其方向，所差的只是分寸不同”（1996：233）。

1996: 284)。但这种矛盾又不可简单归结为个人原因或按“效果论”逻辑下的某种不彻底性，恰好折射出乡村建设实践所需处理与面对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也反映“双向运动”不同力量在乡村建设各层面所发生的作用，本文后三章将结合笔者参与的实例进行讨论。

第二，作者尝试寻找梁漱溟与毛泽东深层次的共通，笔者并不完全同意并有着自己的理解与处理方式，具体将在下文关于“改良”与“革命”的讨论中展开。但这种比较，至少把乡村建设和经乡土社会、独特历史、国情矛盾等脉络限制改造过的乡村共产革命同样定位于“另类”实践，它让我们有机会看到梁漱溟和毛泽东实际都在“面对/对抗”着不同的“主流”⁹⁵，同时警惕着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道路对乡土社会的不适应，以走出一条与一般发展中国家不一样的特殊道路⁹⁶。笔者还认为，同样都精通哲学，两人都尝试在“关系”层面上推动突破⁹⁷，这无疑让他们具有一种更广阔的视野。

此外，笔者认为《最后的儒家》的不足在于：艾恺认为梁漱溟或乡村建设运动面对着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前文已述及这种“两难”所带来的矛盾感与紧张感固然重要，但一般谈“两难”仍然难以跳脱“单向运动”视野，特别是“正向运动”影响下的精英视角与去脉络化——那是谁的“两难”？“难”是相对于什么？如果回到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民众与实践脉络，简单化的“两难”框架是否也无助于对丰富性的把握？总之，其同样不利于充分展示乡村建设的复杂性与“另类”特点。

其他研究中，也有学者如本论文的导论中所简述，尝试跳出乡村建设作为“走向-拒绝”现代化的简单分割，尝试从“另类现代性”的角度进行分析。如李善峰（2003：374）所指：“长期以来学术界基本上把梁漱溟定位于‘反现代

95 虽然毛泽东和梁漱溟在数次交谈中，梁认为毛在阶级观上太坚持“普遍性”，毛认为梁太坚持中国的“特殊性”。但实际上，毛毕生都在挑战主流和一般意义上的传统革命道路。

96 作为反证，可参考：路爱国，《改革三十年——中国成为“正常的”发展中国家？》，2009，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gzhc/article_2011010127502.html，2012年6月6日查阅。路爱国通过各方面的数据分析指出，改革前30年（1949-1979），虽然各方面普遍“落后”，却曾经有可能摆脱世界体系与殖民化的影响，走出一条“后发现代化”国家“有特色”的道路，但近30年改革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使中国的基本制度、社会经济特征等方面越来越类似于其它发展中国家。因此，也将像绝大多数‘正常’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很难摆脱国际分工中的低端地位及‘繁荣-膨胀-泡沫破裂-衰退’怪圈，即发展中国家在整体上始终面临的‘后发劣势’或‘发展陷阱’”。

97 如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2005：161-162）的开头即指出：“中国问题在哪里？有人说是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又有说是在‘贫、愚、弱、私’；这两说都不正确。前一说好像中国此刻就多了这两样东西，去掉这两样东西就好了；后一说又好像中国此刻就在乎这四样缺乏，添补进来就发了。然而，宇宙间最要紧的是那些关系，而不是一一具体事物。……人生下来一丝不挂，可说最贫不过，但未闻有以为问题者。……今日中国不是贫的问题，而是不能富的问题，是贫而益贫的问题”。

化’思想家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其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与对社会现代化的思考,以及对目标模式和具体道路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本世纪以来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些新动向”。李善峰(2003: 376)接着指出:梁漱溟“不认同既有的现代化模式,主张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和民族特点,走自己的路,即希望中国按照自己的文化造就一个自己能够享用的现代化。力求克服西方社会业已出现的弊端和重视中国固有文化这一不可摆脱的背景因素”。

具体到乡村建设实践是否为“另类现代化”,显然是个非常庞大的议题,它也并非本文所更希望采用的角度。对于笔者来说,重要的不是一个是否的确切答案,而是以此是否有助于我们进入那段充满张力的历史。笔者之所以不简单认同乡村建设整体作为某种“另类现代性”的存在,因为乡村建设内部各派对现代化的态度本来就存在很大的差异,除了常常被人说起的晏阳初与梁漱溟之间,卢作孚对现代化的态度也与梁漱溟十分不一样⁹⁸。更有意思的是,如此差异下为何他们又都能“殊途同归”⁹⁹的提出并实践着乡村建设,这是本论文第三章的出发点与基本问题,此不详述。

以上几类观点既是后来者从研究角度对实践行为本身的归纳与评价,同时还很大程度受到一直同步于这场实践的各种批评之影响。

更多不同角度的研究¹⁰⁰,因为篇幅限制难以一一列举,还有一些代表性的观点与研究,将结合到下文的“历史乡村建设批评”中。

二、 历史乡村建设批评

乡村建设有着更为复杂的资源和脉络,笔者将在下一章详细展开。具体到“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讨论,乡村建设既是引发讨论的原因之一(特别是后期讨论),同时也是其以实践回应着类似的讨论(主要指前期讨论)。下文所要详细讨论的各种历史乡村建设批评,许多是由此引发和进一步展开,为

98 卢作孚在《四川嘉陵江三峡的乡村运动》一文中豪迈宣称,他搞乡村建设的目的,是为了“要赶快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而卢作孚认为“中国的弱点只在没有走入现代,没有完成现代的物质建设,没有完成现代的社会组织,没有运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去完成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转引自刘重来,2007:前言2)

99 如本论文随后各章所展开的,“殊途同归”仅相对而言,其间同样充满着差异与张力。只是相对于主流现代化的各种“救国”思路来说,他们所选择并认同的是“另类”的乡村建设。

100 再如,在美国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 Charles W. Hayford (2004: 64)的研究中,晏阳初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创造了新的公共角色,以表达一种乡村中国的思想。虽然他没有成功,但却在需要政治组织的知识分子中建立了一种自觉意识”。Hayford 认为,一方面晏阳初和当时主流知识分子都认为乡村需要现代化并依赖科学方法,但另一方面,他却和其它人很不一样的坚持认为这种方法不是以中产阶级的、城市的、西方的模式为基础,而是从乡村中学来的(2004: 74)。

帮助读者更好理解视角来源及前后脉络的一贯性，下面的第一小节中略作回顾，同时也说明乡村建设在知识生产与论述上面对来自“正向运动”的持续影响。

1、从“农工之争”¹⁰¹说起

罗荣渠（2008：序 29）在其所主编论争文选的序言中指出：“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之争活跃起来，在《独立评论》上引起热烈讨论。这一方面是因为现代化问题的提出大大拓宽了对中国出路问题讨论的范围，同时，由于在世界经济危机形势下我国农村凋敝情况日益严重。另一方面的具体情况是乡村建设实践的兴起”。

他还进一步指出：“农业立国派提出对世界形势的看法，与六十、七十年代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的论点，在精神上实有某些相投之处。当时这种观点绝不只是梁漱溟一人的看法，而是反映殖民地半殖民地知识界相当一大部分人的想法”（2008：序 31）。

但“以农立国”的观点，当年就遭到很大的反驳，比如吴景超（1934：806）认为：“以农立国是一件可怜的事，没有什么可以自夸。因为农业国是走向贫穷，愚笨和短命的路。而工业国是走向富有、聪明和长寿的路”。其中“可怜、愚笨、聪明”等明显感情色彩与修辞特征的词汇，既说明这场争论本身已超越于一般的学术讨论，同时也让我们看到论者对工业化充满着浪漫的想象。

不同于一般“以农立国”论者的发言，梁漱溟以乡村建设实践者的角度参与讨论，他认为：“如何工业化？这不能用哲学的口吻立论，不徒逞主观的偏见，而应从经济问题和客观事实上平心静气研究中国将要有的出路”（1935：897-899）。因为梁漱溟一直就认为当时的中国缺工业化的资本与市场¹⁰²，故他进一步提醒论者：“中国工业不是没有起来的问题（欧战期间有显著的抬头），而是起来之后被摧残的问题”（梁漱溟，1935：897-899）。

这样一个很小的“交锋”，让我们看到“农工之争”不仅涉及简单的主观立场，更涉及到对国情的不同判断与对世界格局的不同认识。而乡村建设即包含

101 即上世纪初中国知识界对于“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广泛争论，为标题简明，特作此概括。在讨论中，观点和立场被分成对立的两派，但实际上充满差异与多元，需特别注意。争论的代表性历史文献原文详见罗荣渠主编（2008）的《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书中相关部分，此处仅作简述，非本文重点，争论的详情，读者请自行参阅。

102 事实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依靠人民公社、城乡二元制及十分特殊的内向型积累方式才完成了独特的工业化原始积累。详见本论文参考文献中温铁军关于中国“工业化”与“中国经验”的相关分析。

这样一种尝试跳出“农业-工业”、“保守-激进”常见二分框架而进行某种“另类”实践的努力，因此自然同时受到来自不同甚至对立立场的批判。下文将选取代表性观点进行讨论。但在具体进入历史脉络讨论前需指出：本论文的重点不是做各种形式的辩护，引用这些批评是为了让我们更全面准确的理解乡村建设实践的具体脉络与论述环境，进而看到“正向运动”力量是如何在不同层面上限定并影响着“另类”实践。

2、“右翼”¹⁰³批评

《独立评论》曾陆续发表了一些自由主义学者对乡村建设实践的批评，其中陈序经的批判最为强烈与突出，虽然不能认为是普遍观点而具有广泛性，但却可认为是作为某种逻辑与角度的代表，在此主要以之为例。

陈序经因发表“全盘西化论”而名噪一时，在1936和1943年，陈教授先后发表了《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乡村建设理论的检讨》、《乡村建设的途径》三篇批判性文章。

陈序经首先提出“乡村建设运动可以算作一种很时髦而很普遍的运动。我个人对于今日一般所谓乡村建设的前途，颇感觉悲观”（1936a：106）；“在工作方面少有成效、渐呈枯萎的现象”（1936b：113）；“还未超出空谈计划与形式组织的范围”（1936a：108）。在他看来，“所谓乡村建设工作，大概说来，可分为四方面：一为教育，一为卫生，一为政治，一为农业。假使我们从这四方面的工作略加检讨，我们难免失望”（1936a：109）。

具体方面，陈序经则指出乡村建设的“几个实验区都设有医院，但是这些医院，无论在治病或研究方面，都嫌太过简陋”（1936a：109），类似批评已有研究者指出其中略显苛刻与不切实际的方面¹⁰⁴，但他在另一篇文章中的这个批评却十分切中要害：“若是到了像定县那样的地方，我们说给参观者参观的，也

103 笔者对知识界主流关于“左-右”的划分与定义有不同的看法，并坚持不应简单的进行二分。但因已有研究者提出乡村建设分别受左右翼学者的批评这一事实，为更好与之对话并强调乡建同时受到对立立场的批评和所处的“另类”位置，暂且借用这一简单化的分类。其中根据当时脉络，“左翼”主要来自共产党内及观点与价值取向相近学者，主要的批评性文章发表在1933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农村研究会刊物《中国农村》上，该团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研究中国农村经济的学术团体，陈翰笙任理事会主席。与此相对，“右翼”批评则多来自与当时共产党的观点主张有较大分别并持“自由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们，代表性的批评者包括陈序经、吴景超等人，主要批评性文章发表在《独立评论》上，该刊为中国现代政论杂志，具有自由主义倾向，1932年5月22日创刊于北平，胡适任主编。

104 如艾凯（1996：276）对类似例证的处理：“民国期间，海外归来并带着现代化‘真经’的陈序经在访问山东邹平归来后，以胜利者的口吻得出了多少有些令人吃惊的结论：梁漱溟仍然没能把山东农村变成上海？”。

不外是在县城里或是县城附近西化的保健院，西化的农场……试问我们所谓以乡村为主体为根据的中国的高度文化，又在哪里呢？”（1934：819）。

遗憾的是，陈序经没有顺着“另类”实践因主流的参照和影响而很难获得真正突破这一更深层次的困境往下挖。相反却回到一般的层面，坚持认为“就是因为它们不以都市为建设乡村的起点。……因为交通不便，以及其他的好多原因，离开都市较远的乡村或区域，治安很成问题”（1943：123）。虽然陈序经也承认包括人才难找，经费不足，环境恶劣等各种条件限制，但他坚持认为理论方面的错误才是根本：“乡村建设运动，在名词上虽是很新颖，在理论上却有了多少复古的趋向”（1936b：113）；“我个人以为乡村建设运动之所以衰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理论上就有其根本错误的地方”（1943：121）。可见比起实践中的困境与不足，理论上的批判才是其关心的重点。他直接指出梁漱溟理论中的问题，比如：“梁先生说：‘现在资本主义下的工商业只是发财的路，农业才是养人的路。’……我要指出：一个国家要独立生存于这个世界，专事养人是不够的¹⁰⁵。养人以外，譬如交通的工具，卫国的武备，以至一切的日常工业用品，也不能不特别留意，尤不能不努力发展”（陈序经，1936b：117）。

陈序经的另一批判更为严厉：“因为目前的工业落后而不得不主张重农，这是一个错误，这是自暴自弃。因为目前不如人而自暴自弃，已是一种失败者的心理表征，而况一般提倡乡村建设运动的人们，大都是一般迷恋于复古的人物，欲以‘以农立国’、‘死不出乡’的传统思想，以应付现代的世界，这是愚妄，这是幻想”（1943：121）。如果说一定要开展乡村建设，陈序经则建议：“这种乡村建设工作，最好是以都市为起点，先从在都市左近的乡村下手，尽量利用都市中的行政机构”（1943：124）。

前文已在《最后的儒家》评述里涉及各种乡村建设批评中的简单化与标签化问题，在此暂不处理陈序经所批评“死不出乡”、“自暴自弃”、“迷恋复古”有多大程度是存在于批评者的自我臆想与想象中。笔者仅希望指出，类似的批评都有将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漫化的倾向，而这种“现代梦”的焦虑与迷思（myth）也非批评者个人独具，它与近代中国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方面的整体脉

105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判断不是自有和永有的，到了近现代世界竞争格局和“民族-国家”的具体脉络下凸显其成为问题。我们当然需要直接面对这个问题，但却不可忽视问题背后更为复杂的成因。其次，梁漱溟80多年前所说“农业是用来养人的，不是用来发财的”，这句话即使今天看来也会很不“解渴”，但却非常符合生态，特别对于当下这个让农业“害人”的食品危机时代，有着分外的意义。详细讨论见论文第四、五章。

络高度相关，是“正向运动”力量与乌托邦信条支撑下的“激进”产物，笔者将在下一章中详细论述。

在这种特定的“意义系统”内，自诩为“现实”的批评者几乎不会对传统农业大国在现代世界经济体系和不可能对外殖民的前提下，实现西方意义上的工业化目标与条件进行必要的怀疑。相反，被批评为“保守、不切实际”的乡村建设派，因为要让“实践”运转下去，则不得不从“条件/代价/成本”等方面进行全面和实际的考虑¹⁰⁶。此外，批评者建议的乡村建设“以都市为起点，尽量利用都市中的行政机构”，看似很好也合理，但却未考虑现代社会治理的高成本及乡土熟人社会在此方面的独特优势。而乡村建设实践者所忧虑的不是人口数量分布上在城还是在乡，发展路径是“从城到乡”还是“从乡到城”，而是整个社会是以什么为导向，由此将对真正意义上的平民、生态环境、文化价值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带着类似角度的反思，我们将发现“右翼”评论都共享着一些自认为无需质疑与挑战的前提。再如《独立评论》上另一些评论晏阳初与“定县试验”的文章，章元善在定县归来后总体持肯定态度，但仍说道：“像东建阳这个村子，经济虽不景气，人民还能安居，充满新气象。这一点小小成绩——代表平教会多年的经营，哪能经得起大兵们一天的光临”（1934：364）；另一去定县参观者涛鸣则在《定县见闻杂录》中认为，“假使以政治力量，来办平教会的事，我敢说他们的成绩，一定比现在好的多”（1932：369）。

这些观后感十分形象的描绘了“另类”实践的艰辛与不易，在这一类自由主义倾向论者的眼里，虽然没有强烈坚持“工业化才是活路，都市化现代化才是方向”，但仍然在“正向运动”的影响下，对政治、政权、国家和变革有着单一化的想象，笔者将结合下文另一立场的批评进行讨论。从主张“全盘西化”陈序经对乡村建设的激烈抨击到以上两位论者较为温和的讨论，虽然同样来自《独立评论》，这恰恰说明乡村建设批评论述中的复杂光谱，它也提醒笔者和读者不可简单化的处理与归纳。

106 可参照上节“从‘农工之争’说起”的相关分析及艾恺对梁漱溟关于“现实”的理解与注释。

3、“左翼”批评

来自“左翼”的批评似乎更成系统¹⁰⁷，其文章主要发表在“左翼”学者主持的《中国农村》上，一些前文已涉及的批评角度¹⁰⁸此处不再重复。

为确保该类批判的目标¹⁰⁹与效果，批评者们声明：“我们不能把批评乡村改良主义运动看做是同行嫉妒式的‘互相倾轧’，而应该把这种批评看作一种原则上的论争，是改造中国农村的两条不同路线的斗争”（孙冶方：245）；“对于这种农村改良运动，过去已经给了不少原则上的批判，而现在农村改良运动的各种成果，更要求我们来作一个彻底的清算”（李紫翔，1936：265）。

首先，批判者认为乡村建设是乡村改良主义，而“改良主义的教育工作和提倡技术运动，是麻醉群众的一种工具”（孙冶方，1983：250）；“一切改良工作的本身，都不免直接间接去为破坏农村的主要因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去效忠尽力……。一切舍本逐末的技术改良，对于这些死亡线上的农民，不过是一种不能梦想的装饰品罢了。如果他们的工作，逐渐深入农村里面，马上就发现越来越困难，而他们美丽的幻想，给铁般的现实打得粉碎，不断的失败，堵塞了改良主义者的虚伪宣传”（李紫翔，1936：266）。

其次，批判者认为乡村建设割裂于外部脉络，逃避¹¹⁰需直接面对的真正问题：“打算从整个国民经济危机中分离开来，独立地来解决农村问题，固然是不值一文钱的幻想；而打算从民族存亡问题分离开来，独立地从事农村建设，不管其有无远大计划，均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助长外来侵略势力的清道夫，国家民族的罪人”（李紫翔，1936：270）。

再次，批判者认为当时更重要的是“活下去”，而乡村建设不利甚至有碍于

107 如千家驹与李紫翔 1935 年出版专门的批评文集《中国乡村建设批判》。

108 比如：孙冶方（1983：248）指出：“他们主观方面的好意，决不能掩饰他们的工作在客观上的开倒车作用”。前文已谈到不可简单的将“主-客观”简单割裂，进一步则需要反思是什么支撑了如此强以至近乎不可置疑的“目的性/方向感”论述？

109 在给刘少奇的报告中，薛暮桥十分清楚的说出了自己的判断：“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一般知识分子不满意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统治，但又没有决心去参加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土地革命运动。他们想找第三条道路，就是改良主义的道路，因此乡村改良运动便蓬勃发展起来。当然，不问他们的主观愿望怎样，他们客观上是帮助了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统治，成为地主资产阶级欺骗民众、粉饰自己凶恶面目的装饰品”（1983：23）；在《中国农村》（“农村改良主义批判”专辑）按语中，作者指出“他们各有各的‘办法’和‘口号’，用来迷惑人心，掩盖农村阶级矛盾和阶级剥削。……对那些抱着爱国热情投身农村工作的青年，我们一向是给予满腔同情，争取他们走到革命的道路上来的”（薛暮桥 冯和法编，1983：243）。刘少奇则回信让他们做好对这部分人的团结工作。

110 一个十分有趣的批评：“一切社会改良主义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忽视社会政治经济的中心问题，专从枝节上去用力，假使有人去请他们注意这些中心问题，他们就说这是好高骛远的空洞理论，他们愿意脚踏实地去做实际工作。但是假使有人批评他们的实际工作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时候，他们又说他们是要解决社会政治经济的中心问题”（余霖，1983：300）。

这一目标的实现。“如今中国的农村，难道不就等于这位病入膏肓的梅毒患者？而我们的改良主义者所提出的教育、技术等救命剂，难道不就等于“阿司匹林”和补药……梅毒患者所最迫切的是 606 针；而今日中国农村所需要的是推翻帝国主义侵略和铲除封建残余势力的统治。以阿司匹林和补药去代替 606 针的人，是因‘好意’而断送了梅毒病患者的性命。以教育和技术来代替政治解放的人，也可以这样‘好意地’阻止了中国农民大众的解放之路”（孙冶方，1983：248）。

类似批判除直接影响着历史乡村建设的具体实践外，无疑也影响着当下乡村建设研究的基本角度，如《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最主要两点批评都与此相关（郑大华 2000：474）：第一，只看到事物的表面现象，而没有深究造成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从而“将事物的表面现象当成了事物矛盾内核，犯了化果为因的错误”；第二，忽略甚至放过了帝国主义侵略、封建统治者的掠夺，从而“只看到西方近代文化的输入所引起的中国传统文化变化，而没有看到帝国主义的政治和经济侵略所引起的中国社会性质变动。既逃避反帝反封建，也逃避内部阶级斗争”。

对这些公开而尖锐的批评，梁漱溟于 1940 年有同样集中系统的详细回应¹¹¹，一方面他认为不应二元对立与简化问题，一些批判者误会了他的本意与乡村建设的实际情况，许多批判者所引以为据的论点也同样是他的观点与坚持¹¹²。只是自己认为中国这样以农业人口为主的文明体，过去各种道路都是被动的模仿别人，晚清以来的一系列失败其实提醒我们需走出一条独特的道路¹¹³。

另一方面，他仍坚持自己十分独到的见解，特别是对“政权”¹¹⁴与“帝国

111 参见梁漱溟，《答乡村建设批判》，收录于《梁漱溟全集（二）》。

112 如《最后的儒家》研究显示（艾恺，1996：205）：“梁漱溟曾挖苦胡适不承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军阀的‘客观事实’”。

113 两个彼此呼应的回应：千家驹 1935 年在《中国乡村建设批判》中猛烈批判，“倒行逆施的开倒车运动固然行不通，自作聪明的独创一格也为时势所不许。我们不是向左，便是向右，中间是没有第三条路的”。梁漱溟则在 1940 年坚定的回应道（2005：597）：“这是为适应中国问题，有其必要，非有意标奇立异也。”；严厉批评晏阳初的张继也是类似的说法：“乡村事业，欧美已行之有素，可资借镜，不必闭门造车，独出心裁。大可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放大眼光作去”。任鸿隽则特别强调“不能如此”，“因为即名为乡村事业，这些事业必定是十分乡村化、地方化。即使在中国，恐怕此地方的成法也不能应用于旁的地方，何况要以欧美的成法行之于中国乡村呢？”（转引自吴相湘，2001：256）。

114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反思“夺权”，但不意味着回避政治及政治经济学分析，因为他认为乡村建设本身也即政治并具备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性视野。他尖锐的指出“如饥似渴地盼望于政府；不然，就想打倒政府；或者有机会加入政府……他们表面上似乎态度各不同，但其病都在眼中只看见有政府”（2005：519）。他随之的担心与自觉既因为“武力统一中国不难，难在谁统一武力呢！”（2005：465），也在于“国家愈大，则政府愈高，离社会不免更远”（2005：442）。因此他主张：“人人皆得而为乡村运动者，则政权用不着定要属于我。任何谁的政权，都没有妨碍我们乡村运动的必然性，却皆有跟着我们走的可能性”（2005：440）。

主义”¹¹⁵这两个最常被讨论的方面，正是这些不同的认识让他指出：对于导致中国危机不仅有“他毁”，还同时有“自毁”¹¹⁶（2005：151、152）；中国非西方意义上现代民族国家，而是完整的文明体，故重点不是分化，而是协调，不是“上”的统一，而是“下”的统一；他同样承认土豪劣绅的存在与影响，但其更关心这些是如何出现的：“其实土豪劣绅并不是传统的东西，只是近年社会上的种种形势恰好构成了土豪劣绅”（2005：404）。至于通常人们所诟病其忽视乡村内部矛盾及剥削，他则说到：“乡村社会的内部，虽然不是全没有问题，然而乡村外面问题更严重”（2005：408）。80多年过去了，今年的我们应该有条件不简单认为其只是含糊其词的自我辩护，而应发现梁漱溟独特的敏感——对于一般人所认为的外敌入侵，他认为更深远或巨大的则是世界关系与秩序的改变及整个世界的发展方向问题；对于一般人所认为的农民困苦与被剥夺，他认为更是现代社会与西方文明影响下乡村整体衰败的趋势问题，而其中应该同时包括农业、农民和农村之立体角度，这也是其更为忧虑的“乡村外面问题”。直到今天为止，我们仍难以简单确定哪个判断更对，相反感觉这些问题和矛盾却经常缠绕一起，无论是主张“改良”的乡村建设，还是主张“革命”的共产党，作为当时处境下的中国要想在现代世界体系结构中突围，同样都是需要面对的多重困境¹¹⁷。

以今天我们的眼光很难真正理解这些剑拔弩张的批判，因此需要回到当时的具体“脉络”¹¹⁸，由此我们还可看到作为“另类”实践之乡村建设的实际处境¹¹⁹。虽然困难重重，“百年乡建”依然断而相续、负重前行，这一方面说明其独特的内在动力与社会基础；另一方面，论述与现实政治的激烈反应也说明其一定程度已经对“主流”构成某种威胁与挑战，因为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主流逻辑无法自圆其说的裂隙性存在。

115 有一种批评论点，认为改良不能解决“帝国主义农产品的倾销”。这的确是个问题，许多历史乡村建设实践者也没有反对，但问题不仅是“侵略”和“倾销”本身，而是中国被迫卷入世界体系，并以霸权国家所主导的价值与观点为基本参照，同时以现代化与融入世界为基本目标这一更大事实。否则，为何在80多年后，当西方热议中国制造“倾销”到全球各地时，为何同样伴随着新一轮的“三农”问题与乡村建设实践？

116 笔者认为此为梁漱溟十分富有洞见的分析，详见第二章中关于“百年激进”现实影响中的政治部分。

117 虽然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被系统的提出（详见沃勒斯坦1974年开始的三卷本《现代世界体系》中相关分析），但当时中国已经身处其中。虽然共产党似乎克服了这种“多重困境”而取得胜利，但许多随后开始显现并影响至今的问题则提醒我们这种困境至今仍在。

118 其中包括国共对峙、互相抢夺青年知识分子与农民支持的具体历史。

119 不仅其在论述上置身于不同立场批判的夹缝中，现实生存条件与空间也非常有限——强力政权还在各方面权衡下直接干预，除晓庄师范被蒋介石关闭、校长陶行知遭通缉外，1930年秋，蒋介石军队攻下河南之后采取的第一批行动即包括关闭河南村治学院（艾恺，1996：243）。

关于讨论中涉及到的“革命”与“改良”，是乡村建设评价中绕不开的议题，笔者尝试结合“双向运动”视野进行简单讨论。

如前文所述，来自“左翼”的各种批评多将乡村建设指认为相对于“革命”的“改良”，已有研究对这种将“革命-改良”二元对立的框架进行反思¹²⁰。笔者认为，反思“革命”是必须和急迫的¹²¹，但首先需要先对中国复杂多样的“革命”进行一定区分以确立乡村建设的对话对象¹²²，同时反思“革命”不等于“告别革命”¹²³。因为在殖民历史的特定脉络与日益不公的全球格局下，发展中国家与弱势群体的“革命”自有一定的进步性与合理性，它们不同程度体现着“社会自我保护”的诉求与位置。出自精英立场的理解与“去脉络化”处理可能遮蔽另一些同样重要的议题，并忽视底层社会及革命本身的复杂性。更关键的是，类似“告别”在彻底取消革命合理性与必要性的同时，仍然还在“革命-改良”二元对立框架之下：一方面，论者通过以主流革命为参照的各种反义想象，虽然尝试归纳改良的各种特征，却没有指出笔者认为改良的另一重要特点——尝试更好的配合脉络并通过互动同时实现介入与自我转化；另一方面，笔者对这种在同样二元框架内为“改良”平反¹²⁴的准确性与有效性表示怀疑。正如论文随后各章所论证，“改良”同样存在于“双向运动”的互动与张力之中，并接受着“单向运动”视野及来自文化经济的动态限定，虽然努力接近脉络，其同样也可能“去脉络”，各种因抽象而过于感性的期待也可能导致“改良”沦为另一种虚幻的“乌托邦”。

实际上，革命和改良都面对着“双向运动”力量的影响，同样需避免简单

120 如陈建华（2000：4）综合各种文献后指出：作为1905年“革命”和“改良”之争的结果，“革命”被与“改良”相对立而构成二元模式。陈建华（2000：170）同时认为：“这固然得归因于中国政治文化的特殊性，也是知识分子自己制造的文化产品，反过来却成为自身观念结构的铁笼子，谁也无法打破它”；因此，“仅仅提倡革命和改良的二元颠倒，对目前的‘失语’的困境，对我们所面临的重新认知世界的困境不能提供任何启示，毋宁说由于它重复了他所反对的‘激进主义’的二元叙述模式而加强了这一困境”（2000：166）。

121 需重思“革命”，特别是历史乡建批评所参照的共产革命，因为其从来都与“三农”议题紧密联系。以致当下有人因为对“革命”的恐惧而拒绝改变“三农”现状的起码努力，这种“革命”与“三农”如此紧密相关既是中国特色，也是乡建不能简单被与“革命”对立的重要原因。因此，只有深化和改变我们对“革命”的意识形态化刻板理解，才可能打开一个新的空间。

122 历史乡村建设实践主要展开于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故需回到这个时代的具体“革命”现状与脉络。梁漱溟也指出其反对的是：“跟着近代都市文明的路学西洋而破坏了中国乡村……（及）跟着反近代都市文明的路学西洋而破坏了中国乡村”意义上之革命（2005：151）。

123 详见李泽厚、刘再复（2011），《告别革命——李泽厚、刘再复对话录》，如李泽厚认为：“从辛亥起，如果本世纪没有那么多革命，社会各方面无人管理、无序混乱、传统弃毁、动荡不安而带来的各种破坏损失一定要小得多”（290）。

124 李泽厚（2011，291）：“改良的确更难，它比革命更为麻烦，更为复杂，更为琐细，更为缓慢，更为捉襟见肘，更为令人生气。因为它需要更多的意志、信念、耐力、毅力，需要更为细致、繁琐、枯燥、繁复的调停、协商、和解、妥协、合作的工夫和功夫”。

化处理。革命本身也并不一定都是“去脉络”意义上的激进¹²⁵，笔者甚至认为，建国初毛泽东先后在党外和党内批判替农民说话的梁漱溟与邓子恢为“妇人之仁”¹²⁶、“小脚女人”¹²⁷也不是简单的“去脉络化”，因为其同时面对着工业与国家的脉络¹²⁸，正是国际局势的客观变化让后两者得以突显，也即“正向运动”和“反向运动”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

进一步说，“革命”本身不必然导致“激进”，而是当其结合了“正向运动”“去脉络化”的乌托邦想象后才导致可能的“激进”。同时这种“激进”也不可简单的进行好坏对错的价值判断，而需指出相对于具体哪部分脉络而言¹²⁹。如果能在现实中改变“双向运动”的力量对比并挑战“单向运动”主导下的主流视野，改进“激进”的存在基础，另一种“革命”是可能的，另一种“radical”也是可能的¹³⁰。

对应着以上“不激进的革命”讨论，实际上也存在“不保守的改良”。例如乡村建设在某些方面就有着更为彻底的认识¹³¹与更具挑战性的实践，本论文第三、四、五章将围绕“平民教育、生态技术、农民合作、城乡互助”的实际案例逐一讨论，笔者希望由此同时打开关于“抵抗”的多元化想象空间¹³²。

所以，不应是乡村建设与“革命”决胜负，两者充满了交叉与重叠，只是

125 如革命和随后建设时期所不断强调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原则，具体如赤脚医生、游击战等实际创造，还有“乡村地区的人们在资源极端稀缺的条件下对因战争而加剧的压迫、剥削和停滞所做出的创造性回应的延安道路”（马克·赛尔登，2002：289），都可认为尝试结合着乡土脉络，并对自己出发时携带的外来思想目标进行着某种转化与创新，是自觉“脉络化”的一种体现，此时革命的脉络与乡村的脉络一致并重叠。

126 详见熊培云，2011，《1953年毛泽东批梁漱溟提农民困难是妇人之仁》，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1_05/24/6586457_0.shtml?from_ralated；温铁军在《“中国经验”与“比较优势”》中曾把这两个批判结合起来讨论，http://book.ifeng.com/special/yueduzhongguo/list/200909/0925_8167_1365168_3.shtml

127 详见张荣久，2003，《称邓子恢“小脚女人”之由来》，《文史春秋》，第2期。

128 如郑直淑在《梁漱溟受批公案揭底》（2003：196）中说道：“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说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

129 例如上述建国初年毛批梁邓的例子中，相对于“三农”脉络，这种“激进”毫无疑问是负面的，并持续影响至今的“三农”问题；但对于国防和工业化这一脉络来说，其可以是另一评价。如此说绝非某种辩护或同意“代价论”，而是希望指出脉络的多重与相对性，同时也提醒笔者和读者都不可简单“去脉络”的进行价值判断。

130 特别值得说明的是，今天讨论“激进”多对应着英文 radical。然而根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增补本）》的释意，所谓“彻底的、完全的、激烈的”仅是第二层意思，其第一层意思是“根本的、基本的”。所以在港台学术界，也有研究者以“基进”为翻译。即说明该词应“定型化”的狭义理解，其同样包括着回到基础与基层，在互动中实现“脉络化”的意涵，只是被我们遮蔽了。

131 梁漱溟的批判性前文已有讨论，而当代乡村建设实践推动者温铁军的观点，从其两本书名《我们到底要什么？》（2004c）、《解构现代化》（2004b）及近年的提法“改出百年激进”即可看出其对当下的批判与反思。

132 在新视野下，抵抗不仅含有拒绝，还应包括建设性的探索，而日常生活中其实一直包含着各种没有得到足够认识的抵抗。如：技术的抵抗，消费的抵抗，流通体制的抵抗，这些都将在第四、五章中详细展开。

当外部条件或宏观环境进一步“激进化”¹³³后，乡村建设失去了开展的条件与空间，而把乡土推向“革命”，但此时的“革命”，自然已经是“激进化”的后果之一，当然不可抽象和“去脉络”的加以单独认识。

此外，需要澄清的是，乡村建设实践不是封建势力的“帮凶”或“掩饰”，无论河北定县、山东邹平还是河南镇平，其都直接挑战了不利于乡村良性发展的权力秩序¹³⁴，部分批评内容所指也非乡建实践目标下的状态，有些是受各方面条件与阶段的限制¹³⁵，有些则是生存策略上的考虑¹³⁶。其对一般政党政治的不认同各自有特殊考虑，因此也拒绝以一般性手段进行处理与回应¹³⁷。

由于近代以来全球竞争要求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同时面对着各种“救亡”与“抗战”的压力¹³⁸，“救国”与“救民”虽有内在关系，但却不完全的替代或覆盖，其矛盾与重点毕竟有所不同¹³⁹。除从“竞争”角度认为乡村建设对“革命”与群众动员不利外，将“革命”矛头直接指向乡村建设则是需要反思的。从“双向运动”视野看，乡村建设实践和与中国乡土结合后的“革

133 详细可参考本论文第一章中“以乡村建设为‘名’、实为国家/地方‘政权下移’的现代政权建设与‘乡土/社区’本位的民间乡建相冲突”中的相关案例，其中说到1934年乡村建设整体式微，是因为国民党“保甲制”的全国强制推行，随后的乡村社会文化经济都进一步“激进化”（详见第一章“百年激进”现实影响中围绕政治、经济、文化的分析），真正乡村建设也正因这一外部环境的改变而失去条件，随后乡村的整体环境更有利于带有暴力特征“革命”的出现和发展。

134 如代表平教会赴延安并受毛泽东接见的堵述初回忆：“定县的旧势力，早把平教会视为眼中钉，对参加平教会工作的本县人士，更是讽刺打击，尖刻异常。他们公开反对平教会的活动，在城里开会密商反平教会和实验县的行动方案，派人到省政府进行反实验县的紧张活动，另外，他们还挑动一些在北京的定县人士写文章，制造反对平教会的舆论”（1983：436-437）；许纪霖和陈达凯（1995：470-471）指出：“定县平教会虽在生计、卫生等方面取得成效，但却因《债务调节法》的颁布而得罪地主与高利贷者。更因严厉禁赌导致地主豪商的反抗。结果实验县刚刚成立一年多，力主‘实验’的县长就被迫辞职……表面上看，定县的试验是因中日战争的爆发而终止，但实际上，乡间保守势力已开始了对种种革新的反扑”；艾恺（1996：238、239）也进行如下质疑：“乡村建设和地方自治的赞助者是由著名的土豪劣绅组成的么？考察一下大部分著名的乡建方案都得出明确的答案。无论是在定县还是在邹平，改革者和至少一部分下层绅士（住在城镇和村庄，而与较重‘都市文化色彩’的上层绅士做区分）之间的冲突是一直存在的，和土豪劣绅有关的难题也是不胜枚举的。（即使）彭禹庭这样的本地下层绅士，在这一地区是他们在起作用，但是他们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解雇全部县以下各级行政官员、修改选举程序，以使劣绅不能再继续把持这些职位”。笔者认为，此应也是彭禹庭这位最强调乡村武装自卫的乡建领袖最后遭遇刺杀的重要原因之一。

135 如吴相湘（2001：261-262）指出：其实“平教总会自成立以来即曾了解中国根本问题的外来与内在各种因素。只是本身为一私人团体，权力有限，自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是惟一合理工作途径”。

136 如曾任定县实验县县长的平教会成员霍六丁（1990：482）指出：“定县是一块平原，京汉铁路从中穿过，经常有一师军队驻扎。在这种情况下，举行公开革命等于自杀”。

137 具体不认同缘由因乡建实践者经历差异而有较大不同，有些是对中国近代历次政治变革的失望（如梁漱溟），有些则是从平民立场对“精英政治”的警惕（如晏阳初）。但他们都同样包容政治异见者。如在定县实验区工作的人员中，有些是当时的地下党员，如张寒晖（著名抗日歌曲《松花江上》词作者）等，有些是非常接近共产党的人士。平教会领导人，虽然知道他们思想左倾，但仍欢迎他们在实验区工作（堵述初，1983：440）。

138 回到历史事实，乡建实践者在“抗战”时期同样发挥积极作用。无论是卢作孚在抗日战争最紧张、最危急的历史关头组织的“宜昌大撤退”，抢救了大量的抗战战略物质；还是梁漱溟在国共两党之间的艰辛斡旋。

139 具体见本论文第三章《“作新民”的乡土遭遇——以乡村建设中的平民教育为例》的分析。

命”都是中国诸困境下的结果与反应，而不是原因本身。复杂与多重困境自然需要多元化的努力与实践，单一化的强调与迷信不仅排斥了本可与之良性互动的其它“另类”实践，实际上也收窄了自己作为“另类”实践的丰富空间，而再次落入主流“二元对立”陷阱，它无疑也为随后出现的各种问题埋下伏笔。

至于孙冶方关于“将死之人是否可能通过中医调理”的批判。除以上分析已经提到，乡村建设与“革命”不应简单的放在擂台上“决胜负”，故不可以“生-死”对立进行二元对应。本论文随后各章虽不直接处理这一议题，但所讨论反思的乡村建设实践案例却与此相关，结论部分对“革命与乡建”也有进一步的开放性讨论，在此不作展开。

只是希望指出，我们其实需要深入讨论什么是“死”？怎样才算“活”？进入的不仅是强心剂，还可能对“强心剂逻辑”的认同与依赖。强心剂之后，是什么“活”了下来（或比其它的“活”显示了更强的竞争力）？某种意义上说，今天我们“活”下来了，当却似乎已经不是当年希望“活”下时的自己！这些看似无需讨论的问题，实际却是整个近代中国持续至今需深思的核心问题。

三、 当代传媒论述：以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为例

如果说上述学术期刊的批评是叙述及影响历史乡建的主要力量，当代乡建实践更受影响的外部叙述则来自大众传媒。既因为相对历史而言¹⁴⁰，当代实践较少受到学术界的集中批评与讨论，还由于大众传媒已成为当代社会更具实际影响力的评价体系与操作力量。以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各种报道为例，大众传媒参与了学院的创办直至关闭的全过程。在“客观、中立”包装下同时具备叙述者、批判者与影响者等多重角色。其既集中体现着“正向运动”影响下的现代逻辑，还充分展现主流意识形态对“小农”、“组织”和“社会变革”等的定型化想象与“偏见”，叙述上虽然充满裂隙与内部矛盾，但却具备着影响现实实践的能力与效果。

因为笔者完整参与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各时期工作，此处以该机构为例进行媒体呈现的讨论，希望呼应前述学术批评对历史乡建的影响，进而讨论乡村

140 实际上，历史上乡村建设也大量借助传媒的力量，如晏阳初借助美国《读者文摘》多次报道以筹集包括财务和人力的各种资源。因为在如此一个以现代化和城市为中心的发展进程中，“乡村”和“改良”要想挤进人们的视线，并获得应有的关注和参与，媒体似乎是最便捷与主要的途径，其的确起着十分重要的“中介”（mediation）作用，同时媒体自身也以特有的方式极大程度上参与了这场运动。故此处强调的是“相对”。

建设在知识论述层面上的基本环境与脉络。它希望同样可借助“双向运动”的视野，让我们看到现代传媒如何同时利用着主流逻辑（正向运动）与普通民众的心理、需求和语言（反向运动）为有效建构力量。即使这样，表面“自圆其说”的媒体叙述也面对来自“另类”实践的挑战。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不是专业的大众传媒研究者，传媒论述本身也非此文重点，相关分析主要作为上述目的之实现手段。

1、大众传媒与“另类”实践

关于现代大众传媒的重要性，正如学者 Roger Silverstone（2003：8）所指：“媒体拣选¹⁴¹、形塑了每日生活的样貌，媒体所呈现出的多元景观，成为一种检验标准与参考指标，引导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且定义、维持了人们的‘常识’”。即使主流叙事，也必须经过大众文化的改写才能被“广大人民群众”这个匿名然而却无处不在的“超级读者”所接受（黄平，2007）。在研究 1968 年欧洲学生运动之媒体呈现的托德·吉特林（2007：导言 9）看来：“在一个日益模糊与不确定的世界里，人们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大众媒介来寻找并试图发现自我”。

大众传媒在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上，一方面如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所指：“大众传播媒介凭借凝结社会的霸权符码的生产而发挥作用，看起来反映现实但实际上是构建现实，这样的大众媒介本身就是当代资本主义主要的意识形态”（转述自雷启立，2008：16）；但另一方面，媒体与社会也有着特别的辩证关系：“媒介属于社会，也塑造社会，同时也被一个创造新秩序的现代社会所塑造”（托德·吉特林，2007：173）。也即魏灼（2010：342）所指：“传媒的新闻报道绝非如镜子般在反映真实，而是在构成真实。但是传媒所构成的‘真实’对整体社会而言，仍具有‘事实’的效果，进而回过头与社会真实紧密互动、交互影响”。

至于媒介如何发挥作用进而影响社会，托德·吉特林提出媒介框架（media frame）的存在：“它是选择、强调和表达的原则，由很多对存在、发生和发展的事物加以解释的细微理论构成。既是认知、解释和表达的连贯模式，同时也

141 正如台湾学者夏晓鹃结合当地媒体对“外籍新娘”及“外籍新娘识字班”的叙述策略后指出，虽然媒体都声称“客观”，但它们取样、强调及省略的重点都是高度选择性的（2002：137）。

是事件操纵者组织言论的过程”（吉特林，2007：导言 13-14）。这种“过程”也为 Roger Silverstone（2003：19）所特别强调：他认为应把媒体视为一个“中介¹⁴²”的过程，因此我们应该拉开视野，“不仅把中介意义局限在媒体文本与阅听人之间的接触，还应把中介过程视为媒体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与对意义的使用和操作上。

具体到中国当下状况，雷启立（2008：4-5）指出：“对于中国公众而言，媒体的自由仍然是通往自由、民主、公正理想社会的桥梁，媒体象征了阳光，是知识、理性、现代、进步的同路人”；他还认为值得特别关注的是 1990 年代以来的变化，每逢危急关头，媒体“常从民粹立场出发，以底层的智慧寻找事实依据，进而从民间收集力量，成为新的权力结构中的一极”。戴锦华（1999：36）则强调：中国传媒之所以显现空前力度，事实上是“权力的媒介”与“媒介权力”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相互结合并彼此借重的结果。

这也是笔者为何认为，大众传媒借助“反向运动”的需求、力量与土壤，但实际却体现着“正向运动”的逻辑与诉求。因此，当代传媒所具有的“双重性”就十分明显：一方面，它要适应市场要求，保证其收视率与发行量，从而获得更高的广告收入，因此需要文化民粹主义立场与“反向运动”形象¹⁴³；另一方面，其“正向运动”实质又很难掩饰其文化精英主义¹⁴⁴立场。

而对于大众传媒与“另类”实践的关系，如托德·吉特林（2007：导言 10）引述 Walter Adamson 的观点：“对于反抗运动而言，在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之外来解释自身和其世界观，并建立能够自我生成文化制度的文化基础是极其困难的，甚至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故现代传媒时代常让其面临着类似的“两难”：媒体既增强同时也是削弱“另类”实践的力量¹⁴⁵。如果与媒体疏离，它们的声音发不出去，因为当前这几乎成为唯一的传播渠道；如果通过媒体，声音则常被扭曲、收编与无害化。笔者认为，“双向运动”视野提醒我们不应满足于此，虽然主流传媒的意识形态框架大多偏向统治集团而不利于“另类”实践。但也不能简化为类似于“传媒污蔑异议者并摧毁社运”（魏灼，2010：342），因为彼

142 “中介”了什么？为达到更理想效果，它无疑需要借助受众的日常生活经验、欲望需求及所谓常识，并以更多的细节和个人化体认去贴近“真实”，用人物和事件去充满“真实”，再以“真实”的质地成为说服读者的有效手段，下文各种例子可进行某种说明。

143 如中央电视台《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等节目名。

144 如张慧瑜（2008：327）所指：“中产阶级价值观成为大众传媒所竭力建构的社会共识”。

145 同时媒体还改变了这些力量运作的环境（Roger Silverstone，2003：5、30），并由于变得和现代社会的常见逻辑高度同构而相对容易获得人们的认可与接受。

此各有自己更为完整的脉络并在此过程中充分互动。

通过下面所要讨论的两组媒体叙述文本，我们将发现其中既有十分严厉的批评与质疑，也不乏言过其实的过誉与追捧，这些都将作为各种形式的“呈现”（representation）共同构成乡村建设不同面向的外部环境与舆论脉络。通过这些分析我们还需反思，比起历史乡建严肃的学术批评，为何如此的“传媒幻象”¹⁴⁶竟能成为当下社会评价“另类”实践的主要标准？

2、命名、修辞与想象

虽然出于职业要求与行业特点，大众媒体都自我要求或对外包装出所谓“客观、冷静、中立”这一基本形象。然而如果对这些被建构出来的基本形象进行逐一分析，将会发现其中充满着无数并不冷静的“命名”、并不中立的“修辞”和并不客观的“想象”。

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创立伊始，就在短时间内被快速的命名着：一方面是各种欢呼与兴奋下的判断：如“晏阳初重返定州”¹⁴⁷、“温铁军：乡村建设运动的复兴者”¹⁴⁸、“翟城试验：寻找梦中的诺亚方舟”¹⁴⁹、“晏阳初乡建精神犹在、新乡村试验扎根定州”¹⁵⁰、“追随晏阳初的脚步”¹⁵¹等。来自大众传媒的“兴奋”，既反映了当年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及由此引发公众对行动所可能引发新希望的普遍期待¹⁵²，也正是大众传媒对各类社会实践的常见态度与惯用手法。

但另一方面则同时是基于主流“正向运动”逻辑所做出的质疑。例如，在2004年4月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第一次农民培训时，就有记者用不到半天的时间做了“中国第一所村办学院生存忧患调查”、“办在村里的学院还能走多远”

146 此借用雷启立关于中国当代生活与媒体文化分析的专著名称——《传媒的幻象——当代生活与媒体文化分析》（2008，上海书店出版社）。

147 为帮助读者更好的对应阅读，下文所有关于媒体报道引文均直接配以脚注。康雪，《晏阳初重返定州——晏阳初乡建学院成立现场采访》，北京人民广播电台，2003年8月。

148 作者不详，《温铁军：乡村建设运动的复兴者》，《国际金融报》，2004年1月。

149 黎光寿，《翟城试验：寻找梦中的诺亚方舟》，《中国改革（农村版）》，2004年2月。

150 安文联，《晏阳初乡建精神犹在 新乡村试验扎根定州》，《燕赵晚报》，2005年7月24日。

151 作者不详，《追随晏阳初的脚步——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简记》，《河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频道-燕赵风采》，2004年7月31日。

152 如在一篇题为《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载得动三农几多愁？》的文章中（中国选举与治理网，<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96899>，浏览日期2009年5月2日。），记者谭翊飞认为：“众所周知，农民最缺乏的是物质利益，即改善生活，而不能改善生活的根本在于其权利的贫乏，农民尚未获得充分的发展权利，然而，这些厌烦于西方高度民主自由社会的人却来大陆用最贫穷的群体做后现代的实验，这岂不荒唐？岂不可笑？”笔者认为：除观点值得讨论外，这种把一个很小民间草根实践安放到要“‘载得动’三农几多愁”的预期中，是值得反思的。

¹⁵³这样“发人深省”的报道。

在这两种“定型化”的判断与想象¹⁵⁴下，各种充满矛盾的命名始终伴随着乡建学院的不同发展阶段。如：“乌托邦”实践¹⁵⁵、“农民黄埔军校”¹⁵⁶、“后定县试验”¹⁵⁷、“新上山下乡运动”¹⁵⁸、“温铁军的乡村星火”¹⁵⁹、“田园牧歌”似的乡村建设¹⁶⁰、“秀才下乡”¹⁶¹等。这些命名一方面体现并实现着主流对“另类”实践的常见定位与处理¹⁶²，另一方面也干扰着实践内外群体对乡村建设复杂性与多样性的把握。

除对社会行动的状态、趋势、问题进行简化与命名外，大众传媒还巧妙使用大量的修辞手法，配合“命名”以更有力达成叙述者所希望的效果。如下面所引新闻标题里的各种修辞：“定县实验”新登场¹⁶³、乡建学校的“荒芜英雄路”¹⁶⁴、“步履蹒跚中的乡建运动”¹⁶⁵、“晏阳初到温铁军：知识分子百年乡恋”¹⁶⁶、“中国知识分子的乡村冲动”¹⁶⁷、“新‘定县实验’终局？”¹⁶⁸、“改良主义者败局？”¹⁶⁹等。除标题外，正文中的一些句式和表达方式也有着同样的处理与预期效果，如：“（晏阳初、梁漱溟）是否都是糊涂的好人？乡建是惟一希望？还未乡建的农村，希望何在？”¹⁷⁰。

罗列如此多的标题与片段，重要的不是进行某种事实层面的检验，而是希

¹⁵³ 聂道先，《办在村里的学院还能走多远？》，新浪网财经频道，2004；《温铁军翟城试验：中国第一所村办学院生存忧患调查》，2004。

¹⁵⁴ 事实上即使被报道方非常不认可其中的一些命名，比如所谓“农民黄埔军校”等，但因其符合于受众的一般期待与想象，而巧妙的让读者很难感觉出其中的暴力与不妥。

¹⁵⁵ 作者不详，《“乌托邦”实践 温铁军把“另类”进行到底》，《亚太经济时报》，<http://finance.sina.com.cn>，2004年07月09日浏览。

¹⁵⁶ 卢韵、曾子墨，《乡村建设学院——中国农民的“黄埔军校”》，2004年第13期，《凤凰周刊》；《打造新农民的“黄埔军校”》，2006年5月12日，《中国青年报》；马海伟，《“农民黄埔军校”试验三年之惑》，《中国商报》，2006年5月23日。

¹⁵⁷ 姜古迪，《值得关注的后定县实验》，《燕赵都市报》，2003年8月24日。

¹⁵⁸ 黎光寿，《新上山下乡运动——我们能为农村做什么？》，《公益时报》2003年11月6日。

¹⁵⁹ 作者不详，《凤凰卫视-财经点对点》，《温铁军的乡村星火》，2004年4月。

¹⁶⁰ 张志，《翟城乡村试验遇困局》，《小康》，www.gutx.com，2006-5-6“田园牧歌”似的乡村建设。

¹⁶¹ 作者不详，《秀才下乡》，凤凰卫视，2005年9月。

¹⁶² 有些命名可能“捧上天”。只是这些“传奇”神话需自我维护，一旦在现实中不能符合媒体或由之引导受众的期待或想象，媒体则会及时挺身而出，用“实地访谈”和对“不同声音”的代言，戳破那个不久前刚由自己所制造的神话；有些命名可能提前“宣判死亡”，以“怜悯惋惜”为姿态去取消实践背后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

¹⁶³ 白红义，《“定县实验”新登场》，《小康》，2004年9月。

¹⁶⁴ 胡印斌、王小波，《乡建学校的“荒芜英雄路”》，《燕赵都市报》，2004年7月18日。

¹⁶⁵ 曹海东，《步履蹒跚中的乡建运动》，《南方周末》，2007年7月。

¹⁶⁶ 曹筠武，《晏阳初到温铁军：知识分子百年乡恋》，《南方周末》，2006年3月9日。

¹⁶⁷ 何忠洲，《新农村的理想与现实》，《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7期。

¹⁶⁸ 翁仕友，《乡建学院关闭 新“定县实验”终局？》，《经济观察报》，2008年1月7日。

¹⁶⁹ 林海，《改良主义者败局？》，<http://blog.sina.com.cn/rwzk>，2007。

¹⁷⁰ 林海，《温铁军：改良主义者败局？》，《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1月21日 <http://blog.sina.com.cn/rwzk>。

望通过比较与联系指出其“去脉络”这一共同特征，并进一步讨论为何这种看似丰富多元实则刻板单调的“命名”与“修辞”，会成为大众传媒对当代乡村建设叙述与呈现的主要类型？

一方面，正如前文对媒体“中介”特点的分析，其“中介”起了主流社会对“另类”实践的一般想象与期待——应该是什么形象（轰轰烈烈、万象一新？）；应该什么影响（载起三农？）；应该需要何种条件等等……。然而，正如导论、本章及下一章从不同角度所进行的分析，这些想象与期待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主流的政治经济结构与文化导向，是需要不断加以质疑与问题化的。

另一方面，它同样“中介”起了媒体生产者及受众对现实的失望与不满，由此反向构建出浪漫化与怀旧化的虚拟历史，实际上其仍是以静态和去脉络为主要的处理方法。例如在《中国新闻周刊》的“新农村的理想与现实”同期报道中，虽然对当代实践充满质疑，但当谈到该实践地点时，笔调则反转为依恋与抒情：“翟城：在这个北方的村庄，知识分子求解乡村问题的探索已承续了近百年”¹⁷¹。在另一篇批评当代实践的文章中，当谈到历史时笔锋也迅速调转：“从当时留下的照片看，跟随晏阳初的知识分子，脸上总是带着兴奋与高兴的笑容。据统计，最高峰时期，晏阳初在定县团结了多达 500 名‘愿意和农民在一起’的知识分子”¹⁷²。

然而，当我们历史化的处理乡村建设历史，将发现这种整齐而连续的叙述实际上遮蔽其间所存在的各种裂隙¹⁷³，大众传媒叙述所强调的“博士下乡”整体群像也让我们忽视其中的另一面——无论历史还是当代的乡村建设实践都同样因自身的“另类”定位而充满着内部张力¹⁷⁴。笔者之所以如此提醒，重点不在于揭破媒体构建的神话本身，而是希望由此引起对这种相对容易获得接受之叙述模式的反思。

总之，通过“命名、修辞和想象”，大众传媒抽离了乡村建设实践的复杂脉络，其中简化和污名化的处理模式既符合现代媒体的一般逻辑，更折射出“正向运动”在叙述层面对“另类”实践同样存在着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

171 何忠洲，《新农村的理想与现实》，《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7期。

172 曹筠武，《晏阳初到温铁军：知识分子百年乡恋》，《南方周末》，2006年3月9日。

173 如晏阳初刚到翟城村，由于照搬其在大城市推广平民教育的经验而遇到挫折，有村民向晏阳初提出，“晏先生，你老的好心肠，可是帮不了我的饿肚皮！”（郑大华，2000：73）详细参见本论文第三章。类似问题和冲突同样充满于历史乡村建设实践各个时期。

174 当年他们之间的各种内部矛盾同样频繁，并且很多人来了不久就走，据晏阳初回忆，他自己在定县的近三分之一时间是在做这些人及他们家属的工作。

3、传奇与个案

通过大众传媒的视野，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或当代乡村建设运动有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开局。许多媒体都会以类似故事为开头——2003年春节，温铁军时任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辑，杂志社编辑刘老石与邱建生带大学生们去河北定州翟城村调研，因为恰值大年三十，大学生们即兴在所住处写了一副春联：“平民教育诚可嘉，乡村教育慨而慷，（横批）继往开来”，这副春联很“偶然”的被村党支部书记米金水看见并引起注意，双方一拍即合，决心在翟城重续晏阳初的梦想¹⁷⁵。

不仅平面媒体对该情节进行了大量的复制与再生产，很多纪实类专题片或纪录片也都“再现”这样一个戏剧性的场景，编导们重新刷上墨迹未干的对联，可谓用心良苦；观众们则因此而“如临现场”，更可谓“效果”不俗。从普通读者/观众来说，类似情节与表达方式容易获得接受，并且其表现内容的确真实发生，本无可厚非。笔者之所以提出来讨论，重点在于当媒体对其反复强调并选择性关注之后的实际效果。通过对“戏剧化”和“偶然性”局部的凸显，不经意间遮蔽了乡村建设实践更为整体全面的脉络¹⁷⁶。同时，为进一步配合读者/观众的接受习惯与偏好，以达到“感同身受”并通过想象进行参与之目的，大众传媒的另一个常见做法是将“传奇”主角“还原”为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个人”。类似处理¹⁷⁷同样不经意的达至另一种“去脉络”效果：如果成功，那是个人道德的崇高，敢为人先，过人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如果失败，那也是个人的“理想主义”、“不切实际”、“乌托邦梦想”……。作为大众传媒版“好人好事”式的类型化处理，前文第一部分已涉及相关反思。略有不同的是，当它作为传媒对象被放置于茶余饭后“阅读/讨论”的客体位置时，所谓的“理解”、“认同”将更加有限与脆弱¹⁷⁸。

175 何忠洲，《新农村的理想与现实》，《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7期。

176 下一章将详细展开讨论，即使这一“故事”本身也有丰富的来龙去脉：如在2003年春节之前，温铁军所主持的《中国改革》杂志社就已经在该村以外的很多地方开展了乡村建设与大学生支农实践；翟城村想利用“晏阳初”进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想法也由来已久，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当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农产品出口受很大的影响，这不禁让依赖辣椒出口的该村村民们产生了质朴的看法：“假如晏阳初还在，就好了”（2004年村支书米金水对笔者的回忆）；而促成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创立的更重要背景则是当时“三农”矛盾加剧，“三农”问题一时成为包括学界、官方、民间的共同“热点”，正是有了这一系列的条件与土壤，那个戏剧性的场景才可能发生。

177 下面所列常见于相关媒体报道中，代表性篇目文注脚已详列，此处暂不一一列举，读者可自行查阅。

178 姑且举例，如果采用现代传媒叙述风格，历史乡建前辈的光环必将短暂而脆弱。第一年，我们可以对这位“海归”博士（晏阳初）的生存状况进行“忧思”（刚回国时，“平教会”活动经费非常困难）；

从“传奇”开局到“个案（个人）”结尾的常见处理方式，配合着前文的各种命名与修辞，不仅遮蔽和简化了“另类”实践的复杂脉络，更阻碍了不同群体对各种深层次问题的追问与挖掘¹⁷⁹。作为批评与介入现实的“媒体利刃”似乎常常重重举起，但却总是轻轻放下。一方面，前赴后继的媒体人以“接力”方式参与着对乡村建设这一“另类”实践的关注与评判，以“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传统故事模式进行着裁剪与建构。另一方面，经过各种“去脉络”处理之后，抽象而空洞的“另类”实践则不同程度的被“中介”于主流社会的逻辑与结构中。例如，当乡村建设实践被“去脉络”的呈现为“好人好事”时，同时也被“中介”进主流社会下某种常见焦虑与心理——大家都不切实际地期待着有一群“崇高/传奇”的“他者”，更好的让我们共同的问题得以解决¹⁸⁰，但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同样可确保这个过程中自己内心的平衡¹⁸¹。

回到“双向运动”视野，正如前文简略提及，为突显草根性与亲民特点，主流传媒较大程度的借用“反向运动”的素材与语言，以普通民众为目标对象，并呈现和定位为某种程度上的“社会自我保护”。但因其与资本的紧密结合及现代大众传媒之基本特点，在运作中很多时候都脱离实际脉络——通过上述丰富并可相互对照的论述文本为例，无论是充满修辞与“正向运动”想象的“命名”，还是对复杂脉络实现遮蔽与转换的“传奇/个案”。由此可见，大众传媒的参与不仅难以摆脱“正向运动”的限定和影响，还更为隐蔽的以中介方式实现了其它“正向运动”力量力所不逮的诸多新效果（详见本章最后部分）。

但实际上，主流媒体的乡建叙述同样置身于更大的“双向运动”脉络内，

第二年，我们可对其解决不了“饿肚皮”（参见前文中村民对晏先生到农村后照搬大城市扫盲做法的抱怨）进行反讽与反证；第三年可以对运动内部博士及家属们种种矛盾和随时的退出进行曝光揭秘或悲情预言。最后，我们将以“花了那么多钱，做了这么多年，今天的定州农村比起周围农村来说，又有什么明显不同？”作为有力审判，以得出“不过如此！”、“失败/不成功”式的结论。

179 如有媒体对当代乡建实践者以“秀才下乡”为命名和戏剧化处理。无论产生的是嘲讽还是愤怒，实际都不利于更重要的一些追问：例如，除这些“秀才”外，当今“下乡”的还有什么人/力量？这些“秀才”很多本来来自农村，为何他们回乡后会如此“蹩脚”？是什么让他们成为我们结论中的“秀才”？既然他们可能更知道自己的“蹩脚”并感受到舆论的压力，为什么他们还坚持下乡？那些本来的“在乡秀才（本地能人）”都到哪里去了？“秀才下乡”和“乡下人进城”是否同样深刻的体现着城乡二元对立下的各种可怕偏见？。

180 夏晓鹃（2002：245-246）认为：“‘他者’是‘自我’的反射。其在心理层面的效果是，凡是‘自我’所不愿承认的性质，都收录于对‘他者’的描绘之中。在这样的过程中，人们藉此将‘自我’从面对社会问题的焦虑中解脱出来，因为他/她已找到问题的原因”。

181 当原来的“成功”出现所谓“失败”时，“不过如此、又能怎样？、So What……”同样可以有效舒缓大家的不安。除当代乡村建设实践外，另一个可以呼应的典型案例是“安徽复兴学校”：先是“志愿者神话”的传奇/悲壮开局，然后是对“神话主人公”也即道德楷模的个人进行严厉的道德指责，当昔日被冠以道德光环的“英雄”被我们迟到的发现为“竟也是普通人”——原来如此！难怪！……随着类似的感慨，似乎极大程度的释放了相比之下“我们”的“道德压力”，但客观上却令一场广泛的志愿者事业遭受挫折。关于该案例的详细过程可参见（朱健刚，2008）。

正如蔡培慧（2010：321）结合台湾“另类”实践案例所指：“大众传媒所报道并认识的‘真实’，并非单向的主流媒体的拮取或传布，应当视之为双向理解与渗透”。因此“反向运动”并不完全可以被按照“正向运动”的方式与目的所利用，或说在利用的过程中，也有着“另类”实践改造媒体的空间与可能性¹⁸²。

四、影响与效果

正如本章开头时的说明，以上文献与材料的罗列与分析不仅为了一般的综述与回顾，从中我们将发现无论学术批评还是传媒论述，实际上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让乡村建设抽离原有脉络，进而使其受到不同程度的“简单化”与“类型化”处理。笔者希望可进一步关注它将对乡村建设所产生的影响与效果，此处仅简要提及，随后各章将结合历史与当代实践案例具体展开。

首先，由于乡村建设被抽离于自身复杂¹⁸³的实践脉络，导致无论实践外的评价还是实践内的自我认同都不得不依赖于主流社会的参照坐标，而由于经济与文化的运作，这些价值层面的标准与判断实际上较程度的受“正向运动”主导，以至虽然“双向运动”一直存在，但却常常只有“单向运动”的视野与认识。它其实也即本章开头讨论的“意义系统”，各种“另类”或反抗实践都在其中有着特定和相对的位置、形象与功能，如果不能对这些“类型化”的刻板“意义”构成根本的挑战，只停留在“好人好事”的“人”和“事”层面上，实际上是难以真正抗拒“正向运动”的负面影响。

此即本章文献回顾得出的基本认识，也是笔者在全论文不同时候不断讨论“参照/坐标”的理由与根据，随后各章的分析尝试重新发掘实践案例中所包含的可能挑战，进而讨论如何可以恢复以“双向运动”视野分析“双向运动”，既让“另类”实践中长期被遮蔽的资源与矛盾、问题与张力得以呈现，又可让我们对“正向运动”影响下常见的“去脉络”简化处理保持应有的批判与自觉。

其次，也由于乡村建设被抽离于复杂脉络而成为抽象与简化的存在，并不得不存在于二元对立的“意义系统”内，故相对于主流，乡村建设自然接近于

182 这也正是台湾“另类”媒体推动者魏灼（2010：345）所提出：“与其单面向的批评、期待或道德性的呼吁传媒能够传达某种‘较真的真实’，倒不如企图创造出另一种社会条件，让传媒从运作逻辑就发生改变，降低扭曲事实的可能性、避免有利于主流却不利于弱势的事实建构框架，甚至积极提供另类的、批判的框架供社会知晓、辩论和反思”。

183 本章主要分析“被抽离”这一事实与过程，至于乡村建设实践脉络本身的复杂性则是下一章《“现代梦”的别样回声——乡村建设的脉络、资源与矛盾》的重点。

同样具有批判、实践、与社会底层相结合特点的各种反抗运动或发展项目。实际上，乡村建设不仅与一般主流反抗运动所依据和目标的市民社会有着不同的脉络¹⁸⁴，其同样与“国际援助产业”¹⁸⁵、“参与式发展”¹⁸⁶都有着根本的差异。但在现实层面，不仅一般的外部呈现与描述中基本模糊化彼此的内在差异，乡村建设实践者自身也常将几者不加区分的混为一谈，进一步让实践与行动的想法受制于主流的“定型化”想象¹⁸⁷。即使感觉不对，但却无“话”可说，因为仍然困在主流的意义系统内。

最后，乡村建设实践者某种程度上的“失语”，还伴随着不同表现的“焦虑”、“无力感”、“悲情”¹⁸⁸、“犬儒”¹⁸⁹、“浪漫化”等不利于实践但却是现代社会的常见情绪¹⁹⁰，进而制约着乡村建设实践主体性的真正建立。这些情绪彼此矛

184 根据较早提出“市民社会”的学者邓正来（1997：6-9）的说法：近代西方市民社会的形成乃是与西方“近代国家”或所谓“民族国家”的出现密切关联。即使当代中国出现市民社会，但“必需把它与中国历史上的各种民间社会组织区别开来，同时它也不包括自给自足、依附于土地的农民”；赵旭东（1999：17）也发现，从城市文明中成长起来的所谓西方“市民社会”概念，恰恰在其一开始就把农民排除在外；吕新雨（2010：117）则强调，一般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都是建立在以城市发展为基础的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上；张慧瑜（2008：355）进一步指出：市民社会理论“复兴的背景是冷战后期，在某种程度上转移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之争的话语方式，90年代以来中国关于市民社会的呼唤实际是为市场化及资本主义进程进行辩护的假面”。

185 详见朱晓阳和谭颖（2010：176、189）的分析，他们的注释指出：将“发展”和“援助”当作“工业”或“产业”来看待，带有西方知识界讽刺和挖苦的意味。“它表明这项事业一方面是某种意识形态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是一项与其他生产经销任何商品没什么差别的产业。这样的标签还意味着它正遭到普遍怀疑并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实际上追随国际发展产业话语也是这一工业资源争取和资源分配的一部分”。笔者根据自己的观察认为不仅国际项目如此，中国本土的基层项目同样如此，故其并非国际项目通过“本土化”就可能克服或解决，而需更根本的反思。

186 如同时参与实践的研究者郭占锋（2010：130-133）所指：国际发展项目出现“参与”的表象和参与的形式化。虽说有不少国内外学者对参与式发展进行过深入的反思，但大部分内容仅侧重于问题本身，而未对深层次的文化原因进行探析。况且参与式发展只是强调工作思路和方法上的改变，即从“自上而下”转变成“自下而上”，这种方法上的改变并未触动社区原有的话语体系与社会结构。同时忽略了“参与”背后更为错综复杂的传统文化网络结构。除此以外，对参与式的反思可参考同为实践者的李昌平：《谁的参与式，为谁而参与》<http://www.aisixiang.com/data/7825.html>及常竹青：《参与式农民培训的经验与技巧》，http://www.zgxcfx.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23193，以上两篇文章均为2009年9月7日浏览。

187 其中两种常见的“定型化”想象：“权力抗争型”和“模型化/NGO型”。之所以说其中存在着“定见”和“偏见”，笔者在第四章和第五章案例分析中会进行讨论。此处需要指出，各种“定型化”的简化想象经常是操作中的不自觉，非主观意愿。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当前中国大陆的部分社会运动实践者缺乏真正的第三世界视野（非一般的“底层/草根”视野，因其可能不包括对“民族-国家”和近现代以来全球殖民历史与发展主义影响的反思），以及对殖民历史、现代世界体系及工业文明下西方语境内各种“政治正确”结论与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缺乏反思，同时大部分发展工作者对NGO所置身的“后冷战格局”缺乏意识与自觉。

188 据笔者观察，包括自己在内的实践者在参与乡村建设运动初期，往往都有不同程度的“悲情”色彩，似乎关注弱者的“道德高度”已然让自己充满了正义与崇高，内心总被一种牺牲者/先行者的悲壮情绪所激荡，因此才具备在各种困难中坚持与开拓的动力，但与此同时，由此引发的“道德自恋/自怜”也随之而至。

189 这种情绪特别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出现，“不过如此！又能怎样？So What?”，它符合全球范围内某种共同的氛围，详见（齐泽克，2002）的相关分析。以某种“看透一切幻象！”式的洞察力构建起一个更大幻象，并取消“反思”和进一步行动的可能性，甚至掉入另一种对既有秩序和权力的无条件承认。

190 这些困惑情绪和处理方式在笔者本人的实践中就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同时据笔者观察，它也不同程度的存在于其它乡村建设实践者身上。具体到本论文的写作，虽然尝试努力从更根本上挑战这些主流情

盾或呼应，直接受影响于主流社会运动逻辑¹⁹¹，也很大程度体现着“正向运动”影响在“另类”实践主体内的投射。它不仅再次遮蔽了经由实践所可能打开的新空间，错失了进一步自我反思并将个体实践与整体社会文化脉络进行扣联（articulate）的难得机会，还削弱了乡村建设作为“另类”实践同时挑战“正向运动”与“反向运动”的真正意义。

综上所述，“正向运动”主导下主流的各种研究、批评与传媒叙述不仅影响了乡村建设的外部环境与评价坐标（“意义系统”），也参与构建其实践主体。由此可见，作为“另类”实践的乡村建设，不仅空间有限，因存在于“双向运动”的各种互动与限定影响，从来不可能存在所谓“纯粹”与独立。其困难与意义也恰恰基于这种复杂性，本章仅在知识生产与论述层面进行讨论，随后四个章节将从不同角度进一步展开分析。

绪的存在基础，但它们仍很大程度的缠绕着书写者。

191 戴锦华教授于2006年8月22日夜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做《迟到的分享——〈蒙面骑士〉导读》的演讲（黄国良录音整理）时说到：当前世界上大多数的反叛运动都带着一种悲情色彩，正如有人说现在很多的NGO领袖都是悲情领袖。这种悲情包含着三个方面：第一种悲情，请看“我们”的不幸，正是“你们”陷“我们”如此，“你们”是如此的“不义”；第二种悲情，“你们”多么无耻和罪恶，“你们”的罪恶就成了“我们”的正义。作为斗争手段当然可以，但敌手的“不义”并不自然地证明我们的正义，而需要自己去建立、阐述和实践；第三种悲情，“你们”看看“我们”做了多大的牺牲。面对这三种“悲情”，且不说在这样一个极端冷酷甚至不再“伪善”的世界，悲情是否有效？另一方面，一味的展示苦难议题，在某种意义上不仅在不断复制并“自我实现”着苦难的逻辑，更让我们悲观的忽略了苦难中人民的生命与创造。笔者认为上述分析基本到位并值得警惕，但当“悲情”似乎成为弱势者的最后武器时，我们不应该只是简单的加以“拒绝”——它无疑有可能打发了弱势者的最后“据点”。我们更应重新进入复杂的历史现实脉络与社会文化张力中，寻找更为有效的反抗力量和行动主体。

若不是保护主义的反向运动阻滞了这个自我毁灭机制的运行，人类社会可能早就烟消云散了。

（卡尔·波兰尼，2007：66）

谋救人的要到乡村，谋自救的也要到乡村，从从容容作学术研究的归到乡村，急急忙忙救死不遑的也须归到乡村，东西南北都归到一块。

（梁漱溟，1992：433）

第二章

“现代梦”的别样回声：乡村建设的脉络、资源与矛盾

虽然本论文不是以“现代化”为专门的研究重点，但中国的现代化却参与构成乡村建设百年实践的基本脉络、评价坐标与对话对象¹⁹²，将其与现代化结合起来更容易让我们看到其限定与意义，这一点已在前章从学术批评与大众传媒角度所做的文献回顾中有所体现。正如前面章节已有所引的艾恺（1996：9）之敏锐发现：“如果我们把梁漱溟看为是‘非保守’、‘非传统’现象——现代化的世界性反应中的一种，或许能看出梁漱溟的真正意义”。故本章将顺着这个角度进一步展开对中国乡村建设实践在行动脉络、想象图景、思想资源等层次的讨论，根据这一特定目标，笔者此处的“现代化/现代梦”特指以“激进”为特征并常见于主流论述中的部分类型¹⁹³。

笔者在此借用“现代梦”这样一个比喻，它之所以被称为“梦”，不仅因为其承诺与现实存在差距；也不止于其“美好”、“中立”形象背后所隐藏着的殖民主义和都市精英主义之武力与思维暴力；其更大“梦幻”则表现为：百年激进现代化历史中，普遍存在的“三农”问题折射出现代化逻辑所尝试遮蔽的巨大裂隙，同时进一步揭示出这种“正向运动”的想象与叙述本身的虚拟性（具体案例详见第五章），它还体现在叙述者们浪漫化的表达与其所产生的接受效果

192 康晓光（2008：209）曾经略显悲观但不无坚定的认为：“现代化几乎就是人类必须承受的‘宿命’，而‘三农问题’则是现代化的必然结果”。这种观点笔者虽然不完全认同，但却同意“三农”问题始终内在于百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其作为整体性问题与思考则一直处于由现代化所引发的各种变革、思潮和矛盾之前沿。

193 正如第一章“研究与评论”所述，本论文不处理所谓“另类现代化”，既因其是个非常庞大的议题，同时也并非本文所希望采用的角度。

上，似乎他们和听众们都已达成共识，存在着某种单一和纯粹的现代化，因此“冲击”之后的“反应”也可能是共同的。

然而，如果我们回到具体的历史脉络和复杂的现实层面，现代化的来源和传播不仅夹杂着各种政治经济诉求与诸多来自内、外部的限定与拉扯，对现代化的反应也自然充满着差异与张力，“冲击”所产生的直接反应与丰富多样的“另类”反应共存，它始终作为百年“现代化”史的内在产物，不断以各种形式反复发生和存在着。

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乡村建设的土壤、脉络与资源是什么？其不断遭遇困境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将是本章讨论的主要问题。

一、“百年激进”与“三农问题”：乡村建设的基本脉络

为更好的交代背景，此处延续导论中的简要讨论，先对近年来已有关于“激进”的各种讨论进行基本梳理。

1、关于“激进”的讨论

自 90 年代以来，中国思想史界试图对 80 年代的一些命题进行反思和修正，许多学者不约而同地回避刻意使用“东方/西方”、“传统/现代”的界分解释，而试图在寻找东西方共有的一些历史范畴的努力中重新定位中国思想的特征。尝试在“激进/保守”的二分框架中呈现近现代思想的复杂脉络正是其中影响较大并引起广泛讨论的一种思路（杨念群，2001：68）。

在余英时在 1994 年的分析中，激进不是指具体的思想或特定的学派，而是指一种态度或倾向，并这个层面上将保守理解成激进的对立项。通过对近代中国不同阶段的历史的分析中，“现实中国思想史上的保守跟激进，实在不成比例，更无法制衡。这是因为中国没有一个现状可以给保守者说话的余地”（余英时，2006：419）。而“中国近代一部思想史就是一个激进化的过程。最后一定要激化到最高峰，十几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个变化的一个结果”（余英时，2006：422）。

作者接着认为：“中国现代思想的激进化在‘文革’时期已走到了全程的终点。……经过七十年的激进化，中国思想史走完了第一个循环圈，现在又回到了“五四”的起点。西方文化主流中的民主、自由、人权个性解放等观念再度

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心价值。全面谴责中国传统文化和全面拥抱西方现代文化似乎是当前的思想主调，……从《河殤》的轰动一时，我们不能窥见反传统的激进思想是多么深入知识分子之心”（2006：429-430）。

虽然不像一般学者那样将“后文革”作为激进“历史的终结”，而认为这种激进的“全程”只是循环圈意义上的，但正是“革命破坏了近代一切旧有的和新兴的制度组织，这正是为什么思想激进化的历程又回到第二次循环始点”（余英时，2006：434）。

作者还以台湾近一二十年的演变为例，认为中间阶层和民主思想的传统将改变激进化趋向（余英时，2006：434）。余同时指出历史上各种有激进趋向思潮所共同分享共同的假定：“即只有破掉一分‘传统’，才能获得一分‘现代化’。把‘传统’和‘现代化’一切为二，‘保守’和‘激进’成为不能并存的对立关系”。余英时所看到的事实恰相反：“现代”一方面突破了“传统”，另一方面也同时继续并重建了传统，两者之间又是互相依存的（2006：435-436）。笔者认为，这种让传统与现代“和解”的论述，放过了对“现代”所应有更深入的反思。

萧功秦（1999：序言 2-3）认为：“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以来的关键历史时期，中国人所做出的历史选择，实际上是越来越走向激进，走向与这一民族以往的经济、社会、政治与思想文化传统作根本的决裂”。而自戊戌变化以来，激进的政策选择不自觉地成为人们“摆脱巨大民族危机所引发焦虑压力的心理平衡手段。其不可避免地具有与现实国情、政情脱节的倾向”（萧功秦，1999：314）。

林毓生则指出，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各种式样的“保守主义”思想与意识形态“大都在社会与政治层面上不甚有效，而在思想层面上也显得无力”（2006：465）。相对应的是，“五四”全盘化反传统主义所造成的“意识形态真空”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中式乌托邦主义”这种新现象。它的突出特点是：“强悍（自行其是）、千禧年式、道德优越感而政治性又极强的乌托邦主义性格为背景。……特别理直气壮、急迫与封闭。它的封闭性与排斥任何不同意见的强悍型。……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对其可能产生的破坏性格，几乎完全没有警觉。他们反而认为中式乌托邦是一个最能系统地、全盘地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运动”（2006：467-469）。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乌托邦的去脉络特点也是本论

文所要挖掘讨论的，但笔者认为它不是中国“五四”以来反传统知识分子的独特印记，而同样存在于延续至今的西方现代化历史及当代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¹⁹⁴中。

面对各种保守与激进的“拉锯战”（萧功秦，1999：序言4）或以之为二元对立框架的讨论，姜义华和陈炎（2000：36）认为：激进主义的确需要反思和批判，但不能站在“保守主义”的立场上对它进行反思和批判，应主张跳出“激进”与“保守”的立场之外，来重新看待“革命”和“改良”的问题。

这种“激进”还存在于更大的国内国际环境脉络中，“就文化层面而言，从清末到‘五四’确实是一个连续激进化的思想历程，不过激进思想巅峰过后，从二三十年代起中国思想界峰回路转，主导价值取向开始趋于温和化。要求西化的知识分子在思想激进的过程中遇上了几乎是难以逾越的四重屏障：首先是虔诚仿效西方与发现西学‘破产’的困惑；第二是全盘实现西化与西学多元取向的困惑；第三是理智接受西方与情感面向本土的困惑；最后是拯救民族危机与文化出现‘真空’的困惑”（许纪霖，2000：39）。笔者认为，这多重屏障也正是敏感于“乡土/本土”脉络的乡建知识分子从激进“正向运动”主流中另辟蹊径的重要背景。

许纪霖（2000：41）同时指出：“在政治层面上，中国的保守主义更具有激进主义的诸般特征：垄断一切社会资源和权力资源，以整体主义来处理社会不同层面的问题；制造某种权威性、自足性的意识形态神话，将子虚乌有的整体利益视为高于一切，拒斥任何来自社会底层的个人欲求。因此之故，保守主义才有可能在同一层面上与激进主义厮杀个你死我活，不可开交，一旦坐标变易，它们之间也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相互转化，变换角色”。

杨念群（2001：71）则进一步指出：在这场争论中强调激进主义占主导地位 and 强调保守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学者都共享同样的前提——“都是对使用现代化标准衡量近代思想的无条件认同。这种前提共享实际上也是近代中国思想的一个主要特征”。但实际上，“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以后，任何保守主义式的复兴言论都已不是一种孤立状态的传统复兴运动，而是现代化叙事积极干预下

194 根据汪晖（2008：126）的分析：“所谓‘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基本上是由激进市场主义、新保守主义以及新权威主义等各个方面共同构成的：在稳定条件下要求将放权让利的过程激进化，在动荡条件下以权威保护市场过程、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要求国家全面退出，这就是中国‘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特点”。

的一种阐说。这实际配合了激进主义的言说方式”（杨念群，2001：72）。因此，“激进-保守”任何一端的倾向性定位都不足以概括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和近代中国思想的复杂性。因为处于现代性处境之内的知识群体恰恰表现出既保守又激进的双重身份，之所以出现如此情况，除中国思想史界长期受制于西方现代化话语的支配外，长期忽视民间与底层社会的思想资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而“用此框架分析农民阶层的思想难得要领，用‘激进-保守’的框架更无法概括民间与底层社会的实际思想”（杨念群，2001：72-74）。

至于由激进所带出的“乌托邦”命题，许纪霖出于对“激进-保守”这类“语义含混、所指滑动”概念的不满，提议借用卡尔·波普（Karl R. Popper）两种社会改造工程的分析模型：乌托邦社会工程（utopia social engineering）与渐进社会工程（piecemeal social engineering），在这对新的概念框架下，激进主义固然属于乌托邦改造工程，但在20世纪的中国，保守主义也具有同样的思想行动特征和共通的思想预设（许纪霖，2000：40）。

张灏则认为（2000：48）：乌托邦还可以分成两类，“消极型乌托邦主义”相信乌托邦理想是随着历史的演进逐渐实现，“积极型的乌托邦主义”相信有这种信仰的人应该以积极的行动去推动历史，尽快地促成其实现，而不该消极地静候历史，遵循其固有的次序节奏，作缓慢的演进。在1895年以来的转型时代，“积极型乌托邦”思想日趋重要。在辛亥革命前，这些思想尚只限于如无政府主义这样的少数激进分子，“五四”时代开始进入知识阶层的主流，有着广泛的影响。

笔者认同以上各种尝试借助新的框架以挑战旧有习惯性论述的努力，它们也构成对本论文分析角度的一定启发。但对一些论者用“积极/消极”这样已带明显价值判断的描述存在保留，而希望用“脉络化/去脉络化”这样尚有分析和讨论空间的框架去讨论乌托邦。这种分析希望指出，能配合脉络（适合的时间/空间/社会关系）的“快速/规模”可能不一定必然导致“激进”后果，脱离现实脉络的乌托邦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这也正是历史和当代的乡村建设所面临的复杂而又充满诱惑力的悖论和困难所在。

2、“百年激进”的现实影响

针对以上批评和讨论，笔者认为现有各种“激进”的论述多涉及政治、文

化、思想层次，较少涉及经济领域；过多强调各种层面的“激进”作为近代中国百年历史的特殊性，而忽视“激进”在全球资本主义史¹⁹⁵及五百年殖民史意义上对于第三世界、弱势群体和生态环境深刻影响的普遍性。

温铁军近年的研究则以宏观历史与经济学角度进行了针对性的拓展¹⁹⁶：作者认为，激进不仅包括政治或文化层面上的革命思潮与现代化意识形态，还包括“激进地按照外资适应的制度要求来改造本国制度”，以此而模仿西方体质的“上层建筑”（现代教育、现代治理方式、现代政治结构）所造成的“内涵性亲资本”。

具体来说，从经济角度看百年中国的激进特征，主要是为了形成国家资本为主的工业化。因为全球范围内的任何政府在工业化过程中都普遍激进，而且实质性地具有政策体系的“亲资本”内涵。但这种说法不是论证“激进”的合理性，因为他马上指出（2011）：“在农村领域的变革，任何激进的制度演进都会有比较严重的制度成本”。这启示着我们以“三农”为立场和角度，既对历史也对当下保持同样且多角度的批判与敏感。

然而，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由于西方所强势主导话语与“正向运动”力量的影响，“现代化”成为一种独特的“意义系统”，它各种层次上充分体现了“激进”与“去脉络”特征。虽然本论文不以现代化为研究重点同时不想延续这样的研究路径，但为了资料使用上的方便，下文将借助现有的较多现代化研究成果，讨论激进“正向运动”对近代中国“三农”的现实影响。

罗荣渠（2008：代序 16）的研究指出：“现代化”一词，在“五四”以后关于东西文化观的争论中已偶尔出现，但其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科学词汇在报刊上使用，是在 1933 年 7 月《申报月刊》发创刊周年纪念特大号“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上。作者根据分析指出：“把现代化基本概念确定为工业化、科学化、合理化、社会化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化论争中基本形成的，它绝不是一个自发的自然过程，而是被动适应世界现代化挑战的过程”（罗荣渠，2008：代

195 实际上，“激进”的强调“整体性”同样体现于资本主义的各种运作中。正如 J.K. 吉布森-格雷汉姆（2002：318、321）所指，之所以我们显的渺小，那是因为我们的生活笼罩在某个庞然大物即资本主义之下，重点是作者指出资本主义的力量不仅通过政治经济方面得以显示，同时还通过其充满“统一性”、“单一性”和“整体性”的话语，是它们构成资本主义这个“不能改革的改革对象”。在这个逻辑下各种局部的、片面的改革就终归是脆弱无力的，它们都将被资本主义以另一种规模或者另一种程度的努力所抵销。作者不无讽刺的再推一步，对资本主义必须从整体上实行变革，否则，干脆什么也别动它。

196 详见温铁军，《改出百年激进——近期中国发生的历史阶段变化》，2011，
<http://roll.sohu.com/20110926/n320555314.shtml>, 2011 年 10 月 26 日查看。

序 26、37)。

虽然如此，现代化的基本逻辑却深刻的影响着中国近现代历史，而由现代化运作逻辑所制造出的更多共识，则通过国家、知识分子、媒体以及全球资本的共同形塑而得以在各个领域运用自如。因此，如果我们希望从经济、文化、社会等角度对当代中国乡村建设实践的各种处境与遭遇进行分析，则需要置身于百年以来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努力与困难及现代化对中国社会所产生各种影响这一基本脉络中。以下将分别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经济方面

正如罗荣渠（2008：代序 27）所指：“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一个农村居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传统农业国之中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和渗透，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商品对我国市场的侵蚀和对我国传统自足的农村经济的瓦解”。

根据许纪霖和陈达凯（1995：178-182）分析：“19 世纪末特别是 1895 年《马关条约》之后，被逼进一步打开国门并由外国资本推动的各项‘建设’使中国形成了典型的二元经济格局，新经济部门的开发在一定程度上掠夺了传统部门，从而导致失业人口大量增加”；例如铁路的建设，使许多农民失去了耕地，在铁路通车以后，导致传统运输业工人大量失业，而“随后由外资直接投资的现代机器工业排挤传统手工业的过程更让中国社会增加了极大的痛苦和压力”；在中国的传统维生经济中，许多家庭的经济本来就异常脆弱，丧失了手工业这一重要经济来源后，更是雪上加霜，大大刺激了乡村人口向通商口岸等城市过度迁移，“被剥夺了大部分家庭手工业收入的农村人口，越来越多地流往城市去碰运气，因此导致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过剩人口，加速了城市贫民窟的形成，对农村发展也没有什么帮助。恰恰相反，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也使农民对市场的依赖程度提高”。

类似判断也为温铁军（2009：137-138）所坚持：“1920 年代以来，有十多年以工业化城市化为内容的经济高速增长，但也就在这个时期，农村出现了种植结构调整、商品率提高、小农经济自给能力下降和收入的货币化。这四个重大变化，为工商业和金融资本进入农村经济，以远高于地租的剥削率榨取小农剩余提供了条件”。所以，“土地占有不平等并不是农村贫困、小农破产的主要原因。从本质上看，最主要的原因是工业化原始积累阶段必然出现的工商业资

本和金融资本对小农经济的过量剥夺，即‘三农’的外部环境才是农业衰败的主要原因”（温铁军，2009：95、128）。

正是当农业完成了如此商品化和市场化之后，受市场力量支配，农业剩余便以工农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不断流向城市和工业。同时，受资本利益驱使，以及大量外部兵差、土匪横行、战乱频繁等外部条件所产生“内部化”后的影响。一方面农村的富人走向城镇经营生意，一方面城里有钱人也在乡间买地，种植工业需用的经济作物。为了获取更多的流动资本，也为转嫁自然灾害可能带来的损失以抵御价格波动风险，这些资本拥有者改变了以往的租地模式——这让租赁农场、富农经济形成普遍现象，地主经济发生向工商业方向的实质性变化，地主迅速从“在乡地主”变成“在外地主”。最大变化则是他们更重视在外的工商业收益，而加大了对原来“在乡地主”时比较“宽容”的那种地租剥夺方式；农村收租则由以前的“秋后租”、“分成租”变为“春前租”、“定额租”；对那些租地耕种的农户，以前可以用收获的农作物或以佣工形式支付的地租，现在必须以货币形式完成交纳，因此，农户的生活也逐渐走向货币化。一方面，农业剩余通过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两大渠道不断的流向城市，农村的劳动力则随着农户破产而不断的逃离农村，农村经济因此而不断凋敝；另一方面，导致了高利贷¹⁹⁷金融资本以及产业资本全面进入乡村社会。这两种传统农业稳态社会的外部资本力量打垮小农的能力远胜于地主。它们既打垮了小农、进一步更导致盗匪横行，传统乡村治理方式所维持的乡村稳态结构随之彻底破坏¹⁹⁸。

随着传统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市场化”与“货币化”，也同时让生产结构出现大范围的“被动”调整，许多经济作物开始出现，类似于殖民经济的种植结构专业化与区域化，对于分散小农来说也大幅提高了各种风险。

关于以上分析，张鸣（2001：104）进一步佐证：“虽然 1928-1937 被某些史学家称为中国近代最有希望的时期，但是中国并没有在此完成步入现代化顺序的过渡，反而日益朝着集权体制的畸形工业化前进……城乡差别越来越大，有限和可怜的资金都流进了沿海都市，农民陷入商品化的程度越高，被盘剥和抛弃的可能就越大，由国民党主导的这次现代化进军，只是再一次加重了农村的破产”；“而农民则被拖入一种畸形的商品化的漩涡之中，比如通过‘经济作

197 毕竟地主还是要维护和小农的长期关系，而高利贷资本则根本不管。

198 该段观点参考自温铁军教授 2007 年 10 月在人民大学研究生课堂演讲《民国时期乡村建设的背景》。

物’ 鸦片的种植。只有这样才能换来更多的货币以支付捐税，但这样的效果却导致农民和下层劳动者染上毒瘾，导致情况更加糟糕”（张鸣，2001：56-57）。

与此同时，另一个重要的脉络是——正当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同步加速时，国际宏观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出现西方的 1929 至 1933 年的经济大危机并进而影响已初步卷入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国¹⁹⁹，具体表现为：当大萧条导致美国金融利益自保而提高黄金白银等贵金属价格时，中国作为刚刚兴起工业化的“银本位”国家立即出现白银大量外流，因此引发通货膨胀，这个本应由都市承担的危机又进一步向农村转嫁，而造成土地兼并、小农破产、社会动荡、外敌乘虚。

（2）、政治方面

根据以上分析，中国的乡村危机正是不平等发展的典型例证²⁰⁰，因此这样的影响必然从经济领域向其它领域进一步延伸。

在杜赞奇的研究中，国家权力向乡村的延伸和对社会控制的加强是在自觉的现代化过程中实现的²⁰¹，它导致国家政权的扩张和“内卷化”²⁰²，地方财政陷入恶性循环，似乎只是在养活不断膨胀的庞大官僚和国家经纪集团，这也正是民国乡村建设兴起的时间、背景和原因之一。具体过程也为张鸣（2001：50-51）所看到：在清朝帝制解体后，准确说应是清末推行以“地方自治”为标志之一的“新政”以来，“一方面开始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革与国家政权建设，特别在庚子以后，带有一点现代意味的财源关税也被列强拿走的情况下，推行新政的经费，似乎只能通过直接榨取农民获得，然而在行政机器效率日益低下的情况下，贸然这样延伸，势必还导致行政成本成倍的增加。其间的各种贪污和截留既吞噬掉大部分农民的血汗，更使晚清以来恶化的吏制更加恶化”。

199 如日本学者城山智子（2010：116）通过对大萧条时期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的研究中指出：“1929 年之前，在收获季节城市资金通过购买农产品流向农村村庄。但是，随着大萧条引起的农产品价格下降，以及约 1931 年开始的资金向中心城市的流动，导致了农村地区现金短缺，严重破坏了农村的金融机构。由于被剥夺了现金和贷款的来源，农村家庭发现，维持生活变得极其困难”；“1929 年，世界市场上农产品价格开始暴跌，也殃及中国市场。1930 年后，中国原材料价格持续下跌……1931 年，因为白银相对其他外国货币升值，使中国的农业部门更直接地暴露在了全球萧条之下”（城山智子，2010：92-93）。

200 如汪晖（2008：120）所指：“不平等的市场扩张通过将农民和土地转化为半自由的商品，从而瓦解了乡村社会的社会组织和自我修复能力”。

201 杜赞奇（2003b：2）指出：“在 20 实际前期的中国政治舞台上，所有的中央和地方政权都企图将国家权力伸入到社会基层，不论其目的如何，他们都相信这些新政权的政权机构是控制乡村社会的最有效的手段”。

202 此概念杜赞奇借用自 Clifford Geertz，杜赞奇（2003b：50）意义上的“国家政权的内卷化”是指：“中国国家权力的扩张有其自身的特点，即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与地方上的无政府状态是同时发生的，也就是说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能力低于其对乡村社会的榨取能力，国家政权的现代化在中国只是部分的得到实现”。

张鸣（2001：3-5）接着认为：自 1860 年代太平天国运动所引发的国家政权地方化以来，各地方势力逐渐兴起，“地方绅权逐渐浮出水面，乡绅权力不仅大大扩展，而且开始趋于强横。他们的势力空前膨胀，从后台跳到前台，赤裸裸的掌控着乡村政治权力，同时这些精英的功利性也大大增强”。一方面，他们“在打着现代化招牌的军事化进程中，原有的民间社会空间受到国家政权的全力挤压和侵蚀，通过这种挤压和侵蚀，实现国家政权的扩张，最大限度地将农村的资源集中到国家政权手上，正好借此建立健全了一套全能式的绑在国家‘战车’上的基层政权体系，无条件地为国家工业化提供所需的一切，以实现所谓‘富国强兵’的目标，与此同时，农村原有的互助、宗教、公益、自卫以及娱乐的功能大面积萎缩……，乡村社会组织则彻底被淘汰出局，乡村也丧失了起码的自我组织、自我调节的功能”。

另一方面，以上原因导致“传统道德权威难以维持，名义上自治机关无所不包的结果，使得它们不得不与地方政权捆绑在一起，借助政府的暴力推行政务；再加上乡村读书人中的优秀分子在轰轰烈烈的废科举兴学堂（比起私塾成本远高得多的西式学堂，往往只会在都市）热潮中再也不可能安心于乡土了，他们被从原本可以留下的乡土社会中被拉走，否则他们再也不可能出人头地。就在以上这几个根本环境的改变下，乡村精英出现‘劣化’，进而‘劣绅驱逐良绅’²⁰³可谓显而易见了。而这样的地方主义最后终于找到了自己最赤裸也最糟糕的表达——军阀割据（张鸣，2001：39-52）”。

梁漱溟（2005：197-201）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敏锐意识到：他之所以希望从乡建入手，而非简单打倒军阀——因为中国危机同时存在于“自毁”和“他毁”这两种力量——“所谓自觉地破坏，那就是为外力破坏所引起之几十年来的民族自救运动，自救适成为自乱。在这自乱当中，外力更易施其技而加强其破坏。（而这）厌弃与反抗，是中国社会崩溃的真因。引起这厌弃反抗的自身欠缺，是中国文化的真失败点”；“本身无力而过于用力，所以非崩溃不可！清廷皇室之倒，即倒于办新政”（梁漱溟，2005：214）；“外力之破坏乡村尚属有限，我们感受外面刺激而起反应，自动的破坏乡村，殆十倍之不止”（梁漱溟，2005：

203 杜赞奇（2003b：114-115）结合满铁的原始资料有过精到的分析：“到了二三十年代，由于国家和军阀对乡村的勒索加剧，那种保护人类型的村庄领袖纷纷‘引退’，村政权落入另一类型的人物之手。村公职不再是炫耀领导才华和赢得公众尊敬的场所而为人追求，相反，村公职被视为同衙役胥吏、包税人、赢利性经纪一样，充任公职是为了追求实利，甚至不惜牺牲村庄利益”。

151、152)。

也即，无论是为了提取更多包括人力和军费在内的各种资源，还是根据现代化思潮影响下国家政权建设所需完成对基层的进一步控制，此前长期维持农村基层稳定且低成本的“乡绅自治”制度已经悄然发生着本质和无法逆转的变化。“那些能够继承农业社会道德传统的‘好’乡绅，由于不能执行政府对农村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横征暴敛，而逐渐退出了农村政治舞台”（温铁军，2009：126）。

与此同时，自上而下遍布全国的正规化组织与行政体系随之建立并在不断“完善”中膨胀，其正是“现代化”想象与内在逻辑在各个层面上的不断自我复制。进而导致行政和治理成本大幅上升，如此“现代”成本却仍将不得不由“前现代”的“三农”代为支付，如此事实与困境延续到了一百多年后的今天。

（3）、文化方面

以上经济和政治面向的分析均产生着相对直接的影响，因此也较容易引起我们注意。但正如卡尔·波兰尼（2007：134）所指：“导致退化和沦落的原因并非像通常假定的那样是由于经济上的剥削，而更是被牺牲者文化环境的解体。当然，经济过程可能为这种毁灭提供了工具，但其毁灭的直接原因并不在于经济因素；而在于对体现其社会存在的制度设置的致命创伤。后果是其自尊和水准的丢失”。

汤普森对十八世纪英国工人状态的讨论可以为这一观点提供案例：“工业化的过程必然是痛苦的。它必定会导致传统生活方式的消逝。这个过程伴随着异乎寻常的暴力。苦难的经历以成百种形式压在他们的身上，对农田劳工来说是失去公地使用权利、村社民主制；对工匠来说是失去手工业工匠师傅的社会地位；对织工来说是失去生计和独立性；对儿童来说是失去在家中的劳动和玩耍。对实际收入有所提高的各类工人来说，他们失去的是安全保障和闲暇生活，而且城市的环境在不断地恶化”（2001：523）。

而对于中国来说，当西方文化价值进入并以都市为主导确定了特定的“意义系统”后，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传统文化随之衰落、传统价值失去应有的位置，乡村作为“非现代”和“反现代”的典型“意义”而遭到不断的边缘化，同时也正是这种“想象中的‘他者’，正好维持着人们对现代城市各种缺陷的容忍。城市和乡村在现实中的对立与在文化现象中的补充关系，正是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主导下的现代化的必然后果”（吴志峰，2008：454）。

关于“激进”现代化所造成文化方面的变化，贺雪峰（2008a：67）指出：“农民的主体地位在逐步丧失，人际联系解体，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福利迅速减少。当前农民的苦，苦于正在丧失生活的意义，苦于未来生活预期的不确定；苦于人与人的信任在下降和生活方式变化太快”；康晓光（2008：210）认为：“无论是科学主义、进步主义，还是消费主义，都在摧毁农民的自信心，给他们一种自卑感，使他们向往城市的生活”；许宝强结合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经验指出：“传统的/原住民的有关发展的知识，备受排挤以至无声无臭。这种知识的垄断局面，随着现代化发展的局限逐渐显现”（许宝强、汪晖，2001：前言18）。

王晓明（2008：355）则通过假期对中部农村的调查，以见闻故事“白描式”的指出：“三农问题并不仅仅是来自今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变化，它也同样来自最近二十年的文化变化。这些变化互相激励、紧紧地缠绕成一团，共同加剧了农村、农业和农民的艰难”。对此石勇回应认为：“城市对农村的‘文化殖民’具有一种基于人格不对等的侵略性。它不仅满足了文化奴役的欲望，使农村的文化生态极端恶劣，而且再次强化了基于城乡二元体制的‘城里人’与‘农民’的心理隔离。……这种‘文化殖民’对农民的危害，更重要的在于，它给欲摆脱困境的农民强加了一种精神的焦虑，一种对土地的厌恶，一种对有利于自己生活前景的制度设计的冷漠。它以隐秘的方式瓦解了人们的理性，使幻想中的‘城镇化’生活与现实苦难的农村生活日益分裂”（2008：360-361）。

这些来自当代中国田野的调查和思考无疑也是民国乡村社会文化分析的某种回声与延续²⁰⁴。他们都从不同角度指出主流“意义系统”让受影响者将整套“非农化”价值内化为基本角度与坐标，进而解释自己所处弱势处境的事实与现状。

综上分析，历史和当代的乡村建设实践不仅在产生土壤、内在诉求、与主流现代化及其所体现的“激进”逻辑存在着多层次的联系与互动，因为这些实践都产生于这样的双重“激进”脉络——在经济和军事上因落后挨打而产生效法西洋东洋或“超英赶美”的“百年强国梦”；在文化上“清算/批判”与告别那相形之下似乎是落后之“根”的农业文明及其背后的文化传统、价值观与生

204 如张鸣认为（2001：2）：“现代化无疑是隐含在农村权力和文化变迁背后的一条主线，现代化过程的拉动，根本性地改变了乡村的文化与政治地位，并使其法定地处于经济上附庸和被牺牲的境地”。

活方式。然而，乡村建设运动却又因此凝聚了一批各自时代的批判者与另类实践推动者，这使得乡建运动既因坚持批判而在根本上与主流格格不入，又因期待产生更大社会影响（效果）而与主流不断地妥协融合。具体互动与复杂关系将在后几章结合案例进行分析。

3、“百年乡村破坏”与“三农问题”

以上分析之所以多角度进行，希望突出和强调一些在经济（增长）决定论影响下常被忽略的面向。而“中国问题原来是混整之一个问题，其曰政治经济文化三问题者，分别自三面看之耳，并不是当真有分得开的三个问题”（梁漱溟，2005：124）。

正是这些不同面向的整体性构成，让我们重温梁漱溟 70 多年前那个振聋发聩的总结：“一部中国近百年史，从头到尾就是一部乡村破坏史”（2005：481）。作为进一步的辨别和说明，他解释道：“任何社会里面，乡村都是居于不利的地位；但我们不能说任何社会史都是乡村破坏史。说作乡村破坏史，必须在这一段历史里面，乡村破坏成了一种趋势……并且乡村成了绝对牺牲品”（梁漱溟，2005：152—154）。

这种“百年乡村破坏”的当代表述即为“三农”问题——它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所提出，至今已为学界及政策制定部门所共知，即不止于农业或经济问题，而应是“农”在三个不同维度上进行立体拓展：农民、农村、农业²⁰⁵。不仅是领域或角度的延伸，更重要的是其指出“三农”问题不仅只是与“农”有关，它更是宏观问题及外部制度环境问题²⁰⁶（温铁军，2009：51）。

作为“三农”问题的最早（1996）提出者，温铁军认为产生“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农业“三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资金）大规模净流出农村²⁰⁷——这似乎是中国在不能对外殖民以转嫁矛盾的条件下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国际金融资本危机从核心区向中国这样的边缘区转嫁的宏观环境使然。

在大幅修订的第二版著作中，温铁军（2009：35）进一步指出：“因为资源

205 三者以这样为排列顺序也是有其独特的考虑与主张，即更突出常被忽视的农民与农村。

206 温铁军（2009:6）还具体表述为：“‘三农’问题本质上是国家工业化与生俱来的制度成本问题，一般会随工业化/城市化加速而愈演愈烈”。

207 可参考本论文引用文献中温铁军教授关于“三农”问题的各种分析，此为其不断提及的基本观点。

禀赋制约，中国历来并无纯粹‘农业’问题；我们历来面对的其实主要是农民权益问题、农村治理问题和农业可持续问题这‘三农’问题”；“‘三农’问题是国家工业化形成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成本，其制度收益已经被完成了内向型积累的国家工业化及其主要载体——城市所获得，但成本却往往由已经为工业化原始积累做出巨大贡献的‘三农’所承担。即“三农”问题会随工业化/城市化加速而愈演愈烈”（温铁军，2009：引言6、正文6）。

此外，“三农”问题的引发原因还体现为：以乡村为本位的物质财富生产和贸易因此转变为以城市为中心的近代工业生产和贸易。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国家与乡村的关系因此而开始逆转，乡村衰落与城市扩张则此消彼长——作为一个史实上的验证：近代以来中国农村的衰退，几乎与以工业化为特征的现代化进程同步，无论是产生了历史乡村建设的民国“黄金经（济）建（设）十年”²⁰⁸，还是当代乡村建设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新背景。

综合这些因素，温铁军（2004a）认为：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所谓发展，是指在工业化成为全球不可逆转的趋势之后，其传统的资源经济向产业经济、产业经济向资本经济这三个性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进步’，及其派生的制度演进过程。而其中，从资源经济到产业经济的所谓‘惊险跳跃’，就是发展中国家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不可逾越的、一般都需要从农业提取剩余的‘资本原始积累’”。在他看来²⁰⁹，这似乎正是发展中国家普遍而必须的发展逻辑，也是“后发现代化”之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普遍困境——越是在资源短缺条件下快速形成工业化，其由弱势群体和“三农”所承担的代价²¹⁰就越大。

重要的是，如此“代价”绝非一笔付过的“创业成本”。相反，正是需要“三农”和生态环境自始而终和源源不断的“输血”，才能支撑起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乌托邦神话”。如此引发对“三农”的耗尽，它似乎符合某些论者关

208 如温铁军（2009:137-138）所指：“民国初年自1920年代中期开始，曾经有过10多年的以工业化城市化为内容的经济高速增长，史称‘黄金经建’时期。但也就在这个时期，农村出现了种植结构调整，商品率提高，小农经济自给能力的下降和收入的货币化。这为工商业和金融资本进入农村经济，以远高于地租的剥削率榨取小农剩余提供了条件”。

209 这种看法温铁军认为是来源于自己在世界各地农村的调研和考察：“三农问题”并非中国独有，也并非发展中国家独有，而是一个具有普适性的问题（2006:11）。

210 温铁军此处对代价和成本的强调，不同于一般从既得利益角度通过“代价论”实现对现状的辩护，其本身有着复杂的张力与批判性，它直接针对当前主流经济学只谈收益不谈成本与代价转移这一现实。至于其中的复杂张力，因为其不能在一般框架下被处理为“工业化/成本代价”的好坏对错，否则也是另一种简单化，而需放回具体且复杂的脉络中，这也是本章所努力尝试的。

于“消灭农民”的逻辑推演，但却引发了更为深刻的整体性危机，详细讨论将在后面章节中陆续展开。

总之，“激进”现代化是以“牺牲农村、衰落农业、减少农民”为基础的。所谓“三农”问题，则是现代化进程的内在产物与逻辑必然；不是“农”自身存在问题，而是现代化和激进“正向运动”的推进将其变成“问题”。

二、动力与张力：乡村建设的不同资源

在上述复杂的脉络背景下，与“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关于中西文化大论战相呼应，中国知识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也爆发了“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大讨论（罗荣渠，2008），本论文第一章文献回顾中已有简单涉及，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则同时是该讨论的发起者之一、实际产物与后续跟进。

类似讨论既让乡村建设实践的立场更加清晰，也让乡村建设不同团体获得某种“共同体”的感觉与命名。然而，正如梁漱溟曾经说过，“乡村建设运动遍于全国，却非自一个中心扩大起来，而是先后由各地发动的；彼此见解互相接近，而不无出入”（2005：591）。也即，作为“激进”现代化另类反应的乡村建设，除与各种主流发展思路不同，乡建团体内部也存在着诸多的差异与张力。但其背后实际则是支撑它们的思想资源与对未来理想社会（及乡村）的想象不同，它们分别是什么？这些不同资源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现实实践又是如何表现和回应着这些不同脉络的资源？

笔者认为，根据“双向运动”的视野，在前文所综述的历史背景与现实脉络下，影响乡村建设的思想资源及其对话对象包括：

1、从“西化”到“现代化”的相关思潮²¹¹

近百年来的中西碰撞与全球化进程，“西方”元素当然是乡村建设思路的首要来源与参照（潘家恩、杜洁，2010），虽然在不同阶段分别有着不同的主要表现形式。“西方现代性”不仅对观点立场彼此对立的社会主张具有同样吸引力²¹²，它同样影响着乡村建设实践者，帮助乡村建设打开思路并为重建新价值提供空

211 详细讨论及更多原始文献，可参考罗荣渠主编，2008，《从“西化”到现代化》，合肥：黄山书社。

212 如卜正民（2005：138）所指：“尽管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期待在立场上是南辕北辙，但是两者却都觉得某种形式的西方现代性是有吸引力的。那种企图掌握西方似乎已经取得之成就的内在驱动力，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却是同样的强烈。”

间，同时还带来包括现代社团、社会试验等新的实践形式。它先后包括着晚清以来的变革思想与“新民”想象及“五四”以来“科学、民主”思潮与“启蒙”路径。

根据许纪霖和陈达凯（1995：356）的分析：“如果说晚清以来的‘乌托邦’思潮保持着中国文化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主体认同和价值选择。那‘五四’后知识分子所焕发的乌托邦热情，则表现了其超越西化而重觅未来理想社会的热忱”。同时，“五四”以来更加激烈的内外刺激也让许多知识分子转向超越书斋的社会改造，这些都是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实践的基本动力与资源准备。

这样一种对“五四”的开放性阅读，更在日本汉学家沟口雄三那里得到展开。在《另一个“五四”》这篇长文里，沟口专门谈梁漱溟思想与“五四”的互动，他认为梁漱溟开创了另一个同样重要的“五四”。它“既不同于陈独秀、李大钊所代表的‘五四’，也不同于以往人们由常识所认为的‘五四’是反对和打压宗法的、儒教的传统思想这样的道路。总之，这是一条与毫不妥协相对立的另外一条道路”（沟口雄三，1997）。

的确，丰富的“五四”不仅直接产生了北大平民教育宣讲团这样的“平民教育”雏形，乡村建设运动所大力推广的“合作社”基本思想也是那个时候引进的（郑大华，2000：502）。而梁漱溟总结乡村建设最核心的八个字：“科学技术、团体组织”，某种程度上则可以说是梁漱溟结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和他对当年中国社会基本判断后，对“科学、民主”的修订与取舍。

如果说晚清产生了启蒙的对象——“新民”，“五四”则让提留在口号和理论阶段的启蒙与其行为主体进行了直接的互动和结合，并创造出知识分子“走向民间”这种启蒙主义的基本形式。同时，“‘五四’后弥漫知识界的民族主义激情和对西方的不信任情绪，为现代化批评提供了广阔的思想空间”（许纪霖、陈达凯，1995：363）。而乡村建设正是被孕育与呼唤出来的其中一种独特实践，笔者将在本论文第三章关于平民教育的分析中详细展开。

2、“反现代性”的现代性

除上述资源外，两场乡建的脉络和资源中都已包含着西方社会及现代化内部的自我质疑与反思，并同时与全球范围内革命思潮的兴衰和传播紧密相关。因此，这些带有某种“另类”诉求的乡村建设实践也必须回到中国现代化运动

的双重历史脉络（寻求现代化与对西方现代化各种历史后果的警惕）中进行讨论。

根据罗荣渠（2008：代序第 8、9 页）的分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暴露了各种问题，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欧文明被沾满了血污，于是引起了西方信仰危机，西方思潮发生了大变化。同时在大战的新形势下，从俄国和西方输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持激进的观点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从西方、印度输入中国的罗素、泰戈尔等人的思想，则温和的重新估价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

汪晖（2008：65）进一步指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成为晚清以降中国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中国现代思想及其最为重要的思想家是以悖论式的方式展开他们寻求中国现代性的思想努力和社会实践的”。

也正是通过如此中国知识界“忽然”到来的新转变，外加随后 1929-1933 年大萧条在经济层面上的严重验证，无疑催生出了反思“西方式”现代化的某种新氛围。只有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并补充新的角度，我们才能理解“新派”知识领袖梁启超在欧洲之行后思想上的巨大转变，他为何会号召青年以“孔老墨三位大圣”和“东方文明”去拯救“西方文明”。而梁漱溟何以在本应“自卑”的大时代里保持着如此高亢的民族自尊与文化自信²¹³——“近代资本主义的路，今已过时；人类历史到现在已走入反资本主义的阶段，所以不能再走此路”（梁漱溟，2005：152-157）。

正因如此，对照下的“理想化”乡村建设不仅可能使中国得到现代化的“好处”，同时还能“避免西方过度都市化和工业化所带来精神及物质上的罪恶”（艾恺，1996：248）。

与此同时，同样对应此“激进”思潮与脉络的中国共产革命，也对同期的乡村建设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本章第一部分所述，西方诸国百年来的殖民化掠夺外加“激进”现代化逻辑的本土化传播，导致了近代以来的“三农”问题。继续“现代化”似乎提供不了更有效的解决办法，伴随着理论界对西式“现代化”的质疑，也同时引入另一种尝试解决“现代性”所产生问题的

213 一个十分有趣的对比，根据 Charles W. Hayford（2004：69）的研究：“五四”之后，晏阳初从美国回到中国，同时期旅欧的激进分子们“从遭受一战破坏的欧洲回国并断言资本主义将自我毁灭，而晏阳初却带回来一幅胜利欢腾的美国远景”。然而，笔者所要指出的是——为何在此阶段看似态度相反的晏阳初与梁漱溟，在不久的将来会殊途同归的走向乡村建设？具体将在下一章详细分析。

方案与思路——从与传统“西方”有着一定区别的俄国传来的共产革命。而此时，作为“百年乡村破坏”之后的中国农村，恰好为这样的激进变革提供了广阔的土壤。

虽然共产革命最激烈并又最具规模效果的实践着“反现代性”，但正如汪晖在 1997 年所做的分析指出²¹⁴：这样方案虽然携带着“反现代”的特征和目的，但当其在具体脉络中演绎并受到各种现实力量限定后的结果，无疑也只是某种“反现代性的现代化理论”。具体说来，乡村建设受影响表现在：

首先，随着国共第一次合作后的“北伐”，各地农民运动迎来了大发展的高潮，特别在农村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动员效果，这在某种程度上为乡建派在农村的实践开展提供了充分的可行性证明与舆论准备。

其次，因为共产党在各地发展迅速，出于争夺对基层控制的需要及为战争和现代上层建筑提取税赋与兵丁，国民政权意识到其构成的较大威胁与竞争²¹⁵，而尚未完全统一和稳定的国民党又不可能有真正的实力来大范围推广试验某种“稳定乡村”方案，这在客观上也迫使当时的国民党政权为民间乡建运动“让”出一定空间。此点在梁漱溟的意识里非常清楚，但与一般人以为“乡建派”被国民党所“利用”不同，他认为恰恰是乡村建设在“利用”政权给出的空间来做那些与政权目的相差甚远的事（梁漱溟，2005：440）。

再次，既然共产革命作为某种程度上的“反现代性的现代化”理论，因此它在实践和理论层面上都引起梁漱溟等试图更为彻底“反现代”的“乡建派”²¹⁶产生与之对话的所谓“第三条道路”，并在实践中处处尝试与之有交叉、区分或互动。

因此表面上看，被称为“改良主义”的乡建实践似乎与革命格格不入，但除了明显的“竞争”与“对话”关系外，两者还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相互影响——如：延安及建国初期，共产党的农村方案中亦有梁漱溟当年尚未实现之计划的“影子”²¹⁷，而晏阳初 50 年代则在台湾帮助国民党完成土改。整体性分析已在本论

214 详见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载于《去政治化的政治——短 20 世纪的终结与 90 年代》，北京：三联书店，2008 年。

215 其同样体现在对立政权的意识中，详见第一章“历史乡村建设批评”中的“左翼批评”部分。

216 需要说明的是，从来没有统一的“乡建派”这一整体，其内部充满着差异。其间也有十分认同现代化，而只是希望如此现代化能真正惠及“三农”的派别。但正因为乡建内部的多元，它可能产生一些微小但却很有挑战性的“另类”思想，此处所指是更为彻底“反现代化”，具体则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思路和做法。

217 从 1938 年，梁访问延安并同毛谈话 8 次之多，可见他们的思路是有一定的交叉和互相影响。如：梁

文第一章“改良与革命”中有过相应涉及。

3、本土思想与传统资源：

根据“双向运动”的视野，作为一种尝试回归“三农”这样一个本土议题的努力，乡村建设实践除受“现代化”和“反现代化”这两方面思潮的影响外，还很大程度上尝试从本土和传统中获取资源。

但这种思想资源角度的链接本土与重思传统，并不等于一般论者对其“复古、保守”指责。因为，正如最为“保守”的“传统派”乡建代表人物都曾经指出：“中国文化到清代的时候，表面上顶光华，顶整齐文密，而内里精神顶空虚，顶糟；外面成了一个僵壳（指礼教），里面已经腐烂。……所以西洋东西进来，一下子就慌了”（梁漱溟，2005：272-273）。既然这样，为什么他又要处处与西方为“敌”？那是因为其有着更为现实及操作层面上的反驳：“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前期之所为，乃欲举数千年土生土长之‘礼’而弃之，凭空采摘异方花果一西洋之‘法’以植于中国者，其事何可能邪？”（梁漱溟，2005：257）。

因此，梁漱溟从乡土社会和传统文化中寻找“另类”的元素与可能土壤。比如他认为礼俗是建立乡土社会秩序最有文化基础，同时又是最低成本，不造成“分化”与人与人紧张关系的一种传统资源。为避免误会，他反复声明：这里说的绝不是一般的封建礼教²¹⁸，因此才需要恢复其“僵化”之前的根本精神，并加以改造。这也是他为何不像一些“道学家”一样停留在纯粹的“道德教化”上，而是同时推动合作社建设、农业技术改良、乡村自卫武装等，因为只有系统成套的建设才能产生综合的效果，并为“新礼俗”的建立提供物质基础。

不仅“本土派”从传统中获取资源，即使被普遍归纳为“西方派”的晏阳初同样也在回归乡土中吸收运用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资源，这从他不断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一传统儒家“民本”思想便可窥见一斑。而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名师杜威的“洋博士”陶行知，同样也很大程度受明儒王阳明“知行

漱溟（2005：510）早在30年代就认为：应“先制造出工业的需要来，同时并且布置了合作的根底，则乡村工业自必勃然而兴。”这与建国初期国家完成工业化的“路径”有几分相似。当然，是否以牺牲农民为代价，却是梁毛观点的不同，这也是1953年他们那场著名争吵的起因。但今天看来，不能简单从道德高度与是非对错角度进行评判，因为毛当时还更为直接的面对以国家工业化实现现代国防以确保民族独立这一同样现实的脉络（更多分析参见本论文第一章关于“革命”与“改良”的相关讨论）。

218 比如梁漱溟（2005：385）指出：“不一定点头鞠躬算是礼。礼的根本、礼的重要、礼的大端是在制度，不过这个制度运用去行的时候，还是要靠礼貌之礼、礼节之礼”。

合一”的影响。两位实践者在乡土与传统寻找资源的过程中所受的具体影响与“遭遇”，将在本论文第三章中详细展开。

以上充满差异甚至对立的思想来源充分说明：无论历史还是当代，乡村建设的主体和思路本身就充满着复杂的张力，同时这些思想资源往往也正是其复杂的对话对象，它既有助于挑战我们在评价时某种看似清晰的“二元对立”倾向，也彰显出“双向运动”不同力量对乡村建设的复杂影响，还显示当时理论者和实践者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知识分子的独特位置²¹⁹，这些都是论文随后各章节不同案例中所折射出乡建实践内在困境与限定的深层次原因。

三、“另类”的难处²²⁰与现实：乡村建设的多重矛盾

费孝通（1948a: 316-321）曾经确凿和自信的提出这样一个总体性判断：“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而只有当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如此结构性差异配合着上述相互“冲突”的各种思想资源，让乡村建设的内部与外部一直存在着各种不同层次的矛盾。

正如梁漱溟本人的认识，无论自己思想中的“矛盾”，还是乡村建设的“难处”，其实都应先追溯其所面对之处境与问题本身的“不伦不类”——“这些矛盾，使中国陷于左右来回的双重矛盾中。……中国在这种矛盾中，伦理本位的

219 如卜正民（2005: 133）在分析资本主义与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书写中所指：“中国的史学家从西方资本主义的论述中引进了不适用的概念来书写自己的历史，此举既非西方殖民主义的单纯产物，也非中国人思想上无安全感的佐证；而是他们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知识分子之经验的结果。”

220 此处的“难处”源自梁漱溟的著名演讲《我们的两大难处》（2005），笔者认为该篇演讲某种程度上被广泛的“误读”，大多数人认为梁漱溟在此是“缴械”般的自我坦言“失败”。如果我们认真阅读字里行间，梁先生是用他的理论和分析来反驳简单的“失败论”——不能让农民很快的参与，因为乡建是个民间学术团体，不可能给予过多现成利益与承诺，开启民智自然缓慢；不能很快改变政权，因为梁先生本身对政权有不同的认识，其认为需挑战对政权固定不变的主流想象，需要的不是让自己变成另一个政权，而是要从乡土立场上接引、拉住和利用（详见笔者在本论文第一章“历史乡村建设批评”部分结合梁先生的观点对“革命与改良关系的重新讨论”）；至于乡村建设多年来不能整合形成一个强大力量，除了对“强大力量”本身的警惕外，梁先生认为恰恰因为他们眼睛看下，从脉络中看到乡土问题本身的复杂性，自然就散了，并且各地乡建都“非自一个中心扩大起来，而是先后由各地发动的；彼此见解互相接近，而不无出入”（梁漱溟，2005:591），至于乡建各派之间观点的差异，本章关于其资源与脉络的复杂性矛盾性的讨论即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理解。所以他在文中强调，这些不是“危机”，也不是“矛盾”，而是任何事物发展都会遇到的“难处”（梁漱溟，2005）。在成学炎 1985-87 年的三次访谈中（1991: 86-87），梁漱溟回答“两大难处”时说：“所说的‘乡村不动’是指我们所做的事与老社会不同，要改，但是农民不是都了解的，如劝妇女放足，不愿接受劝告。早婚、迷信、赌博、贩卖毒品等蔽风陋俗都要改，但农民接受很勉强，不受欢迎”。笔者认为，这些“难处”不能简单的反证乡建之失败，而是可以从中讨论乡建所要达至目标（如改变生活方式、重建乡村秩序等）在当时脉络下的诸多挑战性，但它体现了乡村建设作为“另类”实践的独特定位，进而也帮助我们理解乡建的深层困境。

社会便崩溃了，而如西洋一样的个人本位或社会本位的社会也未建立。在这东不成、西不就的状态中，处处是矛盾，找不到准辙，没有法子相安”（梁漱溟，2005：206-208）。

而作为经由“正向运动”出发并受制于其复杂多元的想象与资源限定之“另类”实践，乡村建设团体内部自然存在着诸多不同的声音：比如，许多受西方教育的乡建同行对梁漱溟就有微词，虽然他们对其个人的品格和学识也公开表示敬慕，“但他们基本上把他看作一个并不十分了解当代世界的‘非科学的’的过时儒家。而他们自己则大多把乡村建设仅仅看成是一个以西方为标准的现代化纲领，它的唯一目的就是提高生产率和教育水平”（艾凯，1996：275）。

总体上说，既然乡村建设作为一种希望在激进“正向运动”脉络的影响和限定下尝试寻求非主流现代化、非资本主义、非西方发展模式的建设性方案，因此而存在和面对着不同层次的矛盾与“难处”，以下尝试分组进行讨论：

1、现代化与乡土社会的冲突矛盾

作为《乡土中国》所提命题的延伸，费孝通在《乡土重建》中指出：“都市兴起和乡村衰落在近百年来像是一件事的两面。进一步可以说，乡村和都市是相克的，都市克乡村，乡村则在供奉都市”（1948b：314-318）。这当然也是乡村建设所直接遭遇的重要困难，笔者将在本论文第五章详述，此处主要讨论其它一些易被忽略的“矛盾”上。

比如：由于追求并努力完成“现代治理”的行政体制与分散小农和传统社区自治存在着矛盾，结果出现政府“治理成本”²²¹大幅提高并因随之向“三农”转嫁而引发广泛的“干群冲突”²²²。这套照搬自西方的制度对城市或许适用，

221 需要特别说明，此处及本论文各章节都使用到“成本”这一概念，当代乡村建设推动者温铁军在很多不同的场合和文章中进行了广泛的使用，作为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概念，其主要意义是对当前主流经济学多谈“收益”少谈“成本”的现状进行挑战，同时指出“收益持有者”和“成本承受者”不对应的事实及背后的“利益/权力”关系。笔者在此延续这一用法，同时进一步提出——所谓“成本”多以“执政者/有权者”为考虑角度。在现实脉络下因其为“三农”所被动承担，故需反复指出。但笔者认为仍需对这种“自上而下”的角度保持必要的反思。具体到此处，所谓政府“治理成本”是相对于传统“皇权不下县”的乡村传统自治方式来说，自晚清新政以来各类政权通过或成功或失败的建立起向乡村渗透的“现代治理结构”，其收益包括重建国家与乡村的紧密关系（一方面，国家获取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各种资源；另一方面，乡村“更好”的纳入现代化发展秩序，参与整个国家的发展）。其成本则包括更多“货币化”的治理费用，这也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负担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随后全国统一取消农业税，但当前这种乡村基层政权的结构没有进一步改变，所以仍然会产生正文所谈到的各种问题。

222 如当前广泛存在于中国各地农村地区的“群体性（反抗）事件”。接着前一注释及正文的讨论脉络，所谓政府“治理成本”是相对于传统“皇权不下县”的乡村传统自治而言，自晚清新政以来各类政权通过或成功或失败的建立起向乡村渗透的“现代治理结构”，其收益包括重建国家与乡村的紧密关系

但却不适应于分散的小农村社经济，除因支付不起较高的“制度成本”外，它还将导致农村基层公共负债，进而增加农民负担。这点在梁漱溟所处的时代就已被他敏锐的发现了：“非乡村自身生出一个力量来，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单靠外力（政府的力量）绝对不行……（因为）乡村是政府力量所不达的地方，因警察没有那么多”（梁漱溟，2005：397）。

70 多年后，2004-2006 年逐步取消农业税以迎来所谓“后税费时代”，虽然可能向乡村过分提取的“黑手”因上级政府明令禁止而被“砍断”，但那依然庞大的现代乡村治理结构（如：部门完整、结构臃肿的乡镇政府）仍将继续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作为“后税费时代”进一步“惠农”举措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本应取得更大的成效。但正如有调查所指：“在新农村建设资源分配中，大多数政府主导实际上已经沦为部门利益主导，它们追求的并不是公共利益最大化，普遍性的‘精英俘获’已经导致精英农户得益多，而多数小农被‘客体化’和边缘化。这既不利于‘农民主体’地位的实现，更可能因‘大农吃小农’而产生农村进一步分化等新问题；……还可能造成合作社发展的虚假繁荣局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重点与政策研究”课题组，2009）。

因此，即使政府已完成工业化并具有充足资源以反哺“三农”时，既无可奈何地受到条块分割与部门利益的限制，更受制于原有的“路径依赖”及以都市化为中心的“激进”现代化强势逻辑之影响。

2、现代化与乡村建设的矛盾

梁漱溟（1932：288）有个十分形象而深刻的比喻，他说“中国人民好比豆腐，官府力量强似铁钩。亦许握铁钩的人，好心好意来帮豆腐的忙；但是不帮忙还好点，一帮忙，豆腐必定要受伤”。因此，作为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社会自我保护”述求与定位的乡村建设，其与现代化也存在着不同方面的冲突：

（1）、以乡村建设为名、实为国家政权下移的现代政权建设与“乡土/社区”本位的民间乡建相冲突

突出例子是山西阎锡山的村政试验和国民党以“保甲制”²²³为主要特征的

（一方面，国家获取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各种资源；另一方面，乡村“更好”的纳入现代化发展秩序，参与现代社会的发展并获取可能的“机会”）。其成本则包括相对较多的“货币化”治理费用，这也是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农民负担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虽然随后全国统一取消农业税，但当前这种乡村基层政权的结构没有进一步得到改变，所以仍然会产生正文及本章前半部分所谈到的各种问题。

223 保甲制始于宋代王安石变法时期的一种军事制度，国民党统治时期对城乡居民采用保甲制作为基层政

农村政策。根据张鸣（2001：76-84）的分析，阎锡山这位唯一的民国“不倒翁”，从辛亥革命获得山西政权，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止，一直牢牢坐在“山西王”的位置，即使在中原大战失败后被迫下野，仍能遥控山西。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其“秘密”在于所谓“村政”——“阎锡山以政治上的军国主义，行政上的警察化和经济上农业国家资本主义的三位一体，迅速实现山西的富强……实际上，他一箭数雕，既把原来乡村存在的各种名目的独立和半独立的武装统统收在自己的名下，从根本上免除了乡村地方势力潜在的离心威胁，又建立起一套乡村准警察体系与预备兵部队，为日后扩军扩张做准备，同时，在这个偏远的小省，他迅速的从农村聚敛了巨大财富，用于主要是军工业的工业建设，……从这个意义上，阎的‘成功’体现在真正实现了从清末开始的国家政权下移，并以政权的力量完成了对个体农民的超常榨取，而对农村的控制更强化到了极致”（张鸣，2001：78-87）。

然而，梁漱溟却对这个名噪一时的省级“村治”试验评价以“盛名之下、其实难副”（1991：892）。艾凯（1996：244）更认为“1927年以后，山西的自治系统堕落成为一种以控制为主的官僚政治，它不过是把官僚政治下放到地方。这样，阎的计划因不为乡建运动所承认而名誉扫地”。

而对于国民党政权来说，名义上的乡村建设可以从早期的“地方自治”一直延续到后来的“实验县”（江宁、兰溪）。但这个以“乡村/地方自治”为名，实为“防共反共”的改革，“虽然对乡村的控制得到了一点加强，但农民的负担却因此而加重，既无任何促进乡村建设的作用，也达不到防止共产主义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张鸣，2001：108）。因此，随着共产主义“威胁”的日益加剧，他们很快“放弃了‘自治’这块带有西洋味的遮羞布，直接斥诸传统最赤裸和冷酷的资源，恢复并强化‘保甲制’。1934年，更将此制推广到全国，但又有碍于此制太过赤裸的违背孙总理关于地方自治的‘遗教’，蒋政府不得不以‘新生活运动’等做一些修饰”（张鸣，2001：112-118）。

如此自上而下的“铁钩帮豆腐”，不仅让那些民间推动的自下而上型乡建实践遭遇尴尬。更可能因为影响深远的“保甲制”之推行而客观上导致“乡建终

治制度。1932年，蒋介石在河南、湖北、安徽三省颁布《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规定以户为单位，十户编为一甲，设甲长；十甲编为一保，设保长。在保甲内，实行各户互相监视和互相告发的连坐法，以及各项强迫劳动和征抽壮丁的办法。1934年，国民党政府将保甲制在它的统治区内全面推行。详细可参见：<http://baike.baidu.com/view/3209553.htm>，2012年7月2日浏览。

结”²²⁴。

对于本论文所讨论的乡村建设，无论哪个派别，基本都希望乡村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潮流中能尽可能减少被剥夺，并以此为基础以发展当地农民力量，重新恢复日益式微的传统乡土社会之低成本治理与秩序²²⁵。而自上而下“保甲制”的全国强制推行却导致了国家对农民的剥夺因有了制度保障而“正常化”，这既强化“劣绅驱逐良绅”，更可能让那些因乡建工作而失去群众基础的“劣绅们”重新归来。

难怪，我们此处看到梁漱溟（2005：395）少有的愤怒：“我们要退出官办的乡村建设事业。如不退出来，则乡村建设事业将缺乏活力”。

（2）、乡建之“地方本位”与现代化所要求的“国家本位”发生冲突

“地方—国家”一般被理解为政治或军事上的对立，但同时其也包括经济与基本发展模式上的分野。另一位通过经济“在地化”而开展乡村建设的代表人物卢作孚在建国初年令人扼腕的自杀，则让我们充满遗憾的感受到其中的张力。

作为不满18岁就参加同盟会并因创办民国最大民营航运企业民生公司而被誉为“中国船王”的卢作孚，其所代表的产业资本通过乡村建设以支持农村社区的发展，创造性的实践出一种“化解过高的企业投资风险，同时减少政府和农民之间交易成本的新模式。既整体改造城市郊区农村，让农民能够随着其企业化进程逐步改善自己生活，最终实现产业资本与乡土社会的双赢”（温铁军，2005a）。

除让产业资本与“在地”乡村建设相结合这一基本方向外，卢作孚的具体做法更值得我们关注：他创造性的提出“和平红利”，即让产业资本及各项建设的收益留在当地，既不上缴，也不自谋私利，以成为帮助“地方”开展乡村建设的原始积累，如此累积方式颇似80年代一些能将利润和就业机会留给本社区

224 此处参考自温铁军的一个大胆判断，他认为与其说是日本1937年侵华的“铁蹄”中止了民国乡村建设，不如说随着1934年国民党“保甲制”的全国强制推行，乡村建设的空间已不复存在，真正乡村建设也正因这一外部环境的改变而走向尽头。历史乡村建设最严厉批评者陈序经（1943：120）的一个观察可以提供某种呼应：“就是没有七七事件的发生，乡村建设的工作是否能够维持下去，已成了一个问题。其实，据我个人的观察，乡村建设运动，在抗战以前的两三年，已有了日落西山的景象”。正如笔者在本论文结论中对“百年乡建”的讨论，其没有“真正”终结，而是以其它形式为表现而已。

225 在成学炎1985-87年的三次访谈中，梁漱溟回忆认为：“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宪政国家，不是宣布一个宪法、改个名，就能真成为宪政国家。宪政国家的基础应当是地方自治。而地方自治又应从乡村入手。乡村是基层、是基础。我离开城市去广东搞乡治，河南搞村治，山东搞乡村建设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转引自成学炎，1991:79）。

的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²²⁶，它不仅根本上挑战了那些让资源单向流往外部大城市的发展模式，并凭此自我“造血”，为乡村和社区的良性治理保障了基本条件。

但正是这样的一位卢作孚，却因焦虑和困惑中的挣扎于 1952 年 2 月 8 日在家中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该悲剧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²²⁷，笔者尝试从“地方-国家”角度提出一个可能的角度。

随着 49 年“开天辟地”的到来，横扫一切“旧势力”的国家力量空前强大，但随之到来的朝鲜战争残酷的改变了一定的新民主主义路线，将中国打入“苏联阵营”并以“一五”计划和过渡时期总路线为依据进行了战略调整²²⁸。而当如此自上而下的国家逻辑被套用到一个充分“社区化”的地方则引发冲突——此前还被国共两党和地方百姓普遍尊为“民族英雄”、“功臣”和“北碚开拓者”的卢作孚，因为国家的工业化和路线调整，迅速而突然的被一些他所热爱的乡亲和公司员工们指认为可能染指“剥削”的资本家，其苦心经营数十载的地方区域化发展也要在国家战略与国家利益面前不容置疑的“被牺牲”时，如此巨大落差，无疑给这位经历过风风雨雨并坚韧不拔的实业家以巨大打击²²⁹。

作为“地方-中央”冲突的另一个例子，同样也是一位乡村建设领袖。曾任冯玉祥秘书并在自己家乡豫西镇平开展乡村建设实验的彭禹庭开创了“自治、自卫、自富”为特征之地方主义，并因此而拒绝中央政府的控制，当蒋介石 1930 年掌握河南的权力后，拥有地方武装并以“剿匪”威震一方的他却在 1933 年被“土匪”暗杀了²³⁰。正如有分析所指，“在南京政府决心实行地方社会官府化，并要彻底清除‘地方自治’的所有残余时，象彭禹庭这样的事业是很难生存下去的”（费正清、费维恺，1994）。

226 详细可参考温铁军主持调研的山西长治霍家沟村股份合作制改革案例（温铁军，2009：333-338）。

227 关于卢作孚的悲剧因篇幅关系无法展开，详细可参考：赵晓玲，2010，《卢作孚之死》，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228 此处参考自温铁军（2009:156）的分析：“在参与对抗联合国军的朝鲜战争当即造成西方经济封锁的条件下，中国只能从苏联争取到为民族独立服务的军重工业启动资本。这种短期复制翻版建立的苏联模式的城市经济基础，对随之形成的苏式上层建筑的长期存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立足于城市大工业的各级政府，不利于与土地革命后形成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进行城市与国家建设所需资源的‘交易’。这种客观矛盾，使中国执政党放弃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发展战略，转向把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主导的国家工业化原始积累，由此，就形成了统购统销这种对农产品的垄断及农村劳动力集中使用的农业集体化”。

229 如清秋子（2010：298）所述：公股代表欧阳平在 1952 年 2 月 10 日整理出的卢作孚检讨记录稿，起首一句就是：“各位：我自问不是想当资本家来搞企业的。（饮泣少顷）……中国又有两次落泪，其中一次是‘泣不成声’”。根据刘重来（2007：42）的分析：“卢作孚之死，是因为种种压力、种种困惑、种种问题的积累，特别是突如其来的对他当众的恶毒攻击污蔑，使他在极度悲愤而无法承受下离世的”。

230 受篇幅限制并因此非本文重点而无法展开，详细可参考：徐有礼、郭晓平、孙子文、胡振拴（1999）：《30 年代宛西乡村建设模式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

笔者在此拒绝做出简单的价值判断，而希望指出类似冲突和“难处”充满着整部乡村建设史，不仅涉及到一般意义上的“中央-地方”关系，它同样涉及到“社区化/在地化”思路所面临的挑战，本论文第五章将讨论的农民互助合作组织案例中遭遇的各种内在困境将有所呼应。

(3)、“革命”话语与乡土社会及乡建的内在张力

如前所述，“革命”²³¹本身也是现代化和泛政治化所派生出来的一种话语和实践，其势必要将农民都建构成“革命化”的主体，然而“革命”却不能解决乡村中的所有问题，并且其深层目标正也是内嵌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之中。乡村建设针锋相对的提出可否暂时在某种程度上将乡村“独立”（受保护）于城市，以此尝试部分地恢复乡村“自主”。因此，“革命”无论与“乡土社会”自身，还是与试图体现“社会自我保护”的乡建实践，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内在冲突。当“革命”成为最大的现实与氛围时，乡村建设似乎永远都是不够“先进/彻底”、脱离“实际”和不可被整体采用的“落后”方案。

正如注释所说明，以上讨论针对的是主流意义上的“革命”，因为笔者对“革命”有着另外的理解，故不进一步展开讨论，而是在本论文第一章及结论中以不同的“革命”视野进行讨论。之所以上文还要简要概括，仅为补充说明乡村建设复杂的内部张力。

3、乡村建设与乡土社会的矛盾

因为乡村建设经由“正向运动”出发并携带其部分的资源与想象目标，虽然力求接近“本土/乡土”并自我“改造/转化”（详见本论文第三章分析），但其仍不断表现出与“非规范”乡土社会或“反应性”自我保护运动存在着不同的冲突（详见本论文第四章分析），以下仅就另一案例进行简述。

比如，费孝通通过指出乡土社会具有“熟人社会”和相对少流动性并对外来文字需求不大等特点，虽不点名，但实际针对的是乡村建设“科学派”代表人物晏阳初的基本理论与认识。费孝通巧妙的通过自己久居城市儿子在乡间的遭遇故事进而分析指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已开始抛离乡土社会，文字是现代化的工具。乡土社会的文盲，并非出于乡下人的“愚”，而是由于乡土社

231 此处“革命”特指主流视野下与“改良”或乡建对立的“革命”形式与想象，而非笔者所尝试重思的“不必然激进的革命”。

会的本质（费孝通，1999a：321-332）。费孝通当然不是在此将“乡土”本质化和定型化，而是提醒我们：“文字下乡”也可能成为另一种强势力量，而“博士下乡”等外加的“道德光环”更容易强化这样的权力等级关系与“对象化”效果，并因此而遮蔽乡土社会的独特性与差异性。

4、当代新限制：现代社会的整体性危机

比起历史上的乡村建设，虽然没有当年如此严肃的时代命题：“乡建救国”²³²，可当代乡建实践却面对全新的危机与挑战——发展本身的可持续与现代社会的整体性危机。在冷战结束但资本主义危机升级的当下，危机的深刻性与整体性已有国内外不同学者进行过分析²³³。笔者认为其还表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是各种危机（生态危机/能源危机/金融危机/环境危机等）之间的相互转化，进而导致警报失效并引起更大的“幻觉”²³⁴，二是当前主流应对和危机处理办法的“去脉络化”而未对其构成真正的挑战。这两个方面将在下文及随后各章中结合案例详细展开。

整体性危机不仅让我们看到近年来大面积发生并日益严重“百（千）年一遇”的自然灾害，它更伴随着农村生活方式的快速“非农化”而大大削解相对于城市来说低能耗之生活方式对危机所具有的缓冲作用²³⁵。同时，即将全面“对接”农村的“消费社会”与“成功人士”新意识形态更是无处不在²³⁶，以致贺雪峰（2008a）提出以“低消费、高福利”为必须的应对战略。

危机间相互转化则可表现为各利益主体在“两害相交取其轻”中不断“权

232 这从梁漱溟谈乡建的书名即可看出，《乡村建设理论》又名“中国民族之前途”；另一本乡建文集则名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2年，上海：中华书局）。

233 如联合国大会主席高级顾问弗朗索瓦·浩达教授所指：“世界当前的危机——能源问题、气候异常、食物短缺和金融困局等都并非偶然，都是当今世界体系逻辑的一部分”（转引自刘健芝，2009：12）；萨米尔·阿明（2011：295）也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结构性的，它不可能在全球化资本主义新的扩张过程中得到克服”；温铁军（2004d：52）在多年前就指出：“由于当今世界越来越缺少可供转化为资本的资源，一旦发展中国家没有新的资源可供资本化了，将会出现真正的重大的全球性危机，不是经济全球化的资本流动，而是世界法西斯主义复苏”；汪晖（2010：255、258）则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将导致‘九十年代的终结’，它将让新自由主义的绝对霸权地位出现动摇，更大意义是对一种新的政治、新的道路和新的方向的探寻，重新思考发展模式成为不可避免”。

234 在当下大众文化与消费社会里，比起2011年日本福岛核危机来说，人们更为广泛的通过《2012》、《阿凡达》这样的商业产品来消费着越来越常见的各种“灾难（警报）”，并由此认同此类商业化文化产品所建构的叙述结构与分析判断，这既让各种危机失去本应有的警示效果，更让我们陷入于更深的主流社会逻辑或“正向运动”的各种虚拟幻觉中。

235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社会蓝皮书》所指，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数千年来首次超过农业人口，达到50%以上

（http://bjrb.bjd.com.cn/html/2011-12/20/content_29184.htm）。

236 可参考王晓明（2000）、（2008）的相关分析。

衡”与“博弈”——前几年电视和公益广告还可以插播性的谈点环境保护、节约能源、电池回收之类，然而 2008 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却让我们再次全民动员，为过剩资本寻求有效的“避难所”：“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建材下乡”不约而同的在美丽外衣下对广阔的农村发起全面“进军”。但每一个同样都可以让我们毁灭的危机就这样如此合理的相互“转换”着，以“危机”解决“危机”似乎成了这个时代的真正绝望！而“三农”在事实上又再次成为危机与成本转嫁的首选对象（温铁军、刘海英，2009）。

因此，当代的乡村建设实践增加了很多诸如生态农业、生态建筑、市民农业、消费者教育之类的工作内容，同时将“可持续视角”和“生态敏感”渗透到每一项相关的工作中。笔者认为，在“双向运动”视野下，不应拘于悲观或失望，同时也要看到整体性危机之中所包括的各种新可能与新局面，详细内容及讨论参见本论文第四、五章相关案例。

四、小结

前文基于各种历史文献及相关研究成果，通过不同角度的“脉络化”以呈现乡村建设的复杂性，它配合着上一章文献回顾的讨论，为随后三章尝试跳出“好人好事”的类型化叙述作出进一步的铺垫。

“三农”叙述作为一种危机和裂隙性存在，展现了“百年激进”和“现代梦”在国际国内各种限制下的某种虚拟性。相应而起的中国乡村建设正是作为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在追求现代化（及其衍生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内在产物与对应物。其同步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一定意义上可看作与主流现代化有着不同程度张力及冲突的某种“另类”实践——正如本论文导论“核心概念”中所述，所涉复杂多样的资源和矛盾正体现着“正向运动”与“反向运动”不同层次上充分互动，同时也正是乡村建设之所以在现实和叙述层面都存在着较大困难的深层次原因。

具体说来：一方面，乡村建设所需要面对的是诸多直接或间接的“难处”，各个不同层次的矛盾混杂交错、相互转化。而当前我们所感知并观察到的这项社会行动，本身就已经是经过各种矛盾冲突与现实张力共同限定下的产物。故乡村建设不可以被简单的约化，而需不断的“再脉络化”。另一方面，如此复杂矛盾综合形成了乡村建设实践的“特殊环境”——梁漱溟意义上的“他毁”和

“自毁”并存，既是崩溃或瘫痪下的“废墟”，也是充满激进“正向运动”诱惑与影响的实践战场。

因此，乡村建设不应拘泥于具体对象或具体范围内的行动，它不仅直接面对“三农”，还应包括对背后所支撑之以“激进/现代梦”为表现的“单向运动”视野的彻底反思²³⁷。

本章作为一个初步的尝试，希望可以挑战“乡村建设—现代化”这一常见的二元对立假设。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建设将不等同于单纯的行动，它既是实践，更是论述。之所以是论述，因为它要对抗强大的主流叙述；但同时它又必须是实践，因为它要让“另类”叙述获得更为充分的现实条件。

237 根据长期参与中国当代乡村建设实践及国际社会运动的香港学者刘健芝（2008：217）的总结，“乡村建设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行动，还可以是一种不同的视角、立场和生活态度”。

他露在地面上的嘴学会了现代社会的口味和名词。口味是摩登的，名词是时髦的。可是从肩到脚却还埋在土里！

（费孝通，1946: 179）

我们的运动，不称农民运动，而称乡村运动；不称乡村教育，而称乡村建设。既可以表现乡村的整个性；又可以表现工作积极的建设性；更重要的是表现靠乡村自身的意思。

（梁漱溟，2005: 409）

第三章

“作新民”的乡土遭遇：以乡村建设中的平民教育为例²³⁸

导论和前两章都已对“双向运动”视野、核心概念、目标脉络等进行基本描述与宏观分析，笔者将从本章开始，尝试借助这样的视野以对乡村建设中的不同实践案例进行逐个讨论。

一、“双向运动”视野下的平民教育

历史乡村建设的平民教育实践得以展开、并从最初的“除文盲”向乡村建设转向²³⁹的出发点与基本动力，是传统文化中的“作新民”²⁴⁰；其蕴含着的从基础开始的变革想象则成为一种有效的动员。但晏阳初²⁴¹在第一次大战身处欧洲战场华工之中而受平民启发、与鼓舞后提出的“开脑矿”之不同于传统文化，乃在于民国初年的平民教育实践者虽带着“启蒙-开发”的信念，但却在丰富的底层实践及与“被启蒙者”的互动中完成对主流启蒙的反思与拒绝。其中，“作新民”不再局限于“主客体”清晰二分和口号上的呼吁，而包含告别说教与浪

238 必须指出的是，本章及随后各章节的当代案例无疑都是某种程度上的“事后解释”，但在笔者及诸乡建同仁开展实践的当时甚至类似反思之后，仍然极易陷入文中所反思批判的各种“盲点”中，即使有所反思，也不断受制于同时存在于内外部各种张力与以主流框架进行简单化处理的“路径诱惑”。

239 关于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关系，可参考（冒荣 1997: 168）。根据郑大华（2000: 70）的研究：“乡村教育运动大约形成于 1926 年前后，但就在乡村教育运动形成不久，尤其是 1927 年后，乡村教育便已开始向乡村建设的方向发展”。

240 出自《尚书·汤诰》，是一非常古老的观念（韦政通 1991: 257），在二十世纪初期的文化社会脉络下成为平民教育运动的基本“口号”、主张与出发点。

241 关于晏阳初、梁漱溟诸先生的生平与观点不是本论文重点，因篇幅关系，相关详细介绍请参阅：艾恺著，1996，王宗昱、冀建中译，《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江苏人民出版社；吴相湘著，2001，《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长沙：岳麓书社。

漫化想象而反身进行自我改造的可能性。

用理论化语言来说，前后互相呼应并持续至今的平民教育实践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于“双向运动”力量影响下，平民教育作为“反启蒙”的启蒙者，本质上也是一种起于“正向运动”、遭遇“反向运动”之后自我改进的“另类”实践。其尝试通过自我赋权提高底层民众在与正向运动主流的博弈中相对有利并能有所制衡的位置，促进反向的“自我保护运动”更加有效与积极。之所以是一种“另类”实践，还因其不同于激进“正向运动”对农民、乡土和生态等国情限制的排斥或遮蔽。因此，平民教育实践虽然同样也从“正向运动”出发并始终坚持清晰的目标与计划，但“作新民”的历史性脉络目标却在“乡土遭遇”²⁴²中转换为“乡村建设”的脉络目标，并在此过程中十分缓慢和认真地通过互动完成自我反思与自主调整。最后，其“另类”性还表现为其“反身”对“正向运动”脉络所进行的“改造”——如对“现代教育/知识/想象”及相关“意义系统”的批评与反思。

需要说明三点：其一，本文所讨论的是被后人归纳为“乡村建设派”的平民教育²⁴³，它虽不是唯一和最早，但却持续时间最长并与当代同名实践呼应，且有同时兼顾理论与实践与城市乡村之特点。如第一章文献回顾中所述，针对这场规模浩大、并涉及不少那个时代重要知识创新的社会运动，中国的思想理论界最常见的反映是人物赞扬与道德肯定，或静态和去脉络化的、依据片面表达及局部行为特征进行批评。两者得出的结论迥异，但都有将复杂历史“简单化”和具体脉络“抽象化”的危险——今人褒贬不一但却都自圆其说的论据，似乎揭示了那个年代那批人的诸多“矛盾”正需通过客观背景解析才能把握当时的复杂脉络，以进入实践本身的丰富空间。

其二，本章所用“遭遇”这样非学术词汇，希望可以较生动的把握其中“不期然但却真实发生”这一特征，因其不是个体的碰撞，而是整体上不同脉络的互动。例如，对于梁漱溟来说，那是短时间内急剧变化的年代——东西大交通

242 此处所“遭遇”的“乡土”只是个宽泛的说法，既包括中国这样原住民农业人口大国一般意义上的乡土性，还包括来自草根社会及实践中与激进“正向运动”所存在的各种差异及限制力量。

243 此外，同期从事平民教育实践的还包括：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1919—1925）和北京高师平民教育社（1919-1924），前者主要领导者为北京大学中思想活跃的知识分子如邓中夏、许德衍等，先后为城市平民、郊区平民和工人讲演约四百余次。详见：刘晓云，《五四时期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述论》，《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5月，第29卷第5期，更多原始资料参见张允侯等，1979，《五四时期的社团（二）》，北京：三联书店，第134-266页；后者由北京高师部分师生共同创立，深受杜威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详见：杨彩丹，2011年，“北京高师平民教育社述评”，《教育学报》第7卷，第1期，113-114。

所带来的东方“遭遇”西方，广大农村“遭遇”资本化和工业化扩张的城市，自成体系的农业文明“遭遇”枪炮和现代文明武装结合的工业化等。

其三，作为从事当代乡村建设与平民教育实践的当事人，笔者借助“双向运动”视野，在论证上直接引用晏阳初等人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下的原文，相对动态地、完整地让读者把握其中的复杂性与张力。但不管引用多少文献，本文仍不可能精准地把握历史脉络，因此，文中呼应了笔者本人及当代乡建同仁的反思、感受与案例，尝试让历史与当代互动起来。

下文论述与案例讨论，将解释这种“另类”实践如何与来自乡土和平民的“自我保护”脉络互动，同时也通过这种本土化的经验研究进一步思考波兰尼“双向运动”的复杂机制与视野所在。

二、“新民”作为语境

1919年5月，杜威在江苏省教育会做来华两年的首次演讲，题目即为“平民主义之教育”，但意味深长的是，该题实为 Democracy education 在当时脉络下的特殊翻译（川尻文彦 2009: 143）。可见平民教育本身的多义性²⁴⁴，并与当时的整体社会思潮存在十分紧密的关系。罗荣渠（2008：代序5）则认为：“新民运动就是人的‘新’化运动，是从‘中体西用’观向‘西化’观过渡的桥梁”。毛泽东等人最早建立的革命组织就取名叫“新民学会”，可见当时新民思想之深入青年。

由于1895年甲午海战的失败，促使严复开始对乡土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现代性思考，其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三民”学说（张丽军，2009: 2-3）。而在1902年发表的《新民说》中，梁启超（1902: 44-45）提出了“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政府，无新国家？”，这无疑对晏阳初将“新民”作为平民教育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有着重要启示，他在97岁的回忆（1987a: 491）中就表达了当时的“崇拜”心情，但也指出梁启超没有进一步具体化，而自己的毕生工作是对这个理论的实践与发展。通过对这一观念的崭新改造，让其不仅成为中国变革的重要资源，而且使占绝大多数的农民、苦力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体与基础（晏阳初 1929b: 171；邱建生 2005: 36）。

244 “五四”运动前后，“平民”一词成为无所不用的形容词。除平民教育外，还有“平民文学”、“平民工厂”、“平民银行”、甚至“平民洗衣局”等。在此情况下，平民教育曾是“五四”时期的时尚之一（顾昕 2006: 517；马宏 2000: 35）。

张灏（2000：52）进一步指出：“从‘新民’观念，到‘五四’时代的‘新青年’观念恰恰反映当时时代感里的个人自觉意识”。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从传统主流的“救国论”有了向“救民论”转化或发展的新空间，这个重大转变以致“新民”不仅成为那个“变革”年代的新语境，也是平民教育实践得以出发的基本动力与想象来源。

但也正是这种求“新”弃“旧”，因其对“新-旧”二分提供了合理化的指认，并为“正向运动”影响下“意义系统”的确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此处笔者先讨论那个时代的整体脉络与氛围。

1、让启蒙“落地”的时代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洋务运动以来的“器物说”到庚子事变的“制度说”，清末官方用了近半个世纪以不同形式学习并引进现成的“西方”，这样的“拿来主义”甚至延续到今天这一经过革命涅槃后的“制度决定论”，它逐步规定了我们与西方互动的基本方式，也因民族自尊与自救而产生了启蒙这一试图在文化层面上有所作为的时代主题。

虽然晚清以来各种变革思想不断，但丧权辱国与危机事实无疑强化以“国家”为救亡与复兴的对象单位，虽然《新民说》产生于1902年，但“救国”事实上压倒²⁴⁵“救民”，对大多数人来说，“新民”的丰富意涵被窄化为“新国家”的诸多实现手段之一。

但到“一战”和“五四”之后，与巴黎和会所引发的民族主义兴起相伴随，是“中国现代化照搬西方摹本的幻灭，变革者们愈来愈发现，自己长期所想象和倡导的富强计划多少显得迂阔和一厢情愿。事实证明，自西方舶来的个人主义价值也难以在农业中国动员起广大民众变革社会的热情与力量”（许纪霖，陈达凯 1995：352-353）。

正是这种内外刺激让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启蒙”²⁴⁶转向社会改造，希望行胜于言地进行更深层和基础性的变革。这也是罗岗（2009：

245 正如温铁军（2010：162）所指：“中国现代化起点是在本社会内部缺少现代化积累的情况下强行启动的，中国现代化路径关注的基点是所谓的‘民族—国家利益本位’，追求的是国际利益角逐中的实力排序，这种导向的现代化将民生问题与国家利益捆绑打包，形成了国家第一、民生第二的价值取向，振兴经济成为新民族主义的中心话语”。

246 对“启蒙”的深化与改造在那个时期的文学上则体现为一种对“文字式启蒙”的怀疑，详见被称为该时期鲁迅小说中的内在张力。

5) 在纪念“五四”九十周年时所指:“以往对‘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和讨论都集中在思想层面,但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开启了一个实践层面”。正是这种实践空间的打开,让“五四”次年回国的晏阳初(1928: 122)说道,“就我国的新文化运动来说,都是少数学者的笔墨运动,和多数平民真是风马牛不相及”。

即使这样,经由“五四”出发²⁴⁷的平民教育实践初期,其实践目标及自我定位依然是“启蒙运动”(宋恩荣 2008: 7; 顾昕 2006: 522),但却因为乡土和实践的改造而让启蒙进一步“落地”²⁴⁸,后文将有详述。

作为“落地生根”的遥远呼应,当代平民教育实践者邱建生²⁴⁹的观点值得比较:在指出当下教育因被各种超稳态利益“绑架”而异化为坚硬的“花岗岩”后,他形象的定位自己所长期从事的平民教育实践为——“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抡起铁锤?我们去爆破?或者,我们种上小花爬满花岗岩?我们必须独辟蹊径。如果我们在花岗岩的缝隙中植入一粒种子,一粒具有变革社会的远大理想的种子,我们集合这个社会善的力量,用心去培育这粒种子,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它将长成苍天大树,它强壮的根系将从根本上撼动这花岗岩石”²⁵⁰。

从这个意义上说,晚清产生了启蒙的基本概念、范式与对象——“新民”,而“五四”及随后大规模的平民教育则让提留在口号和理论阶段的启蒙在实践中“生根发芽”并出现变异。

247 正如钱理群在《中国大陆六代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运动的历史回顾》文中所指(2007: 210):其中第一代即始于“五四”时期,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是“人的觉醒与解放”,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妇女、儿童与农民的独立价值的发现与充分肯定。在这篇文章所归纳 20 世纪的六代“下乡”知识分子中,除文革时期作为知青的“第五代”是半自愿半被迫外,其它五批可以说都是“前仆后继”的奔赴农村,这正是本章讨论得以成立的事实基础,而讨论其中的原因与动力则是本论文的目的之一。

248 可参见钱理群(2007: 216)对抗战时期“第三代”下乡知识分子的描述:因为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并与工农相结合,在其与农民的关系上发生了微妙的移动:由“启蒙/被启蒙”逐渐转化为“受教育/教育”,“到民间去”的“启蒙”主题逐渐变成了“改造”主题。然而,作者紧接着指出其中的“美化农民”与“对农村的民粹主义倾向”之问题,以及其中所包含的“用农民的意识来改造知识分子以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与社会”的隐患。结合本论文导论及下文的分析,“遭遇”乡土或“反向运动”并不意味着成功或正确本身,乡村建设实践同样也可能因对“三农”的“浪漫化”或“本质化”处理而偏离方向。故其是个动态互动的复杂过程,不应简单化的进行认识与归纳。

249 邱建生是当代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创者之一,他从上世纪 90 年代立志以晏阳初为榜样,至今一直坚持以不同方式的平民教育为重点开展乡建,到目前为止已参与筹建了河北定州市翟城村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海南儋州市石屋村农村社区大学、福建厦门国仁工友之家、福建安溪县福前农场乡村建设中心、福建连城县培田村社区大学、福建莆田市汀塘村社区大学。

250 邱建生, 2010a, “平民教育和社区大学的理想”, 个人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165a30100a5n6.html, 2011 年 12 月 8 日查阅。

2、新式教育与现代知识分子的兴起

“新民”不仅催生了启蒙实践，还广泛影响着社会转型期的知识分子，其重要载体则是以“废科举、兴学堂”为标志的新式教育。平民教育实践者，无论晏阳初、陶行知还是梁漱溟都受到很大影响。正是新教育“启蒙”了后来的“启蒙者”，才使后来的平民教育实践中秉持创新精神的“启蒙者”们在不同层次上以“反启蒙”的方式与这些新式教育对话。

新式教育与作为群体的现代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需追溯至清末新政，特别是1905年的废除科举制割断了乡村士绅与官僚阶层制度上的纽带。许纪霖和陈达凯（1995：17、217-218）认为：“乡绅及其弟子要继续充当社会精英，只有进入城市接受新式教育，一旦接受了新知识和新观念就不愿再回农村，甚至在感情和观念上格格不入。同时，出洋留学也快速发展着。正是这两方面读书人求取功名获利的体制变化，造就了新一代远离乡土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既然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正途’被堵塞，同时传统文化既定价值目标所需的工具性连环已经破碎，政治系统与社会精英的传统联系已经割断，整个社会成就取向的根本改变及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社会结构的裂痕出现也就在所难免了”。

这不仅让知识分子的传统社会角色与功能发生“去乡土”变迁，更对知识的理解和定位发生着悄然的改变。在现代知识体系的新坐标中，“乡土”成为不科学的总载体，而以农民为主要组成的平民则因“缺”而待“补”。

晏阳初在晚年《九十自述》的回忆中（1987b：546），谈到安逸舒适的普林斯顿学习并未使自己“乐不思蜀”，相反，美国的富裕和民主更使他深惭中国的贫穷和落后。他怀疑自己在学校里所学有多少可实用于中国的改革，而要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与安乐社会则必须从基层做起，扫除文盲、普及教育。他认为这已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同感，故需要进一步的实践。因为：“中国人易犯的毛病，思想主张用文字写出来以后，有人读了赞赏一下就完事，文字就是工作，理想等于幻想”（晏阳初 1940：128）。晏阳初进一步指出：“学者想写平民百姓的艰辛和奋斗，诗人赞美中国农民生活纯朴，歌颂农村美丽，却丝毫不能解脱他们身上的沉重负担”（转引自赛珍珠，1945：599）。

可见，既需看到早期平民教育实践者在回归乡土前所受的现代教育影响，也要看到正是这种新教育所携带的“作新民”想象，鼓励他们走向更广阔的乡

土社会。

3、来自乡土与平民的影响

乡土中国“遭遇”现代化的过程，绝非如常见的被动化与单向化归纳，相反，其从来就存在着不同形式与表现的“自我保护”，正是它们在实践和思想层面上影响着“作新民”语境下成长并出发的现代知识分子。

虽然费孝通（1948c: 354）承认：“中国乡土社会中本来包含着赖以维持其健全性的习惯、制度、道德、人才，曾在过去百年中，不断受到一种被损蚀和冲洗的作用，结果留下了贫穷、疾病、压迫和痛苦”。但他仍提出如下有力的反思（费孝通，1948a: 316-327）：因为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只有“当其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才产生流弊”。文字作为现代化的工具，这些乡土社会的文盲并非简单由于乡下人本质上的“愚”，而是乡土社会遭遇现代社会后的某种差异表现。

从中我们可反思平民教育实践者们初期“文字下乡”所存在的主观性，也可理解那些常被“类型化”为“受害者、牺牲者”的乡土社会及以农民为主体的平民为何会对“外来者、启蒙者”产生“改造”效果。这种来自乡土及“对象”的“反向运动”可能表现为消极不配合²⁵¹，也可能表现为让启蒙者感动、震惊等充满启示性的情感力量。

晏阳初在其毕生的实践中不断重复类似的话：“我去法国，原是想教育华工，没想到他们竟教育了我。他们的智力和热诚，渐渐引导我发现一种新人”（1987b: 542）。今天的我们不应轻易将“发现”这样的词汇归纳为“他者化”这样的问题意识，因为其已经进一步融为他们的实践自觉与自我反思：“我们所以能十余年如一日，在乡间吃苦耐劳，就因为受了这些可爱可造农民的感动，否则我们也愿意享受都市很舒服的生活，老早就一丢光跑了”（晏阳初 1934: 298）；“‘到民间去’的口号，喊得何等响亮！究竟有几人到了民间去？去了又多久？做了什么事？到民间去休息休息，那倒是常见。到农村去把农村大骂一场，也大有其人。真正到民间去为农村谋一点建设，为农民谋一点福利，这样的人却太少

251 如晏阳初刚去定县推广基于城市经验的扫盲时，就有老乡和他说“您老的好心肠，解决不了我的饿肚皮”（郑大华，2000: 73），类似“消极不配合”让平教会在反思和改进中转向综合性的乡村建设，后来所归纳的“四大教育”、“三大方式”都不是一下子提出，而是在现实和失败中不断配合乡土脉络及农民需求所产生的创造。

了。……新的士大夫呢，从东西洋回来，斥农民为‘麻木不仁’。他们讲政治，讲教育，讲经济都不及于农村，瞧不起农民，抹杀了中国的基本问题，眼红着西洋的繁荣，高唱工业化，抛弃了现实”（晏阳初，1938：36）。

可见，虽然平民教育实践者也有“精英化”和因现代化追求而将乡土本质化与他者化的倾向与危险，但其与那些“新士大夫”仍然不可混为一谈。乡土脉络所映照出的问题与局限，不应算在个人头上，而应该回到他们所出发并深受影响的“正向运动”脉络。除警惕常见的“个人化”处理会遮蔽更大的结构性问题，之所以不应以“好人好事”来简单化他们的努力、危险与尴尬，还因作为实践者的他们几乎都在“双向运动”的“遭遇”和互动中保持着独特的自觉与敏感。

比如，由于在中国本土和乡土双重脉络下的摸爬滚打，晏阳初和陶行知都对当时全球知识界权威的美国教育家杜威的教育理论提出质疑。前者认为“其教育即生活在美国是正确的。但在非洲、亚洲，教育是何种生活？”（1978：447），而作为杜威弟子的陶行知则从晓庄师范的实践中指出“我从民国六年起便陪着‘教育即生活’这个现代教育思潮的中流到中国来。八年的经验告诉我‘此路不通’，整个教育需变个方向。”（夏军 1998：66）；陶行知又指出：“学校即社会，就好像把一只活泼的小鸟从天空捉来关在笼里一样。它要以一个小的学校去把社会上所有的一切东西都吸收进来，所以容易弄假。……要先做到‘社会即学校’，然后才能讲‘学校即社会’；要先做到‘生活即教育’，然后才能讲到‘教育即生活’。这正体现了生生不已的‘生活’”（转引自川尻文彦，2009：151）。

除来自乡土社会的影响、平民的启发、实践的证伪外，历史和当代的改造还可能包括各种限制：如生态环境、作为生活方式的农民文化等（本论文第四、五章中将进行一定的讨论）。

三、平民教育的多重面向

平民教育从诞生之日起即具高度实践性²⁵²。除上文所述语境，其还存在于“五四运动前后为适应当时民族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教育救国’”（张荣禄 1996：101-103）及“近百年来依附于国家工业化必须的产业资本并在当代服务

252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处及下文讨论中的“实践性”虽然包括对行动与现实变革的强调，但并不与研究 and 理论相分割。正如行动研究对“行动”所做的广义理解，此处的实践同时也包括相应的思想、论述与行动。

于全球化竞争与金融资本的主流教育界”（温铁军、邱建生 2010：30）这两大脉络。这更让平民教育在定位、特点等方面显得复杂。

1、现代教育与平民教育

许多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都对自己身处的现代教育进行过猛烈的抨击，归纳为“不洋不中”和“不城不乡”的怪物。但实践者在批判的同时也认为其是一个可以期待的领域，因其既是中西文化和城乡冲突的前沿，也是改变与创新的基础所在。因此在讨论平民教育之前，应简单的谈论现代教育并以此作出区分。

从小就读新式学堂的“最后儒家”梁漱溟（1992：224）绝决但不无深刻的指出：“数十年来与此乡村社会全不切合的西式学校教育，是专门诱致乡村人于都市，提高他的欲望而毁灭他的能力，（而）流为高等乞丐”；“旧日社会之教育，其病在无教育可说，是消极有所不足；（但）三十年来之新教育，则为个人生命上添病，是积极的中毒”（梁漱溟，1992：254）。

他还认为，除耳熟能详的内容差别外，现代教育与传统私塾教育的一个重要不同是，前者必须有后者所没有的单独校舍、西式教材、通晓现代知识的新式教师、不菲的学费等。这些本无可厚非，但如果要以上条件通通具备，只有城市和大的城镇才可能有。因此随着全国蜂拥的“兴学堂”成为热潮，乡村原有的旧式教育体系迅速瓦解，这让乡村教育和人才流向出现了方向性转变²⁵³——“所谓新教育便是西洋化的教育，并且是都市文明体系中的一种制度。无论从知识思想，（还是）生活习惯，所以乡村子弟受教育的那天，便是脱离乡村的那一天”（梁漱溟，2005：480）。

费孝通说的更彻底，这种现代教育是悬空而不切实际的，并且像“采矿”，侵蚀了乡土社会。“乡间把子弟送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费孝通，1948c：359）。陶行知则不无“后悔”的说道：“我以前也是把外国教育制度拉到中国来的东洋车夫之一，不过我现在觉到这是害国害民的事，是万万做不得的。……新学办了三十年，依然换汤不换药，卖尽气力，不过把‘老八股’变

253 除下文不同乡建实践者和社会学家个人的论述外，正如王先明在《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1901-1945）》（2009：43、44、57）中结合各种历史数据所论证：“新学教育作为一支加速乡村士绅离乡的强效催化剂，使整个中国的教育布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乡村学校仅占全国学校总数的10%，即使是服务于乡村社会的农业学校也有将近80%设在城区。同时，受其影响所加剧的单向性士绅离乡流动，则从长远意义上影响和制约着乡村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的重构和运作”。

成‘洋八股’罢了。‘老八股’与民众生活无关，‘洋八股’依然与民众生活无关”（1927：208；1928：237）。

被学界归为“西化/现代”派的晏阳初（1934：299）同样认真的反思道：“工商业发达的国家的都市人的教育，如何能适合犹滞在农业时代的中国社会需要？我们初到乡间，看见农民失学，慨叹中国教育不普及，后来在乡间久住，才知道幸而今日中国的教育不普及，否则真非亡国不可。这并非愤激之谈，因为农村青年，未入学校之前，尚能帮助他的父母，拾柴捡粪，看牛耕田，不失为一个生产者，可是一旦入了学校，受了一些都市文明的教育，他简直变成一个在乡村不安，到城市无能，不文不武的无业游民”。

这些不同学科背景的知识分子，之所以都对自己深受其惠的现代教育给予了如此猛烈的抨击，如简单归因现代教育“脱离生活”则明显不公，现代教育同样强调实践与创新，实用主义更是指导思想，关键在于配合“什么样的生活”。除“成本高、乡村没有那么多合格教师”这些技术性原因外，现代教育因服务并受制于“（大）工业化”、“都市化”与“资本化”而在根本方向上偏离乡土脉络才是关键所在。这种以“现代化=非农化”为主导的教育，让乡村教育成为不为乡村和生活服务，因此，他们一致提出需要“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²⁵⁴。

这种改造对于陶行知来说是“生活教育”（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²⁵⁵。对于晏阳初来说是实验的改造民族生活的教育：“中国式的古董教育，与民族生活不相干，只能造成三家村的乡学究；西洋式的舶来教育，与民族生活不相应，只能造成外国货的消费人。只有实验的改造民族生活的教育，才能造成国家中兴发强刚毅有作为有创造的民族”（1934：297）。

为配合主题，此处将这些自觉与城市化的现代教育做出区分与改造的创新性思想及实践扩展为乡村建设中的广义“平民教育”。它应如杨东平（2008：8-10）所强调：倡导“平民化的教育”，主要“面向农村、难民、贫民²⁵⁶、农民工及其子女等弱势群体，重新强调大多数人的价值，坚持教育平等、教育民主的价值，并以此开启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变革，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路径”。

254 此为陶行知著名短文的标题，详见：<http://www.taoxingzhi.org/show.asp?id=154>，浏览日期2012年2月。

255 详细可参考陶行知及生活教育理论的相关介绍：<http://baike.baidu.com/view/46132.htm>，2012年6月5日浏览。

256 虽包括以贫民为对象，但平民教育不是贫民教育，因为后者是附带的、慈善性质的、零碎的（晏阳初1927a：110-111）。

此外，平民教育更强调在教育方向上的探讨：如何通过生活教育、乡土教育、乡土知识等手段让教育重新回到“本土、乡土、生活”的脉络中，并在这个目标下创造出平民化和低成本的教育方法，如：教学做合一、小先生制、导生制等。

2、教育平民与平民视角

就像乡村建设不同于建设乡村一样，平民教育也不等于教育平民。更重要的是从平民出发，让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互相影响，打破对立分割的假设与界限，从而挑战现代教育的权利关系与利益结构，进而区别于全球资本化影响下，把人类和自然资源都演变为资本剥夺标准化要素的主流现代教育。

在这方面，巴西教育家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在拉丁美洲数十年的“扫盲”实践可与中国经验进行跨文化的呼应。他认为“文盲”不仅是读写能力不足的问题，而是人与世界关系的缺乏。具体表现为，他们会自认为没有力量，必须透过有权力的“读书人”才能了解这个世界，他们的世界是被界定出来的，因此自然经常处于一种消极无力的感受中。因此，“识字”不仅要让文盲具有读写能力，更重要的是帮助建立自信、认识世界并与世界展开对话（吴建兴 2006：78）。

回到中国历史上大范围的“除文盲”脉络，有研究认为，晏阳初最为大家所熟悉的是指出农民的“愚、穷、弱、私”，这从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典型“问题为本”的缺乏视角，总是关注不足和缺陷，进而的对应策略就是如何解决他们的不足，这种视角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运动一直持续至今（张和清，杨锡聪，古学斌 2008：176-177）。六十多年前费孝通（1948b：505）也进行过质疑，认为这种“传教精神”假定了自己的“是”以“教育”别人的“不是”。在他看来，教育并不是以“有”给“无”，更不是以“正”克“邪”，而是建立一个能发展个性的环境。

类似批评十分必要，但若抽离开具体脉络或静态地以特定语境下的说法为全部，仍然有简单化和标签化的危险。虽然“愚、穷、弱、私”被批评为对农民的偏见，但结合晏阳初的主要言行来看，他做如此归纳难免有当年在危机与特殊历史脉络下寻找并命名各种“救国方案”的时代烙印，仍需区别于一般主流知识分子对农民及草根阶层的轻蔑与不信任。

实际上，晏阳初的思想和认识也是在不断的变化中，作为一个行动力特别强的实践者，他在“深入”民间、接近乡土、农民和现实的脉络及各种互动反馈中深受影响。他（1965：401-402）对农民的批评从来也包含着自我反思：“我们有两个发现是真正的革命。其一是学会了评价农民。多少个世纪以来，我国的农民从未受过教育，这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我们发现农民所缺少的不是头脑，而是机会。于是我们发现了所谓‘苦力’的巨大力量。另外一个发现同样令人吃惊，那就是认识到我们自己——知识分子的无知，并且受到了我们自己农民的教育。……这个运动的目的无非是改革知识分子自我陶醉、自高自大的心理状态及知识分子的无知”。

可以说，在教育平民的实践及与平民的不断互动中，实践者们不断尝试以“平民”来挑战“知识分子-民众”、“教育者-被教育者”、“外来者-村民”等类似的二元分割。在更大的语境与脉络影响下，表面分割的群体已不再可能真正独立的具备“本质化”的纯粹特征，两者都同样需要改变，以此发展出一种“平民视角”，将自己作为平民的一员融入他们，去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立体感受他们的巨大潜力、善良淳朴却又随处可见的局限与无奈²⁵⁷。

带着这样的视角，我们才能正确理解历史及当代的平民教育实践在对象和做法上的差异与呼应，比如，民国的平民教育为寻找当时的民众脉络，从长沙、烟台这样的大城市全面转向农村，正如晏阳初（1935b：391）所言：“假如大多数的民众在都市，我们便无庸到农村。他们——大多数民众在哪里，我们就应跟到哪里。”而这也正是当代平民教育实践自2005年起从农村又重新返回城市的原因，因为“农村中的骨干力量基本上都进了城，他们分布在城市的建筑工地、服务行业及工厂流水线上”²⁵⁸。

在做法上，当代平民教育则参照国际经验，借鉴并创新“社区大学”的做法，通过这种新载体整合本地区的知识资源，以较低的成本满足村民和城市农民工的学习需求。它利用现有的中小学资源，于夜间及假日上课，既符合成人学习的时间，又有效扩大现有教学资源 and 公共设备的使用率。聘请退休教师、专业人才、民间学者及大学毕业生来当社区大学的兼职教师，从学习时间和费

257 这种平民视角可参考作家莫言的一个说法：不要“为老百姓而写作”，而要“作为老百姓而写作”。详见：莫言，2001，《莫言：“作为老百姓写作”》http://www.gmw.cn/content/2004-09/01/content_91128.htm，2012年6月8日浏览。

258 邱建生，“使无力者有力，有力者有爱——厦门国仁工友社区教育促进项目介绍”，个人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165a301009bd3.html，2011年12月9日浏览。

用上都较好的满足农村社区成人学习的需求²⁵⁹。

从教育平民到平民视角，化解来自外部的、自上而下的，精英式的各种障碍性力量，让受教育的平民共同参与建立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教育，并成为改变现实的主体²⁶⁰性力量。在与乡村建设结合的过程中，“教育者”的知识脉络与原有的“意义系统”也因受到挑战而改变，开创出新的另类运动空间。

3、教育多功能性——与乡村治理结合的“乡学村学”²⁶¹

在“定县试验”²⁶²中期，晏阳初（1933：246）已经认识到：“仅教农民认识文字取得求知工具而不能使他们有用这套工具的机会，对于农民是没有直接效用的。所以从那时起，我们进一步觉悟，在乡村办教育若不去干建设工作，是没有用的。换句话说，在农村办教育，固然重要，可是破产的农村，非同时谋整个建设不可。不谋建设的教育会落空，是无补于目前中国农村社会”。

既然本文讨论的是广义乡村建设中的“平民教育”，则应包括以教育为手段和载体，实现包括乡村组织、乡村治理等功能在内的“大教育”²⁶³。于此，梁漱溟在山东的乡学村学实践无疑是个启示性的案例。

对于梁漱溟来说，乡村建设与平民教育必然合流，因为乡建其实是以教育改造社会。其不仅为了在农民中普及文化知识，也不只实现农村的现代化，而是以这种传统的方式来形成一套“新礼俗”并进而改造整个中国社会。之所以用乡建这种中国特有的方式，一方面其需要像其他的民族自救者那样使中国文化吸纳很多西方的东西，特别是团体精神方面；另一方面其又要避免之前民族自救者越搞越糟的惨痛教训（吴飞 2009）。

这种以“乡学村学”为形式和表现的“新礼俗”将教育与建设新秩序结合起来，有别于高成本的现代治理。既充分调动原有的村社理性，将村社中的各种冲突矛盾进行内部化处理，又可以此为载体培养具备新习惯和新氛围的进步

259 详见邱建生，2010b，“新农村建设中的平民教育实践案例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推广硕士论文。

260 在文化研究的理解里，“主体并不是独立自持的，而是由文化建构的”（罗钢 刘象愚，2000:12）。

261 详见梁漱溟，2005，“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2版），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第276-394页。

262 需要说明的是：历史与当代乡村建设实践所强调的“试验”方法，除受资源限制及减低风险的考虑外，更是承认乡土社会相对于现代社会的特殊性及不同时空条件的脉络差异。而不是在城市导向及以城市为中心的格局下，由中心制定政策然后层层传达，由此无法更好的体现乡土社会的独特性及每个地方的差异特点。自然，当乡村建设由“试验”走向“推广”时，其同样可能遇到这个困境，故乡建的“脉络化”及其与乡土的互动是长期和动态的。

263 这点也在宋恩荣对晚年晏阳初的访谈中得到验证，1988年4月，已届98岁的晏阳初特别申明“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概念，不足以概括我的思想与事业”（宋恩荣 1995：76）。

组织，重建能应对现代化挑战的新乡土生活方式。因在其憧憬的理想社会中，政治、教育（教化）是合一而不相离（梁漱溟 1992：689、692）。故“乡学村学”既是学校、又是组织；既是教育，又是自治；既重视普通农民，又重视乡村领袖。为避免误会，梁漱溟（2005：346）还专门指出“很有一些人只注意乡农学校为一个学校而忽略了它是一种组织，实是错误”。针对“乡学村学”的基本指导思想——改进后的《乡约》，梁漱溟（2005：350）则进行如下解释：“约就是会的意思，《乡约》就是乡民大会。约来干什么？做好事情，做改进乡村的事情，故乡约就是乡村改进会”。

如此“乡学村学”，首先挑战了主流单一的现代教育想象及背后以个人为“学习/成长/竞争”基本单位的假设；乡村学校通过与组织及治理的结合，让教育回归社区和本土。其次，这种新型组织将传统社会的家长式核心与现代社会的民众动员、政治参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艾凯 1996：216），既远离了西式民主治理的高成本，又有对抗官僚主义与科层形式主义治理的功能。

梁漱溟为这样一个很难让现代人理解的“组织”赋予了太多功能，几乎把几十年没有做好的工作与期待都放入其间。以致现实离目标相去甚远，他本人似乎早有思想准备：“乡建准备整个打算从头到尾皆以多数人为重，结果怕是受多数人之累！”（2005：550）。

但对于为何要把教育和组织结合起来，除利用教育的教化功能为组织所用外，梁漱溟（2005：422）的长远考虑不无道理：“不是说到了理想社会，生存和教育才有保障，而是乡村组织一开头就向此作去”。虽然当下的物质条件自然与梁漱溟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但仍然存在并日益严峻的乡村教育危机²⁶⁴。这种历史比对，要求我们对教育的方向及其与物质利益的关系进行根本性的反思。

略显复杂的与“乡学村学”结合的乡村治理经验讨论并非本文重点，仅以之为例，既说明真正立足乡土和实践的平民教育与现代教育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又指出在与乡土的结合互动中，教育本身所具备的多功能开放空间。

四、“遭遇”后的创新

作为来自实践的重要启示，弗莱雷在“受压迫者教育学”中强调了“对话”的重要性，那不仅是在“扫盲者”与“被扫盲者”之间，还包括学习者与抽象

264 详见：钱理群，刘铁芳编，2008，《乡土中国与乡村教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理论、人与行动的对话，即行动与反思之间永无止境的对话（吴建兴 2006：79）。

这种扣联起理论与实践、反思与创造的“对话”式互动，广泛存在于历史及当代的平民教育实践中。它不同于虽被称为“中国平民教育的源头与胚胎”但却因脱离社会脉络——没有与“乡土”和“国情”相结合而日益淡出²⁶⁵的北京高师平民教育社。晏阳初等人推动的同名运动恰与其在实践中分野，从城市转向农村，在与乡土脉络的不断“对话”互动中“重生”，逐渐完成了由识字运动（“正向运动”）受农民教育（“反向运动”）影响而发展为乡村建设（“另类”实践）的重大转变。

1、从“开脑矿”出发的平民教育实践

台湾学者韦政通（1991：255）认为，“创造转化”是晏阳初乡村改造思想中一个基本的特色。但这些创造是如何开始并完成的？

正如吴飞（2009：73）的观察，晏阳初并没有像梁漱溟那样作出复杂的文化分析，而是从自身经历和朴素印象出发——他自己在很多场合都讲过那件影响终身的“小事”：“一天，我收到一封非常感人的信，它是一位在法国学会看书的中国劳工寄来的，大意是：‘晏先生大人：自从您编的报纸出版后，我开始知道天下大事。但是，您的报纸很便宜，一生丁就能买一份。我怕你的钱赔完了会被迫停刊，因此，我把自己在法国劳动三年节省下来的 365 法郎随信附上。’这真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这些‘苦力’和‘底层阶级’向人们表明：他们是最认真、最有能力的学生，他们的能力和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望使人们摒弃了传统观念……而这一切，都是在任何一所中国或美国的大学里所了解不到的。从那时起，我就决定回国后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给平民教育事业”（晏阳初 1929b：163）。

有了明确的目标，晏阳初先在长沙、烟台等城市开展平民教育，但因中国最广大的平民在农村，故其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逐步迁至河北定县。但期间的乡土“遭遇”并不顺利²⁶⁶，晏阳初结合平教会十二年来的经验教训对各慕名来访并准备做农村工作的来宾坦言其中的曲折与错误：“希望（大家）不再

265 虽然该社创办最早并一度拥有很大的规模，到 1923 年就已有社职人员近 170 人，但至 1924 年 7 月却停止活动。后期社刊《平民教育》所涉及和讨论的问题则愈来愈狭窄，仅局限于学校教育改革，介绍欧美教育，主要是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和方法（杨彩丹 2011：113-114；桑东华 2004:73-74）。

266 如早期其将在城市的平民教育介绍至乡村，而没有配套其他乡村建设工作时，就受到“冷遇”。有村民和晏阳初直接说：“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郑大华，2000：73）。

上当”、“一错实不容再错了”、“我们知道自己不了解农村，才到乡间来求知道……我们欲‘化农民’，我们须先‘农民化’。可‘农民化’至不容易。必须先明了农民生活的一切。我们正努力在农村作学徒”（晏阳初 1932：221）。晚年晏阳初（1979：471）更直言长期伴随着自己的痛苦教训：“我们必须首先甘当和承认自己无知，放弃学术包袱和偏见，然后重新再学习。不少专家发现否定过去所学和再学习是很难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不再是自己知识的主人，而是自己知识的牺牲品”。

长期置身于宽广而厚重的乡土社会现实中，通过“农民化”与“化农民”的动态辩证，平民教育推动者们经由“开脑矿-作新民”出发的“开发-启蒙”思维及以现代社会为坐标的信条在实践中得到很大的修正²⁶⁷，同时由于“双向运动”的存在与角力，加上当时所流行的“实验主义”（experimentalism）²⁶⁸影响，这种调整在实践中则表现为从认识到方法上的创造。

早在费孝通正式对“文字下乡”提出批评²⁶⁹之前，实践中的晏阳初已认识到“文字”在乡土脉络中的局限性：“仅教农民读和写不可能为他们提供实际的帮助。乡村不像城市，不可能为识字的人提供许多机会去使用学过的字。在城市里，商店和家里挂着各种条幅、街道标志、账本等。乡村农民，几乎没有那种在公共场所认出刚学到的汉字而产生的激动心情。因此我们感到，除非能将这种知识教学与农民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否则不可能给他们以实际的帮助。因为在几个月后，他们可能将所学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晏阳初 1929a：143）。

初期下乡的文字只是自我赋权的工具，因其既为平民教育推动者所擅长，又对许多渴盼通过识字以摆脱生活中诸多不便并恢复自信²⁷⁰的村民存在着实际的吸引力。但通过这种手段，“文字下乡”很快转化为乡村本位的综合性“乡村建设”，因为实践者逐步认识到“乡村建设不是任何一面可以单独解决的，而是联锁进行的全面建设。社会与生活都是整个的、集体的、联系的、有机的，决

267 以晏阳初为例，他从早期“愚穷弱私”理论调整为后期“乡村改造十大信条”（晏阳初 1988）后者十分精炼并充满自我反省的总结了诸多有效的农村工作方法，至今仍被全球范围内的农村工作者所学习和借鉴。通过前后比较即可见乡土“遭遇”的影响之深，也正是如此，类似实践需放回当时脉络中进行细致的动态分析。

268 此观念受当时来华访问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的影响，认为观念必须在实验中锻炼，只有经过实验证明，在实践上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观念，才是有价值的观念。

269 如放回当时整体“向上走”和“城市化”的时代脉络下，“文字下乡”本身有独特意义，但更重要的是：哪种文字？怎么下乡？下乡为了什么（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所需的劳动力输出，还是为了乡村建设与平民生活的改善）？笔者认为，相关问题都需进一步的脉络化讨论。

270 在熊佛西基于定县实际生活而创造的民众戏剧中有诸多体现。

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支离破碎的解决问题”（晏阳初 1948：341）。

为了能够真正的“下乡”，直接面对乡土社会与农民的多样化需求，文字和知识都必须得到改造（该部分将在下文的当代案例中详细讨论）。此处简单提到其中的一种创造——农村戏剧教育。与纯文字不同，那是一种不自觉和不勉强理想教育方法，一方面可以打破文字障碍，使教育娱乐化以实现雅俗共赏；另一方面，那为戏剧迎来“新生命”，其内容是农民生活和农村问题，演戏的就是农民自己（晏阳初 1938：41）。

此外，在方法上实践者们也通过创造来直接回应“熟人社会”特点与国情限制，无论是陶行知的“小先生制”，还是晏阳初的“导生传习制”²⁷¹，一直以来都是针对如何将有限教育资源最大化的创新——人人可以成为老师、“大小孩教小小孩”，以改变被几千年传统所定型化的“师-生”想象及背后的权利关系。

陶行知创造的“小先生制”十分生动：“中国原是个穷国，所以教育也要采取‘穷办法’。我是顾到这点才展开小先生运动的。可是这小先生运动不是忽然想起来的。乃是民国十一年提倡‘平民教育’的时候，我那五十七岁的母亲有一个愿望，要学《平民千字课》。我和妹妹每天忙于推广这场运动，连给母亲教千字课的时间也没有，结果我就教才六岁的儿子小桃教他的祖母读千字课。这大胆的尝试居然成功，祖母和她的孙子一个月后竟然读完了第一册”（陶行知 1946：646-647）。

可见，虽然这种“遭遇”不一定发生在具体的乡土社会，但却都来自与乡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平民与实践，正是这种常被忽略的丰富经历，为深入其中的平民教育实践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造动力。

2、大学生支农队员们的“遭遇”与创造²⁷²

百年来的近现代史上，与乡村建设结合的平民教育，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

271 该制脱胎于陶行知的“小先生制”，目的是要以“最经济、最迅速、有计划、有组织、能持续、能自动推进的教育方法，来普及目前最急迫的男女老幼大众教育。其方法是：教的人，要教人习，教人用，教人传；习的人，习会了，要去用，要去传”（郑大华，2000：245）；这种“教学相长”方法，在“教他人的同时，也巩固了自己所学的知识，所以也不吃亏，而且还养成助己助人，为社会服务的精神，增加对社会的了解”（郑大华，2000：266-267）。

272 这点从大学生支农队的口号变化即可看到——因为乡土“遭遇”，最初的“下乡支农”逐步发展出“改变自我”这样新的定位与自觉。此部分更多案例可参见最新出版的《让梦想扎根：一群青年人的成长与对话笔记》（社区伙伴编著，2012，四川人民出版社），其中不仅包括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下属的大学生支农与“农村人才发展计划”项目，还有香港社区伙伴（PCD）在全国各地推动的青年实习生计划。通过许多参与实践青年人与相关领域师友对话这种形式，不仅在成长经历与心路历程上展现了许多宝贵而又丰富的一手材料，还生动多角度的折射出他们在“遭遇”中的各种体验与思考。

沃土上生命力很强的百草。

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并延续至今的、在社会背景上回应日益严峻的“三农”危机的当代乡村建设运动²⁷³，在具体行动上缘起于“大学生支农运动”²⁷⁴。这在当代与正向运动利益取向一致的高等教育中显得另类。从下乡支农调研、扶贫支教、建立信息站，到推动当代乡村建设运动，大学生在当代乡建的初期阶段相当于“酵母粉”，其作用主要对农民进行引导，激发其内在的自信与创造力。并根据农村的需要，把相关信息传播到农村，农民则因为对这些富有献身精神大学生的崇敬感而产生一种凝聚并导致合作的可能，通过这个参与过程既帮助农民解决精神贫困，同时也是拯救大学生自己精神贫困的好手段（刘相波 2005：43-48；方丹敏，王平 2004：20）。

率先“休学支农”的早期支农队员白亚丽和吕程平（2011）则在多年的实践后反思道：“这与五四时代欲用‘民主、科学’试图改变‘愚昧的农民’和‘黑暗的乡村’的情形有所不同，这一代人其实是在为自己寻找并建立价值观的过程中促进着农村的变革。因此，这或者可以称为一场‘双向精神扶贫’运动。……十年前，当‘到农村去’的口号将第一批支农队员聚集时，谁也不曾预料，这竟是一场以行动来探求时代精神和青年价值的（社会运动）”。

邱建生也是大学生支农队最早的组织者，通过支农队在定州翟城村过年的偶然机会²⁷⁵，扎根这个晏阳初等平教会同仁最初进行乡村建设的村庄。他和历史前辈一样充满发现的兴奋，但同样也在遭遇“乡土”后产生很大的变化：“想想两年前我抱着满脑子的理念和方法到翟城来，现在往回看，脑子里的这些东西实在过于理想和不切实际，所幸我能很快调整过来，把自己定位在向农村学习的位置，而不死抱着理念来做事。把理念踩在脚下迈步向前，而不是相反，把理念扛在肩上亦步亦趋……两年来我们处在发现问题的阶段，也就是农民化的

273 从广义上说，当代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实践也是互为融合与交叉，如当代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推动者邱建生就以平民教育为方法和突破口。以乡村建设为名的专门机构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则于 2011 年 10 月 10 日在江苏常州武进区成立嘉泽国仁社区大学（姬山书院），开展当代平民教育工作。

274 该运动无疑为更为广阔的乡村建设做了重要的出发点准备、人才储备、思路铺垫与基地建设，无论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河南兰考及福建乡村建设试验区及全国各乡建试验点都受其直接或间接影响。人才储备既包括支农活动在实践中锻炼成长了源源不断的大学生，支农活动的组织者也在实践和互动中积累了宝贵经验、思路与工作方法，大学生和志愿者的付出与创造则为乡建运动提供了重要力量。在此特别纪念在 2011 年 3 月 24 日因车祸而不幸逝世的支农运动创始人刘老石，在他的推动下，截至 2011 年底，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已经在全国各地建立新乡村建设试验基地 70 余个，与全国 200 多所高校的学生支农社团一道组织大学生参与支农调研和新农村建设行动，累计已达万余人次。详见：《半月谈》通讯，《成长的天空：大学生支农十年记》http://www.gov.cn/jrzq/2011-09/04/content_1939916.htm。刘老石相关文章及评价回忆参见：《老石文存》、《怀念老石》（2012，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编印）。

275 邱建生，《晏阳初乡建学院创办前后》，<http://www.meizaixinling.com/viewthread.php?tid=4296>。

阶段，我们成为农民中的一员，生活在他们中间，与他们一同工作，自然而然就能够发现一些问题，然后才能够谋求如何和农民一道去解决这些问题”（邱建生，2005：41）。

作为大学生支农队的早期成员之一，笔者也有幸因完整的参与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创办过程而“遭遇”乡土，下面我将以亲身经历的案例²⁷⁶来讨论这些创造性实践。

虽然作为农业大学的“三农”类社团负责人并已有较多的“下乡”经历，但当真正搬家至翟城并在村里生活时，我才发现自己：“还一直是‘走近’农村，而远远不到‘走进’农村。大学社团里滔滔不绝的‘三农’理论（或想象）在现实面前是如此的苍白、狭隘与‘花拳绣腿’；饱含热度而又错综复杂的现实让我们收起‘削足适履’式的验证，不管是什么理论什么原有经验，在这里都需通通放下……这也让我们这些工作者成为这个农民培训学校的第一批‘真正’学员。脚踩大地让我开始变的谦卑……”²⁷⁷。

这种态度上的改变让我们有机会在与村民及各地农民学员的互动中，开始反思乡土知识与现代知识体系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与农民们一起尝试以“改编”为特点的创造——对应着前文案例，它实际也可理解为在知识层面上“正向运动”目标遭遇“反向运动”影响后的一种创新与转化。

秦红增（2005：127-132）认为，乡村社会存在地方性和现代性两类知识体系。前者在文化系统中处于被动地位，而现代知识体系有着丰富的科学知识财富，对于它通过技术和组织手段来克服问题的能力深信不疑，但地方性知识由经验积累而成，在后者的强势背景下逐渐消失，地方差异性也愈来愈小。

我们刚到村里，就针对翟城村民举办了电脑培训，发现有学员将自己早前接受培训时的笔记进行整理，然后印给下一期的学员，因学员们的基本教育程度、思维习惯甚至语言都很相似，遇到的难点和可能的解决办法也接近，于是这份笔记比老师们从网络上找到的各种电脑培训教材都更受欢迎。

这给了我们很大的触动和启发。晏阳初当年（1938：38-39）总结农民不识字有三个原因：第一太忙，所以没有功夫读书；第二太穷，所以没有钱读书；

276 参考改编自拙文相关部分：“象牙塔与泥巴墙：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三年培训总结反思”，《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七十二期，2008年12月。

277 引自笔者对自己过去十年的总结反思，《乡村建设、别样选择与我》，2010，
<http://group.hudong.com/isl/doc/ddncDAFtRAnJRA3Bw.html>。2011年12月8日浏览。

第三太难，因为文字多，文体不通俗，读起来不容易，所以没有法子读书。于是，晏阳初和陶行知利用了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遗产——白话文，将文字和语言的“农民化”视作进一步工作的起点，编辑了发行量达 300 万册的《平民千字课》。

如果结合当代案例，知识或语言的“农民化”是否仅意味着一般意义上的简化（多一些图和例子，少一些文字）？但我们通过网络所找到类似《傻瓜学电脑》、《计算机入门 ABC》之类的通俗读物也能满足上述要求，为何不如那些手抄笔记？因后者配合了学习者的实际脉络（现有认识与文化基础、与年龄性别对应的接受心理等），并承认了经验积累的重要性与差异的存在。而已有培训教材则大多编辑自我们对农民无差异需求的假想中。更重要的是：所谓“培训/教学”背后的整套知识和语言体系及因分析归纳而努力追求的逻辑理性与农民学员们的生活逻辑及乡土知识体系存在着不小的冲突。

既然上述差异存在，有什么方式可应对？一首由学员在培训班上改编的歌曲促进了我们的进一步思考：

再也不能这样活

根据电视主题曲《再也不能这样活》改编

改编者：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湖北三岔培训班

东边有山，西边有河，学习培训，意义太多。

究竟是咱不行，还是环境恶，

究竟是命里注定就要苦苦过。

哟呵呵，

闭上眼睛就睡，张开嘴巴就喝，

迷迷瞪瞪上山，稀里糊涂过河。

再也不能这样活，再也不能那样过，

生活就要团结起来，大家一起来做。

生活就要有追求，生活就要去拼搏，

合作洪流不可阻挡，生活定会更加欢乐，更加欢乐！

对于许多观摩的记者、学者和大学生来说，这首歌无疑让他们产生很大的

震动，不仅因为即兴的改编与培训内容结合的恰到好处，充分证明了农民的智慧，更因这首歌原为电视主题曲，农民们耳熟能详而深受欢迎，后来各期培训班多选其为活跃气氛的班歌，并在回乡后教给更多人。类似改编十分广泛的存在于平民教育实践者与“乡土”的结合和碰撞中。在支农队员的记录里，类似的歌曲“成了（改编者）自己的创作，大伙唱得更响、更亮了”（游丽金 2004：15）。

可见，外来的现代知识如果没有与使用者的已有知识、表达需要及语言习惯进行结合，再简化的内容也无法在他们的生活中生根发芽。通过对原有“意义系统”进行挑战与“重置”的“改编”——既可能是平民教育的“对象们”融合进自己的理解、情感和想象而进行学习、吸收和转化的方式，也可能是他们挪主流资源为己用而对预设和既定权利关系进行的挑战。类似的创造性转化又都在培训协作者的配合和鼓励下发生，协作者也常因受其启发而“引导”出更多的“改编”。

当代实践的“改编”式创新，其实是在呼应历史上平民教育前辈对文字、戏剧、图画等资源的借用与发挥。比如：关于文字改编与图画资源的应用，青年晏阳初在法国华工队及正式赴定县之前即已在烟台、长沙、嘉兴等城市的平民教育运动中采用，这种新教学方法被命名为“群众教学法”，主要目的是方便在“教师少而学生多”的地方推行平民教育。除此外，这种幻灯教学还可引起学生兴趣，学生光看图即已受较大影响（吴相湘，2001：49）。到了定县的乡村建设阶段，晏阳初及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教会）的同仁除了在“《平民千字课》、《士兵千字课》及初高级平校课本，平民读物都绘制插图。又绘制历史图说、文艺挂图。农业、卫生、公民、国难教育、社会调查、合作社等都各有挂图。且在各村举行农村图画巡回展览会，并倡导运用挂图代替年画”（吴相湘，2001：189）。而关于文艺与戏剧的应用，平教会充分利用当地和乡土社会中广泛流传的传统文化资源，“改删过的鼓词和改编过的秧歌共已印行二十种，在提高语言程度，增加读书兴趣，启发新的思想上都收到相当的效果”（吴相湘，2001：188）。当时著名戏剧家熊佛西则于1932年辞去北京各大学的课务，迁居定县，创作适合乡土与农民接受的戏剧，同时借以研究大众戏剧的内容与形式。在此期间，熊佛西写下“锄头健儿”、“屠户”、“牛”、“喇叭”、“过渡”等剧本，皆在农村公演中获得很大成功。除剧本外，戏剧家们还创制了乡村露天圆形剧

场，以容纳几面观众，提高互动性并减少传统乡村戏剧中观众拥挤站立台下不利于观众安息享乐等做法。（吴相湘，2001：191-192）

这些创新与改造不仅重新活化并解放了这些日趋窄化但不可忽略的工具性手段，也启发我们重思知识如何在改进民众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对于当代乡建运动发起者而言，在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正向运动”造成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等所谓“生产力三要素”加快流出，形成经济基础领域中的“三农”问题和上层建筑领域的“三治”（县、乡、村三级治理）困境²⁷⁸；在这种不可逆转的主流压力下，虽然“下乡”理想本身也是一种“正向运动”力量，但乡建知识分子主动与草根和乡土“遭遇”所引发的各种组织发育与文化创新相结合，演变为“双向运动”互动中的“另类”实践。

综合以上案例，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代的平民教育实践，都是在与“乡土”的互动中有意无意的让启蒙这一“正向运动”受挫，而正是通过在不断失败中的反思与调整，才能接近“自我保护”的乡土脉络，进而主动地改变自己，自觉从“正向运动”所携带的精英立场与启蒙方法转化为与对立双向运动不同的另类乡村建设。

五、小结

通过结合历史与当代彼此呼应的平民教育实践，本章希望以“实践-研究者”的独特视角既让我们回到具体的实践脉络中，又希望“跳出平民教育看平民教育”，通过其与现代教育的区分及自身的多重面向，让我们对平民教育的特点进行更为立体的把握。

虽然乡村建设不同人物与团体对平民教育有着不甚统一的认识与实践，但“乡建派”所理解和推动的平民教育却有着如下基本共同点：首先，平民教育不是现代教育或传统教育的补充，也不是一般对象意义上对平民的教育，而是特别针对现代教育脱离乡土与生活脉络及现代教育普遍高成本这一现状所作出的挑战；其次，平民教育的目标不止于数量上的普及与内容上的丰富，更强调对教育方向与教育目标的根本反思；再次，平民教育还包括对教育空间的新开拓。如尝试教育与农业，教育与生活，教育与职业发展，教育与村庄治理等的

278 此为温铁军近年来的主要观点之一，详见：温铁军，2011，《“三治”问题与乡镇政府转型》，<http://www.snzg.com.cn/ReadNews.asp?NewsID=3836>，2012年6月11日浏览。

结合，除此以扩大受益范围外，也尝试对现存各种教育特权进行某种突破与探索；最后，无论历史还是当代的平民教育实践者，作为现代教育的经历者与受益者，都包括着较强的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其中不仅是对知识分子“另类”角色的自觉，更包含对现代知识与所建构意义系统的质疑与反省，以此获得对“平民”和“乡土”的立体性认识与方法思路上的创新。

笔者借助波兰尼“双向运动”的整体性视野，以平民教育实践为案例进行具体分析：假设平民教育实践作为一种特殊的“正向运动”，其带着“正向运动”的“启蒙-作新民”理想与目标出发，但却在实践中不期然的“遭遇”了来自“乡土”的各种形式与表现的“反向运动”。这让平民教育初期出现了诸多的不适应与挫折，实际上所折射的矛盾恰是“正向运动”与“自我保护运动”的差异与内在张力。但平民教育推动者没有在这种角力中自我简化为“双向运动”的任何一方，而是反复融合并理解来自“反向运动”的资源与立场，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反思调整出发时的“正向运动”目标及局限，通过复杂的互动与创造性实践，探索出一种以“乡村建设”为目标与脉络的“另类”实践。

因此，我们看平民教育，不应停留在作为口号与动员手段的“除文盲、作新民”和对“愚、穷、弱、私”的主流静态理解上。既需看到其背后以“正向运动”为想象与坐标的“意义系统”，还应理解参与者努力摆脱“正向运动”制约并谨慎配合本土脉络而做出自我反思及创造的必要与艰辛，它更给我们提供一个从根本上去反思当前教育危机的难得机会。

有人误会我反对物质文明，反对工业；我安有此意。我对物质生产增加和生产技术改进，原是看得很重要的。我所以看重它的意思，则在于非这样不能给我们挪出更大的闲空……唯有富力增进，可以用教育代替杀人打人等办法。到那时人命才值钱！唯有经济进步，才让我们的生活能更合理。

（梁漱溟，2005b：101、102）

就像一只猎狗，你只看到它在林子里疯跑，其实它是在追一只兔子。你只看到了狗，没看到它的猎物，所以你不理解它的行为。人们也不知道我们在追求什么。他们以为我们都疯了。他们没看到我们的猎物……。

（罗逸，2011：1）²⁷⁹

第四章 生态与生计：以乡村建设中的生态技术²⁸⁰为例

通过前几章的分析，让我们对乡村建设的复杂脉络与内在张力有了一定的认识，并明确乡村建设的基本实现路径：“回归”²⁸¹乡土，在此过程中实现与不同表现的“自我保护运动”相结合，进而对自己所出发的“正向运动”实现改造。

然而，“双向运动”从来都不会是静止的“等待式”存在，也不会机械对立的彼此独立和平行发展，而是在不断的互动中实现着彼此影响与竞争。对于乡村建设来说，“正向运动”的影响非仅停留于“出发”时才携带的“想象/愿景”层面，而是一种动态而又广泛的存在，故也不会一次性的接受“改造”。因此，无论是作为自我保护的“反向运动”，还是“另类实践”的乡村建设，都不可能拥有完整纯粹的独立空间。

本章与下一章依然采取宏观微观相结合的办法，从当代乡村建设另外三大领域（生态技术、农民组织、城乡互动）的具体案例入手，结合第一章所引入

279 罗逸为小毛驴市民农园 2011 年实习生，后转为农场工作人员，该段话来自 2011 年第 12 期《小毛驴市民农园 CSA 简报》的《卷首语：守住美好》。

280 此处具体指乡村建设实践与视野下的技术，以区别于主流对技术的泛指。当代乡村建设实践中的技术都很大程度上强调生态面向，历史乡建虽不直接面对今天的生态议题，但其所强调由民众掌握技术，技术与自然、社区及生活紧密结合，类似诉求与思考同样体现着可持续与有机性，也需要区别与一般意义上的技术。

281 此处不仅指地理或空间意义上的回归，更强调对“乡土”的重新认识与脉络化反思，以及与“乡土”动态的互动过程。

文化研究讨论中的“意义系统”，进一步探讨“双向运动”的复杂关系、运作机制与其视野下乡村建设的不同方面。

本章将讨论“双向运动”视野下乡村建设中的生态技术，该技术同时面对着“正向运动”的影响与“反向运动”的限定，通过让技术“脉络化”体现着生态、文化与经济的广义社会，进而体现乡村建设“人民生计”²⁸²与“生态面向”的两大特点，同时希望有利于深层次问题的提出与“另类”空间的呈现。

因此，本章虽然谈的是技术，但不是就事论事的在一般层面进行处理，而是尝试分析乡村建设内在的“双向运动”张力是如何通过生态与生计而存在并体现于技术之中，“双向运动”视野下生态技术又是怎样在实践中创新与展开的。

一、生态与生计²⁸³

日益“时尚化”的生态议题绝不是少数人制造出来的末日预言，它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普遍现实，也作为当代乡村建设相比历史实践所新增的内容与角度。对于国家来说，它意味着能源紧张、环境污染、物种急剧减少；对于农民来说，它意味着自己及后代是否有田可种（土地板结），是否有水可浇（水位下降并污染），是否还能种的起地（种子、农资、灌溉成本增加）等问题。而对于城市消费者来说，它意味着是否还有可能让自己和家人吃到真正健康的安全食品。

正如汪晖（2008）所指：“生态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态问题，而是整个发展模式的问题”。它与现代化依靠转嫁“成本”才得以实现的普遍逻辑与整体困境有着内在相关。因此，表面看是当代乡村建设新的工作内容与面向，但某种意义上却是现代逻辑下乡土社会承接代价与成本一以贯之的普遍形式。故应是乡村建设结合其它工作进行深入思考的重要角度。所以，乡村建设必须讨论生态与可持续议题，并将“谁的生态”及“可持续什么”一并纳入。

因已存在太多相关描述，本文不再重复进行对现代社会各种不可持续和日益加剧生态危机的某种“指控”，而是希望跳出仅从技术层面谈生态的惯性与盲

282 乡村建设关注和工作的对象，一直是社会基本组成的乡村社区与普通民众，故此处“人民/民众”不简单等同于“个人”，它将更多考虑社区与团体因素，强调在地化和民众参与。

283 当代乡村建设实践者在内部讨论中曾提出过“生计、生活、生态”这组相对于“三农”的“三生”概念，其也是尝试摆脱单一经济视角的努力。为讨论的更容易开展，此处的“生计”特别是“人民生计”，不仅包括经济层面上狭义的“生计”之意，也包括“生活”。

点，通过将其和生计²⁸⁴的结合及相关脉络的挖掘展开以探讨背后更为复杂的原因。

生态危机与可持续议题的出现，既是激进“正向运动”的某种结果，也是其“正向运动”再次挪用借助的题材与名义²⁸⁵——当下，生态产业不已经作为新经济增长点而成为现代社会整体性危机再次转移的新增空间？在“正向运动”逻辑运作与影响下，生态不断被抽离于国家战略与全球格局²⁸⁶的实际脉络，同时被割断其与文化、社会、经济的实际连接。因此，在正式开展分析前需要摆脱“正向运动”影响下两个常见的前提性假设：

首先，当我们开始反思现代农业对环境和生态造成破坏，并尝试以实践做出一定回应时。马上就会面对着类似的质疑：如果按照你们这样，全球会出现多少饥荒？刚刚打开的空间将马上被以“全人类”的道德高度及各种正义之名所包装的线性思维所迅速关闭。提问者其实心中早有答案，除了不可能耐心和认真的讨论下文所涉及的复杂脉络与各种可能性外，如此提问方式本身就是主流逻辑的充分体现——不可能有任何一种“别样选择”²⁸⁷。

其次，我们也需反思另一类主流——虽然承认存在着危机与问题，但这些都只是工业化过程的必要“代价”，而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也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阶段性”现象。类似说法，似乎如此“代价”只是初期的必要成本，一旦完成“原始积累”则无需再承担。然而从过去几十年的情况来看，全世界并不缺乏对环境和生态进行保护的科学技术，全球的资金也足以解决诸如水质大面积污染和大气工业污染这样的问题，但环境和生态危机仍进一步加剧。第三世界国家的现实历史及近百年的全球资源环境变化还告诉我们：如此“成本/代价”将也是个动态过程，短期内可能可以通过对其他国家地区的转嫁而得以暂时转移，但内在的生成机制使其绝不可被理解为“投资式”

284 此处的“生计”不应窄化为“财富/收入”单一物质层面，其英文词 *livelihood* 本身即包括“可持续生产、社区、生活”等立体脉络与丰富内涵。

285 一个有趣可供参照的分析，刘岩结合包括《星球大战》、《阿凡达》等科幻电影与主流灾难片指出（2011：177）：作为左翼抗议政治的“环保主义”已在资本主义的自我调适中逐渐被去政治化，对劫掠大自然的批判和对另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倡导，正被新能源—技术集团所借重，成为其塑造世界的合法化论述。

286 如工业革命及第三世界国家“追赶”现代化的全球与本土两大脉络，详见本章正文部分。

287 也即“*There is not Alternative*”（缩写为“TINA”）。作为受到学术关注的新词汇，它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兴起，广泛存在于上世纪 80 年代的主流政策和主流思想界，并成为普通民众的主导性思维与“后冷战”的某种时代氛围，并与其后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犬儒主义”存在着某种内在关联。

的一次性成本预付。因此，对“代价论”²⁸⁸的反思必须置于更大的脉络和视野下，不是静态的指出增长和发展是否存在代价，还应包括这种代价由谁承受²⁸⁹、代价如何转移、所造成长远后果是什么、在此过程存在着何种文化霸权或再生产机制等系列问题。

二、“正向运动”的限定与影响

如前所述，“双向运动”充满着内在张力。激进和去脉络的“正向运动”利用农民对技术的工具性需求，配合“科学主义”和“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与限定，将技术抽离于所存在的整体脉络与时代背景而定型为狭义的技术本身，并通过与现代教育及现代知识生产相结合而确立其论述层面的“中立”与“合理”形象。下文将结合笔者所参与的实际案例展开分析。

1、毛驴、牛及其它

2005年春天，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内部有一场非常激烈的争论，前后讨论半个多月，为是否要养一头毛驴。

支持者认为：牲畜曾经在乡村扮演着重要角色，农耕的历史其实也是畜耕的历史。由于石油农业与化学农业的到来，那些世代和农夫一起耕耘了几千年的牲口从土地里“解脱”了出来，农业也似乎获得前所未有的大丰收。但短短的几十年，各种蓄力牲畜（牛、毛驴、骡子等）迅速地从田野里消失，特别是在已经高度机械化的华北平原。与之相伴，在农村掌握驾驭牲畜技术的农夫也日益减少。既然乡建学院需要发展生态农业，畜力的使用与相关反思自然是很重要的方面，它既可为学院翻耕农地提供不依赖石油的持续动力，也不会有其它污染。又因乡建学院是公众教育平台，一头活驴可成为当前能源与生态危机下思考另类出路的好教材，也是探索实践“生态技术”与思考“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反对者认为：养驴是一种倒退，石油怎么会没有呢？农民都已经不养驴了，我们这些刚刚下乡的“秀才”²⁹⁰是不是太“浪漫”了？想开时代倒车？如果真

288 历史上各种罪恶和悲剧几乎都可以在“代价论”粉饰下获得其合理性：殖民主义也带去了科技的传播，侵略战争也促进了工业增长与就业增加，官僚集权体制也曾促进了 GNP 的提高……。

289 《南山纪要：我们为什么要谈环境—生态？》，<http://www.7139.com/lwzx/shxlw/hjbh/200607/55694.html>，2011 年 9 月 8 日浏览。

290 此说法引自某主流媒体批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专题节目《秀才下乡》。其中，在 21 世纪从生产角

的想演示毛驴在传统农耕中的角色与作用，拍成照片或录像即可。而且养驴成本很高，如此是否过于极端，把可持续理念僵化……，它也一定会遭受外界的普遍攻击，况且略有耳闻的村民已经在暗暗嘲笑我们“傻、落后，不求上进”了。

双方争持不下，更多村民得知后，意料之中地表示了非常强烈的不解与反对。最后，不得已之下由温铁军院长的妻子个人出钱认养，并对其拥有“教授”的命名权，才平息了这场风波²⁹¹。

从此以后，这头颇具争议的毛驴“教授”一方面勤勤恳恳地为清理校园搬砖拉瓦，在拖拉机进不去的地方翻耕土地，更显优势的实践着生态农业所倡导的多样化种植。另一方面，也继续成为一个饱受议论的“活教材”，很多在都市中呆腻了的参观者，或新奇或嘲讽的观看并评说着，连同那些召回毛驴的青年志愿者们。

2010年的又一个春天，我们把这头饱受争议的“毛驴教授”迎接到受其启发并以之为名而办起的小毛驴市民农园²⁹²。但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经告别畜力的北京郊区农场里，这头毛驴更加寂寞甚至生存艰难——既因周围很难找到同类伙伴，它的大小疾病更难获得应有的治疗。

有过较多接触的小毛驴市民农园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都对“毛驴教授”的困境与难处有所认识，而类似尴尬还发生在同样有着悠久农耕文明的邻国印度，从“圣牛”到“疯牛”的例子揭示了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的普遍宿命。

牛，在印度被认为是圣牛，是印度文化的象征，并且还有宗教的情感在里面。“印度牛不需要与人争夺食物，而且还提供有机肥，印度村庄所需能量的三分之二来自8000万头牛的牛粪燃料。然而，这个以对牛的全面利用为基础的可持续生态系统，却在效率和发展的名义下解体”（范达娜·席瓦，2006:75）。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包括肯德基在内的跨国公司在长期以素食为主要饮食习惯的印度进行了各种宣传²⁹³——肉食营养好，更容易让人聪明，虽然深

度尝试恢复蓄力则是这批“秀才们”脱离实际的一大力证。

291 详细讨论参见：黄志友，《毛驴的故事》，《足迹》，2008，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生态农业工作室编（内部刊物），第158-159页。

292 关于该农园的详细工作将在第五章中具体讨论。

293 这种宣传既具全球性，更是现代食物体系的普遍事实：“美国农业部3.33亿美元（2003年）的营养教育预算，与食物与饮料公司的“营养教育”（广告费）相比，少得可怜，它仅是百事和可口可乐两家公司（12亿美元）的27.8%，是八家食物集团（66亿美元）的5%。消费者被谁教育，被谁洗脑，一目了然”（周立，2010：45）。

受疯牛病冲击的欧洲已经大大减少了肉类的使用。于是印度人的饮食习惯也逐渐发生变化，增长的需求相应被创造出来，越来越多的资源和土地被用来种植饲料，越来越多的“圣牛”被送进了屠宰场，而原来提供“畜力、有机肥、燃料”等多功能的“圣牛”被简化为牛奶或牛肉生产工具。同时由于这些利用功能单一，以及由分散到规模化的养殖方式转变，也使牛的种类和相关就业机会明显减少。类似变化在范达娜·席瓦（2006: 94）看来：“正使隐喻着生态文明的印度‘圣牛’变成了隐喻着工业文明的‘疯牛’”。

毛驴和牛不仅作为物质性的存在，其作为自给自足传统农耕文明的一个缩影，同样还以特定的位置处于一整套“正向运动”参照下的“意义系统”中：慢（低效率）、麻烦²⁹⁴（日常需看护）、风险（生病或死亡）、低技术含量、不卫生、落后……。总之，不符合现代农业的产业化与规模化方向，但它们无疑都只是相对于工业文明与现代社会之坐标，如果转化为以农业文明或生态文明为坐标，很多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除“生产/生活/生态”不应割裂对待外，象征“落后”的毛驴和牛实际也是可持续和生态循环的象征，其带出了传统农业的重要原理——善于巧妙安排和利用不同生物的共生互养关系。而从物质再生产过程看，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主要使用人畜力、比较简陋的农具和农家肥，属内循环。后者大量使用机械、电力、化肥、农药，属外循环²⁹⁵。“正是这种外部投入，现代农业才可能大幅度提高产量和劳动生产率，但由此导致其自我稳定功能大大降低，在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都丧失了可持续能力”（鲁静芳、左停、苟天来，2008：17—19）。中国科学院石元春院士也因此指出（2006）：“现代农业更加开放，开始进入了一个更大的循环系统，但其带来的结果是：高投入、高产出、高成本和高资源环境代价”。

无论是中国的毛驴还是印度的“圣牛”，自然都不是孤立性的存在，它们背后是一整套的做法、文化与价值。当我们屏蔽了所有的这些，在承载它们的生活方式、社会基础与认识坐标不复存在的条件下，抽象意义上的毛驴和牛——

294 需重新思考这个本来即人为与相对的概念。

295 如文佳筠（2011：40）所述：“大规模单一化种植使得大部分食品需要长途运输才能到达终端市场。2001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中西部地区的食品，从农地到餐桌，平均经过1518英里（2429公里）的长途跋涉。同时随着产业链的加长，消费者支付的食品费用更多的用于运输费、包装费、人力费和销售产品所需的各种投入，农业生产者得到的比例不断降低，面临‘不扩产，就出局’的选择。依靠大型农业机械和化肥农药、长途运输，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得美国农业是世界上耗能最高的农业。每生产1卡路里的食品，就需要投入10卡路里的化石燃料。这种所谓的现代农业，其实是利用土地把化石能源转化成食品。”

—除食用价值外，就像动物园²⁹⁶里的其它动物一样，只具备有物种或某些怀旧价值，当再度被强行拉入我们的眼前，自然显示出浑身上下的不协调。

与拖拉机取代耕畜同时出现的，还有化肥、良种、农药、除草剂、大规模单一种植等，它们都被归类于一个很好听的变革——“绿色革命”。作为激进“正向运动”在“二战”之后²⁹⁷影响至今的重要实践，“绿色革命”其实并不绿，也没有真正解决粮食生产问题²⁹⁸，其高产的定义仅基于狭隘的效益观与严格的排他性。全面采用依赖石油的“绿色革命”不仅直接参与着全球气候的变化，它更以胜利者的姿态与优越感，深刻的摧毁着大部分农业人口相对“低碳”的传统生活方式，并实际联系着十分重要的经济利益与“冷战”政治脉络（J. 托德，1983：106；乐钢，2000：228-229；马格林，2001：280；徐国伟，2003：34-39；范达娜·席瓦，2006：9；阿图罗·埃斯科瓦尔，2011：184-185）。

正是在“丰收”的名义下，始终由发达国家操控着的“绿色革命”一方面在那些渴盼着与世界接轨的广大前殖民地或发展中国家所向披靡，并深刻的影响着这些国家的种植结构与耕种模式——“绿色革命”影响下使用农药化肥正成为当下农民理所当然的新常识。让农民重新相信不用农药化肥也可以种出东西，已经日益困难。另一方面，数十年来与“绿色革命”所衍生相关投入品和产出品加工、贸易、技术、宣传媒介等产业资本已经在这种生产方式之中形成了复杂的利益关系，不可避免地对其后的发展与制度变迁形成一定的路径依赖，各种利益集团及其代表都不大可能为生态文明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让出眼前利益（温铁军，董筱丹，石嫣，2010）。

所以，只有将毛驴和牛置于整体性脉络及“双向运动”相互角力并通过“意义系统”巩固实现的视野下，才能准确的加以理解。与其说是毛驴和牛们的尴尬，不如说是我们自己的实际处境，更是当代社会文化脉络下恢复传统农耕及尝试更为根本的去思考与乡建实践所面对的深层困境。

296 作为现代文明的标志之一，其让越来越多物种“动物园化”，通过所谓“保护”以不断巩固人类自我中心的幻象。

297 氮肥工业的兴起就是一个具体例子，其就是伴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弹药生产扩张而附带出现的（马格林，2001：280）。因为“氮肥的生产工艺与制造炸药相同，并且战争结束后的军工产业表现出巨大的氮肥生产能力。而农业应用化学与军工产业的联系就更为密切，许多除草剂和杀虫剂最初就是用于军事的脱叶剂与神经性毒剂”（约翰·贝拉米·福斯特，2006）。

298 恰恰相反，正如 E.F. 舒马赫在《小的是美好的》（1985：1）全书第一句话所提出的重要命题：“我们时代最重大的错误之一是相信‘生产问题’已经解决。”至于作者为何这么认为，全书有深入浅出的论证。

2、农民的选择？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农民的选择却不断减少。但越来越多人仍然坚持认为“绿色革命”与化学农业的“胜利”是农民自己的意愿和选择，正是他们“用脚投票”的结果。否则，当初毛驴之争中，为何是与毛驴最有感情的农民会成为最大的反对力量？

这种农民“自动”淘汰毛驴的说法无疑是“正向运动”巧妙抽离实际脉络并通过文化霸权以“自圆其说”的绝好例证。它首先遮蔽了中国上世纪50年代国家工业化这一重要的历史背景，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限制下，让小农放弃灵活的牲畜而自动选择农机无疑非常困难，但因朝鲜战争与“国防需要”，在接手苏联援助全套重工业生产线的特殊条件下，利用农业合作化自上而下进行农机化推广，本身就与统购统销及人民合作社体制一样，都是特殊时期的“国家战略需要”²⁹⁹。同时，人民公社这一特殊体制依靠组织的力量，也代为承担了新技术推广应用中的较大风险，改变了传统小农面对新技术时的谨慎与保守³⁰⁰，使得“许多新的农业技术通过人民公社的一次次会议引进了自然村落”（张乐天，2005：232）。

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举办的农业交流会上，全国各地的老农回忆了农药、化肥的推广过程：最初老百姓是排斥这些东西的，它们刺鼻的气味使农民觉得这些是对生命有害（后来事实证明正是如此），然而政府强行把这些东西“扔”到农民的土地上，因为只有这些代表着“进步”与农业“现代化”。在当前的新条件下，虽然很多农民也意识到农药化肥本身的问题，但农民依然选择它们，因为他们有着更精确的计算：如果减少化学投入，则不仅需花费更多时间和劳力，而且还需更多的现金成本³⁰¹，在当前更大外部环境参照坐标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实践有机农耕反而对农民来说意味着高风险³⁰²、低回报和低竞争力

299 详见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2009）中的相关分析。

300 正是这种独特脉络与强势体制才可能改变东亚小农的某种“风险厌恶”，因为“如果‘最高和最稳定’这对目标发生冲突，那么，处于生存边缘的农民通常要选择低风险的作物与技术”（詹姆斯·C.斯科特，2001：24）。

301 我们原来认为对农民来说转向有机耕作会是低成本的，但是农民培训中农户们自己做的经济分析却让我们看到：对于不少农民而言其实是高成本的，因为传统的家庭循环经济已经被破坏，很多家庭已不再养殖，所以大部分有机肥都要到外面购买，成本自然高昂。故乡建工作不仅探讨单一技术的研发与推广，更应着眼于中国小农式家庭循环经济重建，才可降低有机耕作“转型期”的成本。

302 当缺乏有效办法把分散的有机耕作者和新生的有机食品市场联系起来时，采用有机农耕对农民来说意味着要冒更大的风险。

这种整体的悖论性困境³⁰⁴，不仅存在于中国。在印度学者帕沙·查特吉（2007：196）看来：“过去三十年中，随着国家作用的深化，全球范围内后殖民国家中政府技术的不断传播意味着政府对于农业群体而言不再是一个外部的个体。负责教育、健康服务、食品、道路、水电、农业技术、紧急救援和其他各种福利服务的政府机构已经深入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是，它不是一般的渗透，其更结合着价值、观点等文化要素而表现出某种强势的霸权性（Hegemony）力量。正如研究者所指，石油农业的主导性力量体现在——“虽然全球范围内绝对意义上的机械化、石油化和化学化农业可能只有3%，但这种数量上的少数却可以成为全球范式，成为包括中国在内诸多后发国家模仿的对象³⁰⁵”（周立，2010：25）。因此，农业改革并不是出于农业自身的意愿，对于现代农业技术革命的需求，而更多是出自资本的需求，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现代农业的秘密就是用资本取代土地和劳动力”（吕新雨，2008：127）。

面对生产要素市场化、人才城市化和资本全球化的多重压力，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体前途不明（何慧丽、古学斌等，2009：5）。我们自然不应“归罪”于中国农民采取不适当的农业生产方式，而更需体认“两害相交取其轻”下农民的无奈³⁰⁶。况且这些选择显然不发生于孤立状态下，它们多重受制于“正向运动”主导与影响下的文化、社会与经济结构。

首先，在激进“正向运动”所倡导推动的全面都市化浪潮影响与参照下，农耕渐渐剥离了原来丰富存在的生活方式功能与意涵³⁰⁷，而窄化为纯粹的物质生产。在这样的脉络与背景下，农村经历着不同程度的分裂——它为我们提供基本的食物来源，但城市才能满足我们“欲望化”的需要；它可能是我们生产

303 如杨帅和温铁军（2008）所指：“随着近年来农民打工收入占比提高到绝对比重以上，原来因劳动力大量剩余而极度压低的农业劳动力价格，得以相对照于外出打工者的工资而显化，进而导致农业生产中劳动力投入的机会成本上升，以致越多使用劳动力的有机农业就越缺乏市场竞争优势”。

304 这种困境也可总结为：（产前）资本垄断/技术异化、（产中）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产后）食品安全危机。

305 如此才能理解，以美国为代表的大农场式石油农业何以用本国纳税人的钱去补贴其销往全球的农产品。如此“低成本”的在全球范围对传统自足与本土农业稳态结构的打破，为外部资本的介入与主导全面扫清障碍，无疑是非常合算的“投资”。

306 如有实践者在日常接触中听到了农民自己说出的困惑：“我祖祖辈辈靠耕种生存，靠耕种生活，为什么今天我就不懂得种田了？因为我再怎么种生活好像都没有得到改变，再怎么种都依然是很穷的”（何慧丽、古学斌等，2009：7）。

307 无论中国平民的“男耕女织”，或是中国读书人的“晴耕雨读”、“耕读传家”，还是民间广泛存在的秧歌、农耕节日等乡村文化生活，都表明农耕生产从来都与生活、娱乐、审美、传承、社区精神分不开。从这个意义上说，21世纪日本实践者塩见直纪所提出“半农半X”（2006）某方面的意涵一直存在于传统中国农耕社会中，但塩见直纪还赋予“半农半X”更多字面以外的当代意义，详细请参考原著。

的地方，但却不是我们期待着的生活乐土；它是将来不再年轻力壮者和竞争失败者们不得不回来的归宿，但城市才是他们年轻时的向往；它可能是我们的“童年”和“老年”³⁰⁸，但城市才是我们的“青年”。总之，曾经高度统一的生产和生活、生产和消费都不同程度地分离并分裂着。“身土不二”³⁰⁹似乎成为高速发展进程中不乏浪漫但却略显奢侈和无实际可能的生活状态³¹⁰。这些都不同程度的导致农民的整体性认同危机，由之引起他们对于自己传统技能和乡村文化信心上的丧失，对于乡村前途的迷惘与失落都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正如下一部分将要讨论的“生态厕所”和“生态建筑”案例，这些生态技术作为某种意义上的“技艺”，其存在于各种关系网络中，同时嵌入在广泛的社群、宗教与知识论的领域和语境中（马格林，2001：308；丹尼尔·A·科尔曼，2006：20-21）。但伴随着农业商业化的出现，激进“正向运动”通过对需求并配合于工业社会特定“意义系统”的强调与确认，使得技术知识及其较广阔的知识论语境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分割。由于失去了与社区和熟悉语境的整体性关联，农民所知变的越来越零碎，“农民的知识被吸纳到一个更强大、更理性化的话语里，受到关于新技术和新目标的资讯和规劝之框限”，同时被编入一张由狭义的技术性资讯所织成的天衣无缝大网，当中农民“已知的”、“不太清楚”和“不懂得”的界限越益模糊。“乡土社群自身的知识论结构因此而被视为落伍，这与分割了的技术和环境，以及社会和经济分层的知识刚好相符，它强化了乡村地区的不平等和支配性的结构”（阿柏杜雷，2001：209、215-216、234），中国本土的详细案例请见下文。

类似分析不是简单以“自我保护运动”为认同，或从哀悼传统知识流失的角度而对农村生活的某种浪漫情怀与价值评判。而是从“双向运动”的互动理解出发，指出该做法除危害农村的经济自主并侵蚀农民社会资本外，更重要的是“其对认知方式的复杂性与选择的削减，同时让源自乡土的整个知识存库被动的受到结构性改造”（阿柏杜雷，2001：228-231）。

在这种知识结构变迁的影响下，农业劳动者越来越无法依赖于经过长期积

308 中国城市和与之相应的现代社会保障体系，自然无法为这么多的人口提供养老保障。

309 日本和韩国这样与中国有着共同小农经济传统的邻国，都在与快速城市化浪潮相伴的社会运动中喊出这个意味深长的“口号”与原则，无疑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310 在如此情况下，如果用一种“外来”角度和浪漫化的说法去让“本土/乡土”人坚守“原生态”与“田园之美”，并进一步“审美化”而抽离生计与生态的角度，且不说单纯从“文化”角度出发去改变“文化”是否有效，这种由“自我”出发以想象“他者”的要求，难道不正是当前城乡分割与定型化偏见的文化土壤？而现实中城市与乡村、生产与生活的分离与割裂，几乎很少受到质疑。

累与实践检验的传统习惯和经验，而必须更为积极主动的参与“正向运动”所构建出来的现代农业逻辑与基本判断³¹¹，这成为了农民的唯一“选择”。

由此可见，借农民选择之名进一步边缘农民，并将复杂脉络简化和单一化，既造成身处现代化进程的农民们从“被代言”到“失语”这一基本现实，更使得经“正向运动”影响限制后“另类”实践空间的极度窄化。

三、技术作为空间

上述讨论让我们看到，无论是生态还是技术，都与社会、文化、经济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正向运动”的影响无处不在。但与此同时，这种乌托邦信条在实践中却一直面对着来自“反向运动”不同表现与形式的质疑与挑战，生态、生计和技术同样也成为社会进行“自我保护”与在重构“意义系统”中开展“另类”实践的有效空间，下文同样结合笔者参与的另一组实际案例进行分析。

1、什么生态？谁的技术³¹²？

晏阳初晚年总结认为：乡村工作第一要素是怎样认识科学与技术（1980：473-474），“需要将农业科学技术简单化、经济化、实际化，才能达到民众化，否则农民接受不了，用不上，一切都将成为空谈”（晏阳初，1988：560）。历史与当代的乡村建设实践都证明了科学技术的特殊作用，它作为与民众直接接触并关系紧密的“使者”与“先锋”，其在推动农民致富增收，改进生产方式方面最为直接；同时作为工具和手段，帮助农民获得改变自己生存状况的力量与信心方面也最为有效。因此，农民在乡村建设诸方面中自然表现出最为直接的热情³¹³。

在分析前，先说两个前后对照可称之为“喷灌与漫灌”的真实经历。作为

311 在2007年晏阳初乡建学院组织的农民生态农业专题培训中，我们与农民讨论“传统农耕”。对于我们来说，传统应该是“绿色革命”之前的耕作方式，而与会农民却多认为相对于生态农业，传统农业应使用农药化肥的耕作方式。这充满悖论的显示了：农药化肥在几十年使用过程中，已经替代数千年历史的传统农耕而渐渐成为农民的当下传统了。详见：郝冠辉，《2007年11月密云农业培训总结报告》，《足迹》，2008，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生态农业工作室编（内部刊物），第111-112页。另一颇具启示性的参照案例：当我们非常艰辛的寻找本地传统原生态品种时，发现河北定州翟城村及周边的农民都叫它们为“笨种子”。

312 我们也可以从E.F. 舒马赫的如下提醒（1985：95、107）受到启发：“需要最认真考虑的是科学研究的方向。我们不能把它完全交给科学家。……今天，政治的主要内容是经济，而经济的主要内容又是技术。如果政治不能交给专家们，那么经济与技术也不能交给他们”。

313 这点在晏阳初“定县试验”70多年后本地农民中依然表现明显，笔者在与当地村民交流过程中发现，农民对晏阳初及平教会给他们所带来变化最大的记忆仍然是技术方面。

大学支农社团负责人，十年前笔者带队到河北张家口某贫困县下乡调研与支农。该县缺水严重，根据农业大学老师们的教导和教材上的指示，当地应该发展节水农业，具体措施和办法可以为喷灌或滴灌。当时的自己深以为然，于是在一个月的支农与调研结束后，将之写入留给当地调研报告的建議部分。因为该建議来自农业大学学生，当地干部与群众从字里行间也貌似可行，于是向当地某国际扶贫机构申请了“喷灌式节水农业”项目并获得审批。然而一年后，另一批到当地调研的支农社团负责人却告诉我，这些设施买回来没多久就荒废了，因为该地风沙很大，喷灌眼很容易就被堵住了……。

这个由自己所一手造成的“劳民伤财”经历至今让我懊悔不已，但随后两三年，在河北定州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依然再次上演另一个“喷灌故事”，这次则由毕业于三所农业大学³¹⁴工作人员所共同“主演”。当地不像张家口地区一样风沙大而需担心喷口被堵，也是出于“节水”的目的，我们向基金会申请了这个项目，但仍然没过多久就被迫放弃。最主要原因是，该设施主要是配合规模化单一种植，但如果我们拒绝了农业工业化的思路，而从生态角度采取多样化种植，因为间作套作的存在，不同作物灌溉需求自然存在差异。无论是固定式还是移动式喷灌都显得非常不方便，远远没有传统漫灌来的灵活和高效。

这两个不同原因的“失败”让我们反思，看似中立纯粹技术所承载的复杂意涵。我们更应该推动的是什么生态？是否有脱离脉络（时间、空间、社会关系）的抽象生态？喷灌本身就生态吗³¹⁵？为何本应了解当地条件与目标的干部群众也会同样投入的参与到这场由外来教授、推广员与设施农业生产商所共同营造的“生态幻象”中？这种被全球各地农业高校视为共识的“先进”技术更符合了谁的利益与需求？除了我们几位，为何越来越多受过现代农业教育的农大毕业生当参与乡村建设与本土农业技术实践时都产生着类似的困惑³¹⁶？

一方面，受晚清以来延续至今的科学话语影响³¹⁷，特定历史脉络下的技术

314 当时参与此项目的同仁分别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河北农业大学，也即随后成立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生态农业工作室主要发起人及后来小毛驴市民农园的主要创办者。此也说明乡村建设在“正向运动”影响下的曲折经历。

315 它可能节约了一定的水，但却因材料制造而耗费了大量铝矿，更因从外地运输而耗费大量石油。

316 在2012年1月5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在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931会议室召开的《2011年度乡建工作总结会》上，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总经理严晓辉代表团队提出八点困惑，即包括此点，详见该会会议记录（内部档案）。

317 正如汪晖所述：“科学概念的广泛运用构成了20世纪中国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在晚清以降的中国思想氛围中，科学不仅是解放的象征与召唤，而且也作为各类社会文化事务提供客观根据。它不仅证明了新文化人物所期望的变革的必要性，而且也提供了这种变革的目标和模式，并成为一种替代性的公理

多存在于进步主义意识形态中，并内在于百年工业化的现实需求与时代焦虑下。因此，它很容易脱离社会经济文化脉络而被“幻化”为某种“独立性”存在。在“科学至上”激进思想影响下，很多技术要素稀缺的地方甚至某些技术都在资源资本化的发展主义进程中成为了排他性真理的化身，以及判断一切客观事实的唯一标准（中国人民大学重庆课题组，2011：7）。

而事实上，技术的出现与发展从来就紧密联系着技术之外的其它因素。费孝通在《乡土重建》（1999：386-387）里曾结合中国3世纪中叶关于水碓发明但却未必给普通小农与农业生产带来好处的历史教训指出：因为“水碓规模大，建造时需要资本；水道不属私家，利用水力需要权力；利益大，引游人，争得凶”等原因，这个重要发明一开始就被豪门巨室所专有，进而占用沟渠，甚至妨碍本来正常的灌溉，《晋书》曾经在王戎传中说这位豪门“水碓周遍天下”。这个案例³¹⁸生动的说明，技术改变不但影响工业的区位，而且会改变工业组织的结构与财富分配方式，新技术常会成为少数人的特有机会，并造下社会新的分化形态。

另一方面，对技术需要反思，但也不能因此而忽视农业和农民对技术强烈的现实需求，将传统“本质化”和“审美化”³¹⁹进而脱离脉络的成为“去技术/反技术”，以此放大现代“都市人”的另一种现实焦虑，它将同样受到来自生产者和底层实践的“反抗”。

所以，“脉络化”的讨论技术对于乡村建设来说是必要的，其引发的话题自然不仅停留于技术层面：它包括主流社会对技术的“定型化”想象与偏见，技术如何日益脱离经验世界而狭义化³²⁰？同时其又如何成为现代化经济与文化结构的有效组成部分？即便如此，其如何再次成为挑战“去脉络”论述并进行创新实践的有效资源与空间？这些都是以下案例所要讨论的。

世界观。”（2008：161）。

318 同样也是水车，晏阳初在实践中同样意识到这个问题（1989：170）：他说中国的水车一直需要两人操作，而且效率不高。“带发动机的水泵无疑要比原始的水车有效的多，但却不能引进它。理由很简单，因为中国农民不可能买得起这种机械（而且没有电力等能源）。因此，乡村建设者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推广应用一种比旧水车科学但却仍可不用电的轱辘，并且它只需一人操作”。

319 如当前普遍存在对乡村和传统以“生态”为名的某种“原生态”追求与想象，它部分反映了“逆城市化”过程中现代人的某种内在焦虑与“乡愁”情结，如果能与乡土和实践进行结合则有益处，否则也是另一种“去脉络化”与“乌托邦式想象”，而经常受到农民们类似于“饱汉不知饿汉饥”的反唇相讥。当然，这种回应也是在另一种主流话语与脉络中。

320 当前主流技术日益窄化为“高科技”，似乎这才是技术。常用词“技术含量”十分明显的暗示其技术的现代知识构成与“外来”特征。在此大趋势下，各地农民一般都不会认为掌握“二十四节气”可以算是农业的某种技术，但事实恰恰相反。

2、生态建筑的“力”与“困”

自 2004 年始,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一直在尝试大众的、从生产领域开始的、农民可以参与的生态实践,也可说是一种从源头开始的可持续生产与生活。正如前文几章都讨论到的,乡村建设不等同于建设乡村,自然更不可仅是乡村建筑³²¹,但建造“适用、舒适、生态”的乡村建筑却是乡村建设中的重要工作。因其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本身就是千百万农民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与终生追求。但当前的乡村建筑因大范围并盲目效仿城市而陷入误区——无论其取材上纷纷放弃本地天然环保建筑材料,还是外观上照搬城市早已过时的做法³²²而逐步丧失传统乡村民居的丰富美学思想。但目前却很少有理论与实践直接对这些广泛而又影响深远的问题进行着有力回应。

在台湾建筑师谢英俊³²³的推动下,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 2005 年成立了生态建筑工作室。所试验推广的乡村生态建筑正是基于农民广泛的基本需求与可持续发展这一基本原则。一方面,因地制宜的使用可回收再利用或农民可自己生产或就地取材³²⁴的建筑材料,如木、草、土,减少建筑垃圾及加工、运输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同时因这些材料(木、草等)使用之前都需生长,其过程本身就因吸收二氧化碳而对环境有利。另一方面,发挥这些天然建筑材料的优势,结合各地传统智慧与现代建筑科学,真正盖出居住舒适的房子,比如采用保温的草土墙体、高效节能炕等。在这一过程中,还将建筑知识平民化、使用简单工具与技术,以便于普通农民的学习和掌握,以此形成在地化的自主营建体系,使之成为当地社区生态建筑的建造者和推广者。立足这些基础,进一步发育出“在地”能够独立发展与自我服务的合作组织,有效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参与协作。

321 在各地政府所理解和自上而下推动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或“新农村建设”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农村“盖”或“刷新”标准化的住房。

322 如将瓷砖贴在房子外边等。生态建筑虽然提倡使用本土建材,但对其它建筑材料却没有偏见,其示范屋中也有瓷砖,只是它应在卫生间里,而不像很多农民的房子一样贴在房屋外面。

323 关于谢英俊建筑师及其观念与工作,详见其工作室网站:

http://www.atelier-3.com/mediawiki/index.php/Main_Page, 2012 年 2 月 5 日浏览。

324 我们不应忽略目前以消费为导向的流通模式正在强有力地推动农民不计生态成本的开掘资源,以利于资源的自由流动并形成所谓市场意义上的最优配置,而非考虑本地的实际需要。虽然它在一定范围内增加了效率,但却也在生态意义上增加了成本。这些流通环节也如不持续的生产方式一样大大增加了能源消耗。生态建筑的就地取材既希望减少由此导致的能耗,同时也确保各资源在本地的合理流动。

除便宜外，房子的结构功能还需能够满足村民的生活生产需求。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农村所能找到的一切资源都可能用来建造房子。谢英俊曾说道：“没木头，用石头；没石头，用泥土；没泥土，那就竹子；竹子也没，秸秆你总有吧”（转引自王雯婷，2012）。这是生态建筑的材料观。其所经常采用的另一类“轻钢”材料抗震性好，但造价高昂。谢英俊通过10年试验简化了该结构，使其变得可预置、开放性、组装简易、空间灵活，所有衔接处均采用螺栓固定，让村民不请专业施工队也能够把房子盖起。正是完全不设门槛的建房技术，材料充分本地化后可降低的成本支出，让生态建筑与其他农房相比具有独特的优势³²⁵。

但其推广却在现实中“遭遇”到许多阻力与困难，笔者认为首先是来自于以现代都市美学为导向的特定“意义系统”。面对已经被强势传媒和房地产广告深刻影响过的村民，无论是河北定州翟城村还是河南兰考贺村，生态建筑都不同程度面对着理念与文化层面上的挑战。一篇题为《兰考合作建设生态房的理想与现实》的通讯，生动记录了当地农民对待生态房的两极化态度：“有人觉得加入合作社协助盖房的方法不错，有人觉得问题多多——已经参与盖房刘建忠妻子门凤枝指着对门邻居家贴着花花绿绿瓷砖的小楼一脸的羡慕，盖个房子不就是图气魄漂亮吗？这房子像个啥？将来娃子相媳妇都难”³²⁶。这个理由和河北定州翟城村某户准备推广的村民如出一辙，虽然她担心因此娶不上媳妇的儿子当时还只在上小学。原因为何？她们同样都认为这个房子用的材料太“土”，虽然她也承认土墙冬暖夏凉。可见“土”的担心不是来自实用角度，也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在现代和城市双重坐标参照下，大众传媒参与重构后反观的产物。

除此以外，生态建筑工作室于2004年暑期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修建的尿液分离式生态厕所在推广中同样遭遇“责难”。目前该项目已在北京、河南、海南、四川等地因地制宜的推广10多处，并汇编出版了实用性的《粪尿分集式生态厕所理论与实践》。之所以选择厕所作为乡村生态建筑的切入点，因为它是一

325 参考自：王雯婷，“谢英俊的乡村住宅产业之路”，2012，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a3038>，查阅时间：2012/01/03。

326 详见：朱长振，2007，《兰考合作建设生态房的理想与现实》，
http://www.snzg.cn/article/2007/0630/article_6403.html，2012年5月8日浏览。

个十分关键但却常被忽略的世界性议题³²⁷，而我国包括水冲式厕所在内的卫生厕所在城乡的普及率尚不足 40%（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生态农业工作室，2009：25）。

农村中的人畜粪便本是生态农业中的重要肥料。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农业物理学教授、美国农业部土壤管理所所长富兰克林·H·金（中文版 2011：113）一百年前看来：“迄今为止，中国、朝鲜和日本农民实行的最伟大的农业措施之一就是利用人类的粪便，将其用于保持土壤肥力以及提高作物产量。当反思我们农场的土地在不到 100 年的时间里就耗尽肥力的原因，以及为了保证土地的年产量而不得不施用巨量的矿物肥料时，我们便意识到必须深刻了解和认识东方人自古以来一直延续的施肥方法”。但当前我国肥料投入中只有约 35%来自有机肥（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生态农业工作室，2009：25）。即使我们无需将其转化为肥料，只要未进行一定处理，这些人畜粪便不仅会造成农村居住环境的脏、乱、差，并已日益成为病菌传播、影响农村生活质量的重要原因³²⁸。但我们是否有条件在农村地区全面推广“卫生的”抽水马桶呢？且不说它将损失大量有机肥料，仅使用大量水³²⁹这一高耗能处理前提就让很多缺水的农村地区没有推广的任何可能性。

正是基于这一两难困境，乡建学院修建了尿粪分离式生态厕所并进行了推广。该厕所严格实行尿粪分离，既确保粪便干燥而减少臭味，加草木灰等无害化处理后可直接还田，节水与改进卫生条件两不误。厕所建设则充分利用本地可回收的生态建筑材料（草、土、柳条），相比砖及水泥的制造过程所要消耗能源并释放大量的二氧化碳来说，这些来自本土的天然材料在生产过程中能够固定二氧化碳³³⁰。通过“减量化——只处理必须处理的粪便；无害化——处理掉污染环境与危害人体健康的有害病菌；资源化——自然能源与粪肥的循环应用，减少化肥的施用量；节水——少用或几乎不用水（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

327 据研究显示，目前世界上总计约 40%的人没有厕所（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生态农业工作室，2009：14）。

328 “从集中的水冲式收集系统的下水道中排出的污染物是全世界水污染的主要组成部分，目前世界上只有约 3 亿人的污水在排入水体前经过了末端二级处理。污染物通过下水道、化粪池、坑式厕所、污水池等渗入地下水”（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生态农业工作室，2009：15）。

329 “它需要 30 倍以上的水冲洗少量的尿和更少的粪，粪、水混合后，使需要处理的粪污大量增加。同时据初步估计，冲厕用水占日常生活使用总水量的 35%之多”（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生态农业工作室，2009：导言 1、正文 14）。

330 不仅不污染环境，按照《京都议定书》要求，将来向大气中超量排放二氧化碳是要付费的，而这种相反做法将可以得到生态补贴。

中心生态农业工作室，2009：29）”，小小一个生态厕所，多角度的体现了生态可持续理念。

然而很多人却认为这样的工作无足轻重，甚至有长期参与社会运动的朋友在网上称这一举动是对翟城的“文化侵略”，其他响应者干脆建议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更名为“晏阳初乡村厕所学院”（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生态农业工作室，2009：57）。

这种不屑与污名化所体现的日常生活盲点，恰好说明“正向运动”影响已不受觉察的渗透进以“反主流”为目标和旨趣的主流社会运动中：既因其在物质层面上不带任何反思的接受“马桶”这一包含着复杂文化经济生态脉络的“产品”，更由于其准备通过“反抗”所努力争取美好生活的主流“想象”——只是以都市化和西方化为参照并以中产阶级趣味为导向，而马桶“崇拜”背后对现代“洁净”观念的不言自明则是其合理延伸。正是这种看似“就厕所论厕所”的“去脉络”处理和来自主流文化的定见，遮蔽了乡土社会及各种来自生态等限制的因素，强化了我们对于“三农”的“偏见”，进一步影响了农民对“好生活”的标准与定义。

除上述各种生态建筑做法本身的意义外，这些“另类”做法更大的力量与意义在于：它首先承认并肯定农民在盖房子、改进厕所等方面实际而又普遍的需求，以此为基础与前提，尝试低成本和低耗能的改进农民生活，在需求与可持续间寻找某种平衡，使得生态不再高不可攀，而技术可以低廉的价格及开放的形态重新回到使用者手里，实践新条件与脉络下带有“人民生计”特点的“生态技术”。

其次，它在整体脉络与新视野下，改变主流将“传统厕所—抽水马桶、好生态—好生活”对立分割的一般倾向³³¹，也拒绝一些带着都市人自我中心和生态“原教旨主义”倾向者们对农民追求适度舒适生活的完全否认³³²。更在生态与生活脉络重新连接的过程中，通过专业“下放”，实现其与社区、就业和组织结合，让技术重新回到社会与文化脉络中。

除以上来自一般公众文化观念和更广泛“意义系统”中的“偏见/定见”外，

331 1999年10月，在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办的“生态与文学”国际研讨会上，多位学者与知识分子即谈到此议题并提出突破二元对立的必要性，详见：《南山纪要：我们为什么要谈环境—生态？》，<http://www.7139.com/lwzx/shxlw/hjbh/200607/55694.html>。

332 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活舒适与生态良好的相互促进，本来不就是“好生活”的全面之意？

这些“另类”技术实践还直接“遭遇”着更多利益上的挑战与政治经济因素的其它影响，并在现实层面实现“文化”与“经济”的高度结合（详见第五章分析）。比如强调农民在建材、技术开发等方面需“自主、独立”的生态建筑一开始就面对来自各利益相关方或大或小的阻力，其中包括：建筑材料供应商、“城市中心”的建筑知识生产者、追求“样板化/小区化”农村建筑规划部门……，迫使生态建筑最后在河北终止³³³的主要原因则是其被指认为“非法建筑”的“审批权”与“专业资质”³³⁴。专业主义下的类似门槛作为一种商品化及“去社区信任”产物，符合已有的固化利益结构，排斥着成为潜在技术开发者与改进者（土发明，工匠）的可能存在，维护和继续着技术的日益垄断与神秘化，更压缩了“另类”与弱势群体进行创造性实践的有限空间。

这些例证也正是华勒斯坦在关于历史资本主义宏观分析中得出的两个基本推论：现代科学与历史资本主义一直处于紧密联盟中，技术变革是历史资本主义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动力（1999：18-21）。也因此，如果不能“跳出狭义技术看技术”，并在更大脉络与环境上推动改变，单纯追求技术创新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3、技术“重嵌”（embeddedness）社会³³⁵

通过以上两组充满矛盾和张力的案例，主流的现代技术存在着普遍困境与以下悖论性特点：高成本³³⁶、（能源和资源）高依赖、强垄断³³⁷、去乡土脉络³³⁸，但却以“农民选择”为名义。

但现代技术仍得以“自圆其说”并对很多人成功构建了“技术乌托邦”式

333 2007年5月15日，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被迫关闭，其理由之一即是学院内的这组在国际建筑节获过奖的中国大陆当代第一组乡村生态建筑群是“非法建筑”。

334 其与门槛很高的有机认证一样，无疑是典型的主流标准与话语系统对来自底层和无权者“另类”实践的排斥与空间剥夺，并以此巩固权利与资本的主导地位。

335 此处“社会”指波兰尼意义上的广义社会，包括文化、政治和语言等。

336 此成本不仅包括经济上的开发成本，更包括产生着深刻影响的生态成本与社会成本，后者包括现代大型都市化的普遍危机，城乡关系恶化等，笔者将在第五章中详细展开。关于现代技术的高污染，美国学者巴星·康芒纳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技术变迁是现代环境灾难的罪魁祸首，它占到全部污染物的80%以上”（丹尼尔·A·科尔曼，2006：17）。

337 经济史学家布罗代尔（1997：36）也提到：“需要整体的看科技，警惕对科技进步的狂热，每次科技进步都给垄断追加动力”。

338 不仅去“乡土”的脉络，丹尼尔·A·科尔曼（2006：23）认为：“在历史上，科学和技术实际上曾被某种伦理观念长期抑制，这一伦理观念的特点是不图积累，把经济和技艺置于社群（包括自然环境）的通盘考虑中。经济活动及支撑经济的技术当时仅着眼于社群及其生活方式的存续绵延。而资本主义的天生法则就是使经济活动突破社群的既有藩篱，不断求得增长，它的兴起自然解放了科技力量，使科技服务于日益扩张的经济”。也即布罗代尔（1997：45）的观察：“技术不再受社会约束了”。

的幻象。重要原因是其巧妙而又隐蔽的将背后复杂的社会历史脉络割断，进而通过意识形态包装与文化修辞将“技术”抽象为“中性、独立”的存在与形象。作为该逻辑的自然延伸，当问题与质疑出现时，不是通过回到具体脉络进行根本原因的深入分析，而是让不同形式的“就科技论科技”与“以科技医治科技”³³⁹成为常见的解决之道，这种处理方式同样忽视文化、社会、生态等限制，回避社区和生活等因素，再次重复成本转嫁这一基本逻辑，内在的体现着某种“正向运动”的乌托邦想象。这样的主流论述已受到不同科学学者和实践者的批驳（E.F. 舒马赫，1985：98；约翰·贝拉米·福斯特，2006：86、95）。

作为波兰尼《大转型》命题的延伸，如何让技术“重嵌”社会既是帮助我们打破“技术乌托邦”迷信的基本出路，也是确保社会整体可持续的重要方面。通过前文分析，不应本质化的认为技术、加工或城市本身是问题，而是“过激、大规模、单一化”才让它成为问题。因为除狭义的技术面向（效率）外，还有经济面向（垄断、知识产权）、社会面向（健康、生活方式、社区）、文化面向（意义生产、对本土和传统技术态度、美学）、生态面向（能耗、环境影响）等，综合起来才构成完整脉络³⁴⁰，前文各种案例其实只是从不同角度陈述这一基本事实。

因此，“双向运动”视野下乡村建设所倡导推动的生态技术希望能坚持³⁴¹：适用的³⁴²、民众的、低成本的、可持续的³⁴³、紧密配合“三农”脉络，以尝试打破与文化经济社会生态脉络割裂并分离的主流技术想象。

也即，这种技术“实际上必须考虑人民的反应和能力，而不应使自己局限

339 如丹尼尔·A·科尔曼所指（2006：18-19）：“那些相信进步观念的人一般人都认为，由技术造成的任何问题都可通过进一步应用技术而得到解决”。

340 E.F. 舒马赫（1985：50）有个非常有意思的分析：“科学和工程产生‘技术知识’，然而‘技术知识’本身是微不足道的，它只是没有目的的手段，一种潜力，一个没有完成的句子。就象钢琴不是音乐一样”。

341 此处参考自 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1973）中关于“中间技术”和“适用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的讨论，作者认为其应该具有以下特点：价格低廉，基本上人人可以享有、适合于小规模应用、适应人类的创造需要（1985：17）。舒马赫生前就将其理论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进行实践，至今以其名字命名的舒马赫学院仍在英国推动相关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与推广，详见该学院网站：www.schumachercollege.org.uk。需说明的是，自 2002 年始，经由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刘健芝副教授（后兼任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副院长）的介绍，《小的是美好的》成为乡村建设必读书，2004 年 2 月，在刘教授的带领下，部分乡村建设骨干前往印度喀拉拉邦实地学习该邦民众科学运动经验，通过此过程进一步加深对该书的认识，并在回国后积极开展本土案例的收集、试验与反思讨论至今。

342 这种技术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倒退”到过时的方法。比如电脑也可以是“适用/中间”，作为工具其从来不应是问题，但如果因电脑而形成“垄断”，认为只有电脑才能办公，并通过软件等的不断升级而让人形成某种依赖，这种“迷信”与“控制”才成为问题。

343 正如 E.F. 舒马赫（1985：35）所指：“人们通过适度使用资源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显然不会像依赖大量使用资源的人们那样容易互相敌视。同样，生活在高度自给自足的本地社会里，也不会像依赖世界范围贸易系统生存的人们那样容易卷入大规模的暴力行动”。

机械或抽象的概念”(E.F. 舒马赫著, 1985: 123)。同时其必须回到社会文化与生态脉络中。但“小的³⁴⁴”不仅限于规模, 同时更是指“脉络化”; “生态技术”不仅限于技术层面, 更包括从广阔的视野出发, 对主流技术的批判与反思。

带着这样的视野, 乡村建设自然需与农民组织、本土经济、乡土文化等进行结合。在历史上, 晏阳初(1934: 269)就认为: “乡村建设的主要贡献并不在于加工或设备的发明, 而在于寻找一种通过组织和训练, 解决农民充分利用改进了技术问题的办法”。当代乡村建设的技术研发推广也时刻考虑着与其它工作的结合与呼应。例如, 在河北翟城村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院内建生态示范屋“地球屋 001 号”时, 考虑到北方冬天室内需要升温, 如果能够在门窗上做出一些技术性的保温处理, 则可减少燃料的浪费, 它既是技术问题, 也是社会与文化的议题。首先, 我们根据物理学中的保温原理并借鉴双层玻璃的做法, 利用当地已有材料(普通玻璃、胶片纸、双面胶), 开发设计出了价格低廉、简单易学的多层保温玻璃。为便于在本地实践推广, 则让村中妇女协会的成员来参与制作, 在做的过程中她们既学到了知识技术, 也为技术的完善和本土化做出贡献, 而妇女协会这一组织载体又为这些技术的交流与传播提供了保障。这让技术从实际需要中产生, 体现了可持续方式在生活中的具体运用, 同时又结合农民的组织及技术改造。它也不设专利, 我们希望它会像民间和乡村社会中成千上万的本土经验一样, 可以更为自由地加以传播与再创造。

另一个让技术回到社会脉络可供参考的案例是印度南部的“喀拉拉邦民众科学运动(KSSP)”³⁴⁵(可参阅刘健芝, 2002)。

344 虽然舒马赫(1985: 41)对规模有着深刻的反思, 比如其指出“对巨大规模的盲目崇拜, 可能是促成现代技术的原因之一, 而且肯定是现代技术的结果之一”。

345 该运动自 1962 年由一批科学家发起, 1996 年获得被号称为另类诺贝尔奖的“优秀民生奖”(Right Livelihood Award), 至今已拥有超过 5 万的成员, 1974 年则提出“科学为了社会革命(Science for Social Revolution)”的口号, 旨在让科学成为“受压迫”民众的武器。在最初 10 年里, 这批科学家与社会接触, 逐渐发现现代科技并非造福所有人, 尤其是社会底层。他们看到重工业、核电、大型水坝工程等对环境的破坏, 开始对“发展”采取批判态度。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 KSSP 所推广的是一个朴素的高尚诉求: 知识、科学、智能, 应由民众掌握。而通过与民众结合的过程, 让知识分子从象牙塔走出来, 从井底爬上来, 让自己变得对人民、对社会有用。KSSP 认为, 在技术层面的科学并非最重要, 科学是为了社会的改善。因此, 他们针对大众的科技推广采取了有别于主流渠道或市场化的开展形式。无论是街头剧场、民间艺术, 还是火车上的科普读物, 都是他们开展“走近科学, 运用科学”的平台与载体。正是在与普通人民日常生活的紧密结合中, “还原”了科学存在的意义。正是有着这样的理念, 科普不再只是纯粹技术层面的科学普及。笔者在调查中就看到, KSSP 教给普通家庭用当地已有的环保原料和简单技术, 生产必不可少的日用品——肥皂, 与此同时他们还将小小的肥皂联系到全球化的大背景, 给参与者讲述“肥皂的故事”, 进而延伸出跨国公司对肥皂市场的控制及对本土经济的不利影响。详细内容可参考笔者 2004 年 2 月在印度的调查笔记: “发展的可能”, 2004,

四、小结

就像其它章节一样，本章尝试让“去脉络”的分析再度“脉络化”，以此为基础帮助我们看到“双向运动”在很多“领域/空间”都有着实际的发生与表现，不管是生态、生计还是技术。同时它也将和下一章结合起来，从不同角度让我们看到“双向运动”是如何运作并实现于具体的“另类”实践上。呼应着头两章的宏观分析，这些微观层面的案例讨论同样揭示其所存在的困境与尴尬，绝非个别特例，这正是为何当我们一边强调“小的是美好的”，却同时也必须对更为宏观的问题与脉络进行根本性反思。

通过结合起历史与当代乡村建设实践的相关案例与分析，并与印度案例进行联系，笔者认为：“人民生计”和“生态技术”既是乡村建设的主要工作内容，也是其重要特征与全新视角³⁴⁶，它内在体现着乡村建设的基本思想与原则，并帮助我们从“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结合起来的整体性角度为乡村建设的“再脉络化”准确定位。

该组案例通过“遭遇”和“反抗”所呈现的复杂内涵与互动，还让我们看到“双向运动”从来都不单向与机械。一方面，通过资本化、利益化与话语上的技术主义化，主流技术将相关问题“去脉络”的诉诸“二元对立”这一常见范式中³⁴⁷，并因所构建的这一“意义系统”与现代人的思维与知识结构高度同构而较容易获得接受；另一方面，主流对生态和技术的理解既垄断又高度灵活，其还十分善于利用各种手段进行吸纳与结合，甚至让各种危机和反抗再次成为进一步“利益最大化”的借口与原料——例如新兴的环保产业，以再次将代价和成本转嫁出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既要看到现代技术“自圆其说”叙述中的内在矛盾与裂隙——其不同程度的受制于“正向运动”及其背后的利益结构与政治诉求；也应同时看到“反向运动”作用下的改变可能与突破空间。

因此，乡村建设推动的各项实践绝不仅是拘于“二元对立”陷阱下的简单回归，而是批判中的新建构。我们既不可在不处理整体脉络情况下抽象的谈生态或技术，也不可能仅在技术层面上孤立的进行相关实践。而必须回到具体脉

《Perspectives》（第四卷第二期），“海外中国青年论坛”，第46-50页。

346 比如 E.F. 舒马赫（1985：47）就指出：今天需要有一种崭新的思想体系，一种以人为重点而不是主要以物为重点的体系。可以归纳成一句话：“大众生产而不是大量生产”。

347 正如汪晖（2000：45）所指：“这种二元对立的分析方式是中国现代化话语在分析中国问题时的最主要特征”。

络，重新连接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等纬度，在社区与共同价值日趋瓦解的今天，重建另类“生态/技术”的在地化载体、条件与主体性。

经济功能仅仅是土地许多至关重要功能中的一种。土地为人类的生活提供稳定性；为他提供栖息之所；是他生理安全的条件；也是风景和季节。设想人的生命中没有土地，就如想象他出生时没有手脚一样荒唐。

（卡尔·波兰尼，2007：152）

我绝对不相信，北京城的居民会因为吃了我们的蔬菜就健康起来，至多只是生活问题的一角能暂且缓解而已，还有空气、水、工作和生活上的客观压力、情绪上的影响、整体大环境等等，我们是无法替他们分忧这些问题的……。

（徐凌涛，2010：12）³⁴⁸

第五章

经济与文化：以乡村建设中的农民合作与城乡互动为例

上章通过将乡村建设实践中的技术结合生态与生计面向，讨论“双向运动”在具体领域与空间中的复杂发生机制及其背后的经济与文化，以此反思主流“意义系统”并尝试建立“另类”参照坐标，在此过程中带出的现实反思与理论敏感既有助于对相关议题的深入思考，更让行动者对实践中所遭遇的各种困难进行新的认识。

本章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对“双向运动”影响下乡村建设具体实践的探

讨，所结合的两组案例则来自乡村建设另外两部分主要工作。与上章相比，本章继续采取经济和文化相结合的视角，并讨论“正向运动”的虚幻性是如何通过特殊的文化与经济操作而获得认同并产生影响。

一、经济与文化的“另类”视野

为更好讨论“正向运动”在“激进”与“去脉络化”中所表现的虚幻性，需要先从重思“经济”与“文化”入手，它们不仅因常在实际运作中充分互动

348 徐凌涛为小毛驴市民农园2010年实习生，后转为农场工作人员，该段话来自《蔬菜配送记》，《田间地头》（小毛驴市民农园会员通讯）2010年第八期。

与结合而非独立的范畴或领域，更是展开“双向运动”视野所必需的重要角度。作为本论文结论前的最后一章，有必要通过对“经济”与“文化”的进一步反思与归纳，以帮助笔者更好把握乡村建设的张力困境及“双向运动”的运作与实现机制。

而对于重新理解经济之必要，除上下文所讨论的角度外，还涉及到对当前主流知识界对文化研究的“经济观”进行必要澄清。正如劳伦斯·格罗斯伯格（2011：352）所述：“对文化研究而言，我认为问题决不是我们认为经济是不重要的。我们认为经济问题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一些政治经济学家从事经济研究的方法是非常糟糕的，也就是说，文化研究反对的不是经济问题和事项，而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的方法。不是我们拒绝政治经济学，而是我们拒绝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版本”。

1、重思经济

当前我们多通过现代经济学来认识理解并定位经济，其作为“显学”的强势存在则对欲罢不能的各种常识建构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泰国学者佩尤托（2003）分析指出：“实际上经济的思想早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已经存在，而经济学研究却只是工业化时代才得以形成一门学科，狭隘的经济学思维事实上已经成为当前最紧迫的社会问题和环境危机的主要根源”。

而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并非如大众所信以为真的科学主义与现代主义，相反是借助于大量文学书写一样的修辞：比喻、引用权威、简单对称的表述和被认为是严谨和科学的数学语言等（许宝强，1998）。但另一方面，经济学又将自身与其他社会科学和文化领域分割开，其中一个重要功能是建构出“合适”的“经济领域”，或为被界定为“经济”的领域提供合法性与围墙，以使得“另类”的经济观点被消音（许宝强，2007：前言3、145、158）。

正是这种经济学及其所扣联的其他相关力量共同制造出“经济社会”、“经济人”常识，让经济得以“独立/优先/凌驾”于被分割出来的“社会”与“文化”，从而构造出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经济乌托邦”——它表面独立于社会，但却隐藏着改造社会、重构主体的潜在目标与事实效果。但实际上，正如卡尔·波兰尼认为，“经济并非像经济理论中说的那样是自足的，而是从属于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的”（弗雷德·布洛克，2007：15）。同时它是一个植根于各种生态、

技术和人工建构的组织制度之内的动态“过程”，即经济生活是嵌入各类社群文化活动中（许宝强，2007：274）。“被认为不言而喻的各类‘经济’活动，实质包含了种种被界定为‘非经济’的社群文化实践。而被不断强调和化约的经济力量只是其中一个因素，政治、文化、社会等力量从来都不会被完全排拒出其运行机制之外的”（许宝强，1998；2007：21-24）。

波兰尼（2007：134-137）还通过实例指出：“任何力量都不像经济主义偏见那样有效地模糊我们的社会洞察力。导致退化和沦落的原因并非像通常假定的那样是由于经济上的剥削，而是被牺牲者文化环境的解体，恰恰是这种对剥削的强调使得更重大的文化退化问题逃离我们的视野。印度大众在19世纪下半叶饥饿而死的原因并不是他们被兰开夏（英国纺织业中心）剥削，他们大批死亡是因为印度村庄共同体被消灭了。因为在从前的时代，有地方上的小粮仓来应付款收，但现在这些粮仓或者早已不再运转，或者被卷入大市场中，正是这些剥削的对立面启动了具有毁灭性的文化交往”。通过这种结合起经济与文化的整体分析，他因此认为“社会的发现既是自由的终结，也是自由的重生”（波兰尼，2007：220）。

呼应着波兰尼的思考，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2003）认为：一切社会都可以被分解为几个“组合”：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但“只有与其他‘组合’联系起来，渗透到其他‘组合’之中并向其他‘组合’敞开大门的情况下，经济这一块才能被理解”。布氏通过对我们习惯上自认为唯一的经济社会进行了“物质生活、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层次划分，指出介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市场仅起不完全和部分的联系作用，而非真正万能。19世纪前，它只是一个坚实的、厚薄不均的普通层次，在它的下面有着日常生活的汪洋大海，一切进步取决于物质生活的膨胀，而市场经济本身也依赖物质生活而迅速膨胀，并扩展与外界的联系。虽然在这一扩展中，得益的始终是位于最上层带垄断性质的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也从未完整的统辖整个经济或全部社会劳动（布罗代尔，1997：82-84、93）。正是通过三个层次之间的互动与辩证，布罗代尔让我们跳出经济决定论的陷阱及对“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固定化认识，并在重思“经济”的“另类”视野与“脉络化”的分析方法中打开社会变革的可能空间。

回到中国乡村建设实践的具体脉络，正如本论文第二章所指，梁漱溟和晏

阳初都十分清醒的认识到其中“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的一体性³⁴⁹。虽然乡村建设大部分是“经济”建设，但单从狭义的经济上做功夫是解决不了经济问题的。具体到农民合作社，如果单把合作看成是达到经济发展的手段，则合作社是不会办好的（梁漱溟，2005：425-428）。正是这种不限于以经济学为讨论依据的整体性视野，是推进乡村建设反思与“双向运动”实现机制讨论的必要认识基础。

2、重思文化

早在开展乡村建设之前，梁漱溟 1921 年就在其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就对文化进行了独特的定位：“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1921：26）。某种程度说，乡村建设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视野下展开的。而在艾凯（1996：212）看来：“乡村建设必须是一个文化运动而不是政治运动。因为梁漱溟认为，中国的各种问题——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都不过是根本上文化危机的具体表现”。无独有偶，乡土社会的长期田野感知让费孝通（1999：300）指出：“文化是指一个团体为了适应处境所形成的一套生活方式”。而对于当代的乡村建设实践者来说，文化既是低成本重建乡村秩序的良好手段³⁵⁰，更是推动“另类”实践的一种新视野。

这种与主流有所区别的“文化”其实正是文化研究所提倡的“另类”³⁵¹文化观。在《关键词》（1976 年）一书中，雷蒙德·威廉斯将文化界定为现代社会知识中的 4 个或 5 个关键概念之一。他提醒我们，文化一词最初与耕种庄稼和饲养动物相关（以 agri-culture 一词为例）。19 世纪，受德国作家郝德及浪漫主义运动和高涨的国家主义的影响，“文化”逐渐变得与“不同国家和民族独特的和多变的文化联系在一起——即，记述特定的群体、民族、国家或历史时期的生活方式”（保罗·杜盖伊、斯图尔特·霍尔，2003：11）。此外，威廉斯着重强调了文化、意义与传播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认为文化的意义和社会的价值观，

349 如晏阳初（1937：565）在回顾自己过去十年实践时说：“乡村建设是整个新社会结构的建设，并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事，而是从根本上谋整个的建设事业，所有文化、教育、农业、经济、自卫等各方面工作都是互相连贯的，是由整个的乡建目的下分出来的”。

349 详见当代乡村建设实践者、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何慧丽副教授结合河南兰考实践所进行的相关分析，如何慧丽，时间不详，“我在兰考的乡村建设实验”
http://www.wenmi114.com/wenmi/jianghua/xiangzhennongcun/2007-06-04/2007060499793_2.html，2012 年 6 月 8 日浏览。

351 该提法认为“文化是整体的生活方式”，虽然已经至今数十年同时影响日益广泛，但相对于主流社会将文化窄化为“精英文化”、“文艺”等常见处理，笔者认为其在现实中仍是某种“另类”位置。

总体而言反映、折射和表现了社会关系：“由于我们看问题的方法实际上就是我们生活的方式，因而，传播的过程事实上是结成社区的过程：新意义的提出、接受和比较导致关系的紧张和发展与变化的实现。”（保罗·杜盖伊、斯图尔特·霍尔，2003：12）

在当代文化学者保罗·杜盖伊和斯图尔特·霍尔（2003：2）看来：近年来，“文化不再被视为仅仅是其他进程（经济或政治进程）的反映，而被视为与经济或政治发展进程同样是现实社会的组成部分。不仅如此，由于近年来理论家们开始主张所有社会实践都是有意义的实践，因而所有的社会实践在实质上都属于文化范畴”。

这种文化的“另类”视野，呼应着第一章所提出并在随后结合案例有所讨论的“意义系统”，既可帮助我们更好分析“双向运动”的运作与实现机制，理解乡村建设实践相对于狭义的经济而言常被忽视与遮蔽的面向³⁵²，挑战主流对“三农”、和乡村建设实践中各种文化“偏见”及“类型化”刻板认识的来源与基础，同时也有利于参与者重新打开被压缩的想象与空间，发展出能够体现民众化、在地化³⁵³、脉络化³⁵⁴的“另类”文化。

二、经济文化一体化：农民组织案例分析

通过以上讨论，经济与文化从来不是各自独立的存在。一方面，“正向运动”作用的发挥与实现往往通过经济与文化的联合。另一方面，在“反向运动”的自我保护及“另类”实践中，都同样可看到两者的充分互动与影响。下面将以“双向运动”影响下农民合作社的想象、论述与实践为案例进行讨论。

“三农”问题虽然错综复杂，可从历史至今，如何让纷纷外流的“三要素”（劳动力、资金、土地）逆向回流则是最为关键的出路。一方面“原子化”的个体小农无法抵御市场风险及已成规模的资本竞争。另一方面社区凝聚力越来越难以建立，乡村公共事业多陷困境。针对如此现状，乡村建设所强调并实践的一个基本思路是促进农村社区内部、城乡之间等多种层面与形式的组织合作，重建各种群体协作的机制与平台，通过互助实现自助，以重新激活农村。在这

352 故需强调对乡土社会及当前各危机困境的文化敏感与自觉，意识到无论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农民还是市民都共同面对的各种“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具体在本章和上章的各案例中都有所体现。

353 此处不只强调社区化，同时包括对主流“中心化”导向的反思和挑战。

354 具体将根据脉络相异而有不同的呈现，如乡土社会的文化与城市消费者的文化就有较大不同。

样的过程中，组织既是手段和重要的工作方法，同时也是目的之一。因为拥有“社区感”³⁵⁵的新生活方式和更为“低成本”乡村秩序的建立本身就是乡建努力的方向。

如果我们回顾整部乡村建设历史，也将会发现无论是晏阳初、梁漱溟他们开始组织并延续至今的农村经济合作社、资金互助合作社（金融互助）、乡村文艺队（民众戏剧），还是当代新开拓的“城乡互动”、“社区支持农业（CSA）”³⁵⁶、“城市消费者合作社”等，这些都是在不同条件和环境下开展合作和组织化的努力。它既是乡村建设重要的组织载体与工作内容，也是乡建理念的微观体现，更作为由西方引进的现代制度在乡土社会中“遭遇”、反抗、适应和矛盾的一个前沿领域，各种类型的实践案例、已有研究与批评则都较为丰富。

对于“农民自己办的公司”³⁵⁷，许多合作社研究者和推动者分享着一个基本共识：农民合作社是个“经济”组织。既然作为“经济”组织，许多人因此认为：只有搞好经营才能盈利，只有盈利才能生存和发展，只有发展才能实现社会理念，“经济”和“社会”需以这种先后顺序才能连接。另一种代表性观点则认为：首先要让农民得到利益，他们看到希望才会跟你（合作社）走，有了经济基础，做什么也就好办。然而，苑鹏（2001）辩证的指出，农民合作社一方面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另一方面“其制度安排却具有天然的反市场性”。许宝强（2007：242）则认为其“带有某种‘反资本主义’性质”。

在此笔者不希望通过概念和特征将合作社本质化而抽象化，而是希望让合作社回到具体的实践脉络，让我们重新思考其“经济性”，同时其与文化、社会、政治等面向的联系及互动。

1、“经济”组织的文化脉络

立足乡土社会的农民合作社，之所以不只是狭义上的“经济”组织，除其

355 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正如大卫·哈维（2006：165）所指：“社区精神长期以来被认为可以防止社会混乱、阶级战争和革命暴力。但装备完善的社区常常是排他性的，它在自己与他人之间划定了明确的边界，树立各种各样的不得入内的标志，并使监视、社会控制和镇压内在化。社区常常是社会变革的障碍，而非推进器。新城市生活创建的意识形态既是乌托邦的，同时又是令人忧虑的”。这也是某种“双向运动”独特视野下对一般“反向运动”的反思，故乡村建设实践同样需要对主流社会运动所在“本质化/浪漫化”社区的倾向有所保留。

356 即 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国内通译为“社区支持农业”，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同样也是“农业支持社区”，故应是两者都有的城乡互动，或如台湾朋友所翻译以体现生产者与消费者共同投入、分享互动的“社区协力农业”。笔者更认同“社区农业”这样的概念。

357 这种对合作社特点和性质的简单归纳，常见于当前各种对合作社的讨论与研究中，同时也广泛存在于各种与合作社相关的专栏节目或培训教材中。

同时还存在着社会、文化、伦理、生态等功能外，还因其特殊的历史脉络与外部环境。

自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我国农村公共空间日益狭小，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生活方式在使人回归家庭的温情时也使人的公共意识淡漠。正如当代乡村建设实践者邱建生的形象描述（2005：38）：“我们会看到荒草从农村戏台的化妆室里长出来，也会看到水从损毁的沟渠里倾泻而出，偶尔一辆小车从村道上通过，它扬起的灰尘或溅起的污水也会让我们皱起眉头。农村的一切都在继续着，土地在继续，猪舍在继续，闲言碎语也在继续，唯有公共生活没有继续³⁵⁸，组织没有继续，集体没有继续。而市场、强政府、电视文化趁着这空档悄然而霸道的侵袭了农村，农民则在这种袭击下丧失了大部分的自信，甚至尊严”。

因此，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在2004年所举办的第一期农民培训即以“合作组织”为主题³⁵⁹。但在随后举办的数十期农民合作社培训班中，真正困难不在于讲明白合作社是什么，而是合作社与人民公社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区别。理论上似乎可以讲的简单明了，因为那对培训教员似乎只是一段充满悖论的历史，但对于农民学员来说却是饱含着复杂感情的记忆与参照，更是他们对“合作”主题的基本想象来源。不管新型合作如何不同，这种对农民来说的“二次合作”需先认真处理那个特殊的时代，而非照搬主流对人民公社的简单化评价——这种结论清晰的判断往往巧妙的利用人们在情感上对那段岁月的整体好恶，在“打包”处理中去脉络化，有意无意的遮蔽人民公社悖论的复杂原因³⁶⁰与时代特点³⁶¹（温铁军，2009；罗兴佐，2006；申端峰，2007）。但不管正确与否，历史所留下的影响与话语大大增加了“二次合作”的难度与阻力，并让各种“新合作”对“旧合作”而产生一定的“路径依赖”。

除来自历史与记忆的影响外，已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较大主导权的新自由主

358 贺雪峰（2008c：141）基于实地调查后的发现：“当前的中国农村，因为现代性因素的进入，农村社会中异质性因素大大地增加，农村社会快速地半熟人社会化。农村公共生活需要重建”。也部分呼应着乡村建设对乡村公共生活的思考与推动方向。但如果仅是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强势推动，将也只是“正向运动”的常见做法与单向纬度。故在实践中，需十分小心并有着多重的自觉与警惕。

359 因为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院长温铁军（2009：88）认为：“在市场经济与全球化的压力不可逆的条件下，政府至少应该通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使农民获得起码的谈判地位”。

360 如温铁军所指（2009：172）：“满足国家工业化和城市的粮食需求是大办合作社的动因之一，在采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行统购统销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合作化的组织建设能够弱化、抑制农民反抗”。

361 之所以提到这些参考文献中的不同解释，并非为某些政策或人物辩护，则是希望跳出以个人评价代替历史分析、以具体事件代替宏观趋势的简单化倾向。而这种处理不仅影响到当前主流各界对农民合作能力的普遍怀疑，当其与学术研究及意识形态宣传相结合，它更无形中强化和定型了广大农民（包括大部分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中青年农民）对“合作”的负面印象（想象）。

义意识形态与大众消费文化，作为重要的外部环境参照，对农民合作社起着不可忽视的限定作用。个人奋斗、致富神话等“意义系统”与个人主义话语，在对乡土社区、家庭及传统互助价值形成挑战的同时，也让“合作组织的社会基础与信任关系很难形成”（董磊明，2007）。

温铁军和董筱丹认为：伴随着市场化带来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之商业文化弱化了农民组织的传统纽带，并且当前快速的经济发展、社会流动、信息传播及国家权力向农村的渗透，“农民合作的心理文化、经济基础等方面都遭受了强烈的销蚀，农民价值观得到了重塑，同时改变并重建了农民行动的结构条件”（温铁军，2010：95、263；温铁军、董筱丹，2010）。

贺雪峰（2008b）则结合自己在全国 20 余省市的农村调查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所确立的市场经济理念及现代性在根本的行为动力与人生目标上改造并重塑着中国农村，这使得解决农民合作之需的传统方式越来越难发挥作用”。

这些分析与调研让我们看到促使农民合作或不合作的各种因素，它高度受制于国家所选的发展道路与时代特点。不仅是中国的农民合作社，当前正被学界广泛关注的日本农协也以现实经验呼应着相关的分析。“因工业化进程所不可避免的‘三农’问题，日本的农业和农村也同样面临着来自工业化和自由化同时加速的双重挑战”（温铁军，2010：118-120）。而综合农协正是日本对外殖民扩张和工业化时期应对国内“三农”问题的时代产物与服务明治维新后工业化原始积累之国家战略³⁶²。即使这样，有着上百年历史的日本农协，当面临着“金融自由化、农产品进口自由化和粮食管制等各种限制缓和”这三大外部环境改变时，所引发的各种矛盾随处可见，“地缘和血缘越来越淡化，农户与农协的关系日渐疏远……因为现在农业整体不行，农协也就不行，这是一种恶性循环。而农协之所以还能维持，正是靠着一些经济效益好的业务来支撑”（李晶，2011）。

可见农民合作社有问题，从来不是农民或合作社本身的问题。经济与文化，历史与现实，记忆与想象从来都是充满张力的缠绕于内。

2、“经济”现象的文化制约

以上谈到一些对农民合作社发生着重要影响但却容易被忽略的历史与文化

362 这也正是李晶（2011）通过人类学实地考察后所验证的：日本农协虽然号称是农民自己的组织，但一开始就得到了政府荫庇。

脉络,说明农民合作社的意义与发展困境不应只从合作社自身及内部寻找答案。

“如果说其存在着制度规范的问题,也主要需依赖外部条件的根本改善,离开这些单纯谈内部规范是没有意义的”(杨雅如,2010)。下文进一步讨论农民合作社所面对的诸多制约,也都无法从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等一般角度进行分析并获解决。

随着宏观政策的变化,一方面农村的“三要素”(土地、资金、劳动力)随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加速而纷纷外流,进而导致留下的可盈利空间萎缩³⁶³,小农剩余过少(杨雅如,2007)。另一方面,产品的市场化和支出的货币化让传统小农经济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在当代乡村建设的实践中,无论是农资联合购销还是通过自我中医疗法节省医药费等诸多举措,理论上省钱即赚钱,但却在实际中效果不明显。重要原因可能是:与传统乡土社会因自给自足与社区互助而“低现金交易/依赖”不同,当日益货币化后各种现金需求激增,农民自然就认为省下的有限货币不过杯水车薪。

另一方面,当代的农民合作社是在农户分化、强者牵头、弱者参与、部门和资本下乡的格局下进行的,因此形成了特殊的面貌(黄胜忠,2009;温铁军,2010:6、39)。“基于政绩和利益的考虑,涉农部门逐步开始兴办和领办农民合作社,各种合作社只能和部门利益结合,成为部门的附庸和发展部门利益的‘帮凶’”(仝志辉,2008:167-168),在这种多重博弈中涉农部门则与在地化的资本和精英更为紧密的结合了。

正是在上述比较复杂和特殊的脉络下,温铁军(2010:41、252)结合当代乡村建设各地试验区的具体案例进一步指出:“当前农村经济主体间的互动出现了‘精英俘获’结果,资本和部门通过扶持‘大农(精英农户)吃小农(普通农户)’,既节约了作为外部主体下乡需与分散小农的‘交易成本’³⁶⁴,又因组织起来的农民更有利于部门和资本的盘剥而保证收益垄断。当这种形式和内涵的合作社成为主要形式,其自然不会真正完善内部的合作关系,各种‘交易成本’的节约也仅限于社员的购销需求,而实质上并不能解决小农在市场上的弱

363 如温铁军(2009:374)所指:“即使成立合作组织也不能拉动农民合作,因为几乎所有能够产生规模效益的经营领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都无权进入”。

364 需再次强调,正如前文也有相关注释对“成本”所做的说明。温铁军在此处及本论文其它地方相似用法受其特定书写目标与阅读对象的限制。作为反思性的政策研究与建议,我们对温观点的把握重点不是谈论“成本”时的位置与立场,关键是其所指出的“成本-收益”不对应及“三农”承担“成本”后仍未根本性的解决问题,反而让危机日益隐蔽与深刻。但对于笔者和读者来说,谁的“成本”和什么是“成本”同样也是需要不断追问与反思自觉的问题。

势地位，反可能造成合作社的虚假繁荣局面，改变了财政专项扶持资金维护公平的公益性质”。

这种垄断与排斥构成了当前农民合作社更深层的困境，笔者所负责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培训部从2004年始就建议农民合作社以联合购销的形式尽可能在市场中获取更大收益，然而几年的具体实践却面临重重困难，与其说农民不够努力或方法不对，不如说更可能由于当今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已经被过度化的市场与垄断力量所占据，“为合作社们联合购销预留的空间并不大”（何慧丽，2007、2008）。

在我们的培训中有一位十分认真的学员，培训后回到家乡创办起了合作社，在至今6年的时间里历尽艰辛，他充满感慨的说道³⁶⁵：

“当前农村中，有规模有效益的项目，农业龙头企业在做；小规模有效益的项目，村庄中致富能手在做；有利可图的项目，村庄中小商小贩则是无孔不入。市场上已经形成各自完整的利益链，逐渐形成垄断利益；村庄中占70-80%的分散农户只能靠出卖原材料和劳动力获得利润。……我甚至绝望的做了比喻：‘一群乞丐与一个乞丐能力没有本质的区别，顶多是个丐帮’。

在六年中，我们也在不断尝试发展生产和产品的营销，但在实践中，我发现一群长期被土地绑定的农民，去做市场³⁶⁶，有很大的局限性，我们处在一个熟人社会圈子，我们想做的事，别人也想的到，……合作社的机制没有秘密，大家开会研究要做的事，第二天整个村子全知道。有些事，在村里已形成垄断利益，是一群特定群体的‘盘中餐’，合作社触动了这部分利益，组织者就会受到刁难，甚至报复。合作社目前的情况是利益是大家的，责任却由个人承担。好不尴尬！”

这个鲜活具体的“尴尬”让我们看到研究者和推动者以之为目标的“模型化”合作社及各种原则在面对现实时的局限与无力。如果说它让我们看到主流经济系统因高度垄断而对“另类”实践产生排斥，下面另一类农民学员返乡后的困境则让我们看到主流实际上更通过“经济”与“文化”联合而对“小农”

365 以下为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学员、福建永安市建兴笋竹专业合作社创办人陈绍安2011年5月致部分合作社专家与推动者的信件节选，引用前已经作者同意。

366 作为原文引用，此处应特指主流和狭义理解中的“市场经济逻辑下的经营行为”。

进行着双重制约。

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每次农民合作社培训中，作为院长的温铁军教授都会苦口婆心的反复叮嘱：中国目前的各类生产已经高度过剩，而生产中的合作成本是很难降低的，故风险也最大。所以建议刚刚合作起来的农民先不急上生产项目，而是从产前产后及购销入手……³⁶⁷。但培训过后，农民学员们往往在实践中“不听劝告”，结果导致部分项目亏损而后悔不已。

开始时，笔者常自责可能是培训时强调不够或没讲清楚，但之后慢慢发现根本不是培训本身的问题，也不是农民是否“理性”或足够认真。如果农民学员更愿意选择联合起来规模养猪，既可能有上节所提到的历史原因：对“合作”限定性的习惯想象——人民公社式合作虽已被媒体和主流意识形态反复进行了负面强调，但却不经意间“限制”了互助合作本应十分丰富多样的形式与内容。

同时，长久以来占据主流话语的“农民致富神话”宣传，无疑都是以带头人“个人”（奋斗）为基本叙述单位，虽多辅以“带动全村”，但也往往只是对其事业成功与精神伟大的进一步证明而已，更多篇幅多为“致富英雄”如何战胜普通村民们的“短视”与“落后”观念。如此“意义系统”所建构的“现实”与想象自然都与强调地缘血缘的传统乡土社会及高度组织化的毛时代农村都有着明显的区别，它有效的重建了与外部社会及时代特点可以对接的新标准，它更从“成功学”角度赋予了广大农民受众在精神与文化层面上通过不同形式追求“个人奋斗”式致富神话以不竭的动力。

所以，比起缓慢而又逆时代潮流的信任基础重建，农民学员当然更愿意以“上项目—快速致富”为先。况且对一般的中国小农来说，长久以来，本来就只有种地养猪这类生产活动才是他们真正熟悉和有实在经验基础的，如果没有特殊的支持，农民怎么可能按外来者的期待在流通、购销、金融等陌生领域中游刃有余？

在合作社培训班里，我们常以南街村的“外圆内方”³⁶⁸为例，启发合作社寻找着自己的发展策略与现实平衡。但在现实中，“圆”如何影响“方”？“方”

367 对应这些讲课内容的是相关学术观点（温铁军，2009:90）：“国际经验表明，单纯搞生产的农业合作社大部分是失败的（笔者注：主要指亏损或与目标相距甚远，非“成败论”意义上的“失败”），有回报的合作社经营只可能是在技术服务、加工、金融和购销等非农业生产领域。”

368 南街村位于河南省临颍县城南隅，被誉为全国十大名村，通过坚持“集体主义”以实现共同富裕。“外圆内方”总结自该村名言：“坚持外圆闯商海，严守内方治南街”——内方指南街村特有管理模式，外圆指适应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外部环境。

又是如何以“圆”为想象与标准？这些层出不穷的新问题让我们看到表面独立的经济问题，背后其实包含着各种文化层面的制约。而所谓单纯独立的经济政策与社会共识，往往隐含着许多或明或暗的文化“偏见”，不断生产与流通着的“意义”既共同巩固了主流对经济的狭义界定，又通过如此强势经济所产生的主导效果，反过来巧妙遮蔽“文化”于其间的角色与影响。

3、“经济-文化”视野下的合作社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不再执着于以单一视角及主流经济视野为来分析现有农民合作社的问题与可能空间。既然“在兼业小农占主体的中国农村，专业性农民合作存在着诸多无法在既定结构内部进行突破的限制，因地制宜的推动以社区为边界、提供综合服务功能的综合性农民合作将是更为适合的方向”（全志辉，2009）。它不应停留在“是否综合农协也有缺点”这样的问题上³⁶⁹，它的推动不是得寸进尺般的争取更大空间，也不仅期待农民所获得其他领域的盈利足以支付整体的合作成本，它更应让我们有机会发展出某种“另类”的“经济-文化”视野。

在这种新视野下的“另类”实践，金融、生产、生活、文艺是不可相互割裂而彼此独立的。合作社除经济效果外，也可能为参与者带来包括尊严、认同、信任、安全等社会和文化产出；经济业务的顺利展开，则离不开各种文化、社会、政治、社群等要素或手段的支撑。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更为准确的把握合作组织对于乡村建设及乡土中国的综合意义，挑战对农民合作社各种常见的“定型化”刻板认识³⁷⁰，同时也看到抽象意义上讨论合作社的局限。因此，一方面对合作社的反思和批评不应停留在就合作社谈合作社的阶段；另一方面，必须让合作社重新“嵌回”特定的文化与社会脉络，和其他的乡建实践（如生

369 有人提出“日韩台的综合农协也有不足”，当然，任何合作都不可抽象而泛化的成为教条与必然，更不会如狗皮膏药般的“一合就灵”，当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重要的不是综合农协有多好，而是其针对和处理了什么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否需要直接面对。

370 除上述对大陆合作社“定型化”刻板认识的挑战外，还如许宝强（2009：31）针对其所观察到香港合作社实践所存在的刻板化认识：“合作社的讨论本应是更直接和批判地处理各种经济议题，但结果却讽刺地变成完全拒绝严肃地参与经济践行和讨论商业知识。……倘若这种反经济主义和反资本主义的立场，导出出全面排拒所有组成资本主义的部分，包括物质上的得益（这甚至可能是另类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以致妨碍我们理解现有的资本主义其实是由异质与非本质化过程构建而成的，那么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为积极参与合作社运动者和整个另类践行计划，营造出一个负面的形象——一个不能实现的乌托邦形象”。在此基础上，许宝强（2009：45）进一步指出：“与其把合作社语言的诠释和表述拱手让与跨国企业，使社会运动退至更（自我）边缘的领域，社会运动者应否进据一个较进取的位置，重夺管理、市场、效率等语言，并尝试将它们跟公平、生活素质、异质性和多元化关联起来”。

态农业、乡村治理、乡土文化等）结合起来。

比如，在各种不利于合作的资源条件下，农民的“不合作/合作失败”既可能是外部制约的表现与结果，也可能是某种程度上农民对不利环境、都市导向及文化霸权的消极反抗与自我保护（相对于“资本/部门下乡”的“大农吃小农”），故不应将“不合作”抽离所处脉络而简化为“善合”或“不善合”这样的本质性问题，也不应简单化的归纳为“真假合作社”之争。类似讨论与争论实际上一直伴随着当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过程，特别是2006年10月31日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之后。在大学阶段即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推动工作的钟庆卫当年即指出³⁷¹：需警惕滥竽充数的“假合作社”，因为“假合作社”可以得到政府资金与免税支持，而地方政府也通过如此而获得政绩。在作者的调查中，如此“假”合作社不仅不能给农民带来好处，反而产生其它不利影响——如在河北某村，该县林业局成立了“林果经济协会”，政府部门强迫命令要求该村“枣农协会”挂在其名下，并要求大部分生产资料比如农药，必须在其指定经销地购买，却不允许该村“枣农协会”注册。也有人形象的指出其为“翻牌合作社”，这种多由消息灵通并拥有特定渠道的涉农企业所“翻牌”的合作社不仅“截获”了国家本应给弱势群体的政策支持，同时还挤压草根合作社的应有空间。然而，长期从事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与推动工作的刘老石却在一线的调查中调整了自己原来和上述观点相近的认识。他认为³⁷²：一般意义所讨论合作社的“真假”问题其实是个假问题，很多人谈的“真假”更多指的是规范和标准问题，但是现在很多人用“真假”这个概念客观上却否定了合作社发展的状况（多元化、丰富性）与存在的意义。在合作社发展初期，各种自上而下的严格规范既不切实际、也不现实，不应该在合作社这种本来非常乡土意义的事情上重新回到现代化单一标准与话语中去，也不应低估农民的创造能力，而应该把所谓“真假”裁决

371 详细讨论及全文参见：钟庆卫，《热衷炒作忽略实际：警惕滥竽充数的“假合作社”》，《农民日报》，2006年11月24日，网络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newcountryside/2006-11/24/content_5371113.htm，2012年5月7日查阅。

372 详细讨论参见：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内部学习资料《对话——合作社真假》，2010，其中核心文章为《真假合作社：是合作社的真假还是我们标准的真假？》（刘老石，2010b）。

权交给农民自己（原来多在学者或媒体人等手里），让农民在有判断权的同时也有管理自治权。

笔者认为，首先需要讨论并反思“真假”标准从何而来，从什么意义上来看所谓“真假”，可能还需进一步结合脉络而展开“真假”和“假假（符合草根特点但不符合国际合作社通用规范或“打假者”对合作社主流想象）”的区分。如果结合本文的“双向运动”视野，类似争论虽有特定意义，但如只停留在“去伪存真”层面，而未能对其背后的“正向运动”——“资本/部门下乡”与“精英俘获”进行深入的分析，类似的“打假”口号反可能模糊真问题，充分调动起来的过度期待³⁷³与恨铁不成钢式焦虑情绪反可能成为“规范”³⁷⁴农民合作社的“正当”借口，并进一步成为主流关于“农民果然善分不善合”论述的有效例证，进而抹杀乡土社会和草根合作社因各种先天不足与外部制约而成长出不被已有规范所承认之多元形态的合理性。结果可能是，更为迫切的合作社新空间不仅没有得到开拓反而被收缩，经由实践所打开对经济和文化的重思视野再次被遮蔽。

同样可借助“经济-文化”视野以检视“正向运动”的具体运作与实现。对于“资本”这一下乡的外部主体来说，经济和文化高度统一、并且十分灵活，随时可根据需要而选择更有效率的一种或多种手段。其之所以能在农村迅速产生影响，决不单靠“优惠/促销/返还”等经济手段，而是有效借助了大众传媒与主流意识形态等文化手段，充分利用城乡二元差异下农民对“城市，让生活更美好”³⁷⁵为导向“追赶想象”所重建后的价值观与“意义系统”。而这些文化“工程”的目标当然不止于商品销售与利润增加，其更希望可以彻底的让乡土社会转型为现代意义上的经济社会。当然，这种理想化的状态从来不会彻底的发生，实际也只是经济主义逻辑下的另一种“乌托邦”，它从来就遭遇着各种“社会自我保护运动”的制衡，前文第三章已有来自平民教育案例的具体论证，下一节将通过另一组案例进一步分析。

373 不切合现阶段农民合作社的现实空间与条件。

374 在中国当下语境中，规范往往等同于整顿，对于弱势和无发言权的草根合作社来说，他们无疑是首当其冲。

375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为中国 2010 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主题并因密集型宣传而在中国大陆广为人知，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三农”大国来说意味深长。

三、“乌托邦信条”的虚幻与挑战：城乡互动案例分析

正如第四章的详细分析，现代农业不仅存在诸多不可持续因素，其还作为激进“正向运动”的前沿地带，内在于“高垄断、强排斥”的利益结构及霸权文化影响下。随着能源与生态危机的加剧，当前对现代农业的反思与批判日益普遍，本节不做过多重复，而将重点放在常被批判者所忽略的“叙述/话语”层面——“三农一农化”。正如论文导论中所简要提及，它将本来代表着“文化、社会、经济”立体维度的“农民、农村、农业”窄化为“农业”这一单一经济维度。以此同样的逻辑，本也应多功能的“农业”则进一步被窄化为食物原材料的供应方——这无疑将“现代商业中完全的利润导向和‘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模式植入传统农业，使原本具有多种功能、提供多样化产品的农业趋于价值和功能的单一化，以同质化且并无安全保障的食品流水生产线应对愈发异质化的消费者需求”（曹东勃，2010：12）。这在周立（2010：96-97）看来则是“在发展主义框架下，让农业被推到和第二、三产业一起比武打擂的竞争场上，自然会造成农业多功能性被肢解，而仅短期财富创造价值的生产功能才能被强调，使得农业功能不断走向单一化”。这也是 E.F. 舒马赫最为担心的（1985：72、75）：即“把工业原则应用到农业上”，因为其不仅会对土壤和农业，也将对整个文明造成主要危险。同时“其可能所造成的社会结构，使人与现实的自然界不可能保持真正的接触，并且支持着暴力、敌意与环境破坏等一切最危险的现代倾向”。

除“三农一农化”外，与之相关的“城乡脱钩”也是同样虚幻的另一种“乌托邦信条”，它们和包括“消灭农民”、“技术中立”、“经济脱嵌于社会”等一样，虽看似强大并充满“诱惑”及自圆其说的强势“正向运动”力量，但如果真正回到民众、生活与实践的脉络中，将遭到同样有力的自我保护的挑战。

1、从“真假生态”讨论说起

2011年11月8日的《北京晚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小农场租地种菜只是看上去挺美 成本高且不生态》的报道³⁷⁶，该报道质疑生态农场的生态性，因为其通过老李、老冯和网友“老皇”为例指出：这类农场其实存在“不划算、不丰富、不周全、不认证”这四大“弊端”，因为“虽说 1500 块一年的菜地租金不

376 全文可参见：<http://news.sohu.com/20111108/n324939517.shtml>。

贵，但实际投入的时间、精力和其他费用让这些菜吃起来很不划算”；“一上午，我就收了这么点儿青椒……个头只有市面上普通青椒的三分之一”；“个头小，也没几个，这一小把青椒，只够吃两顿的”；“送菜上门种类单一，菜依然会扎堆”；“‘看上去，这 1500 元就是全部成本，其实不然。’……其实，收这点菜还不够油钱呢……因为北京的小农场全部分散在城郊，记者调查中遇到的最近小农场也在通州张湾镇，距离天安门广场约 30 公里”；“虽然有收成，但很难真正对接家里的餐桌”；“菜都是有生长期的，在生长期内，我们来这里就是除除草、施施肥、浇浇水，也带不走什么收成。但成熟期一来，你看这白菜、萝卜，全可以收，又多了，哪吃得完啊！”；“在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大背景下，有机食品似乎被认定是一种更安全、更健康的食品，其实并非如此。……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有机食品更营养健康”。记者由此得出结论——这种农场只是以生态为名，实则不生态。

这篇报道引起消费者与生态农业实习生们一场公开讨论，正是这些讨论引起该报派同一记者再次前来调查并发表立场与角度都有很大差异的第二篇补充报道³⁷⁷。针对第一篇报道的质疑，很多实际参与其中的消费者不这么认为，配送份额成员范敏坚（2012：21-22）认为：“这个成本高，是怎么比较的呢？的确，如果是自驾车，油费就要 30 人民币。可这是和什么在比呢？我不来种菜取菜，去郊区的农家乐或是休闲度假，里程、耗油油费一样不少，成本可低？就生态了？……我在家门口买到的菜，难道是家门口长的？且不说蔬菜本身的生态性，单说蔬菜的运输距离计算过吗？……贵就不划算吗？我吃着放心，踏实，这个感觉，买得来吗？多少钱算合理呢？客观效果上讲，看中国近年的发展，就是恩格尔指数降低，这算发展进步，可降低的那些百分点，都补到医疗支出上了，那么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吗？”

退休的劳动份额成员尹瑞庆（2012：26）则认为：“对于这些付出，我们不但不会把它列为菜的成本，反而成为我们到郊区呼吸新鲜空气、强身健体和朋友交流的需求，成为我们向往健康生活的一部分。收获的蔬菜反倒成为了副产品”。

此外，多位终日与生产者及消费者相伴的农场实习生们从不同角度表达了

377 全文可参见：<http://www.takefoto.cn/viewnews-14232>，如果把两篇报道比较起来，是个分析大众传媒如何处理“另类”实践的很好案例，相关分析可参考本论文第一章，“文献回顾：学术批评、传媒论述与影响”中第三部分。

自己的意见³⁷⁸：他们首先指出“在中国，都市农业虽然冠以‘都市’之名，但其在城市中的生存状态是尴尬的，它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残留物，城市发展在哪里，农田就消灭在哪里”。因此，这在2010年就开始实习的黄巧真看来：“在一个过度开发的大城市里，无论如何强调这里的‘在地农业’要做到‘低碳’‘生态’‘有机’，都是达不到概念里所寄托的市民期待的。我觉得这是作为北京常住民的人要去认识的一个道理。”；2011年开始实习的罗逸在其写的《白菜，劳动，生活》中谈到：“劳动不仅仅只意味着干体力活、收获健康的食物，它也承载着人与人沟通交流的功能。很多城市家庭觉得沟通越来越少，是因为城市生活最大限度地剥夺了人们一起劳动的机会。”；毕业于中国农业大学的实习生罗龙吉则认为：“我觉得有种委屈在里面，农场有苦说不出。来农场种菜是成本高，但并非我们自己的问题，而是北京这种极端城市化，把农田都挤到六环之外。如果小毛驴真的能把农场开到公园里，开到社区里，也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市民来种地不仅收获菜，还收获快乐，收获家庭的融洽、收获孩子的教育，收获健康的身体，这些难道不需要算到种地的结果里面吗？为什么如此片面的追求种地的GDP呢？”。

类似讨论无疑在经济和文化层面都可带给我们十分丰富的思考，所对应的实践则在继续发生着。这场争论的对象与实习生们劳动和学习的载体就是创建于2008年的小毛驴市民农园³⁷⁹。它位于北京西郊自然风景区凤凰岭山脚，是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在其多年积累的生态农业与城乡公益网络基础上整合推出的新探索³⁸⁰。其前身就是前文各案例发生及笔者完整参与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2007年学院被迫停止工作后，为生存并发展乡村建设事业而选择

378 因不同观点汇总于一篇文章中，同时本引用参照自网络版本，无法标注页码，以下讨论均参见《小毛驴市民农园 CSA 简报》（2011 年第 12 期）中的文章“生态农场，是爱是恨？——对《小农场租地种菜只是看上去挺美 成本高且不生态》一文的讨论和反思”，罗逸等，<http://www.littledonkeyfarm.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22&extra=page%3D1>。2012 年 5 月 8 日浏览。

379 详情请参见小毛驴市民农园网站：www.littledonkeyfarm.com 及各种相关媒体报道。它借鉴国内外 CSA（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经验，通过建立一套可持续的农业生产和生活模式，倡导并实践“发展生态农业、支持健康消费、促进城乡互助”的行动理念，推动食品安全、生态文明与城乡良性互动，促进中国城乡统筹和可持续发展。最终希望将商业模式与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理念融为一体，引导城市健康消费合作社与农村绿色生产合作社对接，通过城乡间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直接互助，重建社会的信任与合作机制，实现城乡良性发展。

380 类似创新探索早在小毛驴市民农园前就已存在，如：2006 年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发育的农民合作组织经济联合体国仁绿色联盟；2006 年“教授卖大米”事件与河南兰考南马庄“购米包地”实践。详见：黄胜利，2007，《“卖大米教授”何慧丽：将城乡互助和谐进行到底》，《中国经济时报》，http://finance.ce.cn/macro/gdxw/200710/31/t20071031_12681449.shtml，2012 年 5 月 9 日浏览。

了“公司化转型”³⁸¹。和其它“另类”做法一样，“转型”一开始就“遭遇”诸多“正向运动”影响下主流社会运动的批评——认为此举将服务中产阶级³⁸²，未能自觉独立于“资本”之外，总之将变得“不纯粹”³⁸³。实际上，如此“偏见/定见”不仅发生在中国内地，同样也存在于当下的香港³⁸⁴。

下文将以近三年来该农场的实践为例，通过这些充分社会化并具有广泛社会影响与社会意义³⁸⁵的工作，进一步讨论各种“乌托邦信条”本身的虚拟性及来自实践的各种挑战。

2、“农业多功能性”的遮蔽与再现

笔者认为，小毛驴市民农园近年来受到普遍欢迎³⁸⁶并保持着不竭创新动力的两大原因³⁸⁷分别是当前日益严峻的食品安全危机与农业本来和从来都应该是

381 2008年5月，学院核心团队在北京海淀区工商部门注册成立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小毛驴市民农园是该中心近年的主要项目。为何要“转型”？它不仅是借公司的名义以解决现阶段民间组织注册难的问题并减少对公益基金的依赖，还希望可以向商业与经济学习，挑战NGO思维中的偏见与盲点。

382 “为中产阶级服务”的质疑既对也不对。“对”是因为：中国中产阶级目前不仅已经有着庞大的数量，其拥有引导包括底层和广大农民在内消费方式的“话语权/时尚权”，同时中国当代中产阶级还需通过教育和成长以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不对”是因为：百年乡建本来就扎根并出发于乡村/民众，与其“服务”不如是“对象为”中产阶级；其目标本来就包括如下：结合公平贸易，让来自中产阶级的利润直接返回生产者并进行生态补偿，同时也因中产阶级的参与而让农民和其他生态农业从业人员获得可贵的尊严；再次，通过重新定义与评价生态农业，在农村引导农民工通过多元化的城乡互动方式返乡创业，在都市则发展社区农耕与阳台农业等方法以探索城市低收入人群与生态农业的结合。总之，基于复杂的脉络与现实，类似工作不可能一步到位，所可能的影响也是直接与间接相结合。

383 结合上文分析，在当前如此复杂之社会文化脉络与各种利益结构充分“共谋”的情况下，抽象的“纯粹”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可疑的期待。而对于NGO的经济独立，王绍光（2002）早已通过多项数据分析指出，所谓市民社会自给自足这一深入人心的“独立迷信”在全球范围内根本没有事实基础。因此，NGO圈内某种程度上的“道德洁癖”不仅涉及判断标准问题，也反映出其对社会运动的“定型化”想象及对各种二元对立框架缺乏应有反思，如部分组织不自觉的受限於“非政府/非盈利组织”这样以别人为“非”的命名中，既易掉入割裂与二元对立的思维陷阱，也可能将本来复杂的“对手”简单化和单一化，反过来影响对自我的认识与空间判断。

384 许宝强（2007：290）通过对香港近年来社会运动与左翼思潮的观察指出：“社会运动者往往拒绝运用跟各种资本主义权力集团有关联的语言，诸如利润、市场、贸易、管理等。虽不少左派都能接受‘人民计划’，但人民的‘市场’、人民的‘自由贸易’、人民的‘金钱’却更易被指责为‘披着人面的资本主义’。这样处理的效果，不仅把‘资本主义’本质化和单一化，甚至也把预设为资本主义对立社群——庶民、边缘群体、生态环保团体本质化，仅以其反‘资本主义’的性质来想象他们”。

385 它直接针对着这样一个普遍而又深刻的悖论：本应作为和吃饱饭一样的基本权利——吃上健康和无污染的食品，在物质条件绝对富足的当下（据《人民政协报》报道，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武维华表示：经测算，全国每年浪费的食物总量可养活2.5亿至3亿人。详见：

<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10/03-10/2161052.shtml>，2011年12月7日浏览。），反成为一种奢侈、时尚有闲的标签和有钱人才能享受的“特权”。而那些有幸可以自留健康农产品的农民也并不如消费者所想象的那样——把有毒的卖给别人，专留无农药的农产品给自己。因为其所卖出的有害农产品已经让他们更直接而大剂量的接触到农药，他们比分散和间接接触的消费者更难以逃脱。

386 截至2011年12月，农园已经得到海内外近200家媒体的采访报道，吸引了大量市民、农民、大学生、学者、媒体、NGO、工商业者和政府部门等不同身份、群体的广泛参与，接待国内外不同身份前来小毛驴农园参观的人数接近万余人次，包括三十多批300多位国际友人来访。在北京市乃至全国各地、世界生态农业领域引起了普遍关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所倡导的模式也已被中国个别省市（如贵州省贵阳市）正式写入政策法规。

387 客观的讲，除无数同仁的努力与付出外，小毛驴市民农园及城乡互动实践近年来所引起的较大反响与

“多功能”的。一定意义上说，对食品安全的普遍焦虑与自觉意识也可算是坚持以工业思路彻底改造农业之“正向运动”乌托邦破灭后的某种反应³⁸⁸，因不是此部分重点，相关分析可参考上章相关内容及本节基本分析思路。

此处希望指出并论证的是：即使常被认为是“三农”中更接近经济与技术层面的农业，本身也都包括生态、文化、社会等多种面向与功能。只是由于长期受“正向运动”乌托邦信条的影响，致使生产与经济之外的其它面向受到很大的遮蔽。然而，随着生态危机与现代城市普遍困境的出现，农业内外的各种“乌托邦”特征将逐步得以显现；外加经济和文化“另类”视野对“正向运动”所主导“意义系统”的挑战，这让农业多功能性的再现与重新获得认识成为可能。

比如，小毛驴市民农园³⁸⁹配送份额其生产过程产生的各种风险由双方共同承担，成员需不定期到农场参与劳动体验，并监督农场生产³⁹⁰。农场则定期举办各种活动、编辑相关简报，给成员传达农场的动态信息，宣传环保健康的生活观念。如此做法既不断生产与流通出新的“意义”，同时也是打造社区、家庭与生产基地直供链条³⁹¹的方式之一，所构建的多重信任体系还打造了“本地生产、本地消费”产销共同体，将传统市场运作中被分割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

各种客观形势变化有着极大的相关性。2008年“三鹿”毒奶粉所引起的“后三氯氰胺”时代在不同层面上改变着消费者与类似“另类”实践的外部环境。可供对照的案例是2006年的“教授卖大米”事件与2009年的“女博士种菜”事件，两者同为相似新闻点的媒体事件，但媒体的立场与价值取向却有较大变化，前者毁誉参半，后者的嘲讽与批评则要少很多，更有记者从职业性采访到直接去农场租地种菜。这两个案例的媒体报道广泛存在于网络，笔者在此不一一列举。

388 如温铁军（2010：78）在第一届全国社区支持农业经验交流会闭幕式上针对会议所作的总结发言时谈到：“有人问怎么动员市民参与？最好的动员不是我们，不管我们做了多少宣传，但并不能被城市中的中等收入群体完全接受。那么，什么是他们最能接受的呢？不是我们的宣传，不是我们的教育，而是产业资本全面过剩条件下的恶性竞争。‘过剩到死资方尽，钱烧成灰泪始干’中等阶级转变成绿色健康的消费，是谁教育的呢？不是我们教育的，是那些有毒食品教育的，是孔雀绿、苏丹红的功劳……。”

389 以下小毛驴基本业务的材料参考自：严晓辉，《小毛驴市民农园三年运作总结》，2011，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编印：《第三届全国社区支持农业（CSA）经验交流会资料汇编》（内部资料），第18页。

390 当前的食物体系在安全和监管上存在着市场与政府“双重失灵”（石嫣，2010：127）。小毛驴市民农园各劳动份额市民因其不定期到农场劳动，便捷而又多种形式的参与着对农场生产的各种监督。同时，全国各地志愿者长期在农场参与劳动和媒体的不定期采访都起到监督作用。

391 它有利于获得兼顾生计与生态、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合理价格。正如周立（2010：117）所指：“当前实际既非生产者定价，也非消费者定价，而是中间商定价”。如此长链销售不只让消费者承担着更高的成本，实际上“这些链条拉的越长便越能避开规则、惯常的控制及通常的监视，资本主义的进程也就越清楚地凸显出来”（布罗代尔，2003）。而小毛驴所采用的“短链”模式，既希望将消费者所支付货币最大程度的直接到达生产者和生态环境恢复者手中，同时还“让消费者在新的生产链条中承担其应尽的责任，在逐步的自觉中避免所形成的‘倒逼’机制让商家增加食品安全风险”（石嫣，2011），这种新的销售形式既提高消费者的参与感，还改变了主流的定价规则。

的纽带重新建立起来，更可以促进社区的发展³⁹²，解决由于消费者与生产者脱节而形成的信任缺失问题。这不仅促进了食品生产的两端建立互信互助的透明关系，也保障生产者的收益与消费者的健康，同时减少产销对立矛盾与缓解了食品安全压力。

再如，小毛驴的劳动份额则是另一类“农业多功能性”的有力体现，该会员在农场有一块自己的菜地，既可体验田野劳动，又可收获全家健康。成员们就像一个大家庭，共同在农场的区域内经营自己的菜地。在休闲之余，市民通过自己种地，蔬菜安全有了保障，家庭饮食结构也发生变化。更重要的是，这个过程让人们重新认识农业和食品的关系。在这里，他们可以认识新的朋友，形成不同的邻里关系，互相帮助，互相交流，形成一个以蔬菜种植、老年休闲、儿童教育、周末休闲为内容的都市农耕社区。

这些实践不仅带进了多种参与主体，也为重新思考农业增加了角度³⁹³——除满足食物需要这一最常见的功能外，它还有“文化教育、生态环保、休闲观光、农民就业、农村生活、农民生计等社会功能”（周立，2010：101）。它与上一节讨论的农民合作组织前后呼应，在其所推动建立的城乡互动平台上，农民与市民（生产者与消费者）不再是落后与现代、贫穷与富有这些二元对立的对应物³⁹⁴。通过城乡不同层面上的组织创新，两部分群体都更好的掌握着自己的生活，减少对外部的依赖。“农民既不是被动的扶贫对象，他们有能力生产出无污染、天然的健康食品；消费者也不是被动的购买者，他们只要支持农民生产并承担应尽的责任，就可以获取安全健康的食物”（张和清、杨锡聪、古学斌，2008）。

该实践还有助于挑战我们对“经济”的定型化想象。虽然小毛驴市民农园工作涉及到一般的经济形式与手段——销售、物流、客服、品控、团购、开发

392 CSA 之所以是“社区支持”，而非一般的“消费者支持”，因其强调社区作为社会的微观体现与功能单位，更象征性的让我们去想象一种让过度耗能与污染的产业经济链条得以缩短的可能形式。而对于社区的含义，Hillery 指出人们至少可以从地理要素（区域）、经济要素（经济生活）、社会要素（社会交往）以及社会心理要素（共同纽带中认同意识与相同价值观念）的结合上来把握（石嫣等，2011）。

393 黄紫翎（2011）结合台湾相关实践，转述 Brunori 所论及其存在的丰富意涵：“功能上，它具有健康与品味的意义；在生态中，它注重食物里程的距离、生物多样性与地景的变化；美学上，它使地景呈现多样化与差异性的面貌；伦理上，食物具有本质上的真实性（本真，authenticity），并且与人类社群掺杂了认同感与休戚与共的连带关系；在政治上，食物可以改变传统食物链中种子、农药、加工、制造与营销公司等权力支配，具有改变生产与消费模式的影响力”。

394 有了这一前提，让我们有机会在“生态文明”坐标中重新看待乡村老人、乡村妇女等“劳动力残值”群体的意义，比如前者恰可能是即将消失的传统生态农耕技艺的传承人，也可能是社区记忆与文化的保存者。

票等，从表面看似乎很难可以被以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为目标的社会运动所承认。但如果可以突破对主流经济的狭义理解，不将经济等同于狭义的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式的垄断经济³⁹⁵，以上案例即可理解为在民众和生活脉络上所存在着十分丰富的经济：道德经济、信任经济、尊严经济³⁹⁶、社区经济、团结经济、互惠经济等。它们不是另一种具体的经济形态，而是让经济重新结合起社会、政治、文化等脉络，让经济重新“嵌回”社会后的新理解。与其说是对主流经济的替代，不如说它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空间，在新的坐标中让我们尝试摆脱主流，去想象并寻找新的“另类”可能。

3、城乡“脱钩”³⁹⁷，还是城乡互动³⁹⁸？

除前述“三农一农化”和“农业单一功能”存在着“虚幻性”外，笔者同样认为主流对城乡关系的认识、想象和处理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虚幻性”。

无论作为空间还是议题，城市和农村从来都不可能真正的相互独立或割裂³⁹⁹。挑战“城乡分割”这种更有利于向“三农”与环境转嫁成本的主流论述框架⁴⁰⁰与现实当然是乡村建设的工作与努力方向之一，但如果反过来认为“城乡割裂”或“城乡脱钩”作为目的本身，笔者则认为是需要同样引起警惕的另一种“陷阱”——既因其不自觉的将“乡村建设”简化为“建设乡村”，更将复杂的城乡关系对立、固定和本质化，其实同样体现着激进“正向运动”的“去脉络”及“乌托邦”特点。

事实上，推动良性“城乡互动”⁴⁰¹不只存在于当代实践，其贯穿于近百年来乡村建设的整部历史中，只不过历史上的乡村建设当时还无需直接面对“逆

395 详细分析和辨别参见布罗代尔（1997、2003）的相关论述。

396 让在主流经济中处于弱勢的群体（如农民）和产业（如农业）重新获得尊严。

397 正如导论注释已经提到的，乡村建设实践内外都存在一种看法，认为乡村建设是“乡村的建设”，极端逻辑即“城乡脱钩”后才有利于乡村的建设。此处讨论主要针对这种观点与逻辑，希望特别指出不应画地为牢，而要看到无论是历史还是当代城市与乡村之间实际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相互依赖和融合的程度有所不同。除此外，城乡“脱钩论”还不利于对刻板定型化的城乡关系与观念进行真正的挑战。然而这种对“脱钩”的反思并不妨碍笔者对已存在“城乡割裂”历史与现状的批判。

398 下文分析与另外注释中已说明此处非等同于一般意义的“城乡一体”。城乡互动强调动态性和开放性，即可能城影响乡，也可能乡影响城，结合全论文的分析与观点，笔者在此更强调对主流城市形态与观念的根本性挑战与反思。

399 特别是当“城市化”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并深刻影响和主导着农民生活时。

400 “城乡分割”的后果之一是农村被优先定位为生产场所，而非完整意义上的“生活-生产”场所，如此自然衍生出农民对城市所象征生活方式与消费方式的无限向往和“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与价值观的重要转变。

401 此处城乡互动，非简单“互助”，既强调其是个动态的过程，更有挑战城乡固定边界与文化定见（城强乡弱）等多重意涵。

城市化”⁴⁰²与“食品污染”，故当年的城乡互动在理论上反思“工业”与“城市”在“城乡割裂”格局下对乡村的剥夺，在实践层面则创造条件推动人力、资金、教育资源等向乡村的合理回流。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建设历史本身就是重思并改善城乡关系的历史。因此关注城乡，绝非简单的领域转移与扩展，重要的是从“关系”角度切入，同时它还是我们利用当下现代“城市病”这一普遍困境进行主流价值重估的难得机遇。

在谈到中国本土的社区支持农业实践时，在全球推动 CSA 二十余年的美国永续农业运动有机委员会主席伊丽莎白·亨德森（Elizabeth Henderson）（2011：41）认为：“在中国，由于小农经济的种植模式，自古以来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距离就是很近的，但从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一些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消费者距离土地的距离越来越远，由于农民的生产利益难以保障，食品安全的问题频发”。该观点表明现代城乡形态⁴⁰³才是当下各种食品安全与消费者信任危机的温床。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城乡关系不像西方一样处在对立的、控制与反控制的过程中。相反，中国（传统社会）的城乡关系是互相哺育的过程”（吕新雨，2010）。准确的说，现代城乡关系也不应该抽象的进行单一化认识，在实践层面其实充满多种可能性⁴⁰⁴，而此处主要挑战的是受“百年激进”与“乌托邦”信条影响下主流的现代城市观念⁴⁰⁵。

当今天的我们从政策和道义上都熟悉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⁴⁰⁶，梁漱溟（2005：558）在 70 多年前却提出一个不太一样的观点：“西洋现在社会可以谓之二本，都市离开了乡村，超过了乡村，独自发达；初时则压倒乡村，后来则转回救济乡村；总之，让都市与乡村仿佛成了两极端，成了很不相同的东西。其实都市与乡村，不应当有很大的不同，不应当是截然两种东

402 详见：<http://baike.baidu.com/view/483922.htm>，2012 年 2 月 7 日浏览，此处更注重对现代“城市病”的反思。

403 吕新雨认为（2010）：“近代以来，随着现代化的开启，中国的城乡才开始分裂，并成为世纪以来中国最深刻的现代性问题”。

404 如吕新雨（2010：119）进一步指出：“现代化以来的城乡关系还要进一步有所区别，其中毛泽东时代的城乡割裂与今天的城乡对立需分别对待。前者的城乡分割是国家完成工业化战略的条件与前提，但与此同时，那个时代却通过‘政社合一’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设计，以及用强制的方式让知识青年、医疗队和科普知识下乡等方式克服以城乡差别为代表的三大差别”。

405 就现代城市形态来说，现代城市里的隐居、社会原子化以及精神隔绝的程度在人类史上实际上是空前的，城里人比他们的祖先在农村还要与世隔绝。但在主流论述中，往往仍以“开放的城市/封闭的乡村”作为不言自明的“常识”，即使批判性的观点也多不自觉的共享着与对手同样的逻辑，可见更重要的批判是对“现代城市/城乡关系”的定型化想象上。

406 该提法于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2005）上，由胡锦涛总书记以“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所提出。详见：http://www.gov.cn/jztzl/2005-11/18/content_102073.htm，2012 年 2 月 23 日浏览。

西；而应当调和”。

在遥远的欧洲，同样带着对主流定型化的城市形态与城乡关系想象的批判，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⁴⁰⁷于1898年提出了至今仍产生着全球影响⁴⁰⁸的“明日的田园城市”。在他看来，“田园城市不是城郊，而是城郊的对立物；也不是乡村避乱所，而是为生动的城市生活提供完整基础”（埃比尼泽·霍华德，2000：译序24）。因此，他希望用一种“城乡一体”⁴⁰⁹的新社会结构形态来取代城乡分离的旧社会结构形态，因为城市和乡村都各有其优点与相应缺点。如果能够从这样的高度和角度进行认识，城市规划自然不应停留于技术层面，而应是一种整体性社会改革思想的创新与实践。虽然一百多年来，英国、奥地利、澳大利亚、比利时、法国、德国、荷兰、波兰、俄国、西班牙和美国都有对这一有别于主流现代城市思路的具体实践。但这个公认的经典，似乎仍无法获得更大的空间，这点正好呼应着同为“另类”实践乡村建设的实际处境——因为如本论文各章所述，两者都从属并受制于更大的“双向运动”。

回到中国本土“城乡互动”的具体脉络中，除本论文导论所述“整体性危机”对原有“自圆其说”叙述所进行的挑战外，随着实践的不断互动与反馈，既蕴育出当代中国城市消费者超越于一般个体维权层面的实践性自觉，又为打破“单向运动”视野和展开进一步“另类”实践创造空间。下文的三个实际案例分别来自小毛驴市民农园创办三年来不同年份的会员消费者，相关内容均来自这些北京市民亲自叙述的原文。

2009年自取份额成员钟声除自己消费小毛驴产品外，还主动在其居住小区发起成立“自取小组”，在第一届全国CSA经验交流会上，他（2010）做了一个题为“我们为什么发起自取小组”的分享：他先谈了自己所住小区邻居之间互相的不信任、冷漠与戒备，而：

“2009年年初，给了我们一个‘拆墙’的机会。小毛驴本身就是建立市民与农村之间良性关系的。我们小区有相同想法的人，通过小毛驴建立了互相的

407 20世纪英国著名社会活动家，城市学家，风景规划与设计师，“田园城市”运动创始人。1850年1月29日生于伦敦，1928年5月1日卒于韦林。当过职员、速记员、记者。他了解、同情贫苦市民的生活状况，针对当时大批农民流入城市，造成城市膨胀和生活条件恶化，于1898年出版《明日：一条通往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一书，提出建设新型城市的方案。

408 其1898年所著《明日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是一本具有世界影响的书，曾被翻译成多种文字而流传全世界。田园城市运动也发展成世界性的运动。在当今的城市规划教科书中几乎无不介绍这本名著。

409 笔者认为，基于现有经济文化结构，简单的谈“城乡一体”同样有浪漫化成另一种“乌托邦”信条的危险，故此处以“城乡互动”进行表述与定位，主要强调其中的动态性与开放性。

联系。”通过组织起来，轮流取菜，“大家平常还会经常进行沟通，分享之间的喜怒哀乐及取菜时的心得体会。……除此之外，我们自取小组还给孩子组织了绘画班、舞蹈班，不是外面平常的收费班。我们的舞蹈老师就是自取小组成员请他们的亲戚来担任的。……孩子容易建立起这种关系，大人却不容易建立这种氛围。但是通过这种方式，邻里之间的接触就比较频繁了”。

相比而言，2010年亲自来农场劳动的尹瑞庆（2010）则认为：

“细细想来，生活的改变，让我们失去了什么？外出旅游不再安排，很少在外就餐；而生活的改变，让我得到了什么？一是身体比以前强壮了，菜园是一剂养生又强筋健骨的灵丹妙药。二是收获了健康安全的放心菜——吃菜时，再也没有心理负担了；更大的收获是在思想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在思想中逐渐清晰和深入。……小小菜园联系着大目标。受大学生的感染，我们会把装鸡蛋的塑料盒和配送小西红柿的网兜带回农场，重复利用。在家里也进行垃圾分类，更注意节约水电”。

虽然2011年小毛驴每斤8元的菜会让有些人觉得贵，但配送份额成员聂露却这样分析道（2011）：

“看起来每周64元的菜价比市场上贵，但这样健康值得信任的菜却为我们全家的其他生活带来些悄悄的改变——减少吃肉、洗菜省水（不担心农药残留）、每周至少取消一次外出吃饭（家里固定有健康菜，意识提高后自然担心外面的食品安全）、减少购物频率……并且，这种“昂贵”的菜还起到十分重要的教育作用，教育自己及家人尊重农民的付出，同时它也教育了农民，这种健康产品的高价格是对诚实劳动农民的奖励”。

正如上章所反思农民选择一样，以上案例也不仅是一般意义上消费者理性或选择的问题⁴¹⁰，更大意义在于其所带出的文化经济脉络，它同时体现着“人们对于现代化并入全球化运作中，化为社会关系、制度、与竞争过程中的工业

410 一个可供参照的案例：郭于华针对近年来的“珍奥核酸”、“脑白金”事件指出（2005：102）：“市场和社会造就了日益‘精明’的消费者，但这种被要求全知全能的消费者又是最缺少知情权的——信息残缺、虚假广告、包装做秀会让消费者在以为是自主选择和舒服愉悦中被愚弄和被宰制。因此‘全知全能’消费者的另一个面相是与之共存的‘无知可怜’的消费者。在科学至上甚至‘崇尚科学’、‘信仰科学’的时代氛围和强势话语中，在面对权力、知识、专家和围绕着它们的高科技光环时，普通消费者处于绝对的弱势，而且他们对这样一种处境并不自知”。

化、商品生产系统，如：惯行农业的生产、食品加工、销售型态等现况，如何产生反省与质疑，进而有所行动”（黄紫翎，2011）。

笔者认为，这些案例不仅让我们看到消费者在新条件下的自觉与对主流“意义系统”进行着的实际改变，挑战了我们对“城市人/消费者”及“城乡关系”的类型化想象，更让我们看到由此所打开各种“另类”空间的现实可能。再例如：社区支持农业虽然表面是一种“买卖”的经济关系，但同样也可能引发更多不同关系，它包括生产者与消费者、城市与乡村⁴¹¹、人与自然、消费与生产，劳动与闲暇、农业与非农业、种地老手和新手⁴¹²等；虽然每位成员需要付出一定的现金⁴¹³，但作为一种风险共担的付出与承诺，其本身更有利于对当前城乡及生产者消费者互不信任的改变；虽然以货币作为建立彼此关系的手段之一，但小毛驴市民农园却以此为基础发展出更多以二手物交换、投稿换菜等“去货币”的“另类经济”⁴¹⁴，并从中收获乐趣、循环利用的可持续生活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和谐；虽然由农村生产者合作所引发的城市消费者合作及城乡互助，更像是社会组织，但其却同时拓展了经济交换范围，改善了市场环境，降低沟通与监督成本（内部监督，避免外部认证的高额成本），让生产者有更合理的投入产出，并部分改变了消费者的经济行为（包括如何定价等）⁴¹⁵，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降低了成本⁴¹⁶与风险，增加了效率。最后，虽然部分消费者在大众传媒与现代商业宣传影响下带有“消费者是上帝”的优越与自我感觉，但通过他们参与过程中的细微变化可以发现，“傲慢/理性/非理性”并非本质使然，背后正是更大的文化经济脉络，新空间将伴随这些脉络的变化而得以开拓。

411 小毛驴市民农园已认识到现有探索还主要局限在大城市周边的郊区农业。未来探索的主要方式则是推动农村地区农民合作组织与城市消费群体的对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乡互动。比如，2012年3月与现农场邻近的海淀区柳林村合作共建的“小毛驴柳林社区农园”及由此延伸的村庄综合发展与乡土文化计划，即是一种新的探索。

412 小毛驴农场目前已逐步出现一些积累了经验的老成员志愿指导新租地成员的案例。

413 由此延伸开的各种“经济”手段，还希望利用现代社会已有的“常识”、语言和规则，减少重建“新常识”的巨大成本——如用价格差距（小毛驴租地分成三个较大差距的价格，“低端”产品占绝大部分，其实是为大家亲自动手；而配送到居民点较为低价，则是希望大家可以自己步行或骑车到附件居民点取菜，鼓励大家环保并配套汗水）这一易于接受的手段，鼓励市民自己动手田间劳动及到配送点自取蔬菜，以引导他们体验生产的艰辛并减少物流到家的高能耗。

414 2011年7月9日，小毛驴农场举办第一次专门的“二手市集”，以后将不定期举办。

415 详见2006、2007年河南兰考南马庄农民合作社在北京推动的两届“无公害大米价格听证会”
www.3nong.org/bbs/viewthread.php?tid=15467，2012年2月26日浏览。

416 类似的成本意识常被NGO和社会组织所忽略。

四、小结

本章从对主流经济及主流文化的不同理解与反思出发，结合笔者所长期从事乡村建设实践的另外两组案例尝试指出：

表面独立的经济议题背后其实包含着来自社会与文化的限定与影响，故需一种“脉络化”的整体视野及让经济重新“嵌回”社会的理论敏感与实践框架。同时，正是通过经济与文化的进一步结合和透过“意义系统”层面的运作，各种形式的虚幻“乌托邦信条”才得以实现。正是在这种结合起经济与文化的新视野下，乡村建设包括农民合作、城乡互动等实践都不能简单的讨论“合作”或“城乡”。

对于农民合作实践，既要看到其所同时承载的历史遗产与债务，也要回到实践所在的当代脉络，同时还要意识到类似实践如何受制于各种先入为主的文化偏见与意识形态影响。

对于城乡互助实践，首先要看到在当前的论述与想象层面上，主流的农业与城乡关系其实既现实又虚幻，“农业多功能性”与“城乡互动”这种“另类”城乡关系的再现，某种程度上正是对主流现实与论述所产生的反应、挑战与拒绝。

其次，“双向运动”的视野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正是“正向运动（中产阶级/城市导向/现代消费观）”遭遇并接受“反向运动（通过‘食品不安全、农民离乡离土、乡村荒芜’等为表现的分别来自‘三农’的反抗与自我保护）”的改造，在实践中进行着以“多功能农业”、“社区支持农业”、“城乡互动”为表现的创造与回归。

综上，只有结合起经济与文化，才有助于加强对各相关议题的深入思考，并让行动者准确理解自己在实践中所遭遇的各种困难，所谓“另类”空间自然也不可能抽象与纯粹的独立存在，而是与主流实践同样的存在于整体性脉络中。在此意义上，乡村建设通过对现代社会及各种“常识”和“偏见”进行挑战与质疑，并由此尝试一种让“经济”重新“嵌回”社会，让“文化”服务于“脉络化”的“另类”实践之可能路径。

我在此强调的真理严峻的不完全性可能成为一些读者悲观的来源。但是，在承认没有人再能把他人当作孤立的客体或文本来书写的时候，难道没有一种解放在其中吗？

（詹姆斯·克利福德，2006：55）

我们想建设的不是一座新公园，而是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里，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和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田园里每个工作步骤的重要性、创造的喜悦和感动，以及令人舒服的空气。

（塩见直纪，2006：22）

结 论

本论文希望把乡村建设实践放置在更为复杂与动态的脉络下，尝试以一种有别于“成王败寇”逻辑的叙述与视野，从被忽略和尚未引起注视的角度重新审视并理解中国历史及当代的乡村建设实践。在此过程中，一方面通过以参与者独特的视角，同时结合历史先行者的著作、回忆、批评及包括笔者在内当代实践者亲身参与的具体案例，从微观到宏观层面去把握实践的复杂与丰富。另一方面，通过将具体实践扣联（articulate）到近代中国转型的“百年激进”进程及宏观层面上各种经济文化运作，以了解对于中国这样有着庞大农业人口及以乡土社会为底色的文明体，乡村建设在一定程度上的必然性及其所具备的独特意义。

这种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不同于一般研究中将历史与当代实践分开或仅作表面上的联系比较，因为笔者认为把两者互动起来才有利于历史与整体性视野的形成，并十分有必要带入参与者的敏感与视角，进而更好把握乡村建设的独特性。虽然时空及实践内容有一定差异，但历史及当代乡建实践可以统一于笔者的以下研究目的：即通过脉络化的讨论，以理解乡村建设的生命力、深层意义与困难⁴¹⁷；并在此基础上对已有各种“类型化”评价认识、“刻板化”参照坐

417 也即笔者在导论中所提出长期困扰自己的这些问题：“为何这些实践会不约而同而又彼此呼应着相似的批判与思考？为何乡村建设会成为不同背景学科与出发点下“另类”知识分子的某种殊途同归？面对如此多的困难与曲折，为何乡村建设仍具有着不竭动力与坚韧的生命力？作为一个参与其中的实践者，具体到自己及同仁们的工作，虽然不可谓不努力，但为什么实践者们的目标和结果却永远

标及背后的“意义系统”进行质疑与反思。重思和挑战之后的落脚点，当然不是追求另一种“模型化/理想化”的乡建，它一直为笔者所努力拒绝，而是重新理解乡村建设的定位与特点——无论“自我保护”还是“另类实践”，以及其与主流社会的复杂关系及互动。此即笔者所认为乡村建设更为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决定其将一直面对着各种困境与张力。希望通过这些命题的进一步认识与把握，也有利于乡村建设及相关“另类”实践新行动空间的打开。

为更好实现以上目的，笔者借助卡尔·波兰尼“双向运动”视野，但努力避免极易滑入因生搬硬套而削足适履式的寻找本土或农业上的“双向运动”，因此更多借鉴其“视野”⁴¹⁸上的意义，希望通过它更好看到那些被遮蔽与忽略的面向，进而解决困扰笔者的现实与实践问题。同时，全文结合了历史与当代乡村建设的各组案例，这些实践所蕴含的复杂性与丰富性也希望可以推进我们对“双向运动”发生及运作机制有进一步的讨论，论文第四章和第五章就是通过结合经济与文化所进行的尝试。

论文的立意与叙述，希望能跳出一般分析中“乐观-悲观”、“积极-消极”的二元框架，也挑战将乡村建设纳入“效果论”、“好人好事说”和“问题说”这三种常见的类型化处理。故本文尽量避免简单的代言与辩护，而是呼应以个人参与乡村建设的生命史，反观其中的兴奋、困惑、不甘、无奈等复杂情感与认识，除此带出对所存在社会基础与宏观环境的讨论外，也再次印证了乡村建设的丰富性与动力所在。

论文借助文化研究的思想资源及其对脉络与扣联的强调，同时在方法论与具体方法上强调“实践-研究者”的独特视角，希望以此打破“研究者-行动者”、“理论-实践”的习惯性二分。然而本文的叙述毕竟也是另一种叙述，至于是否更“客观”，不是本文的目的与认识，因为笔者更认同于印度庶民学派（subaltern studies）对“另类”历史的某种理解：“它不是为了补充权威史学确认的历史（精英历史）之不足，更不是要取代精英历史，而是跟踪精英历史施行删改、压抑、排挤的痕迹，从中动摇其封闭的二分法确立的价值观以及由此产生的表意和叙述的封闭”（许兆麟 刘健芝，2005：序一 15）。

存在着较大的偏差？而无论历史和当代的乡建实践者都难逃被“类型化”表述和归纳的困境？”

418 此处使用的“双向运动”是否完全吻合波兰尼文本上的意义，笔者认为不是关键。不管怎样，毕竟它已经离开原著者书写时的脉络，更重要的是，笔者希望是以它为方法与视野。

一、“双向运动”与“双向运动”视野

笔者认为，“双向运动”与“双向运动”视野需要进行区别，因为波兰尼意义上的“双向运动”一直相对应的存在，但我们的社会实际却经常只有“单向运动”这一不完整的视野。

关于“双向运动”，笔者已在导论部分有所讨论，此不详述。重点是再次指出：通过本论文中各案例的讨论，让我们看到“双向运动”或类似“双向运动”力量的广泛存在并且彼此间通过经济与文化活动而展开各种形式的互动。“正向运动”既有受“反向运动”影响和转化的可能（如第三章关于“作新民的乡土遭遇”所讨论），也有在既定逻辑下通过为“反向运动”预留空间而弱化其挑战的可能（如第一章文献回顾中关于“正向运动”逻辑与影响下主流研究批评与传媒叙述对乡村建设的处理及所产生的效果，再如第四章关于“生态技术‘力’与‘困’”所讨论），故思考“双向运动”的重点不应放在结果寻找或现实“指认/辨认”。一方面，现代化、资本化、工业化、城市化等力量虽然强大，但实际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获全胜”，其不同层面上都遇到“反向运动”顽强多样的制衡；但另一方面，波兰尼提出“双向运动”的存在决不简单等同于“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式的机械原则，进而让我们可以袖手旁观。相反，“双向运动”通过经济与文化的实际运作，让现实力量对比发生着动态变化（如第四章、第五章关于“生态技术、农民合作、城乡互动”三组案例的讨论）。故我们需以整体过程而非单一事件进行理解，才能看到其中丰富的张力及各种新的现实可能，以此拒绝胜利在前或正义必胜式的盲目乐观及“TINA”式的犬儒主义。

正如导论中已有引述，波兰尼一方面指出“正向运动”之所以有效和强大，因为其背后是“日益演化为一种信仰、无限的行动主义、世俗宗教、社会计划、社会组织原则的经济自由主义信条”（波兰尼，2007：116-127）。笔者认为这些“教条”在现实层面常以各种迷思（Myth）⁴¹⁹和文化研究所谈的“意义系统”为表现，其所产生的虚幻效果与所构建的主流评价坐标常让我们不自觉的深陷其中。但另一方面，如果说“正向运动”无法一贯到底，那可能也不是“反向

419 如许宝强转引罗兰·巴特的观点：认为“正是迷思（Myth）企图成为社会的共识，使原本是历史和人工生成的文化观念，化身成为自有永有的自然法则，将主导群体的利益自然化和普同化，变为所有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迷思的力量建基于将语言等同现实，使人以一特定的方式去理解世界，同时也将这种理解强加于人”（2007：前言2）。笔者认为它也正是“正向运动”得以达致“去脉络”效果的重要原因。

运动”本身会取得胜利，关键在于“正向运动”建基其上的“乌托邦”假设本身的虚拟性。

因此需要本文所使用的“双向运动”视野以呈现这些“乌托邦”的虚幻性，而现实实践本身即包含着显影这些虚幻与迷思的丰富素材。比如在第五章关于城乡互动的讨论中，来自都市消费者的实际言行及当下中国新兴社区支持农业（CSA）实践让我们看到原来习以为常的“三农一农化”与“城乡脱钩”其实都是不同表现的“乌托邦”。类似处理实际是各章讨论的重点，但同时也遭遇着最大的困难，具体理由将在下文“不足与讨论”中涉及。

“双向运动”视野需左右开弓，既反思“正向运动”代表的主流及所主导下的一种“单向运动”视野，同样也需反思“反向运动”代表的非主流及所主导下的另一种“单向运动”视野。但它又绝非“各打五十大板”或“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是对原来看似对立矛盾的各种定型化思路与类型化认识进行同样认真的清理。在具体方法上则是通过再脉络化，让我们通过社会脉络与思想资源本身的内在张力而看到其中的复杂性。这种处理挑战常见的好坏对错价值评判，进而让我们有条件对整体的评价坐标进行反思，它较为充分的体现在论文第一章文献回顾与第二章脉络资源及矛盾的分析中。需要特点说明的是，第一章通过对已有各种历史乡建研究批评与当代乡建传媒叙述分别展开，由于不是历史学及传媒研究的论文，该部分处理点到为止，因为笔者的重点是通过它们来讨论乡村建设实践所处的评价脉络与知识生产环境，以及各类型“单向运动”视野对乡村建设实际造成的影响。

“双向运动”视野更有利于我们发现“双向运动”本身的复杂性及彼此间常被遮蔽的互动关系。透过第四章和第五章的案例分析，“正向运动”影响决非单一层面、一次性发生或固定操作，相反却是高度灵活、动态弹性并充分结合着政治经济文化诸要素所进行的整体运作。“反向运动”实际产生的效果也绝不限于“刺激—反应”这一常见范式，其既有直接反抗，也有间接影响（如第三章关于平民教育实践，通过对“正向运动”出发的目标、价值、方法进行反思、调整与转化）。

本论文使用了“另类”（alternative）这个近年来日益被广泛使用的概念，对“另类”的期待、发现与实践正越来越成为社会运动与批判知识界开展建设性批判的新通路，已有对“另类”的理解可归纳为两种基本思路：第一种通过在

全球各地发现并培育不同的“另类”实践，并促就它们的联接与呼应，以创造某种“抵抗的全球化”⁴²⁰；第二种认为“另类”也应包括着对“另类”想象与定义本身的反思⁴²¹，不一定需要专门寻找或独立培育“另类”，在“主流”之中的诸多现实其实都已包括或可以发展出“另类”的各种元素。

笔者认为在“双向运动”视野下，所谓“另类”实践或“另类”运动都不是有别于“双向运动”外的第三种单独运动，它只是借助“双向运动”视野，让我们看到“正向运动”与“社会自我保护运动”充分互动后的某种复杂表现。因此，“另类”与“主流”同样不可简单分割，否则其将同样的“去脉络”并营造出另一种“虚幻”，两者不仅相互包括，还通过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为中介和连接，不断发生着动态的转化。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将乡村建设理解为“双向运动”视野下的“另类”实践。通过第三、四、五章的讨论，我们可以认为在其丰富实践中体现着“另类教育（平民教育）”、“另类经济（社会经济/互助经济）”、“另类贸易（公平贸易/短链销售）”、“另类农业（社区支持农业⁴²²/市民农业）”、“另类知识（生态技术）”等。然而，我们还应随时警惕对这些实践加以“模型化/实体化”的理解与定位，它同样容易以“脉络化”的名义达成另一种“去脉络”的虚拟效果——当它割断了“另类”与“主流”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互动与联接，“模型化/实体化”后的实践不仅很难避免其一直存在的封闭性⁴²³问题，也可能因自我窄化而失去可能影响并改变主流的宝贵张力。

进一步说，无论乡村建设还是其它形式的“另类”实践，既不可能存在于完全理想化的“独立”空间，也不可能真正自主的选择自己的起点与路径，其

420 参考自书名《抵抗的全球化》（刘健芝等主编，2009，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该书翻译自另类实践世界论坛（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s）的同名英文出版物。

421 如许宝强（2009：34）所指：“除了在‘资本主义’以外寻找另类（alternatives to capitalism），是否也可尝试寻找另类的各式各样‘资本主义’（alternative capitalisms）？另类资本主义首先可建基于对资本主义的既成习见的否想（unthinking），这样可让我们看到，不是一定要在‘资本主义’之外才可以有更大的社会运动天地”。

422 如社区支持农业不仅是“另类”农业，也可以理解为“另类”消费者运动，因为其超越于一般的消费者维权层面，还包括着对消费行为本身的反思。同时，其除关注消费者外，还以公平贸易的方式关注着生产者，并涉及到食物主权。

423 作为一个可以参照的分析，大卫·哈维（2006：156、177、189）认为，我们平常所接触到众多乌托邦都可以说是“空间形态的乌托邦”，因为社会过程的暂时性、社会变革的辩证法——真正的历史——都被排除了，同时社会稳定又是由一种固定的空间形态来保证的。这种特定形态乌托邦受到列斐伏尔的坚决反对，因为它们具有封闭的独裁性。回到20世纪的历史中，当下及过去20年左右社会各界对这种乌托邦理想的广泛拒绝可以被理解为其在东方和西方的失败。即使这样，哈维仍然坚持（2006：191）：重振时空乌托邦理想——一种辩证乌托邦理想——它来源于我们目前的可能性中，但同时它也揭示了人类不平衡地理发展的轨迹。

一定更为现实的生长于已有之社会文化经济结构。正因如此，从另一角度说，作为实践的乡村建设其实从来就具有着“双向运动”整体视野，因其对应的是完整的需求与整体的脉络（包括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生态）。故本文各组合案例与不同实践者的原文引述，可以理解为仅是对这种被遮蔽视野与丰富性的微小“复原”而已。

二、“双向运动”视野下的中国乡村建设

如导论及各章所述，基于本研究“重新理解与反思乡建”的目标，本论文希望通过“双向运动”视野与“脉络化”分析，以帮助我们更好理解乡村建设实践的资源、意义、困难与空间，从而避免常见“类型化”评价及因书写者的当事人身份而很容易落入的“辩护”陷阱，这两方面笔者在第一章与后记中有所讨论。下面将仅略要地从三个方面总结笔者通过“双向运动”视野所看到的乡村建设，更详细总结请参照各章结尾的“小结”部分。

1、脉络与意义：三个“百年”

论文之所以不断谈及脉络，因为笔者认为“正向运动”影响下“单向运动”视野的主要表现就是通过各种方式之“去脉络”，才可不断追逐其目标中的“乌托邦”，类似处理也影响着我们对乡村建设的习惯评价与认识。既然希望对此进行挑战，只有不断回到具体的实践脉络中，通过对其复杂性与矛盾张力的充分展现才可实现。

乡村建设实践所处的脉络与意义，笔者认为可以从“百年激进、百年乡村破坏（梁漱溟语）、百年乡建”为角度进行宏观理解与把握。至于为何使用“百年”作为基本描述，首先波兰尼在“双向运动”分析前关于“百年和平”的提出与分析启发了笔者，如果能有一些到位的宏观概括，它既有利于打破历史与当代乡村建设实践在时空与叙述上的割裂，还可让我们更准确把握乡村建设的独特性；其次因为当代乡村建设主要推动者温铁军近年来不断强调“百年激进”这一提法，希望以继续其多年前通过工业化对百年中国宏观共性的独特概括（详见温铁军，2001），本论文希望进一步展开。

通过全文的讨论，笔者认为中国作为以农业为主要文明类型与人口构成特点的超大型大陆国家，在过去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整体性的遭遇西方、现代化

与资本主义生产生存及生活方式，进而引发以“激进”为特征的全方位变革想象，它不顾乡土社会、小农经济与生态环境等脉络限制，大规模而又快速的推动以“工业化、城市化、理性化”等为特征的整体性变革。作为这场转型所要“告别”与“摧毁”的对象——“三农”，既产生出“三农问题”这样的负面后果与极端表现，也蕴育了多种形式的“自我保护运动”，它既影响也实现了乡村建设这一独特实践。从这个意义上，“百年激进”催生了本论文第二章所详细讨论的“百年乡村破坏”与“三农问题”，这让敏感于此的中国知识分子以各种形式与“三农”相结合，并以此为基点反思现代化与乡土中国的复杂关系，由此展开的不同探索与努力参与构成着乡村建设充满张力的思想资源，实际上也为其在实践中所日益显现的矛盾与困境埋下伏笔。

虽然一般分析认为中国乡村建设只包括历史（二十世纪 20-40 年代）与当代（21 世纪初以来至今）这两个非连续的时间段，但笔者通过整个论文的分析认为：“百年乡建”作为中国追求现代化及其衍生出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内在产物与对应物，其实一直伴随着“百年激进”与“百年乡村破坏史”。当然，这里的“百年”都是泛指，也可能存在着时间上的滞后。至于历史与当代中间的乡村建设实践（如 1950 年代—1990 年代）⁴²⁴，根据第一章“历史乡村建设批评”中关于“改良与革命”的讨论，笔者认为在回归乡土脉络的情况下，革命与乡村建设本来就存在着诸多的重叠与交叉⁴²⁵。而在这二十世纪后半段的岁月里，以“农村包围城市”为特点的中国共产党革命对乡村建设实现了某种程度的替代与覆盖⁴²⁶——无论通过扫盲（平民教育⁴²⁷）、赤脚医生（乡村社区医疗）、民兵（乡村社区自卫⁴²⁸），乡镇企业（乡村工业化）、大众文艺（民众戏剧），还是存在于 1980-90 年代充分体现基层干部群众实践与创造精神、为期十年由国务院批准的农村改革试验区⁴²⁹。当然，半个世纪以来由政府所主导的“乡村建

424 笔者认为这是另外一个十分复杂而庞大的议题与脉络，但也应纳入本论文的分析与讨论中，因它在本论文初稿完成时才为笔者所进一步意识，我将在未来的研究与书写中进一步展开。

425 笔者刚知悉上海大学中文系孙晓忠副教授在编辑“延安的乡村建设”一书，虽未见到成书，但笔者认为其将对我们认识“革命与乡建”关系是个有意义的突破。

426 无论“重叠”、“替代”和“覆盖”都只是一种基于“民间”乡村建设为角度与出发点的说法，结合上一注释中孙晓忠的尝试，如果换个视角，当然也可以理解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的农村建设工作从来就是某种乡村建设。

427 括号内都为乡村建设的主张与实践。

428 需说明的是，虽然民兵系统还有着超越于社区自卫的更多功能与定位（如国防储备），但其至少也是客观存在功能之一。笔者所生活四年的河北定州翟城村，毛泽东时代的民兵系统仍是当下维护村庄治安的主要力量。

429 当代乡村建设推动者温铁军也是当年农村改革试验区的主要执行者之一，他（2009:310）认为：“这

设”也存在着不同的问题，很多时候因为其它脉络或力量的需要而对乡村“去脉络化”⁴³⁰。此正如温铁军曾指“三农有问题，不是三农本身的问题”⁴³¹，笔者接着指出：乡村建设有问题，不是乡村建设本身的问题。

正是以上多方面的条件与下文所要分析乡村建设实践中浓厚的知识分子自觉与自我反思特征，让我们看到很多第三世界或殖民地国家虽然都有“三农问题”，但却不一定都有对应的乡村建设运动。

然而，宏观分析如不能结合起微观实践，同样容易遮蔽其中的复杂与差异，上述脉络当然不是静态不变的。笔者之所以在前两章宏观分析后，紧接以三章的篇幅，分别就“平民教育、生态技术、农民合作、城乡互动”这乡村建设实践四大主要方面逐一分析，希望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乡村建设的具体脉络如何在“百年激进”整体格局下不断而又动态反复的展开、遭遇、调整、掩饰、吸纳、转移……，以及其间的经济与文化运作。另一方面，也希望我们可从中发现这些努力所编织的常识与“意义系统”本身的“虚幻性”，特别是当它遭遇乡土中国并因向殖民地、“三农”、生态等领域转移成本却无法继续进行，曾经“成功”的自圆其说⁴³²在现实限制的显影下日益捉襟见肘⁴³³时。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将发现乡村建设实践的必然与必要。

因此，乡村建设并非一个技术或经济层面的单一回应，也不只是某些微观的实践与做法。“百年激进”脉络与“三农”立场对立统一的内在于其中，由此具备的独特敏感与视角将蕴育出各种新的实践可能⁴³⁴与论述，以挑战主流逻辑

些乡土中国的制度创新试验客观上使得新乡村建设试验成为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中期的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实际指导力量”。详细内容可参见该书310-338页。以及《农村变革与中国发展（1978-1989）》（周其仁编，1994，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中与“农村改革试验区”相关报告。

430 比如本论文第一章“历史乡村建设批评”中关于“改良”与“革命”讨论中所举1950年代毛泽东分别在党外党内批评梁漱溟与邓子恢的农民立场为“妇人之仁”与“小脚女人”。这段让广大农民普遍“被牺牲/被剥夺”的历史至今已经越来越多的得到认识，但更需深入讨论的是，既然毛泽东同样承认梁漱溟也是“仁政”，在什么意义上，其被指认为“小（仁政）”？详细讨论参见第一章正文及相应注释。

431 虽非完整原话，但该观点与思考方式一直存在于温铁军不同场合的发言与演讲中。1993年和1996年其分别根据基层调查写出《汝果欲支农，功夫在农外》和《粮食有问题，但不是粮食问题》的文章，随后以此为基本思路讨论“三农”问题的不同方面至今，进而指出制约“三农”问题背后更为宏观的问题与外部环境。详细可参考：<http://book.sohu.com/20040719/n221072863.shtml>，2012年5月21日浏览。

432 如潘岳（2008：66）所指：“传统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势不两立，但有一点是两者相同的，及工业化的发展模式是一致的。它们都产生于西方工业文明，都学自一个经济学老师，都认为地球的资源是无限的”。

433 笔者认为，所谓“自圆其说”和“捉襟见肘”都是相对和动态的。虽然其遭遇现实挑战而出现裂隙，但仍可能通过新的文化运作或政治经济行为进行再次遮蔽与转移。但即便“自圆其说”依然可能，听众却可能出现一些不同的反应，这点在第五章城乡互助案例的消费者自觉中即可体现。

434 如新社会组织形式的创造与发展（合作组织/村学乡学/城乡合作/社会企业等）；新思考纬度的引入（生

下的各种迷思、偏见与定见，进而打开一些“单向运动”视野所遮蔽的角度与行动空间⁴³⁵，同时反身质疑“单一化”论述与评价标准的不足与问题。在此过程中，逐步改变主流社会中包括“犬儒”⁴³⁶等在内的各种无力感。

正如前文所指，乡村建设实践本身也可能“去脉络化”，所以其不应是一种先在的预设和理论俯瞰，而是一种在地的实践，深刻的体认与自我的反省。对其更恰当的处理自然不应只是简单的优缺点分析，更不是评功摆好与“以成败论英雄”，但这些却是主流的最常见做法，其正是笔者在第一章文献回顾中不厌其烦详尽罗列的原因。

2、重思乡建（I）：自我保护与“另类”实践

正如标题所示，笔者认为乡村建设应该从自我保护与“另类”实践两个角度进行把握。之所以需要结合起来，既因为乡村建设的起源与目标决定其不同于一般的“反向运动”或“自我保护运动”，还由于结合起来才可让我们更好理解乡村建设的复杂特点，并从中看到“双向运动”间的充分互动。

如导论所述，乡村建设作为由知识分子发起并推动的一项带有反思与自觉的“另类”计划，虽然其独特目标受到乡土社会与“反向运动”的改造并具有诸多自我保护特征，但却不等同于“反向运动”本身。因其携带着“正向运动”的资源烙印及某些原则底线⁴³⁷，这与一般“反向运动”的自发性、反应性及实用性存在着根本不同，即使这样，因其与“反向运动”充分互动，其仍然具备“社会自我保护”的功能与自觉。

关于乡村建设为何及如何在与乡土社会的结合中体现着自我保护，笔者在第三章结合历史与当代的平民教育实践进行了详细讨论，而乡村建设实践中的

态可持续/生活教育等)；新知识生产(晏阳初提出的“农民科学化，科学简单化”等)；新生活方式(都市农夫/博士下乡/大学生支农等)。

435 比如，当下农村中常被“主流”不无怜悯的通过“弱者化”而“边缘化”的“389961部队”(即分别对应于妇女节的留守妇女、对应于重阳节的留守老人及对应于儿童节的留守儿童)，但当代乡村建设的很多实践，却多从这些群体开始(可参见河南兰考的乡村建设实践)。当然我们需批判与反思造成“留守”的原因并让城乡良性互动，同时也需进一步反思其中的精英立场与由之出发“刻板化”的“留守想象”。

436 笔者已在第一章文献回顾的效果与影响中简要提及，它同样或多或少作用于乡村建设实践者，因为“另类”与“主流”一直在相互影响。笔者在此要补充的是：“犬儒”也是另一种“去脉络”的判断，因为其往往没有看到“底层”的脉络——虽然有着“正向运动”的强势影响，但他们不会完全甘心和彻底被动，他们为了活下去，无数改变与“反抗”已经在坚韧的发生着，只是常常被我们忽视。这也是前一注释中所提，为何乡建多从“389961部队”开始。

437 如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就有非常强的自觉意识(2005: 395):“我们要退出官办的乡村建设事业。如不退出来，则乡村建设事业将缺乏活力。……若乡村建设变成行政，则不能往深刻里去。”

“另类”特点已在前文关于“双向运动”视野的总结中有所涉及，第三、四、五章则分别结合作为历史和当代乡村建设实践主要工作的“平民教育、生态技术、农民合作、城乡互动”为具体案例，既希望指出这些不同具体方面的工作其实都可以从新的视野与“另类”角度进行不一样的理解，同时讨论“双向运动”视野下另类与主流的复杂及动态关系，也涉及相应实践如何参与着对“正向运动”所主导之“意义系统”的改变。

其中，第三章通过对历史与当代平民教育的脉络与案例分析，希望讨论并指出“双向运动”如何作用于平民教育工作者并深入影响着乡建实践者的行为与主体。这一方面的“自我保护”既来自直接“遭遇”现代社会而产生各种反应与不适应性的乡土文化与乡土社会，也来自乡村建设实践者在“遭遇”乡土社会过程中的自我反思与文化自觉。而其中的“另类”性则体现在其对主流现代教育目标与方向的根本反思，以及其在与乡土和生活结合中所产生的新创造。

第四章通过对生态农业、生态建筑等生态技术案例与实际处境的分析，希望让我们看到“双向运动”影响的广泛存在及其中复杂的利益与文化脉络，由此所导致乡村建设实践中力量与困境的辩证性存在。此处的“自我保护”既来自草根社会与农民生活中的具体需求，也涉及到当前日显重要的生态可持续立场。而“另类”实践则体现在立足生态、就业与社区立场上对主流现代技术的批判，及随之对舒马赫意义上“适用技术”的思考与实践。正是结合起这几个层次的意涵，让我们看到乡村建设从来不是或不应是简单拒绝技术革新，其所倡导与实现的技术也非仅在技术层面的就技术论技术。

第五章则通过结合农民合作和城乡互动这两组案例及所处脉络，进一步指出“双向运动”视野所帮助我们看到更为复杂立体的文化经济脉络——农民经济组织所存在的困境不仅是农民或经济或组织本身的问题；强调农业单一生产功能的背后原来一直存在着被人为遮蔽的农业多功能性；城乡脱钩或城乡割裂也只是不同表现的虚拟“乌托邦”。该案例中的“自我保护”有力体现着对主流常识和“正向运动”虚拟性的反观与挑战，而“另类”实践则体现在对文化、经济、社会 and 生态的重新连接与脉络化处理上，以及由此引发对理论与实践、行动与研究关系的重新理解。

正如前文注释中已经做过相关说明，此处的实践不是主流意义上与理论或思想割裂对立的狭义实践，其始终兼顾着理论和实践双重属性，如此既有利于

对抗形形色色的主流叙述，并可在介入现实和改变“双向运动”力量对比中打开更多的现实可能性。

3、重思乡建（Ⅱ）：张力与困境

根据“双向运动”视野与脉络化的分析，笔者对乡村建设困境的讨论希望可以避免一般“效果论”或“好人好事说”的类型化处理，原因与主要区别已在第一章文献回顾中有所讨论。这些类型化处理让宏观及复杂的外部问题仅归于微观与个案，政治、文化、经济等融合的整体问题只被当作单一问题进行讨论，甚至被进一步简化为道德问题。而笔者认为，乡村建设更深层次困境非在个人或个体层面，而是其所在脉络和思想资源自身所构成的内在张力，以及由于“自我保护”与“另类实践”这两个定位所决定的内在矛盾。

在第二章关于乡村建设实践思想资源的分析中，笔者认为如果回到具体脉络中，这些资源间彼此充满着“矛盾”与张力，分别体现着“双向运动”视野下的不同力量。以梁漱溟（2005：153）对乡村建设四个层面源起的分析为例，其中关于乡村建设起于“乡村自救”可理解为是乡土社会自我保护的“反向运动”，而其它三个原因⁴³⁸，则更接近于当时社会脉络下的各种救亡图存思潮，共享着“正向运动”的类似目标与定位（详见第二章相关分析）。这种因同时接受“双向运动”不同力量影响的内在困境实际上一直存在于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之中。

正是在“双向运动”视野下，乡村建设成为某种意义上“反理论”的理论生产者⁴³⁹、“反都市”的都市人⁴⁴⁰、“反启蒙”的启蒙者⁴⁴¹，大多时候则以“反乡建”的手段开展乡村建设⁴⁴²。除此外，在“民族-国家”的既定框架内，乡村

438 梁漱溟认为另三个原因分别为：当乡村破坏成为趋势而激起“救济乡村”、中国社会积极建设之要求与重建社会构造。其中最后一个原因梁认为是因千年社会组织已崩，但新者未立，此需重新建立新的社会载体，作者实际也将其体现在自己对乡村建设实践的设计与定位上（梁漱溟，2005:153-161）。

439 乡村建设各种实践本身包括对主流理论的反思与批判，但为了实践空间的打开，其同时开展着各种“另类”理论的思考与构建，其不仅体现在各章具体案例中对“技术/经济/文化/城乡”的批判与重思，乡村建设在“双向运动”视野下对主流评价坐标的反思与重构也可以理解为是这种努力。

440 乡村建设实践反思都市主义或以都市为中心的立场，然而很多实践者却来自都市（如梁漱溟本人即是典型案例），或虽生在乡村却主要成长并受教于都市。第二部分人群多成长但挑战于这样的环境：他们可能会更加努力，但是为了对农村生活的厌恶与逃离；他们来自乡村，但却不属于乡村；他们的生活经验基于乡村，但想象图景与思考方法已经与城市无异。

441 第三章已有详细讨论，此处暂略。

442 虽然第三章实际上已有所讨论，此处还需补充指出：无论历史还是当代的乡村建设实践在过程中都充满着表面上的矛盾与悖论，比如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一边开展生态农业试验，另一边所推动的农民合作社正通过联合购销农药以促进社区合作；大学生支农支教的开始阶段也往往包括鼓励农村儿童通过向往城市而离开乡村这些“反乡建”的手段与实际效果。本文所举包括笔者在内实践者的各种尴尬与

建设实践还内在体现着后发现代化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结构性困境⁴⁴³。

这些多层面的内在张力让乡村建设困境不同于一般的困难。首先，其不可能让乡村建设完整实现期待中的目标并获得主流评价体系的真正认可，这也是第一章文献回顾中各种类型化评价得以存在的基本“土壤”。其次，这些张力影响着乡村建设实践者，本论文各章所谈到包括笔者在内实践者们的各种困惑、矛盾、尴尬与焦虑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体现。由此希望指出，所谓“平和”⁴⁴⁴与否不仅是心态本身的问题，实践者在这种困境中很难建立真正的主体性与话语权，多数情况下则不自觉的参照主流评价与意义系统对自己行为的意义与困境做出相应解释，实际则进一步巩固“单向运动”视野的影响与效果。

通过这些分析，笔者再次意识到反思和重新理解乡建是非常必要与紧迫的，它既让我们通过把握其中的复杂性以更准确的定位乡村建设，以此打开新的行动空间；同时也由此延伸开，进一步推动我们在复杂动态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更好的理解“三农”的处境、遭遇、意义与由此带来的启示。

三、不足与讨论

本论文在叙述上尝试采取一种“实践-研究者”的视角，挑战主流社会科学常见的对象化书写方式，通过故事和案例带入笔者个人的经历、感受与反思——既因为“我”与“非我”的分割同样需要质疑⁴⁴⁵，而其中所谓的个人，也是脉络下的个人。希望如此有助于微观与宏观的更好结合。

在历史的理解上也希望有别于一般的精英立场，它不仅只是对“非精英”或“自下而上”的单纯强调，而是如印度庶民研究学派所坚持的：庶民历史是

困境，既是自我反思，更是希望指出其所折射的种种矛盾张力与深层次困境，绝非通过个人的一般努力可以完整改变。

⁴⁴³ 这点在历史及当代乡村建设推动者梁漱溟和温铁军观点中都同样包含：在《最后的儒家》中，艾恺以“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对梁漱溟进行了概括，认为它不是个人的两难，而是客观处境与主观目标的内在张力。对于温铁军来说，从其两个主要观点“解构现代化”与“生态文明”即可看出对工业化的明显批判与质疑，但其却非简单化的拒绝与否定。因为对于500年殖民主义的历史与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现实来说，不仅工业化是古老文明亿万民众安身立命的必要与基本条件，而且“生态”与“生计”也不可简单割裂。

⁴⁴⁴ 近十年来，温铁军对不同的乡村建设参与者与实践者都提出“以平和之心行平常之事”的要求与期待，笔者在一定层面上基本认同，并曾撰文《虚心以求、贴地步行——论乡村建设志愿者心态》（2006）有过讨论。但通过本论文的研究与写作，发现更应对心态背后的复杂原因展开探讨。

⁴⁴⁵ 笔者比较认同如下观点：“正如达斯对韦伯的理性/感性二分法批评所说，行动是心身之动，而这个心身是在众多张力交错、‘过去’和‘未来’重叠、不同力量互动下不断形成的，不可以‘我’和‘非我’的二分法进行界定”（许兆麟 刘健芝，2005：序一22）。

在精英历史内在的矛盾张力处，即二分法思路最脆弱的地方，把零散、面貌不清、不完整片段重整出不同的故事来（许兆麟 刘健芝，2005：序一 12）。为了让其中的复杂性尽量得以呈现，同时兼顾论文主体的紧凑与流畅，笔者使用了数百个大大小小的注释，希望从多角度进行补充与延伸讨论，但因其只是注释，大部分内容只能点到即止，笔者希望未来有机会在另外文章中详细展开。

正如前文所述，因本论文尝试一种“双向运动”的视野，故需要同时进行着两种拒绝——既反思主流，也需同样质疑一般意义上的“反主流”⁴⁴⁶；既需要揭示“去脉络化”的问题与虚妄，同样也需要警惕泛泛的“脉络化”可能造成的“去政治化”⁴⁴⁷等不期然后果；既需看到“正向运动”的激进性，也需看到“反向运动”对参与者的浪漫化与本质化诱惑。然而，要真正实现无疑困难重重。

首先，作为“后革命时代”的“80后”与“独身子女一代”，虽然长期参与乡村建设实践，但笔者却因基本外在于和乡建高度相关的“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现实脉络而欠缺应有的感知，同时我们这代人的基本成长环境更是“冷战”结束后全球范围内的回归“主流”与告别“另类”⁴⁴⁸。我们不仅内在于成王败寇的个人主义逻辑与精英主义立场，现代社会的整体危机更蕴育了随处可见的“犬儒”心态与深层无力感。多年的现代教育浸淫与主流知识结构框架，让我们更习惯于主流意识形态下的叙述与书写，及与此同构的主流评判标准。当真的要讨论困境、不甘、尴尬与那些不成功但也没失败的实践时，“左右开弓”的在不确定⁴⁴⁹中尝试寻求可能，以被简化后的知识结构去把握复杂与动态，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

具体到笔者个人，虽然对“正向运动”的“去脉络”处理有着较多的自觉，但却因长期被定义为社会运动和 NGO 的实际参与者，或者说当代乡村建设本身置身于“NGO 化”的话语环境中，这让笔者对另一种“单向运动”视野的批判与警惕明显感觉吃力，反思不足，很多地方会有不自觉的简化与新盲点。这同时

446 比如，一些 NGO 以反主流为定位，但实际上却以主流为反身定义，仍然回归主流定义与二元位置中，并共享着主流的基本认识与意义系统（如发展主义、市民社会等）。此即笔者前文所述的“预留”位置而并未构成真正挑战。此点乡村建设实际上有一定的区别，但正如本文所强调的，乡村建设实践也断非统一和整体，其中同样充满差异，故笔者只能从相对意义上指出其可能性。

447 如不利于现实政治的更有效介入或集体行动的动员展开等。

448 笔者认为，被“告别”的不仅是革命，还包括各种各样尝试挑战主流发展道路的多样化尝试。

449 相比之下，我们更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着某个既定的准确答案——比如，当前社会危机重重，肯定就存在着一个主要矛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其他矛盾将迎刃而解。而当真正进入脉络并了解其中的复杂性，我们很容易因此而愈感困惑。

也说明，我们实际上不可能真正外在于“主流”，它往往就在我们的知识、经验与情感结构之中。但另一方面，正是这些写作中的困境，再次坚定了我对乡村建设复杂性与内在张力的确认，同时也让“实践-研究者”再次感受到“双向运动”视野的独特意义，笔者将在未来的修订与研究中进一步展开反思与挑战。

除缺乏更具备“双向运动”视野条件的主体外，现实社会是否有足够的空间与资源以利于这种视野的真正展开？“另类”位置的尴尬与困难不仅由于乡村建设等具体实践本身的影响微小或处境艰难，还因为当前社会正在系统性取消整体性“另类”的存在基础与想象可能——当“冷战”的一方不战而胜的呼应着社会主义遗产债务的自我抛弃与切割，以反思的名义取消着真正的反思并打包埋葬着那充满张力与空间的历史及记忆时，它无疑更被“大国崛起”的欢呼喝彩声所加剧。正是在如此整体性拒绝“另类”讨论与想象的时代与空间里，笔者讨论与反思中不时透露出的“底气不足”自然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次，虽然在导论中即已交代本论文的主要目标在于“理解乡建”，而非“叙述乡建”；所分析与对话对象主要是主流理解或叙述下的乡建整体，而不是乡建具体的某些方面。但在实际选题与写作过程中，笔者一直面对着这两种不同处理路径的内在张力。对于为何要“理解乡建”论文各部分已有较多涉及，而“叙述乡建”却实际上同样的构成笔者一个很难绕开的“心结”——因为长期并深度的参与实践至今，身边更多同仁们还在十分艰辛努力的工作于一线中，面对自己暂时获得一定的“话语权”，时时总感觉有责任 and 必要把其中许许多多的故事与不甘、努力与苦恼都说出来，把自己所参与经历十年来的各种反思“铺陈”开来，让读者有个更为广泛全面的认识。这两种潜藏于心的诉求和目标冲突常常在不自觉中模糊着论文本应更集中与聚焦的角度，所谓的广度势必影响论文的深度。虽然在导师的不断提醒下笔者已经有所觉察，但在书写中仍然难以完全摆脱，它总是挥之不去。与其说是过宽的素材跨度或过大的“野心”，不如更准确说其源自写作者十多年来的一个“一体两面”的梦想——既要一个不一样的“说法”，更要不是为“说法”而“说法”。

之所以说其为“一体两面”，笔者认为就问题本身来说这两个目标并不冲突，大多算是不同的角度与侧重点而已，只是因为同时体现于一篇论文的具体写作中才充满张力。笔者希望可以在未来的研究和书写中，进行有效区分，以利于更深入分析的分别展开。

再次，在初稿完成后，经老师们的批评指点，认为案例分析不够充分和详实，不利于读者对案例背景与脉络的理解。笔者在此提醒下重新阅读文中案例，虽然已有尝试通过诸多注释从写作者自认为的角度尽可能做出交代与背景说明（只是因为篇幅的限制，许多说明只提供了资料来源与线索），的确存在着老师们所批评的这些问题，故在论文修订中进行了相应案例的适当补充。

但为何在写作过程中自己却基本没有自觉，以致成为某种习惯性盲点。除前面所述本论文跨度大题材广泛外，个人反复检讨后可能有如下原因：一方面，笔者近十年来一直身处实践之中与乡建话语内部，所写文章与所做分享（如给乡建骨干或参与乡建大学生培训）也主要在乡建“圈子”内，所涉及各种案例的相关背景多已为这些对象所共享与认知，长期下来，笔者习惯性的以之为分析讨论或写作的前提，自然存在较大的偏差；另一方面，本论文主要目标是促进读者重新理解乡建，各种案例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故笔者根据需要尝试“组合”不同案例，并只有所侧重的呈现其中的部分侧面，而非一般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完整呈现与细致分析，这些也有悖于读者的一般阅读习惯；再一方面，本论文为文化研究学科博士论文，笔者本科与硕博阶段分别接受的是工科与人文科学的学术训练，相对缺乏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学或人类学训练，对于如何更为准确有效的进行案例书写与分析能力不足。

基于以上几方面的反思与自我认识，除已对其中部分案例所进行扩充外，笔者将在未来较充分时间中对论文所涉更多案例进行更详实的展开。

本论文各部分都谈到主流叙述中的各种遮蔽与盲点，正如许兆麟和刘健芝（2005：序一 18）所指：“问题不在于怎样避免盲点，而是怎样在就地互动的情况下，把盲点的封闭性可能转化为下一步发展的开放”。在论文的最后，笔者自认为还有一些没有处理或处理不好的地方：

一方面，本文所讨论的“脉络”是相对和多重存在的，我们将可发现国家与乡村、市民与农民、资方与劳方因参与主体、利益与立场的不同，存在着既可能统一也可能冲突的不同“脉络”。但因笔者能力限制与本论文目的之限定，无疑不可能同时展开不同脉络的讨论，所分析和讨论的仅为与本论文目标相关并以“三农”为基本立场的脉络，因此也可能出现不自觉的简化。

另一方面，笔者认为农民在论文中的位置模糊。虽然本论文的分析对象为乡村建设实践而非农民，但这却是一个十分值得讨论的问题。其一定意义上也

反映了“三农”本身在“正向运动”视野主导进程中的尴尬处境：现代社会需要通过它来实现（提供原材料/转嫁代价等），但在现实中其却常被处理为主流叙述的“冗余物”与“绊脚石”；广大农民和知识分子是同样重要的乡村建设实践者与主体，但在现实中却很难发现他们的声音，或者即使他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我们却在既定条件和视野下听而不闻，致使他们往往只能再次成为被书写者与被定型化的对象与来源。乡村建设实践者尝试站在他们的立场，甚至某程度上背负着“保守”的指责与标签而为之“代言”，但却仍然难以真正用上他们的视角⁴⁵⁰。笔者在此不是为了简单的滑回“反向运动”视野，而是希望指出，即使农民们受到来自主流文化霸权的很大影响，许多时候他们的视角也由于“正向运动”的主导而发生着很大改变，但他们仍然有着自己尚未被完全收编的书写、语言、理解与想象。E.P 汤普森和印度庶民学派已经通过自己的研究做出十分有益的启示⁴⁵¹，笔者希望未来可以朝此方向继续努力。

结论不是结束，而是希望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在导论和各章里，笔者讲了许多个人的故事，这里也希望再以“皮鞋与布鞋”的故事作为另一个过程的开启。当2003年我们去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所在的翟城村开始工作和生活，由于受晏阳初（1932：221）名言“欲化农民，需先农民化”的感召和启示，虽然我们无法摘下眼镜，但却可以通过穿着上尽可能减少与农民的差别来拉近和他们的距离。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天天穿着村里买来的布鞋。在一次外出给农民组织培训时，带着自己“农民化”原则与对农民的印象，我专门穿着这种土布鞋。然而到了培训现场，学员们倒不出所料都是普通农民，但往脚下一看，全都是清一色的皮鞋，我又一次没有“农民化”……。

由此看来，无论农民化、乡村建设实践，还是“另类”书写、自我反思或“脉络化”处理，皆不可能有真正的“一劳永逸”，都将是一个漫长而又复杂动态的征程！

450 需要说明的是，并没有本质或固定的“他们的视角”。

451 可参见以下著作的精彩分析：E.P.汤普森，2001，《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E.P.汤普森，2002，《共有的习惯》，王加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许兆麟 刘健芝选编，2005，《庶民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有人说：城市的每一寸土地下面，原来也是田园。有一天它也许还会变成田园，所以有着田园梦想的人，是有希望的，也是有福的。

（郝冠辉，2008:98）⁴⁵²

放弃沉思和智慧
如果不能带来麦粒
请对诚实的大地
保持缄默和你那幽暗的本性

海子，《重建家园》（1987）

后记 辩护与理解

梁培恕（2001：174）在给他父亲梁漱溟的传记里说：“在动手写这本书之前，我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不作辩护士，如果竟而辩护，将是我的失败。他的一生不需要辩护，只需如实的陈述”。

同样，我也希望可以拒绝一般意义上的辩护，既由于它不利于真正坦诚的面对如此复杂和充满张力的实践，而容易沦为自觉不自觉的“评功摆好”，更因为它将不无遗憾的回归到主流分析框架中。与其说乡村建设需要“自我辩护”，不如说其更需要“借题发挥”，乡村建设的生命力正在于不断与主流社会的互动过程，其当然不可能在“毕其功于一役”中安享曾经的“战功”。

同时，我的研究目的也不希望成为这种辩护，它希望可以从反思这些常见的“刻板”认识与主流评价坐标开始，尝试既进入实践内部又能“跳出乡建看乡建”，进而为实践重新寻找新的资源与空间。

不要辩护，但要理解。然而它与当下许多讨论中的“同情的理解”也有一定的不同。因为笔者认为，理解既可以通过“脉络化”以调整今人立场并指出“后见之明”的某种虚妄，还可以之为动力，帮助我们更好的跳出定型化认识与既定框架。理解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如何让理解成为可能？理解之后，

452 郝冠辉为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农业教育部主管，本段话选自其撰写的《2007年2月—5月学院农业工作总结》，载于《足迹》（内部刊物），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生态农业工作室编，原话转引自舒飞廉，2004，《飞廉的村庄》，北京：华夏出版社。

会有什么在发生着变化？

既然是后记，与其再次进入严肃的学术讨论，不如再聊聊自己的故事，因为这篇酝酿许久的论文本来就是为回答自己生命故事中的诸多困惑而起，希望可以帮助读者多一个侧面理解本论文。个人故事虽属某种主观叙述，但也是乡村建设客观脉络的一部分，要回答乡村建设是什么，也可以说乡村建设改变了参与者什么？在这改变过程中存在着什么样的冲突与困境？类似反思正是本文所谓“理解”的重要内容。

就像导论开头所述，我在大学社团时期开始参与乡村建设，参照第三章的框架，即也是自“正向运动”的目标与想象出发，同时携带着自信与兴奋，其中急切而遥远的眺望包含着自己的童年记忆与朴素想象，但基本上仍只是从城市的位置与角度回望农村。社团组织的一遍遍“下乡”满足了自己硬把他乡做故乡的弥补心理，但却也积累了不少空虚与抽象，“眼”高了，可“手”在哪里？一方面，虽然“满口皆农”，但实际却毫不知觉的将“农”对象化了，我们研究它、讨论它、叙述包装它，然后呢？另一方面，长期以城市为中心的教育让我们生活在互相套嵌的“泡沫”里：历史和科技必将带领我们通往光明与富庶的未来，因为“明天会更好”；科学和专业人士终将帮助我们克服困难，因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们似乎没有必要与理由去质疑这些常识本身。

在这样的状态下，虽然有浓厚的兴趣，但自己实际上始终无法理解乡村建设，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读了多少次就是读不下去，不仅因为著作本身的难度，而是由于那时的我存在于既定的框架和概念之中，坚信着“成王败寇”的强者逻辑，分享着作为“胜利者/有权者”的自我定位与认同。无论梁漱溟还是晏阳初，当他们一开口，八十年后的我们已经知道了“失败”的结局，既然如此这样，何必认真？

随后的一次“偶然”，让我个人的“正向运动”有了遭遇“反向运动”而落地的机会。2004年开始，我和同仁们陆续在位于河北定州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安家，开始了乡村的学习与生活。什么是最为直接的冲击？那应该是视角与态度，它让我有机会反思原来的“都市/现代人/准成功者”视点，并在冲突与矛盾中重建源自乡土与底层的“敏感”，以此挑战长期以来的习惯性盲点——原来农民不该只是我们想象中的被动“对象”与整体性概念，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有着喜怒哀乐与复杂情感；农村也不该是可以自欺欺人的“一言以蔽之”，每个村

庄都有着数百年甚至上千年历史与复杂的现实脉络；处处需留心，不仅意味着对村庄内外权利关系和所谓“贫困”背后复杂成因的充分认识，同样包括去“发现”有别于传媒及书本“类型化”形象的“底层世界”：村民收入虽然低，但他们却是我们的资助者与志愿者，50多岁的大娘乒乓球打的竟然比我们都好，村民为了学电脑可以如此热情——没有电脑，竟然在自己手绘的纸键盘上秉烛练习……，有了这些丰富鲜活的认识，我们还能简单化的以或冰冷或浪漫的语言去定义或想象他们？

如此“发现”让我们把脑中抽象的概念与肩头唬人的理念暂时放下，更为自觉的“走近”他们。同时仍需保有另一种自知自明——不管主观意愿怎样，我们身上已然带有着不同的“痕迹”，无论在他们的眼里还是事实上，我们都不可能真的是他们。只有同时保持着这两种理解，自觉与反思才能持久，把“三农”放置于一个更大脉络下进行思考与讨论才有必要的空间。

乡村的点点滴滴既让工作与生活融为一体，也让我们这些工作者成为这个农民培训学校的第一批学员。学院的各项工作一直充满艰辛和希望的逐步开展着：农民合作组织培训、大学生“另类”实践交流计划、生态农业、生态建筑、翟城及各地乡村建设试验区、频繁接待不同来访者与媒体……但当人群散去，校园恢复宁静，呆呆注视着那些充满着半个世纪村庄记忆的旧校舍，我忽然想到：乡建学院难道不正是中国“三农”的缩影？它不断在镁光灯下被聚焦，但却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即使努力发声，也多淹没在滔滔不绝的主流声浪之中。这样的反思实际正是本论文之所以用最长的篇幅梳理文献与传媒呈现的出发点，也希望构成我们理解乡村建设的一个新角度。

乡村生活其实并不都可以让我们平静，久居乡野后有次到北京开会，忽然把我们震住——当看到不管寂静郊区还是繁华城区，北京的路灯和各种没有必要的灯都开得一样夺目，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村里老停电，甚至连最基本的浇地用电都要限制。我们自己开玩笑说，如果北京是祖国的“心脏”，那么河北就应该是祖国的“胸膛”，娇贵的心脏不仅需要胸膛的保护，更需要宽广的胸膛进行无限的承载。对于这种情况，老乡们视之为自然，我们也慢慢习惯，但它却遮蔽了各种各样的不自然，原来发展从来就包含着“优先序”与“牺牲者”，城市与乡村从来就没有真正“分割”过。如果这样，乡村建设的真正开展是否可能在不对城市以反思节制的情况下进行？当然，老乡们半夜起床排队等水浇地

的艰辛是很难进入更多人的视线，既因为看不到，也因为我们熟视无睹，更因为即使看到了，按照已有的思维习惯与生活方式，又能怎样？因为来回于城乡及“主流”与“另类”之间，这种由震惊带来的理解，正是本文不满足于“城乡脱钩”等常见处理的直接理由。

震惊不应该带来简单的拒绝，我们当然必要反思城市，但并非因城市具有天然和本质的罪恶，否则不就自我印证于“反都市”这样的主流标签。我们更需要的是进入复杂脉络，讨论现代都市的寄生性与高消耗性及原因，这样的反思不仅有批判，同时还带进对可能的“另类”城市与城市中“另类”元素的丰富想象，如果由此可打开更大空间当然最为理想，至少它帮助我们看到现代城市、现代教育、现代知识所存在着问题，不仅是它们本身的问题。而所谓纯粹或独立的原则性坚持常常导致割裂与遮蔽，实际并不利于我们对问题的真正把握。如果这样，我们既无需沾沾自喜清高自居，也不必对“误入”知识分子行列而妄自菲薄。也正是这种带着理论视野的理解，让我不满足于一般叙述，而尝试结合起宏观与微观，不断强调脉络化与复杂性，通过对主流“虚幻”叙述的揭示以打开“另类”的新可能。

在乡村的工作和生活，因为脚踩大地，心中虽有对现实的不满与愤怒，但我们还是较容易让自己的心态恢复平和。身边无数普通的劳动者们，其实并不沉默，同样可以用独特的表达让我们感受到他们的活力与坚韧、不甘与乐观。与他们的交往让我开始学习谦卑，并努力挑战学生社团时代形成的张狂与高调，在让激情淬火中尝试让自己也坚韧起来。这种来自对生活与生命的理解，给予了本文尝试摆脱“悲观-乐观”、“肯定-否定”、“成功-失败”主流范式以真正的“底气”。

三年的博士学习与论文写作，一遍又一遍的自我质疑与理论重思，对于笔者来说，它也是一种精神和知识生产上的乡村建设，与实践及物质层面中的乡村建设有着相通的困难，因为实践和理论本来就并不割裂，实践包含着对另一种理论的理解与追求，理论则时刻为实践准备着更大的打开空间。正如结论中“不足与讨论”所提，由于时间等因素的限制，本论文无论在理论思考还是现实反思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的不足，希望可以在笔者未来的研究与修改中得到不断的完善。

就像实践需要一步一个脚印，本论文也是不同阶段思考和写作的系统化，

部分章节的部分内容曾经发表在《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China Journal of Social Work》、《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二十一世纪》、《开放时代》、《天涯》、《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报》等杂志上，但在此皆已经过大幅度改写与扩充。特此说明并对这些杂志的编辑们表达诚挚的谢意。

感谢我的两位导师许宝强与刘健芝，能受教于两位先生是如此的幸运，以至于此时的我真不知该如何表达，只能说“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已经记不清多少次了，两位先生分坐左右一遍遍的帮助我理清思路指点迷津。为能更好的理解我的脉络，两位老师竟会在百忙之中专门“陪”我读梁漱溟。可以说，本论文之所以能够完成，凝结了两位先生的大量心血与付出。除学术训练外，他们还通过一言一行为我示范应该如何做好一名老师。无以为谢，唯希望你们的教诲能一直鞭策着自己未来的教学与实践。

两位老师所在的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是一个十分独特的集体。身在其中的美好五年，既让我享受了思考的快乐与痛苦，更开拓了自己的视野，让自己真正体会到批判精神与实践品格。在这里，教授们竟可以完全没有“授业者”的“身段”与姿态，无需以年龄、学识和权力来维持师生秩序，一方面可以赤手空拳的和学生们一同站立在社会运动与另类实践的最前线，另一方面又贴地步行的践行教育理想，亦师亦友，亲切的直呼其名而不让学生们觉得任何不妥，打成一片又不乏认真严谨，我希望可以在此对系里每位老师与职员表示深深的谢意与敬意。同时感谢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兼职教授戴锦华老师，除为您的博士申请推荐信与不厌其烦的耐心外，您激昂而富有穿透力的讲课声常常通过录音播放而充满着我们小小的卧室兼客厅，给我们带来了课余之外的无数美好时光与生动回忆，让非人文学科出身的异乡人也能有条件在乡音中感受文化研究的魅力与思考的独特乐趣。

感谢温铁军老师，除为十年来的耳提面命与言传身教，更为几年前所布置的任务与期待，让我这三年来一刻不敢懈怠。虽然常感力不从心，但每每想到您憔悴但匆忙的身影和疲惫但坚定的面容，便让我再次感受到乡村建设无声却不息的力量。

感谢乡村建设的一线同仁们，在学习期间代为承担了本应由我来承担的责任与压力，这使前几年的自己常有“逃兵”般的愧疚。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这篇不完善的论文了解到我这几年的耕耘，虽然用的是书本与键盘。其中一定还有

许多的不足与错误，至少希望同仁们能够分享到其中的“双向运动”视野，以此重新理解和定位自己，重新检视其中的不足与希望，我们及我们的实践无疑只是历史进程中的一滴水，我们不做，也一定会出现这方面的努力，因为这个世界断不会只有一种力量。如果这样，我们将坦然，将从容，将更易轻装上阵。

感谢这么多年来所接触到的各位农民朋友们，特别是河北定州翟城村的乡亲们，翟城至今仍是我经常的梦境所在，正是那段充满“歌”与“火”的日子，不知不觉改变了我今天看问题的眼光与参照。

感谢并纪念晏阳初长子晏振东先生，当我还在农大念书的时候，这位和蔼而可爱的长者尽管行动不便，仍然非常认真为他父亲的资料做着录入与校正，与他的交往是对浮躁年轻人的无言教育。想想自己与乡村建设结缘，冥冥之中似乎总有一股力量，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乡建梦，它就像现在越来越多人都在实践的田园梦，我幸运的及时唤醒了它。

此外，还要感谢许兆麟、严海蓉和孙歌三位老师所分别组织的读书会，让我学习多种类型的读书方法，同时感谢五年来许多香港师友在学习上的帮助与生活上的照顾。

在我论文的最后阶段，有幸接触并加入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这个年轻但充满活力的团队，嘉陵江畔文字斋的灯光将继续照亮我前行的脚步。

对于以上及尚未提及的许多深受其惠的师友们，因篇幅关系，请原谅我无法一一具名说出内心的感谢。

最后，感激妻子杜洁十一年来的陪伴与并肩，还有我们两边的家人，正是这些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们，不断提醒我想起莫言的一个说法，“作为老百姓的写作”比“为老百姓而写作”其实更难，但也更重要。

谨以此论文献给刘老石及无数一路同行的乡建同仁们！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六日

参考文献

1. Alitto, Guy, 1986, *The last Confucian: Liang Shuming and the Chinese dilemma of modernity*, 2nd edition,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 Altrichter, Herbert, Peter. Posch and Bridget. Somekh, 1993, *Teachers investigate their work : an introduction to the methods of action research*. Routledge.
3. Clifford, James and Marcus, George E edited, 1986, *Writing culture :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 a School of American Research advanced seminar*,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4. Coleman, Daniel A, 1994, *Ecopolitics : building a green society*, New Brunswick, N.J. :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5. Duara, Prasenjit, 1988,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6. Escobar, Arturo, 1994, *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7. Foster, John Bellamy, 2002,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New York, NY : Monthly Review Press.
8. Gibson-Graham, J. K, 1996, *The end of capitalism (as we knew it) : a feminist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Mass. : Blackwell Publishers.
9. Gibson-Graham, J.K, 2006, *A Postcapitalist Politics*, Minneapolis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0. Gitlin, Todd, 1980,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1. Grossberg, Lawrence, 1997, "Cultural Studies: What's in a name (one more time)", in *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Essays on Cultural Studie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2. Hall, Stuart., eds, 1997, *Representation :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London : Sage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Open University.
13. Harvey, David, 2000, *Spaces of hope*, Edinburgh :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4. Howard, Ebenezer, 1965, *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 London: M.I.T. Press.
15. King, Franklin Hiram, 1949, *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 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 Korea and Japan*, London : J. Cape limited.
16. Meisner, Maurice, 1982, *Marxism, Maoism and Utopianism: Eight Essay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ystem.
17. Meisner, Maurice, 1999, *Mao's China and After: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Free Press.
18. Miller, Ethan. and Solidarity Economics, 2004, *Strategies for Building New Economies from the Bottom-Up and the Inside-Out*,
[http://www.communityeconomies.org/site/assets/media/Ethan_Miller/Miller_Solidarity%20Economics%20\(2005\).pdf](http://www.communityeconomies.org/site/assets/media/Ethan_Miller/Miller_Solidarity%20Economics%20(2005).pdf) .
19. Polanyi, Karl, 1957,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 Beacon Press.
20. Schumacher, E. F, 1973, *Small is beautiful :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 New York : Harper Colophon Books.

21. Scott, James C, 1976,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ant :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 Yale University Press.
22. Selden, Mark, 1995, *China in revolution : the Yenan way revisited*, Armonk, N.Y. : M.E. Sharpe.
23. Shiva, Vandana, 2000, *Stolen harvest : the hijacking of the global food supply*, South End Press.
24. Silverstone, Roger, 1999, *Why study the media?*, London ; Thousand Oaks, [Calif.] : Sage.
25. Thompson, E. P, 1968,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Harmondsworth : Penguin books.
26. Thompson, E. P, 1991, *Customs in Common*, London : Penguin.
27. Wallerstein, Immanuel Maurice, 1983, *Historical capitalism : with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London: Verso.
28. Žižek, Slavoj, 1989,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 ; New York : Verso.
29. 阿柏杜雷著, 2001, “印度西部农村技术与价值的再生产”, 《发展的幻象》, 许宝强、汪晖选编,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30. 阿图罗·埃斯科瓦尔著, 汪淳玉、吴惠芳、潘璐译, 叶敬忠校, 2011, 《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1. 埃比尼泽·霍华德著, 金经元译, 2000, 《明日的田园城市》, 北京: 商务印书馆。
32. 艾恺著, 王宗昱、冀建中译, 1996, 《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33. 安文联, 2005, “晏阳初乡建精神犹在 新乡村试验扎根定州”, 《燕赵晚报》, 2005 年 7 月 24 日。
34. Altrichter, Peter Posch. and Bridget Smoekh, 夏林清等译, 1997, 《行动研究方法导论——教师动手做研究》, 台北: 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35. 白红义, 2004, “‘定县实验’”新登场”, 《小康》, 2004 年 9 月。
36. 白亚丽、吕程平, 2011, “蜗居时代的‘乌托邦’——当代青年的乡建运动”。
http://www.snzg.cn/article/2011/0624/article_24613.html, 2012 年 3 月 7 日浏览。
37. 保罗·杜盖伊、斯图尔特·霍尔等著, 霍炜译, 2003, 《做文化研究——索尼随身听的故事》, 北京: 商务印书馆。
38. 卜正民, 2005, “资本主义与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书写”, 《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 卜正民、格力高利·布鲁主编, 北京: 新星出版社。
39. 布罗代尔著, 顾良、张慧君译, 1997, 《资本主义论丛》,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40. 布罗代尔著, 杨起译, 2003, “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 《是明灯还是幻想——天涯精品系列丛书经典文献卷》, 韩少功、蒋子丹主编,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41. 蔡培慧, 2010, “真实是一场社会行动——反思台湾农村阵线的行动与组织”,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 9 月号。
42. 蔡翔, 2012, “文化研究, 还是文学研究”, 《中文世界的文化研究》, 王晓明编,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43. 曹东勃, 2010, “现代农业的困惑”, 《读书》, 第 5 期。

44. 曹海东, 2007, “步履蹒跚中的乡建运动”, 《南方周末》, 2007 年 7 月,
<http://www.chinavalue.net/General/Article/2007-9-15/80911.html>, 2008 年 5 月 8 日浏览。
45. 曹筠武, 2006, “晏阳初到温铁军: 知识分子百年乡恋”, 《南方周末》, 2006 年 3 月 9 日。
46. 常竹青, 《参与式农民培训的经验与技巧》,
http://www.zgxcfx.com/Article_Show.asp?ArticleID=23193, 2009 年 9 月 7 日浏览。
47. Charles W. Hayford 著, 叶晓露译, 2004, “公共活动家及独立的政治家: 晏阳初与自由主义的中国化(1919-1949)”, 《颠蹶的行走: 二十世纪中国的知识与知识分子》(《学术思想评论》第十一辑), 贺照田主编,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48. 陈光兴, 2009, “文化研究在台湾到底意味着什么? ”, 《方法与个案——文化研究演讲集》, 孙晓忠编,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49. 陈建华, 2000, 《“革命”的现代性: 中国革命话语考论》,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50. 陈序经, 1934, “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 《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 罗荣渠主编, 2008, 合肥: 黄山书社。
51. 陈序经, 1936a, “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原载于《独立评论》196 号), 《陈序经文集》, 余定邦、牛军凯编, 2004,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52. 陈序经, 1936b, “乡村建设理论的检讨”(原载于《独立评论》199 号), 《陈序经文集》, 余定邦、牛军凯编, 2004,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53. 陈序经, 1943, “乡村建设的途径”(原载于《当代评论》第四卷第二期), 《陈序经文集》, 余定邦、牛军凯编, 2004,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54. 城山智子, 孟凡礼 尚国敏译, 唐磊校, 2010, 《大萧条时期的中国: 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55. 程序, 2004, “当今世界农业发展状况与中国农业发展(上)”,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第 26 期。
56. 成学炎整理, “梁漱溟先生谈山东乡村建设”, 《梁漱溟与山东乡村建设》, 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邹平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1991,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57. 川尻文彦, 2009, “杜威来华与‘五四’之后的教育界——以陶行知的杜威思想受容为中心”, 《社会科学研究》, 2009 年第 6 期。
58. 大卫·哈维著, 胡大平译, 2006, 《希望的空间》,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59. 戴锦华, 1999, 《隐形书写——90 年代的文化研究》,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60. 戴锦华、斯人, 2006, “文化的位置——戴锦华教授访谈”, 《学术月刊》, 2006 年 11 月号。
61. 戴锦华、刘健芝主编, 2006, 《蒙面骑士——墨西哥副司令马科斯文集》,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62. 戴锦华, 2009, “文化研究的困惑和可能”, 《方法与个案——文化研究演讲集》, 孙晓忠编,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63. 戴锦华, 2012a, “后冷战时代的文化政治”, 《中文世界的文化研究》, 王晓明编,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64. 戴锦华, 2012b, “坐标·雾障与文化研究”, 《从首尔到墨尔本: 太平洋西岸文化研究

的历史与未来》，王晓明、朱善杰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65. 丹尼尔·A·科尔曼著，梅俊杰译，2006，《生态政治——建设一个绿色社会》，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66. 邓正来，1997，《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67. 董磊明，2007，“农民为什么难以合作”，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9/200702/15593.html>，2009年12月8日浏览。
68. 堵述初，“平民教育运动在定县”（《河北文史资料》1983年11期），《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李济东主编，1990，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69. 杜赞奇，2003a，“为什么历史是反理论的？”，《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黄宗智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70. 杜赞奇，2003b，《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71. E.F. 舒马赫著，虞鸿钧、郑关林译，刘静华校，1985，《小的是美好的》，北京：商务印书馆。
72. 范达娜·席瓦著，唐均译，2006，《失窃的收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73. 范敏坚，2012，“我对‘四不’的看法”，《小毛驴市民农园 CSA 简报》，第1期（内部资料），下载地址：www.littledonkeyfarm.com。
74. 方丹敏、王平，2004，“自我历练 精神扶贫——他们眼中的大学生支农活动”，《中国改革（农村版）》，2004年第8期。
75. 财经点对点栏目组，“温铁军的乡村星火”，《凤凰卫视-财经点对点》，2004年4月播出。
76. 费孝通，1946，“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费孝通文集（第四卷）》，1999，北京：群言出版社。
77. 费孝通，1948a，“乡土中国”，《费孝通文集（第五卷）》，1999，北京：群言出版社。
78. 费孝通，1948b，“评晏阳初《开发民力 建设乡村》”，《费孝通文集（第五卷）》，1999，北京：群言出版社。
79. 费孝通，1948c，“乡土重建”，《费孝通文集（第四卷）》，1999，北京：群言出版社。
80. 费正清、费维恺编，1994，《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81. 富兰克林·H·金著，程存旺、石嫣译，2011，《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北京：东方出版社。
82. 布洛克，“导言”，2007，《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卡尔·波兰尼著，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83. 郭占锋，2010，“走出参与式发展的‘表象’——发展人类学视角下的国际发展项目”，《开放时代》，2010年第1期。
84. 沟口雄三，1997，“另一个‘五四’”，《中国文化》，第15、16期。
85. 顾明，2004，“农业生产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9月。
86. 顾昕，2006，“‘五四’激进思潮中的民粹主义主题（1919-1922）”，《二十世纪中国思

想史论（上卷）（第二版）》，许纪霖编，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87. 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生态农业工作室，2009，《粪尿分集式生态厕所理论与实践》（内部资料）。
88. 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编印，2011，《第三届全国社区支持农业（CSA）经验交流会资料汇编》（内部资料）。
89. 郭于华、史云桐，2008，“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布洛维‘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的启示”，《开放时代》，2008年第3期。
90. H·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2010，《农民的终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91. 郝冠辉，2008，“2007年11月密云农业培训总结报告”，《足迹》，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生态农业工作室编（内部资料）。
92. 郝冠辉，2008，“2007年2月—5月学院农业工作总结”，《足迹》，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生态农业工作室编（内部资料）。
93. 何慧丽，2007，“农民合作销售与村庄经纪人角色的冲突与调适”，《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期。
94. 何慧丽，2008，“农民合作社统购的经验”，
<http://www.21gwy.com/ms/dcyj/a/3860/443860.html>，2010年10月5日浏览。
95. 何慧丽、古学斌等，2009，“城乡链接与农民合作”，《开放时代》，第9期
96. 何建华、于建嵘，2005，“近二十年来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研究综述”，《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第3期。
97. 何塞·卢岑贝格，1999，《自然不可改良》，黄凤祝译，北京：三联书店。
98. 贺雪峰，2008a，“新农村建设与农村道路”，薛毅编，《乡土中国与农村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99. 贺雪峰，2008b，“论农民理性化的表现与原因——以河南省汝南县宋庄村的调查为例”，《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第29卷第2期。
100. 贺雪峰，2008c，“农村的半熟人社会化与公共生活的重建——辽宁大古村调查”，《中国乡村研究》（第六辑），黄宗智主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101. 何忠洲，2006，“新农村的理想与现实”，《中国新闻周刊》，2006年第7期。
102. 河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频道栏目组，2004，“追随晏阳初的脚步——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简记”，《河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频道-燕赵风采》，2004年7月31日播出。
103. 华勒斯坦著，路爱国、丁浩金译，1999，《历史资本主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04. 胡印斌、王小波，2004，“乡建学校的‘荒芜英雄路’”，《燕赵都市报》，2004年7月18日。
105. 黄国良（老六），2008，“不像报告的报告——健康农业志愿者实习生总结”，《足迹》，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生态农业工作室编（内部资料）。
106. 黄平，2007，“罅隙密布的‘盛世神话’——2006年春节晚会语言类节目文化研究”，
<http://sh.sina.com.cn/20070615/172677765.shtml>，2012年4月6日浏览。
107. 黄胜利，2007，《“卖大米教授”何慧丽：将城乡互助和谐进行到底》，《中国经济时报》，
http://finance.ce.cn/macro/gdxw/200710/31/t20071031_12681449.shtml，2012年5月9日

浏览。

108. 黄胜忠, 2009, “农业合作社的环境适应性分析”, 《开放时代》, 第4期。
109. 黄宇, 2004, “温铁军: 乡村建设运动的复兴者”, 《国际金融报》, 2004年1月9日。
110. 黄志友, 2008, “毛驴的故事”, 《足迹》, 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生态农业工作室编(内部资料)。
111. 黄紫翎, 2011, 《台湾文化研究月报》, 2011年5月25日, 第116期,
http://hermes.hrc.ntu.edu.tw/csa/journal/Content.asp?Period=116&JC_ID=402, 2012年3月7日浏览。
112. 霍六丁, 1990, “我任定县实验县县长的回忆”(原载《河北文史资料》1983年11期), 《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 李济东主编,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13. J. 斯特拉塞, 1983, “农村不是世外桃源”, 《美国的农业与农村》, R.D.罗得菲尔德等编, 安子平、陈淑华等译,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14. J. 托德, 1983, “一项温和的建议: 科学为人民”, 《美国的农业与农村》, R.D.罗得菲尔德等编, 安子平、陈淑华等译, 北京: 农业出版社。
115. J.K. 吉布森-格雷汉姆, 2002, “质疑全球化”, 《资本主义的终结——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女性主义批判》, 陈冬生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16.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重点与政策研究课题组, 2009, “部门和资本‘下乡’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第7期。
117. 姜古迪, 2003, “值得关注的后定县实验”, 《燕赵都市报》, 2003年8月24日。
118. 姜义华、陈炎, 2000, “激进与保守: 一段尚未完结的对话”, 《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 李世涛主编,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119. 卡尔·波兰尼, 冯钢 刘阳译, 2007, 《大转型: 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20. 赖秀芬、郭淑珍, 1996, “行动研究”, 《质性研究: 理论、方法及本土女性主义研究实例》, 胡幼慧主编, 台北: 巨流图书公司印行。
121.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 2000, “文化研究的流通”, 《文化研究读本》, 罗钢、刘象愚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22.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高士柏)、冯应谦、陈韬文, 2010, “文化研究之落地生根”, 《传播与社会学刊》, 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香港浸会大学媒介与传播研究中心, 总第11期。
123. 劳伦斯·格罗斯伯格、史岩林、张东芹, 2011, “关于理论与问题的探讨——与劳伦斯·格罗斯伯格教授的对话”, 《文化研究》(第11辑), 陶东风、周宪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24. 乐钢, 2000, “评梵当娜·施瓦的, 《活下去: 妇女、生态、发展》——兼论知识生产的价值问题”, 《视界》, 李陀、陈燕谷主编, 第1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25. 李晶, 2011, “政府荫底下的日本农协——仙台秋保町的人类学调查”, 《开放时代》, 第3期。
126. 李昌平, 2009, “谁的参与式, 为谁而参与”, <http://www.aisixiang.com/data/7825.html>, 2009年9月7日查阅。

127. 李善峰, 2003, “梁漱溟思想的现代意义”, 《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第二版), 梁培宽编,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128. 李棠庆, 2004, “为化肥鸣不平——兼谈解决化肥污染问题的出路”, 《大自然》, 2004年第4期。
129. 李泽厚、刘再复, 2011, 《告别革命——李泽厚、刘再复对话录》(第六版增订本), 香港: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130. 李紫翔, 1936, “农村建设运动应有的转变”, 《<中国农村>论文选》, 薛暮桥、冯和法编, 1983, 人民出版社。
131. 黎光寿, 2004, “翟城试验: 寻找梦中的诺亚方舟”, 《中国改革(农村版)》, 2004年2月。
132. 黎光寿, 2003, “新上山下乡运动——我们能为农村做什么?”, 《公益时报》, 2003年11月6日。
133. 梁鸿, 2011, “行动在大地”, 《天南》(创刊号), 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134. 梁培恕, 2001, 《梁漱溟传——我生有涯愿无尽》, 香港: 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135. 梁启超, 1902, “新民说”, 《新民时代——梁启超文选》, 侯宜杰选注, 2002,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136. 梁漱溟, 1921,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节录)”, 《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 罗荣渠主编, 2008, 合肥: 黄山书社。
137. 梁漱溟, 1930, “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设立旨趣及办法概要”, 《梁漱溟全集》(第五卷), 1992,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38. 梁漱溟, 1932, 《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 上海: 中华书局。
139. 梁漱溟, 1935, “往都市去还是到乡村来? ——中国工业化问题”, 《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 罗荣渠主编, 2008, 合肥: 黄山书社。
140. 梁漱溟, “北游所见记略”, 《梁漱溟全集(第四卷)》, 1991,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41. 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第五卷)》, 1992,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42. 梁漱溟, “朝话”, 《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2版), 2005年,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43. 梁漱溟, “乡村建设理论”, 《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2版), 2005,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44. 梁漱溟, “我们的两大难处”, 《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2版), 2005,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45. 梁漱溟, “答乡村建设批判”, 《梁漱溟全集(第二卷)》(第2版), 2005,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46. 雷启立, 2008, 《传媒的幻象——当代生活与媒体文化分析》,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47. 林海, 2007, “改良主义者败局?”, <http://blog.sina.com.cn/rwzk>, 2007年12月23日浏览。
148. 林毓生, 2006, “二十世纪中国的反传统思潮与中式乌托邦主义”, 《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第二版), 许纪霖编,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149. 刘重来, 2007, 《卢作孚与民国乡村建设研究》,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50. 刘健芝, 2002, “‘掌握平常’的激荡——民众科学运动”, 《视界》, 李陀、陈燕谷主编, 第6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51. 刘健芝, 2008, “乡村建设的另类经验”, 《乡土中国与乡村教育》, 钱理群、刘铁芳编,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152. 刘健芝等主编, 2009, 《抵抗的全球化》,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53. 刘康, 2008, “文化研究的中国问题和理论创新”, 《文化研究》(第8辑), 陶东风、周宪主编,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54. 刘老石, 2010a, “理想寓于行动中——实践式教育与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农村发展人才计划”, 《立场》(网刊: www.lichang.org), 2010年第3/4期
155. 刘老石, 2010b, “真假合作社: 是合作社的真假还是我们标准的真假?”, 《对话——合作社真假》, 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编(内部资料)。
156. 刘湘波(刘老石), 2005, “从‘支农调研’到新农村建设”, 《开放时代》, 2005年第6期
157. 刘晓云, 2010, “五四时期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述论”,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10年5月, 第29卷第5期。
158. 刘岩, 2011, “从《星球大战》到《阿凡达》: 科幻谍影与文化领导权”, 《光影之隙(2010)》, 戴锦华主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59. 路爱国, 2009, “改革三十年——中国成为‘正常的’发展中国家?”,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ggzhc/article_2011010127502.html, 2012年6月6日查阅。
160. 鲁静芳、左停、苟天来, 2008, “中国农业发展的现状、挑战与展望”, 《世界农业》, 第6期。
161. 卢韵、曾子墨, 2004, “乡村建设学院——中国农民的‘黄埔军校’”, 《凤凰周刊》, 2004年第13期。
162. 罗钢、刘象愚, 2000, “前言: 文化研究的历史、理论与方法”, 《文化研究读本》, 罗钢、刘象愚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63. 罗岗, 2009, “五四: 不断重临的起点——重识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1期。
164. 罗龙吉等, “生态农场, 是爱是恨? ——对《小农场租地种菜只是看上去挺美 成本高且不生态》一文的讨论和反思”, 《小毛驴市民农园 CSA 简报》(内部资料), 2011年第12期。
165. 罗荣渠, 2008, “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代序)”, 《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 罗荣渠主编, 合肥: 黄山书社。
166. 罗荣渠主编, 2008, 《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 合肥: 黄山书社。
167. 罗兴佐, 2006, 《治水: 国家介入与农民合作》,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68. 罗逸, 2011, “卷首语”, 《小毛驴市民农园 CSA 简报》(内部资料), 第12期。

169. 罗逸等, 2011, “生态农场, 是爱是恨? ——对《小农场租地种菜只是看上去挺美 成本高且不生态》一文的讨论和反思”, 《小毛驴市民农园 CSA 简报》(内部资料), 第 12 期,
<http://www.littledonkeyfarm.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22&extra=page%3D1>, 2012 年 5 月 8 日浏览。
170. 吕新雨, 2008, “农业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 《乡土中国与文化研究》, 薛毅编,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71. 吕新雨, 2010, “新乡土主义, 还是城市贫民窟?”, 《开放时代》, 第 4 期。
172. 马格林 (Stephen A. Marglin) 著, 卜永坚译, 潘永忠校, 2001, “农民、种籽商和科学家: 农业体系与知识体系”, 《发展的幻象》, 许宝强、汪晖选编,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73. 马海伟, 2006, “‘农民黄埔军校’ 试验三年之惑”, 《中国商报》, 2006 年 5 月 23 日。
174. 马宏, 2000, “‘五四’ 时期拜民主义思潮评介”, 《石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 16 卷, 第 2 期。
175. 马克思、恩格斯, 197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四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76. 马克·赛尔登著, 魏晓明、冯崇义译, 2002, 《革命中的中国: 延安道路》,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77. 马勇, 1999, 《梁漱溟传》, 郑州: 河南文艺出版社。
178. 迈克尔·布洛维 (Michael Burawoy), 2011, “从波兰尼到盲目乐观: 全球劳工研究中的虚假乐观主义”, 《开放时代》, 第 10 期。
179. 冒荣, 1997, “发展与落差——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的中国教育”, 《江苏社会科学》, 第 1 期。
180. 孟繁华, 2003, 《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81. 莫里斯·迈斯纳著, 张宁、陈铭康等译, 2005, 《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82. 莫里斯·迈斯纳, 杜蒲译, 2010, 《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183. 莫言, 2001, 《莫言: “作为老百姓写作”
http://www.gmw.cn/content/2004-09/01/content_91128.htm, 2012 年 6 月 8 日浏览。
184. 聂道先, 2004, “温铁军翟城试验: 中国第一所村办学院生存忧患调查”, 新浪网财经频道, 2004 年 2 月 9 日,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040209/1745623412.shtml>, 2009 年 5 月 2 日浏览。
185. 聂露, 2011, “‘昂贵’ 的菜”, 《小毛驴市民农园 CSA 简报》(内部资料), 第 4 期。
186. 帕沙·查特吉著, 张建琴译, 2007, “二十一世纪农业文化”,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 9 月, 第 67 期。
187. 潘家恩, 2004, “发展的可能”, 《Perspectives》(第四卷第二期), “海外中国青年论坛”, 第 46-50 页。
188. 潘家恩, 2006, “虚心以求、贴地步行——论乡村建设志愿者心态”, 《民间》(秋季号), 广州: 中山大学华南民间组织研究中心。
189. 潘家恩, 2007, “新农村建设的几个关键字——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实践举例”, 香港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 4月号, 总第 61 期。

190. 潘家恩, 2010, 《乡村建设、别样选择与我》,
<http://group.hudong.com/isl/doc/ddncDAFtRAnJRA3Bw.html>, 2011 年 12 月 8 日浏览。
191. 潘家恩、杜洁, 2010, “从‘三农问题’到乡村建设——百年‘现代梦’在中国农村的现实处境与反应”, “首届博鳌青年论坛”会议论文。
192. 潘家恩、杜洁, 2011, “‘现代梦’的别样回声——乡村建设的资源和矛盾”, 《开放时代》, 第 3 期。
193. 潘家恩、杜洁, 2012, “社会经济作为视野——以当代乡村建设实践为例”, 《开放时代》, 第 6 期。
194. 潘淑满, 2003, 《质性研究: 理论与应用》, 台北: 心理出版社。
195. 潘毅, 2011, “走向以社会经济为目标的城镇化”, 《南方都市报》, 4 月 3 日,
http://epaper.oeeee.com/F/html/2011-04/03/content_1326428.htm, 2012 年 2 月 8 日浏览。
196. 潘毅、许宝强、严海蓉, 2011, “审视社会经济的公义想象”, 《明报(世纪版)》(香港), 3 月 17 日,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8686949/>, 2012 年 2 月 8 日浏览。
197. 潘岳, 2008, “关于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几点看法(上)”, 《资源与人居环境》, 第 10 期。
198. 佩尤托著, 叶舒宪译, 2003, “佛教经济学”, 《是明灯还是幻想——天涯精品系列丛书经典文献卷》, 韩少功、蒋子丹主编,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 齐泽克著, 季广茂译, 2002, 《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 钱理群, 2007, “中国大陆六代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运动的历史回顾”,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 9 月号, 总 67 期。
201. 秦红增, 2005, “乡村社会两类知识体系的冲突”, 《开放时代》, 第 3 期。
202. 清秋子, 2010, 《中国人能做到——民国实业家卢作孚》, 江苏: 凤凰出版社。
203. 邱建生, “‘知识农村化, 农村知识化’——翟城实验区的疑虑和希望”, 《开放时代》, 2005 年第 6 期。
204. 邱建生, 2010a, “平民教育和社区大学的理想”, 个人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165a30100o5n6.html, 2011 年 12 月 8 日查阅。
205. 邱建生, 2010b, “新农村建设中的平民教育实践案例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推广硕士学位论文。
206. 邱建生, “使无力者有力, 有力者有爱——厦门国仁工友社区教育促进项目介绍”, 个人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165a301009bd3.html, 2011 年 12 月 9 日浏览。
207. Roger Silverstone 著, 陈玉箴译, 2003, 《媒体概念十六讲》, 台湾: 韦伯文化。
208. 萨米尔·阿明著, 彭松译, 2011, “过时的资本主义和新的世界紊乱”, 《热风学术》(第五辑), 王晓明、蔡翔主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9. 赛珍珠, 1945, “告语人民——与晏阳初谈平民教育运动”, 《晏阳初全集》(第二卷), 宋恩荣主编, 1992 年,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10. 桑东华, 2004, “五四平民教育思潮的演变、分化和发展”, 《党史研究与教学》, 第 4 期。
211. 斯图尔特·霍尔编, 徐亮 陆兴华译, 2005, 《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 商务印

书馆。

212. 社区伙伴编著, 2012, 《让梦想扎根: 一群青年人的成长与对话笔记》,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13. 舒飞廉, 2004, 《飞廉的村庄》,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14. 宋恩荣, 1995, “最好的纪念”, 《晏阳初纪念文集》, 1996, 晏阳初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15. 宋恩荣, 2008, “重提‘平民教育’的现实意义”,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第10卷, 第9期。
216. 孙津, 2004, 《中国农民与农业现代化》,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17. 孙立平, 2004, “关注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的新变化”, 《社会科学论坛》, 第1期。
218. 孙冶方, 1983, “为什么要批评乡村改良主义工作”, 《〈中国农村〉论文选》, 薛暮桥、冯和法编, 1983,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19. 石勇, 2008, “被文化殖民的农村——读〈L县见闻〉”, 《乡土中国与文化研究》, 薛毅编,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20. 石元春, 2006, “从农业发展历史看科学与人文的互动”, 《光明日报(网络版)》, 2006-01-26, <http://www.southcn.com/nflr/llzhuanti/gzsn/sngc/200601260201.htm>, 2007年12月8日浏览。
221. 石嫣, 2010, 《替代食物体系中的信任建立机制: 一项社区支持农业的参与式行动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论文。
222. 石嫣等, 2011, “生态型都市农业发展与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兴起相关性分析——基于小毛驴市民农园社区支持农业(CSA)运作的参与式研究”, 《贵州社会科学》, 第2期。
223. 石嫣, 2011, “多元、平衡——未来农业的发展趋势”, 《绿叶》, 2011年第5期。
224. 石嫣、程存旺, 2011, “社区支持农业(CSA)在中国大陆”, 《第三届全国社区支持农业(CSA)经验交流会资料汇编》, 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编印(内部资料)。
225. 谭翊飞, 2009, “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 载得动三农几多愁?”,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96899>, 2009年5月2日查阅。
226. 汤普森著, 钱乘旦等译, 2001, 《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27. 汤普森著, 沈汉、王加丰译, 2002, 《共有的习惯》,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28. 陶行知, 1927, “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创校概况”, 《陶行知教育论著选》, 董宝良主编, 1991,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29. 陶行知, 1928, “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 《陶行知教育论著选》, 董宝良主编, 1991,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30. 陶行知, 1946, “教育生活漫忆”, 《陶行知教育论著选》, 董宝良主编, 1991,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31. 涛鸣, 1932, “定县见闻杂录”(《独立评论》第4号, 民国21年6月12日), 《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 李济东主编, 1990,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32. 田松, 2010, “推广转基因技术首先不是科学问题”, 《读书》, 第7期。
233. 仝志辉, 2008, “‘部门分立体制’下涉农部门合作的空间——以R市农村合作协会为

- 例”，《中国乡村研究》（第六辑），黄宗智主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34. 仝志辉、温铁军，2009，“资本和部门下乡与小农户经济的组织化道路——兼对专业合作社道路提出质疑”，《开放时代》，第4期。
 235. 托德·吉特林著，张锐译，胡正荣校，2007，《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北京：华夏出版社。
 236. 王雯婷，2012，“谢英俊的乡村住宅产业之路”，
<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a3038>，2012年1月3日浏览。
 237. 汪晖，2000年，“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死火重温》，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38. 汪晖，2008，“‘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三联书店。
 239. 汪晖，2008，《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三联书店。
 240. 汪晖，2008，“环保是未来的‘大政治’——打破发展主义共识，寻找新出路”，《绿叶》，2008年第2期。
 241. 汪晖，2010，“‘九十年代’的终结”，《热风学术》（第四辑），王晓明、蔡翔主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42. 王俊秀，2006，“打造新农民的‘黄埔军校’”，《中国青年报》，2006年5月12日。
 243. 王绍光，2002，“金钱与自主——市民社会面临的两难境地”，《开放时代》，第3期。
 244. 王绍光，2008，“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245. 王先明，2009，《变动时代的乡绅——乡绅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1901-1945）》，北京：人民出版社。
 246. 王晓明，2000，“导论”，《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90年代的文化与文学分析》，王晓明主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47. 王晓明，2008，“L县见闻”，《乡土中国与文化研究》，薛毅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48. 王晓明，2012，“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从首尔到墨尔本：太平洋西岸文化研究的历史与未来》，王晓明、朱善杰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49. 魏灼，2010，“不跟传媒玩同一场游戏”，《台湾社会研究季刊》，9月号。
 250. 文佳筠，2011，“环境和资源危机时代农业向何处去？——古巴、朝鲜和美国农业的启示”，《开放时代》，第4期
 251. 温铁军，2001，“百年中国 一波四折”，《读书》，第3期。
 252. 温铁军、熊景明、黄平、于建嵘，2003，“中国大陆乡村建设运动”，《开放时代》，第2期。
 253. 温铁军，2004a，《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逻辑——发展经济学阅读讨论提纲》（未刊稿）。
 254. 温铁军，2004b，《解构现代化——温铁军演讲录》，广东人民出版社。
 255. 温铁军，2004c，《我们到底要什么》，北京：华夏出版社。
 256. 温铁军，2004d，“全球化与世界法西斯主义”，《解构现代化——温铁军演讲录》，广东

人民出版社。

257. 温铁军, 2005a, “产业资本与乡村建设”, 《开放时代》, 第 6 期。
258. 温铁军, 2005b, “我们还需要乡村建设”, 《开放时代》, 第 6 期。
259. 温铁军, 2006, “新农村建设与城乡和谐社会”, 《新农村建设理论探索》, 温铁军主编, 北京: 文津出版社。
260. 温铁军, 2009, 《“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 中国经济出版社。
261. 温铁军、刘海英, 2009, “家电下乡与问题分析”, 《中国金融》, 第 6 期。
262. 温铁军, 2010, “市民农业的实验”, 《第二届全国社区支持农业(CSA)经验交流会资料汇编》, 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编印, (内部资料)。
263. 温铁军主编, 2010, 《中国新农村建设报告》, 福建人民出版社。
264. 温铁军、董筱丹, 2010, “村社理性: 破解“三农”与“三治”困境的一个新视角”,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8 月。
265. 温铁军、董筱丹、石嫣, 2010, “中国农业发展方向的转变和政策导向: 基于国际比较研究的视角”, 《农业经济问题》, 2010 年第 10 期。
266. 温铁军、邱建生, 2010, “‘三农问题重中之重’与我国教育体制的适应性调整”, 《民族教育研究》, 2010 年第 1 期, 第 21 卷, 总第 96 期。
267. 温铁军, 2011, “改出百年激进——近期中国发生的历史阶段变化”, <http://roll.sohu.com/20110926/n320555314.shtml>, 2011 年 10 月 26 日查看。
268. 韦政通, 1991, “‘创造转化’与‘自我实现’——论晏阳初的思想与人格”, 《教育与社会发展——晏阳初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宋恩荣主编,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69. 翁仕友, 2008, “乡建学院关闭 新‘定县实验’终局?”, 《经济观察报》, 2008 年 1 月 7 日。
270. 吴飞, 2009, “乡村建设与现代中国文明”,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第 7 卷第 3 期。
271. 吴飞, 2009, “从乡约到乡村建设”, 《思想与社会》(第七辑: 教育与现代社会), 上海: 三联书店,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de782e0100cxo5.html, 2011 年 9 月 29 日浏览。
272. 吴光芸、李建华, 2007, “培育乡村社会资本、促进农民合作”, 《当代经济管理》, 第 29 卷第 2 期。
273. 吴建兴, 2006, “撼动世界的成人教育学家: 包罗·弗雷勒”, 《区区一出戏——社区剧场理念与实务手册》, 赖淑雅主编, 台湾应用剧场发展中心、财团法人跨界文教基金会。
274. 吴景超, 1934, “我们没有歧路”, 《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 罗荣渠主编, 2008, 合肥: 黄山书社。
275. 吴相湘, 2001, 《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 长沙: 岳麓书社。
276. 吴志峰, 2008, “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叙事——知青文学(1966-1986)研究”, 《乡土中国与文化研究》, 薛毅编, 2008,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77. 夏军, 1998, “杜威实用主义理论与中国乡村建设运动”, 《民国档案》, 第 3 期。
278. 夏林清, 1996, “实践取向的研究方法”, 《质性研究: 理论、方法及本土女性主义研究

- 实例》，胡幼慧主编，台北：巨流图书。
279. 夏晓鹃，2002，《流离寻岸——资本国际化下的“外籍新娘”现象》，台湾社会研究丛刊 09。
280. 萧功秦，1999，《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81. 熊培云，2011，“1953 年毛泽东批梁漱溟提农民困难是妇人之仁”，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1_05/24/6586457_0.shtml? from_raated](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1_05/24/6586457_0.shtml?from_raated)，2012 年 5 月 6 日浏览。
282. 徐国伟，2003，《米话唔关你事——亚洲米农的困局》，香港乐施会出版。
283. 徐凌涛，2010，“蔬菜配送记”，《田间地头》（内部资料），第 8 期，小毛驴市民农园。
284. 许宝强，1998，“没有界限的经济与经济学”，《读书》，第 8 期。
285. 许宝强、汪晖选编，2001，《发展的幻象》，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86. 许宝强，2001，“导言：反市场的资本主义”，《反市场的资本主义》，许宝强、渠敬东选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87. 许宝强，2007，《资本主义不是什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88. 许宝强，2009，“导读：为什么要盘点 怎样才算认真？”，《盘点 I H 认真通识》，陈清侨等著，香港岭南大学群芳文化研究及发展部。
289. 许宝强，2009，“文化中介的专业化——在全球化时代中重译经济”，《方法与个案——文化研究演讲集》，孙晓忠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90.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1995，《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上海：三联书店。
291. 许纪霖，2000，“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李世涛主编，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92. 许兆麟、刘健芝，2005，“序一：一线之差——封闭/开放的（历史）阅读”，《庶民研究》，许兆麟 刘健芝选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93. 徐有礼、郭晓平、孙子文、胡振拴，1999，《30 年代宛西乡村建设模式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
294. 薛暮桥，1983，“关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及白区工作问题——给少奇同志的报告”，《〈中国农村〉论文选》，薛暮桥、冯和法编，1983，北京：人民出版社。
295. 薛伟强，2006，“晏阳初研究八十年”，《河北学刊》，第 26 卷，第 2 期。
296. 塩见直纪，2006，《半农半 X 的生活——顺从自然，实践天赋》，台湾天下文化书坊。
297. 晏阳初，1927a，“平民教育的真义”，《晏阳初全集》（第一卷），宋恩荣主编，1989 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98. 晏阳初，1927b，“平民教育的宗旨目的和最后的使命”，《晏阳初全集》（第一卷），宋恩荣主编，1989 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99. 晏阳初，1928，“平民教育概论”，《晏阳初全集》（第一卷），宋恩荣主编，1989 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300. 晏阳初，1929a，“有文化的中国新农民”，《晏阳初全集》（第一卷），宋恩荣主编，1989

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301. 晏阳初，1929b，“中国的新民”，《晏阳初全集》（第一卷），宋恩荣主编，1989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302. 晏阳初，1932，“在欢迎来宾会上的讲话”，《晏阳初全集》（第一卷），宋恩荣主编，1989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303. 晏阳初，1933，“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工作大概”，《晏阳初全集》（第一卷），宋恩荣主编，1989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304. 晏阳初，1934，“农村运动的使命”，《晏阳初全集》（第一卷），宋恩荣主编，1989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305. 晏阳初，1934，“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晏阳初全集》（第一卷），宋恩荣主编，1989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306. 晏阳初，1935a，“农民运动与民族自救”，《晏阳初全集》（第一卷），宋恩荣主编，1989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307. 晏阳初，1935b，“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演进的几个阶段”，《晏阳初全集》（第一卷），宋恩荣主编，1989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308. 晏阳初，1935c，“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的演进”，《晏阳初全集》（第一卷），宋恩荣主编，1989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309. 晏阳初，1937，“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晏阳初全集》（第一卷），宋恩荣主编，1989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310. 晏阳初，1938，“农村建设要义”，《晏阳初全集》（第二卷），宋恩荣主编，1992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311. 晏阳初，1940，“实习区的意义”，《晏阳初全集》（第二卷），宋恩荣主编，1992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312. 晏阳初，1942，“平教运动的回顾”，《晏阳初全集》（第二卷），宋恩荣主编，1992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313. 晏阳初，1948，“开发民力 建设乡村”，《晏阳初全集》（第二卷），宋恩荣主编，1992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314. 晏阳初，1965，“关于乡村改造运动的总结”，《晏阳初全集》（第二卷），宋恩荣主编，1992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315. 晏阳初，1978，“在第十届国际乡村改造培训班上的报告”，《晏阳初全集》（第二卷），宋恩荣主编，1992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316. 晏阳初，1979，“就‘乡村改造’答记者问”，《晏阳初全集》（第二卷），宋恩荣主编，1992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317. 晏阳初，1980，“乡村改造的要素与国际乡村改造学院的精神”，《晏阳初全集》（第二卷），宋恩荣主编，1992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318. 晏阳初，1987a，“我为什么第二次回到祖国”，《晏阳初全集》（第二卷），宋恩荣主编，1992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319. 晏阳初，1987b，“九十自述”，《晏阳初全集》（第二卷），宋恩荣主编，1992年，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320. 晏阳初, 1988, “乡村改造运动十大信条”, 《晏阳初全集》(第二卷), 宋恩荣主编, 1992年,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321. 晏阳初, 1989, 《晏阳初全集》(第一卷), 宋恩荣主编,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322. 晏阳初, 1992, 《晏阳初全集》(第三卷), 宋恩荣主编,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323. 严晓辉, 2011, “小毛驴市民农园三年运作总结”, 《第三届全国社区支持农业(CSA)经验交流会资料汇编》, 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编印(内部资料)。
324. 严晓辉, 2012, 《2011年度乡建工作总结会会议记录》(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主办, 2012年1月5日)(内部档案)。
325. 杨彩丹, 2011, “北京高师平民教育社述评”, 《教育学报》, 第7卷, 第1期。
326. 杨东平, 2008, “平民教育的流变和当代发展”,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第29卷, 第3期。
327. 杨念群, 2001, 《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328. 杨帅、温铁军, 2008, “发展生态农业的国际经验及本土试验研究”, 《环境保护》, 第15期。
329. 杨雅如, 2007, “从‘囚徒困境’到‘智猪博弈’——资本在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供给中的作用”, www.snzg.cn/article/2007/1212/article_8410.html, 2011年8月7日浏览。
330. 杨雅如, 2010, “当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外部条件调整研究”, 《2010年农民合作经济发展顶级论坛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等主办)。
331. 伊丽莎白·亨德森等, 石嫣、程存旺译, 2011, “世界范围内的社区支持农业”, 《第三届全国社区支持农业(CSA)经验交流会资料汇编》, 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编印(内部资料)。
332. 尹瑞庆, 2010, “老知青菜园的故事和随想”, 《田间地头》(内部资料), 第11期, 小毛驴市民农园。
333. 尹瑞庆, 2012, “就‘四不’问题, 与孙先生商榷”, 《田间地头》(内部资料), 第1期(内部资料), 小毛驴市民农园。
334. 应星, 2001, 《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北京: 三联书店。
335. 游丽金, 2004,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记一次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 《中国改革(农村版)》, 2004年第8期。
336. 余霖, 1983, “乡村工作的理论和实践——读了<教育与民众>七卷一二两期后的感想”, 《<中国农村>论文选》, 薛暮桥、冯和法编, 1983, 北京: 人民出版社。
337. 余英时,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与保守”, 《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上卷)》(第二版), 许纪霖编,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338. 苑鹏, 2001, “中国农村市场化进程中的农民合作组织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第6期。
339.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著, 耿建新、宋兴无译, 2006, 《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340. 詹姆斯·C·斯科特著, 程立显等译, 2001,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北京: 译林出版社。

341. 詹姆斯·克利福德, 2006, “导言: 部分的真理”, 《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 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 马库斯编, 北京: 商务印书馆。
342. 张灏, 2000, “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思想道路”, 《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 李世涛主编,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343. 张慧瑜, 2008, “遮蔽与突显: 作为社会修辞的‘农民工’——‘农民工’在大众传媒中的再现”, 《乡土中国与文化研究》, 薛毅编,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344. 张慧瑜, 2008, “王石捐款、范跑跑事件及其公民社会的‘公民想象’”,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 9月号。
345. 张慧瑜, 2008, “‘爱的奉献’、公民社会的想象及批判的尴尬”,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 9月号。
346. 张和清、杨锡聪、古学斌, 2008, “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以能力建设和资产建立为核心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 《社会学研究》, 2008年第6期。
347. 张乐天, 2005, 《告别理想: 人民公社制度研究》,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348. 张亮, 2008, 《阶级、文化与民族传统》, 江苏人民出版社。
349. 张丽军, 2009, 《想象农民——乡土中国现代化语境下对农民的思想认知与审美显现(1895-1949)》,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350. 张鸣, 2001, 《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 广西人民出版社。
351. 张荣久, 2003, “称邓子恢‘小脚女人’之由来”, 《文史春秋》, 第2期。
352. 张荣禄, 1996, “试评五四时期‘教育救国’思潮”, 《唐都学刊》, 第3期, 第12卷, 总第49期。
353. 张允侯等, 1979, 《五四时期的社团(二)》, 北京: 三联书店。
354. 张志, 2006, “翟城乡村试验遇困局”, 《小康》, 2006年第5期。
355. 章元善, 1934, “从定县归来”(《独立评论》95号, 民国23年4月8日), 《晏阳初与定县平民教育》, 李济东主编, 1990,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356. 赵旭东, 1999, “农民、公民与意识形态——由三十年代的平民教育所想到的”, 《社会科学论坛》, 1999年第7-8期。
357. 赵旭东, 2008, “乡村成为问题与成为问题的中国乡村研究——围绕‘晏阳初模式’的知识社会学反思”, 《中国社会科学》, 第3期。
358. 赵旭东, 2009, “从‘问题中国’到‘理解中国’——作为西方他者的中国乡村研究及其创造性转化”, 《社会科学》, 第2期。
359. 中国人民大学重庆课题组, 2011, 《重庆新事》,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60. 钟庆卫, 《热衷炒作忽略实际: 警惕滥竽充数的“假合作社”》, 《农民日报》, 2006年11月24日, 网络来源:
http://news.xinhuanet.com/newcountryside/2006-11/24/content_5371113.htm, 2012年5月7日查阅。
361. 钟声, 2010, “我们为什么发起自取小组”, 《田间地头》(内部资料), 第5期, 小毛驴市民农园。
362. 周立, 2010, 《极化的发展》, 海口: 海南出版社。

363. 周年兴、俞孔坚, 2003, “农田与城市的自然融合”, 《第三届全国社区支持农业(CSA)经验交流会资料汇编》, 2011, 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编印(内部资料)。
364. 朱长振, 2007, 《兰考合作建设生态房的理想与现实》, http://www.snzg.cn/article/2007/0630/article_6403.html, 2012年5月8日浏览。
365. 朱健刚, 2008, 《行动的力量: 民间志愿组织实践逻辑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366. 朱晓阳、谭颖, 2010, “对中国‘发展’和‘发展干预’研究的反思”, 《社会学研究》, 2010年第4期。
367. 赵晓玲, 2010, 《卢作孚之死》, 香港: 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368. 郑大华, 2000,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369. 郑直淑, 2003, “梁漱溟受批公案揭底”, 《梁漱溟先生纪念文集》(第二版), 梁培宽编,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370. 周其仁编, 1994, 《农村变革与中国发展 (1978-1989)》, 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371. 作者不详, 2004, “‘乌托邦’实践 温铁军把‘另类’进行到底”, 《亚太经济时报》,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12月9日浏览。
372. 作者不详, 2005, “秀才下乡”, 凤凰卫视, 2005年9月22日播出。